

1979年创刊

1992年

近代史研究

1

(双月刊)

总第67期 1月出版

· 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

- 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陈高原 (1)
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郑云山 (23)
欧洲、日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西学东渐
的三部曲……………(港) 绝绍霖 (37)
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刘 平 (47)

• • •

-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章鸣九 (68)
再论左宗棠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的性质问题……………董蔡时 (82)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欧阳跃峰 (96)
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与思想近代化……………刘望龄 (116)
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尚明轩 (133)
孙中山图片考……………俞辛焯 (146)

• • •

- 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美) 周质平 (157)
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
几个问题……………杨奎松 (171)
1925—1937年间民族工矿业与航运业中的
联营活动……………王方中 (195)
“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徐辉琪 (214)
失败的外交记录——抗战初期的日本外交综论…王建朗 (230)

略论日伪新民会.....曾业英 (253)

读史札记

张静江出任国民党中央会主席考析.....陈国强 (270)

书评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科全书”——读

《辛亥革命辞典》.....胡绳武 (278)

有益的新尝试——读《胡适与他的朋

友》第一集.....雷 颐 (283)

动态

让苏联人民全面地认识中国——苏联

中国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活动之

警告.....薛衔天 (291)

记檀香山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

术讨论会.....张海鹏 (296)

1990年中国近代史书目索引.....近代史所图书馆 (299)

· 书讯 ·

《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出版..... (322)

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

陈高原

中国人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酿成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下文简称为“思潮”)，并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该思潮在五四以前产生与初步发展的状况及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力求从中得出某些启示。

(一)

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①。已初步接触到中西民风的比较。80年代，钟天纬提出“西人之性好动”，“华人之性好静”^②，涉及了民族性格问题。90年代，严复认为中国“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③，直接提出了对中国人的改造问题，成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导。但此类论述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都还寥寥无几。跨入20世纪后，这一思想迅速得到发挥。“五四”前20年中，涌现了大量有关国民性及其改造的讨论和文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② 转自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③ 严复：《原强》。

学作品。当时影响较大的各派刊物如改良派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革命派的《江苏》、《民报》、《河南》；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新青年》等都刊载过此类文章。几乎当时所有先进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谈论了这一问题。梁启超倡“新民”；鲁迅论“立人”；邹容主张去奴性，“进人格”；孙中山提出进行“心理建设”；陈独秀呼吁启发国人“伦理的觉悟”；李大钊提倡“由静的民族变为动的民族”；蔡元培倡导以教育“养成完全之人格”……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中国人心理素质和思想意识的更新问题而展开，互有联系，互相补充。他们的探索，把改造国民性思潮逐步推向高涨。

这一思潮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戊戌以后至辛亥以前，是其形成阶段；后期从辛亥以后至五四以前，是其初步发展阶段。前期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为主要代表，思潮经历一个从高涨到淡化的过程；后期波及各界先进知识分子，思潮呈逐步深化趋势，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新的高潮。整个思潮流变划下的轨迹是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V形曲线。

戊戌——辛亥期间，特别是20世纪最初几年，关于中国民族特性、国民精神面貌及其改造的探讨盛极一时。梁启超起初在《清议报》上发表《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过渡时代论》等文，抨击中国人奴性、旁观等“劣根性”，提出新时代新国民应有的“德性”。接着干脆取“新民”之义办起《新民丛报》，连载了他的10万字专著《新民论》，全面分析旧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根源，阐述“新民”（即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理想模式与实现途径，形成第一个系统的改造国民性理论——新民理论。邹容的《革命军》以及革命派的其它时论如《说国民》、《中国之改造》、《论中国的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国民新灵魂》、《国魂篇》等等，也大量论及革除国民劣根性，铸造新国魂的问题。

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新民”、新“国魂”的探讨，从发起

和参与讨论的主角来看，是当时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从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来看，数量不少，并多刊于国内外改良派、革命派的重要刊物或著作里，流行较广（如《新民说》、《革命军》等）；从讨论内容看，既有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及其根源的揭露和鞭挞，也有对新民新国魂必要性的阐述，对理想新人格的设计，以及对造就“新国民”、“新灵魂”途径的探索。可见，当时对这一问题的探求是先进中国人较广泛的思想倾向之一，并已形成初步的思想体系。按当时人们的理解，国民性指“各国国民所独具之性质”^①，改造国民性即改善一国国民普遍的心理素质和思想意识，使之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因此，二派所谈论的“中国人的德性”、“中国人的特点”、“中国魂”等，无不属中国国民性之列，他们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新民新国魂的追求，标志着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初步形成。

然而，国民性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思潮的曲折性。在思潮的形成期（辛亥革命以前），改良派革命派对国民性改造的认识，有一个由同到异的反复过程。1905年以前，以同为主。他们共同强调国民程度对国家政治变革的制约作用。如梁启超在论述新民之必要时指出：“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虐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英美各国之民，正因为程度高，故“常不待贤君相而足以致治”。这里所说的国民程度，指的是“民德、民智、民力”。他认为，有德智力皆高的“新民”，则“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②所以，他说他“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烈烈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

① 《论中国之国民性》，《东方杂志》第5卷第6期。

② 梁启超：《新民说》。

之英雄!”^①希望铸成无数德智力兼优的新国民。革命派也提出：“政治之善恶，常视国民进化之程度为正比例，其民为自主独立之民，其国即为自主独立之国。”^②

正因为深感国民素质于国家政治之至关重大，改良派和革命派把国民“劣根性”视为中国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予以揭露、痛斥。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数列了中国人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劣性，在《新民说》等文中进一步发挥，特别是着重地抨击了奴性与旁观。所谓奴性，即奴隶性格，包括缺乏权利思想和自由思想，盲从古人，迷信天命，爱随大流等等。他认为，中国人既甘为“身奴”，又自为“心奴”，是为国家积弱之源。至于旁观，也是四万万“中国人之性质”，是“国虽大而必亡”之因^③。革命派对奴性的批判尤为激烈。邹容称中国二十四朝之史为“一部大奴隶史”，叹“中国人自乐为奴隶”，甚至把被梁启超尊为豪杰的曾国藩、李鸿章之辈斥为“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他指出奴性乃中国之病根，因而把“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与“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相并列，作为革命的口号^④。革命派对中国人的旁观也常予针砭，指出苟安自图、只知劳作而“不知国界，不谈政治，此支那人物普通之本色”^⑤。此外，改良派和革命派还鞭挞了中国人保守、自我封闭、缺乏冒险猛进精神等不良习性。

对于这些不良习性，他们动辄称之为中国人的“劣根性”或“第二天性”，但实际上并不视之为天生固有不可移易的东西，而是积极地从自然和社会条件上寻找其产生渊源。梁启超说：“故夫

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

②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

③ 参见梁启超：《新民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阿旁观者文》。

④ 邹容：《革命军》。

⑤ 《中国之改造》，《大陆》第8期，1903年。

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①即把旁观归因于奴性，把奴性又归咎于专制统治。邹容更明确指出：“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②。另一方面，他们还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国民性的危害。梁启超称礼教为“驯之之术”，是历代统治者培植中国人奴性的四术之一^③。革命派也指出“重礼则养成卑屈之风，服从之性”^④。

根据上述认识，两派提出了基本一致的改造国民性模式，即发扬中国民族精神之精华，补以他国国民精神之精粹，以涤除国民劣根性，铸造新民新国魂。从梁启超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过渡时代论》和《新民说》、壮游的《国民新灵魂》和邹容的《革命军》等文来看，可归结为几点：一、以独立自由精神取代奴性；二、以公德心、义务感取代旁观；三、以进取冒险、尚武坚毅取代保守怯弱；四、以既自尊又虚心取代夜郎自大、自我封闭；五、有政治观念和自治精神。至于造成这种理想人格的途径，两派都强调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不同的是，当涉及宣传教育和政治运动的关系时，梁启超倾向于前者，认为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唤醒国民，促使其进行自我改造。有了新国民，才能有新制度新政府。革命派则更强调政治革命的根本作用。但总起来说，这时分歧还不突出。

1905年以后，两派歧造国民性思想产生了严重分歧，主要表现在1905—1907年的政治大论战中，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国民程度的估价，二是对提高国民程度途径的认识。对于国民程度的估价，两派的分歧在于：梁启超继续强调国民程度的低下，

① 梁启超：《新民说》。

② 邹容：《革命军》。

③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④ 《权利篇》，《直说》第2期，1903年。

国民性格的落后，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只能适于开明专制；革命派则很少再谈国民劣根性，反而极力强调中国人程度不低，具有共和立宪所需要的国民品格^①。这种分歧，决定了两派对国民性改造途径也取不同态度。梁氏以国民程度低下为由坚决反对革命，同时也不再象1905年以前那么强调宣传教育的决定作用，转而强调政治改良对国民性改造的制约性，提出国民心理的洗涤更新有赖于教育变革，而教育的改造又有赖于政治改良。革命派则以中国人程度本来不低为由主张通过政治革命“去其沮遏”，使固有国民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说到底，分歧的焦点在于两派的政治分野。分歧的明朗化主要也正是由于1905年以后两派政治冲突的激化所致。

1907年，两派的论战以改良派的失败告终。此后几年，理论界相对平静。革命派一方面因为在理论上战胜了改良派，在实践上忙于发动起义而放松了思想启蒙宣传，另一方面出于发动群众投身革命的需要而回避谈论国民劣根性；改良派则一方面由于论战的失败，在理论上威望下跌，失去探讨国民性问题的市场，另一方面热衷于立宪运动，出于要求立宪的需要而不敢再力陈国民程度之低下。所以，改造国民性思潮明显地淡化。

(二)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主共和制度的流产，人们对中国国民程度和国民性格的怀疑、抨击和改造愿望进一步强化，于是，辛亥至五四期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改造国民性思潮重趋高涨。

这一时期，思潮波及面更大。辛亥以前，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主要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进行。而在这一时期，却成了知识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思潮波及政治、教育、文学等各领

^① 参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汪兆铭《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

域。热心讨论这一问题的，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派政论家；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人；有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新教育家；还有以伦父、钱智修为代表的《东方杂志》派。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一直对中国国民程度估价甚高，而此时也意识到中国人思想意识和心理素质之缺陷，写成旨在改造“国人社会心理”的《孙文学说》，抨击中国人的奴性、保守性和自我封闭性。陈独秀、李大钊以《新青年》、《甲寅》、《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强烈鞭挞中国“卑劣无耻退蕙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呼吁进行“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①。鲁迅更以其犀利的小说杂文批判了中国人的不良“民族根性”而成为“针砭民族性的国手”^②。蔡元培则极力推行新教育，探求养成国民“完全人格”之道。至于钱智修等《东方杂志》派改良主义者，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文章，不过其消极因素大大增加，甚至逐步走向了思潮的反面。

此期思潮内容也愈加深广。人们开始把中国民族性放到整个“东洋民族性”中考察，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除了继续鞭挞奴性、旁观、守旧之处，进一步扩大到对麻木、愚昧、不洁、诈伪、民族自大、尚情任力等病态心理和习性的抨击。在挖掘劣根性根源方面，不但进一步批判封建专制政治和纲常名教对国民性的扭曲，还深入到对经济、社会背景的剖析。李大钊指出东洋国家的自然与经济条件对东洋人消极、保守等特性的决定作用^③；陈独秀则从东方民族宗法社会的特点考察东方人缺乏独立、自由、平等精神的根源^④。他们把努力进取，追求成功，既发展个性又造福人类，视为人生的归宿、历史的使

① 陈独秀：《我之爱国议》。

② 许寿裳：《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③ 参见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④ 参见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异同》。

命。他们已经看到，只有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才有可能养成真正牢固的新国民道德。再如审美意识，是辛亥以前被忽略的心理要素，这时则被列入了理想人格的模式。蔡元培说：

“凡民族性质偏于美者，遇事均能从容应付。虽当颠沛流离之际，决不改变其常度”。这便是“美术与国民性之关系”^①。所以，要改良中国国民性，不能不培养其审美意识与刚强意志。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弥补了辛亥以前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大缺陷。

综上所述，辛亥前后20年间，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以一种不可阻抑的趋势产生、发展，虽有挫折，有低潮，但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这一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的、时代的和文化的根源。20世纪初年，改造国民性问题之所以引起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共同关注，并初步形成一个社会思潮，主要原因有几方面：

1. 历史的经验教训。首先必须承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在政治态度上有根本分歧，但对资本主义制度，对近代化的追求是其一致的方向。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其确立必将意味着对封建主义的全面否定，包括对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以至文化意识的背叛。换言之，要实现近代化，孤立地建立资本主义政治或经济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社会文化、国民意识的更新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是近代中外历史发展所展现出来的规律。改良派和革命派正是在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中外历史经验教训中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

梁启超1922年在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时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②这里说的虽然是辛亥以后的总体情况，但

① 蔡元培：《我之欧战观》。

②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反映了这种从失败中觉醒过来，从政治变革转向人格改造的思想转变倾向。就梁启超等早就从事国民性思考的“先觉”者而言，这种思想转变来得早些，是鉴于戊戌变法的落空而形成的。只要看看梁氏在戊戌前后的不同论述，便可明了这一点，戊戌以前，他在《变法通议》中力陈政治、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把官制即政治制度的变革视为根本和急务。认为“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人的改造有赖于政治制度的改善。戊戌以后，虽然其改良的政治态度未变，但意识到人的改造对政治改良的制约作用。他一再指出变法未竟原因之一在于民习民性未得改造。“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中国人“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①不难看出，他是从变法的失败中悟出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的。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也为中国有识之士提供了历史的启迪。革命派倡导以武装暴动改造中国，但从欧美资产阶级的历史中他们又体会到，革命需要民众，需要具有德、智、学的广大国民的支持；破坏为了建设，要建设西方式的新社会，必培育西方式的新国民。邹容正是在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把国民性改造视为革命之前提，并设计出一系列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特色的新人格构想的^②。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改良派、革命派虽出于不同政治目的，却共同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历史课题。

2. 时局的严重压迫。正因为感觉到国民程度的重要性，所以局势愈严峻，他们对国民性改造求之愈切，对劣根性责之愈苛。20

① 梁启超：《新民说》。

② 邹容：《革命军》。

世纪初年，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屈辱求降，列强割地索款，不可一世。民众反帝斗争受挫。袖手旁观，俯首为奴者，似乎反倒自在。不论革命派或改良派，热忱爱国者，无不为之痛心而力图唤醒之，鞭策之。显然，亡国灭种的压迫感是驱使他们批判奴性与旁观，呼唤新民新国魂的动因之一。

3. 传统的思维惯性。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力”，重道德修炼。孔子在探究周礼崩坏原因的时候，已开始着眼于人心的考察。他认为是人心的麻痹堕落才导致礼乐的崩坏，因而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以德教民，以礼齐民；“克己复礼为仁”。《大学》所倡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即显扬美德，革新民习、达于至善，其核心也是道德修炼，倡导以“修身为本”。此后二千年封建社会，统治者动辄曰人心不古，士风日下，以整肃民心为巩固统治之妙方。虽然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封建制度乃至封建文化的叛逆者，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质上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整肃人心（下详），但其中却隐含着这一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即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从个人道德修炼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梁启超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他的“新民”取义于《大学》的“作新民”：

“《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故能真得力于悔字诀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于世界，大学所谓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则一身进步。国民如是，则一国进步。”^①就是说，根据《大学》的意思，自我反省是进步的动力，个人能通过自我反省去除不良习性，就能获得自新。社会上人人如此，则能造出新民，使社会进步。后来写《新民说》，如他自己所讲的，正是贯彻了这一思想，即旨在启发国民通过反省进行自我改造。在《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中，他更明确地表

①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

白其受《大学》的影响：“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

为了达到修身目的，古人乐于进行理想人格的构想。如果说在三代时人们只是热衷于对“圣王”品格的赞美，那末到了秦汉以后，知识分子则致力于对儒者理想人格的设计。如《礼记·儒行篇》便提出了刚毅、守义、忧思、宽裕、尊让等一系列人格构想。改良派、革命派所倡导的新国民、新灵魂诸特性，正是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新的理想人格构想，目的也是为人的自我改造提供理想方案。当然，它与古代人格构想在内容上已有了根本区别，其对象也由理想的儒变成了理想的国民。但其受前人的影响却不可否认。

4. 外国的影响与刺激。在考察国民性思想产生原因时，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述二派探讨国民性改造的文章，几乎全是发表于日本，或由留日归来者所撰。梁启超畅言“新民”思想的园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出版于横滨；曾发表过不少呼唤新国魂，批判劣根性时论的革命派重要刊物《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都创办于东京；《革命军》则是邹容1903年刚从日本回来时写成的。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出现，是否与日本思想的影响有关？通过比较，我们惊讶地发现，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论述，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明治初期，“明六社”主要成员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思想家致力于“文明开化”的启蒙宣传，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改造日本国民的旧风尚、旧习性，造就德、智兼优的日本新国民。他们认为，国民德、智的提高是国家进步的前提。福泽谕吉指出：政治与文明程度相辅相成，“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而文明程度则取决于人民的智德。“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

^① 见《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

……这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我国两个要求。”^①森有礼也强调“丰富人的才智、增进人的品德”。中村正直则提出通过“艺术”和“教育”去“改造人民的性质”^②。在探讨如何改造人民性质，提高人民智德时，他们抨击了日本人乃至亚洲人的奴性与旁观，提倡培养独立性和社会义务感。福泽谕吉指出：“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媚人。”而独立精神正是近代“文明的精神”，所以要使日本文明发达，就必须大力培养“人民的独立精神”。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③

可以说，改良派、革命派对改造国民性必要性的阐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新国民精神的倡导，其基本精神大都能从日本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类似的论述。这决不是巧合，而是具有依承关系。

他们虽然很少直接表白这种关系，但他们对日本近代历史和近代思想的推崇态度，却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一点。革命派召唤国民新灵魂，就是受日本“大和魂”的启发。较早谈及“国魂”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一文表明了这一点：“吾闻日本立国之原素，由人人抱有所谓‘大和魂’者，吾中国之士民，相安于不识不知之中，其灵魂之丧失也久矣。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既终，乃为楚言以招之曰：魂兮归来！”^④梁启超则径直引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论证礼教对奴性形成的影响，对中村正直翻译英人斯巴尔斯的《自助论》以“振起国民之志气”也推崇备至^⑤。根据这种

① 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版。

② 《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46、52页。

③ 参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版。

④ 见《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

⑤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版。

思想倾向，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受到日本启蒙思想的影响，是合乎思维逻辑的，其论述的雷同表现出一种师承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日本近代思想许多来自西方，近代中国人受日本思想影响的同时，也通过日本间接或到西方直接地吸取西方的近代思想，这也是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成因之一。如关于民力、民智、民德之说，就是取自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梁启超逃亡日本以前已从严复那里间接了解到这一学说，到日本后更多次加以发挥。1899年他在《文野三界之别》文中指出：“故西儒云：国家之政事，譬之则寒暑表也；民间之风气，譬之则犹空气也。空气之燥湿冷热，而表之升降随之，丝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符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迹以尽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在《新民说》中又以此例论证新民之必要。这段西儒之话，当为斯宾塞的意思，与梁氏1903年在《记斯宾塞论日本宪法语》中所转述的“政治之进路，由初阶渐次以达绝顶，其进步程度，一依其国民智德力之程度以为定”一语，观点完全一致，可见，斯宾塞的进化论成了他新民说的理论基础之一。

另外，外国人对中国人性格较系统的研究，也为中国人的自省提供了更多的借鉴。斯密斯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译《中国人气质》）一书就属此类。斯密斯是美国传教士，1890年集其在华20多年之见闻感受写成《中国人气质》，在上海《中国北方每日新闻》连续发表，后集成书，1894年在美国出版，1896年东京出版了日译本。书中分27章详细评述了他所认识的中国人特性。这一轰动一时的著作，梁启超等就算在国内没看到（实际上很可能看到），也应该会在日本看到。从其中内容来看，“麻木不仁”（the absence of nerves）、“知足常乐”（content and cheerfulness）、“缺乏公心”（the absence of public spirit）、“保守”（conservatism）等章节，与改良、革命

二派之所述也不无相似之处。后者受前者启发也是极有可能的。

概括来说，20世纪初年改造国民性思潮的产生，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历史的影响和时代的要求。八国联军入侵，半殖民地化加深，强化了中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使他们必然从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这一时代方向去探求拯救中国之路。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则驱使他们向单纯资产阶级政治或经济改良以外寻求新的出路，陷于更深沉的思索之中，在这思索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近代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启示，而强烈感受到民族性的“孱弱”、“劣根”对社会变革的严重阻碍，产生了从人的观念意识近代化、国民的心理素质与思想品德近代化角度探讨改造中国新途径的思想倾向，从而逐步形成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

(三)

至于辛亥以后思潮复兴和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就外在的直接因素看，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更多先进中国人看到即便推翻了专制王朝，没有思想文化的革命，没有国民精神面貌的更新，仍不能保证新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因而愈发感到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性。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为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气候。就内在的根本原因来说，则是由于国民性改造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下详）随着近代化历程的推进和社会思想的发展，人们对国民性的改造求之更切，认识更深。

那么应当如何评估这一思潮的价值和地位呢？它对国民劣根性的鞭挞，虽有不恰当甚或错误之处，但总体上说还是当时中国国情的一种反映。

诚然，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美品质，如平和、善良、勤劳等。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存在着某些特有的不良习性。二千年的封建专制、自然经济和封建意识会给中国人的心

理、意识、思想带来极严重的污染。

马克思就是在赞扬东方人积极面的同时，毫不隐讳地指出“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等消极面的^①。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文中还以印度为例分析了东方民族的社会经济特点和国民消极性格：“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他们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

上述论断，恰恰是明确地揭示了东方人存在着愚昧、奴性、苟安、旁观、自大等落后性的一面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从主流上讲，新思潮批判这些落后面，并非主观的臆想，而是切中当时中国国民性之弊害。

新思潮从不同角度揭示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则表明论者承认国民性乃历史的产物，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而他们倡导去除国民劣根性，塑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国民性，又表明其认识到国民性必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并致力于促成这种变化。

从民族立场角度讲，新思潮的实质决不是消极的对本民族的自我菲薄，而是一种积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前面已经指出，新思潮产生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梁启超、

^① 马克思：《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邹容等痛斥国民的奴性与旁观，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唤醒国民不当亡国奴。辛亥以后，陈独秀提倡“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也是为了“图根本之救亡”^①；鲁迅鞭挞国粹的自大，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②。如果说赞美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批评、鞭策则是其不可缺少的补充形式。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敢于揭露中国人的弱点，号召国民去除惰性，发扬独立精神和政治热忱，不当亡国奴，难道不是出于深沉的爱国心？鲁迅好友许寿裳说得对：“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由历史上，社会上各方面研究得极深。……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③对于这种“暴露症结”的爱国心，列宁也曾给予高度的肯定。他回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的批判：“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指出这种批判“是本着真正爱国精神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心情。”甚至列宁自己也本着这种爱国心，

“特别痛恨我们自己的奴隶式的过去……和我们自己的奴隶式的现在”，认为那种“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掩饰”的奴隶精神即奴性，“就是理应受到忿恨、鄙视和憎恶的东西了。”^④这些论述表明了列宁的两层意思：即对于缺少革命性，反而为自己奴隶地位辩护掩饰的奴性应当予以批判；这种批判是真正爱国的表现。虽然列宁是针对俄国讲的，但这话用于评价20世纪初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也完全适合。

从政治态度或社会理想角度讲，新思潮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是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潮。就动机而言，它虽然着

①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

② 鲁迅：《随感录·三十六》。

③ 见许寿裳《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④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列宁论民族问题》，中央民院研究部1955年版，第242—243页。

力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却根本不同于近代西方开始走下坡路的资产阶级所炮制的“群氓论”。19世纪末，意大利犯罪学家西盖勒的《作奸犯科的群氓》，法国政论家勒蓬的《群氓心理学》、《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等书，极力宣扬“群氓”论，把群众视为非理性者，把一切群众运动等同于“群氓”作乱。这是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后期人民运动面前惊恐万状，为了制止运动而对民众进行的肆意攻击^①。而20世纪初中国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恰恰相反，是为了使国民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精神面貌而抨击其苟安、屈从、旁观等惰性，是善意的、进取的鞭策。辛亥以前改良派倡言新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记取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而提出要新政治，必先新民；革命派呼唤新国魂，除了号召反帝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唤起人们的革命热情，使之投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建立民国的斗争。辛亥以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重新高涨，主要出发点则在于总结革命失败的精神因素，清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与巩固的社会心理障碍与思潮障碍。一句话，该思潮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始终围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只不过是鉴于政治改良与革命运动受挫，或出于发动革命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而企求从国民精神、国民心理的改造方面寻找解决这一历史主题的新钥匙而已。

就内容而言，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整肃人心或古代理想人格的构想，又有别于清廷兜售的所谓“新教育宗旨”，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旨在批判封建意识形态及封建时代国民精神，倡导资产阶级新国民精神的思想启蒙。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动辄曰民风不古，曰整肃人心，都是针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失灵而言。而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思潮所摈斥的奴性、怯懦、旁观、好伪、保守、麻木、愚昧、自大等劣根性，正如思潮所揭露的，无

^① [苏]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101—102页。

一不是封建专制政治、封建社会经济和封建意识形态长期压制、影响和毒害人民的产物。因而，思潮批判的矛头最终指向的是封建制度。思潮所呼吁的是使中国人从长期的封建束缚和熏陶中解脱出来，去除一切在封建社会染就的恶劣根性，与封建统治者的整肃人心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无论从动机还是从内容上讲都带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是与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近代化政治运动相应的，是以资产阶级国民精神、国民心理取代封建时代旧国民精神、国民心理的近代化思想启蒙运动。它虽然不是直接追求社会客体——社会制度的近代化，却追求着与此相应的社会主体——人的近代化。

但是，它又有别于一般的反封建思想。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有着强烈的反封建色彩，还具有鲜明的民族反思特色。它所批判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这一特殊社会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中的恶劣一面。

概括起来，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实质可以表述为：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以民族自救为出发点，着眼于国民心理与国民思想意识改造，追求中华民族人的近代化的爱国进步思想运动，是中国近代化总体思潮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个因子。

这一思潮的实质和积极意义决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具体来说，它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开拓中国民族性研究领域，以深刻的民族自省冲击了顽固的民族偏见，丰富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闭塞的自然经济和长期的强国地位，使中国人历来深谙夷夏之辨，对本民族缺乏正确认识，更谈不上认真的民族性研究。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①。长此以往，形成一种变态的“爱国主义”：

① 鲁迅：《华盖集续篇·马上支日记》。

似乎对本民族的盲目陶醉便是爱国（鲁迅称之为“爱国的自大”），而一讲到中国人的不足便有媚外不爱国之嫌。这种传统的民族偏见和变态的“爱国主义”，置于国际竞争激烈的近代世界，特别是落后挨打的近代中国，显然是十分有害的。改造国民性思潮第一次较系统地探求了中国民族性问题，大胆揭出中国国民性的痼疾。对于卸下中国人身上长期负荷的民族自大包袱，使之正确认识自我，迎头赶上先进国家，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同时，这种民族自省还赋予了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就不仅要崇敬她，捍卫她，还要善于正确地认识她，发现不足，扬长避短，不断地改造她。

其二，深化了对中国近代国情和近代化使命的认识，并留下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此以前，近代中国志士基本上只从经济、军事、政治的落后去认识中国国情，从这些社会客体的改造去描绘中国近代化的蓝图。虽然严复在19世纪末已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但未深入、系统。改造国民性思潮则开始较全面地从考察社会主体人的落后及其改造的角度去理解中国近代国情，把人的近代化提上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议事日程。这就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中国落后之迷，从更深的层次为中国近代化运动提出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的提出影响深远。五四运动及20～3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日趋成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没有辛亥前后对旧国民性的鞭挞，就不会有20年代作为批判国民劣根性典范的《阿Q正传》问世；没有辛亥前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经验教训，也不会有20—30年代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新飞跃——把发扬国民性优良面与暴露国民性不良面自觉充分地结合起来。

其三，警醒国民，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一定的国民心理基础。辛亥以前，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在海内外广为传播，影响颇大。1898—1907年，梁启超阐发新民理论的园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前后共出版了196

期，在国内外大量发行，《新民丛报》还印发了许多合订本。同时，梁启超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作了无数次演讲，赢得青年学生的推崇。如果说梁氏的新民学说在海外曾轰动一时的话，那么印数逾百万册的邹容《革命军》则是在国内掀起思想的狂涛。而他们对奴性、旁观的共同鞭挞，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伦理等国民劣根性根源的批判，对独立、自由、民主、社会义务感、冒险勇为精神的共同追求，恰恰是有意无意地（对梁启超来说就是意想不到地）激发了国民的革命热情，客观上成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辛亥以后，思潮扩大到各个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内容更加深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更大。五四爱国运动的掀起和迅速扩大，正是反映了国民关心国事，不愿当亡国奴的心理的增长，这不能不说与思潮的影响有关。

当然，改造国民性思潮也存在着局限性。在对待中国国民性中精粹与劣根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注重揭露劣根性而忽略总结优良面的偏向。虽然梁启超倡导“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革命派呼吁“中国魂”之归来，但对何谓“本所有”者，何谓“中国魂”，他们都缺乏具体论述，多为泛泛而谈，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对国民劣根性的全面理解，容易把中国人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甚至把好的一面也说成是坏的。

对国民性优劣二面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是这一思潮最根本的局限性，使它无法正确反映中国国民性的全貌，更不可能为如何将旧国民性改造成符合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新国民性问题找到完善的答案。

在探讨国民性改造中民德与民智更新的关系时，它表现出重德轻智的倾向。从严复、梁启超到陈独秀、蔡元培，都把民德更新、伦理觉悟、人格完善等视为国民性改造的核心，而把民智开发放到不显眼的从属地位（虽然也有提倡）。新民德固然重要，但对于素有强调道德教化而推行愚民政策传统，国民愚昧麻木缺乏求知欲的中国来说，过分重德轻智显然没有突破传统的樊笼，

不利于国民精神面貌的彻底改观。因为智德二者相辅相成，其更新对于近代化国民来说同样重要。如果国民不具备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社会知识与能力或科学技术，就不能真正去除奴性，发扬公德。更不能进行有效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包括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

此外，对于国民性改造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问题，思潮也未能较好解决。虽然思潮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变革结下不解之缘，并在客观上起过唤醒国民参加政治革命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思潮又表现出与政治革命不相协调的消极性，梁启超在倡导新民的同时，从未忘记对革命的抵制，他的新民理论包含着明显的反对革命的主观意向。革命派虽曾把批判劣根性与宣传革命联系起来，把改造国民性视为革命的前提（如邹容），但同时又存在着相反的一面，认为只要革命一起，便可奴性自除，独立性自立，民智自开（如章太炎、孙中山）。他们对国民性改造与政治革命的对立统一关系缺乏完整的理解，特别是在政治大辩论中，革命派为了论证革命可行而倾向于抬高国民程度，忽视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实际上割裂了国民性改造与政治革命的联系，随着革命的迫近，他们对国民性改造的探讨更趋淡化。辛亥以后改造国民性思潮虽然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推动作用，但随着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思潮又再次表现出与政治革命脱节的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针砭国民性的“国手”长时间地孤军奋战于思想领域。总之，尽管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本来是并行不悖的，但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发生发展过程却表现出与政治革命既相联系又相反对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使这一思潮始终未能与革命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辛亥前后的中国存在着一个长期延续，波及面较广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总起来说，思潮着重批判了二千年封建时代造成的种种国民劣根性，并描绘了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精神面貌为基调的新国民性，探讨了实现国民性改造的途径。

它是一个旨在救亡图存，实现中国人心理、思想、价值观念根本变革，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潮，是中国近代化总体思潮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不仅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且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但思潮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雷颐）

（作者陈高原，1957年生，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

《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出版

《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一书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新兴学科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果，由对民国史各专题有深入研究的黄逸平、姜义华、刘望龄、张宪文等学者共同撰写，所写专题包括从民国创立到解放战争时期（含北洋军阀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两个时期）及民国经济、民国思想文化、民主党派、华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日关系等。这些纵横交错的专题网络组成了民国史研究清晰的画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此书1992年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大32开本，516页，42万字，定价9.30元。订购者请汇款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邮编：100006）

辛亥前夕的国民性问题探讨

郑 云 山

本世纪初叶，有一些忧患国运的中国人，对我们民族的国民性作了探讨。那时也称国民性为国魂、国民精神、民族魂、民族性等等，所指包括一个民族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思维方法和风俗习惯之类，有时也把体魄状态、文化知识或文明程度纳入议论之列。

在当时的探讨中，人们主要是对我们国民性中的弱点作了无情揭示，并倡导用西方人为榜样来塑造新的民族风貌。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股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结局有直接间接关系，且在辛亥以后还时高时低地持续了几十年，它对近代中国人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也给后人留下深刻启示，值得认真加以总结。近几年来已有一些文章论及于此，我不愿赘述，也谈些刍见。

一 从历史的反思转向对国民性的探讨

揭示自己民族中某些优缺点，早已有之；但对比中西民族间不同的国民性，把中国的国民性作为一个专门问题以引起人们注目和探讨，却始于甲午战败之际。拉开序幕的是严复和谭嗣同。

严复在1895年即对中西民族之间的不同，作了相当全面而有深度的对比：“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

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① 继又列举洋务运动中的12项事物，感慨系之地说：

“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桔为枳之叹！”^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严复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民智即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因而他力主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作为中国的“治本之策”。这样，在由甲午战败、洋务破产引起的历史反思中，严复开始把探讨中国的国民性、提高民族素质的大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由于同样的历史原因，谭嗣同在稍后则以更激烈的言论揭示我们国民性中的问题，诸如：“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中国人有“固将杀尽含生之类而无不足”的好静、主俭两大致命弱点，等等。甚至认为中国人的体貌“亦有劫象”，“拟诸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③ 如同在别的一些问题上以激烈著称那样，谭嗣同上述言论也是火辣辣的；有的则不免偏颇，如他对“俭”的否定就显然不妥，用蔡元培后来的话来说，这是“耳食一种倒果为因之经济学”后所发的错误议论^④。但谭嗣同的偏激发自其深重的忧患意识，即使是对中国人体貌的那些令人难堪的描述，也旨在提醒国人重视体育，增强民族体质。

移植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器物到一个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里，并不能使这个社会起死回生，而移入的东西则难免变质；西方的一些东西来到中国后发生“淮桔为枳”的演变毫不为奇。发生这种演变，不但因社会制度不同之故，也确是同东西民族间存在的国民性差异有关。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沉痛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索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近30几年来中国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见王拭编《严复集》3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② 《原强》，《严复集》15页。

③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356、3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蔡元培全集》第3卷，6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人学习西方没有成功之因。严复、谭嗣同等正是从这种历史的反思中，把目光转到我们民族性的探讨上。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继洋务运动后向西方学习的第二次重大努力。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它重点向西方学习的不是器械，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维新派通过创办报刊、学堂、学会，介绍西学，开通民智，不仅为变法准备人才、动员舆论，事实上也是对改造国民性作了初步尝试。

戊戌变法取鉴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戊戌变法却失败了。从康、梁开始，人们就对彼成我败之因作过种种探讨，虽说法不一，却有一点是众人的共识：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保守思想过于强大。通过戊戌变法，人们更痛切地认识到：对于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简言之我们这古老民族的国民性，有加以深刻反思，去除弱点的必要，唯其如此，民族才复兴有望。

恰值此时，西学被大量译介进中国。这既大大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看到中西间在诸多领域存在的差距，更痛感自己的相形见绌；又使人再尝“淮桔为枳”的酸苦之味。梁启超1903年列举5年来海外传入的自由、平等、竞争、权利、革命等学说在中国所起的消极作用后，深叹“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①与8年前严复的感叹完全相同！尽管他说得未必正确，但表明“淮桔为枳”的老问题仍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振兴。

国内的情况促人反思，在外的刺激也令人惊悟。20世纪之初蜂涌出国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遭遇的屈辱与难堪，常常激起中国人改善民族形象和素质的强烈愿望。留日学生们饭后茶余“在附近散步，亦往往听见妇孺之辈‘豚尾奴，豚尾奴’的叫骂声”^②；“凡吾人所至之地，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

①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第3册。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425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才’之号。或侮之，或辱之，甚或以枪轰毙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① 这些对于稍有血气的中国青年，不能不生彻骨铭心之痛。著名的青年革命家陈天华，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的诋毁；鲁迅弃医从文，决心从改造国人的精神着手来救国救民，都是对在异邦所受刺激作出的强烈反应。1904年秋冬间，梁启超和秋瑾分别目睹日本人欢送出征军人的场面后，一个惊慕日本有以献身国事为荣的“日本魂”，自愧中国没有这种民族魂；一个则“又是羡慕，又是气愤，又是羞恼，又是惭愧”^②，——羡慕日本对军人的尊敬和由此导致其军队的勇敢能战，愤愧中国没有这种风气和军人的怕死怯战。

上述历史条件促进了对国民性的进一步探讨。1901年，革命派的《国民报》揭示“中国人以柔顺为教，特别之奴隶根性，已深入于脑浆”等弱点，提出“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③；1901—1903年间，梁启超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新民议》，特别是《新民说》等重要论著，其他许多人也参与对此问题的讨论，从而在历史的脚步刚跨入本世纪门槛时就在中国形成了这股探讨国民性的思潮。

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曾依次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具体目标。这个次序记录了认识逐层深入的轨迹，但它们还都是可闻可睹的浅层，且学习的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或失望。现在，人们又认识到在国民性方面也有我不及人之处，亟需认真改造。这比之向人学习器物 and 制度，需有更大的勇气和克服更多的感情牵挂。而且，与器物、制度相比，国民性的问题是隐蔽于深层，不易发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745—746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② 《秋瑾集》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9、73页。

觉,而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更深远影响的问题。所以,探讨国民性思潮的出现,表明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又一重要深入。

二 一次无情的民族自我解剖

本世纪初的探讨国民性思潮,既然是要从民族自身中去探究中国学习西方的两次重大努力均告失败之因,加以紧迫的民族危机催逼国人猛省,因此,这次思潮并不是对中国国民性作全面恰当的评估,而主要是从中西比较中揭示其存在的弱点。

所揭示的弱点很广泛,主要如:

缺乏国民意识。论者们认为国民本应“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①,而中国人迄今尚无这种意识;与此相应,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均甚淡薄,只知有家族,有本村本乡,不知有国家,对国事持漠然无动于衷的“旁观”态度;

缺乏社会公德,没有合群习惯。表现于“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喜独恶群,不能结成牢固稳定的团体,以至全中国“无三人以上之法团,无能支一年之党派”^②;

有“奴性”,有“奴隶犬马性质”^③,以至于“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④;

好古保守,“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⑤。此与西方恰好相反,因而今日欧洲与百年前相比,新与旧“划然分明”,而今日中国与二三千年前相比,却“点滴相肖”^⑥!这种好古保守又养成苟安偷且,缺乏高尚目的,正是

① 丛刊《辛亥革命》(一),357页。

② 《梁启超选集》3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276页。

④ 丛刊《辛亥革命》(一),356页。

⑤ 云间,《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⑥ 马傅,《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吴郡新民丛报汇编》1391页。

我们民族的根本缺点。

这些对国民性弱点的揭示、鞭挞，是对我们民族的一种无情的自我解剖。对民族进行自我解剖是必要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或弱点，善于保持和发扬优点，不断克服弱点的民族才能兴旺强盛。无情的自我解剖，找出缺点弱点，无损于民族的尊严，反而能促人猛醒。正如马克思说的：“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①

但是，什么事情都总得有个分寸，对自身弱点的揭示、鞭挞也不例外。而本世纪初叶人们对中国国民性的揭示却常常言过其实。诸如把全体中国人都说成是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就显然过分。且不说古代，即近代无数志士仁人，包括这些论者在内，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甚至流血牺牲的事实，就否定了“旁观者”的说法。无论何国，热心奔走国事的总是少数人，并非只有中国如此。又如把中国人说成全是奴隶成性，也与历史大相径庭。

而且，他们所揭示的问题也未必都是弱点。例如他们把“犯而不校”、“以德报怨”作为中国人奴隶性的重要例证，就缺少具体分析。阿Q挨了打只会在心里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就算自己“胜利”，才是应加鞭挞的奴性；而人际间的互谅、宽容，却不应概作奴性予以否定。

还应指出：在革命与保皇大论战展开之前，人们对中国国民性大都只揭其短而不言其长，这也是很不妥的。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不足，认真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美德；但如果只讲并且夸大自己的弱点，就既不利于弘扬民族优点，也难以鼓舞民族信心，反会产生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虚无主义。章太炎在1906年就指出过：“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页。

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① 讳言弱点固然不好，抹煞优点同样有害，应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人们在揭示国民性中各种弱点时，还探讨了造成这些弱点的原因。他们把此归咎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压迫，使人民向无权利、无自由，久而便“放弃义务，弁髦权利，不识国家为何物，不知自治为何事”，自然成为对国事的“旁观者”了^②。他们还对儒学为核心的纲常伦理大加挞伐，痛斥其“但知尊君卑臣，辨天泽高堂陛而已”^③。揭露历代尊孔是“因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之故^④。

无政府主义者更激烈地抨击“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发誓要用“刮骨破疽之术”，以消除“孔毒”^⑤！道家倡导的静、虚、柔、无为、无动等也被痛斥为是“奴隶之教授法”^⑥！

他们还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宗法家族制度，也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基本原因，因为它使人养成只有家族观念而无国民观念，没有政治能力，因而有人说这种家族制度是“国家之坚敌”^⑦！

对儒、道学说中消极成份的抨击，对宗法家族制度的批判，都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使这次探讨国民性思潮具有思想启蒙的性质。但正如对国民性弱点的解剖中有偏颇一样，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是不全面的。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历代宣

①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梁启超：《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1905年第12期。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35页。

④ 君衍：《法古》，《童子世界》第31期。

⑤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208—209页。

⑥ 同上书，第1卷，707页。

⑦ 《家庭革命说》，《江苏》第7期。

教等，对铸成民族特性当然关系甚大，决不可忽视它们的作用；但这些归根到底还得受各个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每个民族的特性，都是在历史长河中，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随着以社会经济为中心的文明发展而形成、变化的。虽然由于它与民族感情这棵大树的攀缠，又为人们的习性所维系，因而不易改变。但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后，不管人们情愿和觉察与否，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迟早总要发生变化。所以，忽视社会经济状况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就不能真正找到造成国民性弱点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三 以西方人为榜样塑造民族新风貌

否定旧我是要追求新我。这次探讨国民性思潮，本是在反思近代中国半个多世纪来学习西方均告失败之因中出现的，对国民性各种弱点，也是以彼例此所得出的认识。因此，人们很自然要以西方人为榜样来提出塑造新型国民性的要求。提得最系统、详尽的莫过于梁启超的《新民论》，他主张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来改造中国人，前者指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中的优秀部分，后者则是吸取域外文化和西方民族中的优良东西。作为一种方针，这无疑是很正确的，既避免了否定自己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又不是固步自封的盲目自大。但从那时包括梁氏在内的人们所实际提出的要求而言，重点还是以西方人为范本来改造中国人。他们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主要有：

发扬社会公德，树立义务观念，培养利群风气。这包括自觉地为国家、为社会尽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做到一言一行都“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等等^①；

增强权利思想，去除奴隶主义。这里的权利是指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政治权利等，他们把这种权利思想看得及其重要，力主

^① 梁启超：《新民说》。

以欧洲民族为榜样，寸步不让地维护和捍卫正当的权利，力抗一切侵犯权利的强暴势力；

与此相应，无论革命派或改良派，都力倡自治，要求人们努力成为自觉遵守纪律、维护社会秩序的有高尚人格的民族；

提倡进取冒险，克服保守苟安，培养顽强的毅力和勇气。梁启超希望中国人具备两种毅力：对于在自己手上能实现的目标，要“竭尽全力以赴之，鼓余勇以继之”；在自己手上不可能实现而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则要“尽天职以任之，献生命以殉之”^①；

提倡尚武精神，挖掉文弱恶根。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切忧国之士特别提倡的一个内容，他们称颂尚武精神是“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的支柱，深痛中国重文轻武的文弱积习，希望国人努力从心、胆、体等方面培养尚武精神，挖掉“文弱之恶根”^②。

此外，还有人提出剪辫子、改穿西服、改革婚制等移风易俗的主张，使中国人从观念到体貌都焕然一新。

提出具体的目标还只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困难和重要得更多的是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在这后一方面，改良派与革命派有着不同的主张。

改良派主张用宣传、教育而反对用革命倒清的途径来塑造新型国民性。他们说一个国家或社会是由“民之所积”而成，其好坏决定于民；政府的优劣也一样，有良好的民才能有好的政府。因此，只有先用宣传教育提高民之素质，才能出现好的国家和政府；而且，在当时中国人民缺乏国民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情况下进行革命，不但不能改造国民性，反而会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就象“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一样^③。

① 梁启超：《新民说》。

② 梁启超：《新民说》。

③ 《康有为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那么，由谁来对全民进行宣传教育？改良派提出由“有思想之中等社会”，亦即由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承担此任^①。

说一个国家、社会以至政府的状况与国民素质有关，这并非毫无道理；宣传、教育等也确为必不可少，改良派如严复、梁启超等那时在大力译介西学，开通民智方面的活动成绩斐然，其所显示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令人敬佩。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性的改善，除需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个基本条件外，也与一个国家、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关。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改良派在分析造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原因时，也一再指出过历代封建统治及其纲常伦理的罪责。如只强调国民素质对国家、社会 and 政府的制约，而否认问题的另一面，就不但与对造成国民性弱点原因的揭示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探讨国民性问题的意义，而且必然不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塑造新型国民的目标。《浙江潮》上有一篇文章说：“自理论而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②就是对这种片面性的批判。

革命派不否认国家和社会由“民之所积”而成，也认为对中国国民性必须加以改造，但他们认为必须通过反清革命来进行这种改造。章太炎的名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便是对此所作的典型说明。有的革命报刊还强调良好的国民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全仗阅历磨练而出”^③。这些论点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推倒清朝，建立新国之前和在革命准备阶段究竟怎样提高国民素质，革命派却没有认真地计划过。象《民报之六大主义》这样的纲领性文章中，只字未提提高国民素质，还强调汉族“民族思想与民权思想发达充满，故能排满，能立国”。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革命发生本

① 梁启超：《新民说》。

② 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8期。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903页。

身即已证明国民素质之高，忽视了在革命准备时期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这是明显的失误。明公理、去旧俗固需革命，革命要成功也不能缺少在其准备时期和进行过程中做好明公理、去旧俗的工作，而这是要另花大的力气，并非光凭革命本身就可自动达到的。

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实际上就是要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改造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因此，不但宣传教育和革命倒清两者缺一不可，而且还须有社会经济的根本改造。在传统的封建、半封建经济基础上，要塑造西方资本主义民族的国民性是难以做到的，对这一点，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是认识不足的。十多年后，在又有辛亥革命——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三次重大努力失败的新教训，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后，李大钊对此有了深刻的新认识：“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①将“改造人类精神”与“改造经济组织”并重，强调两者的一致进行，这是在探索改造国民性之途中的一大前进。

四 “国民程度”之争和辛亥革命的兴败

在同盟会成立前，革命派与改良派虽对如何改造国民性认识不一，但对国民性中存在的各种弱点却看法一致。同盟会成立后，随着两派论战的展开，由于如何看待国民性现状，直接关系到要不要和能不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问题，双方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便日益分歧，并集中地就“国民程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改良派更加强调和夸大中国人民的落后，说成是“泯泯昏昏，蠢如鹿豕，知书识字者千不得一，明理达时者万不得一”的群氓，以证明中国根本不具备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条件。与此

^① 《李大钊选集》19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相反，革命派的一些宣传中一改前此对国民性弱点的激烈鞭挞，而尽量高估国民的政治意识、政治能力。例如陈天华1903年说中国“大家都不讲公德，只图私利”，“照现在的人心风俗，恐怕是万事俱休的景况”；而到1905年10月时却着重强调“吾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且当鸿昧初起、文明未开之际，吾民族已能崭然见头角”，并说中国人兼有受到当时人赞佩的条顿、大和民族之长^①。仅隔2年，陈天华对中国民族的评价如此截然相反，就是要论证中国人已“能享有完全权利”，中国已“宜改创民主政体”了。革命派还力图说明中国国民一向具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国民”^②。还有一些革命派报刊则以民智与官智相比，得出民智高于官智、国民程度已足可当家作主的结论来批驳改良派。

论战暂告一个段落，虽然在一些文章中，不仅改良派，革命派也仍不时有对国民性弱点和程度低下的揭示，例如孙中山1908年就感叹中国“人心几死，是犹醉梦者虽饥渴亦不知饮食也”^③（可见革命派在论战中对“国民程度”的评估，是有很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但这股持续了几年的探讨国民性思潮，已转向了低落。

由于革命派在论战中认为“国民程度”已足，前此各派人士所揭示的国民性的各种弱点被暂时搁置，革命派没有为提高国民程度多下功夫，遍及民间的守旧、愚昧等有碍民主政治的东西并未受到多少触动。如新式学堂、劝学公所等象征近代文明的事物在广大农村到处不受欢迎，晚清最后10年民变中，砸毁新学堂的事件屡屡发生，其因既为了反对“新政”所增加的剥削，更是农村中憎恶这种与传统异趣的新式教育的表现。武昌起义前，有的

① 《陈天华集》48页、204—20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7期。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38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新式学堂里已在公开提倡剪辫，而在广大农村，到民国时代村民仍“看不惯没有辫子的人，他们说剪辫子的人是要随外国当鬼子。”^①至于把“自由党”当作是“柿油党”，把革命理解为去掉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就完事这类笑话也并不只是鲁迅笔下的未庄的人所独有。总之，辛亥革命是在多数国民的政治意识、政治能力还相当低下，尚未作好迎接民主共和政治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爆发的。革命派在辛亥前夕关于“国民程度已足”的宣传，一方面给人以清朝应当推翻、民主共和能够建立的信念，客观上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估计本身并不符合实际，革命党人又忽视了提高国民素质的切实工作，以致使各种复旧、复辟势力仍有深广的社会基础，广大人民还如同孙中山所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立的民主共和，即使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破坏，也是难以茁壮成长的。这是辛亥革命迅速失败和民初一再出现复旧、复辟逆流的重要根源。“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而“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③辛亥革命没有做好这项工作，原因固然不止一个，但与革命前对“国民程度”的估计不确有直接关系。孙中山后来痛心地说：“当日革命党员多注重于民族主义，而鲜留心于民权主义，故破坏成功之后，官僚则曰人民程度不足也，而吾党之士又从而和之，曰人民程度不足，不可以行直接民权也。”^④经过辛亥的洗礼和“阅历磨练”，原是强调人民程度已足的革命党人，也附和说“不足”了，这既说明革命派当年在论战中对国民程度之估计不符事实，也说明他们前此对提高国民程

① 博彦满都：《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辛亥革命回忆录》六，42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4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1077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5卷，190页。

度所做甚少。这是辛亥革命迅速失败和民初出现各种乌烟瘴气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原因。

以往我们对民初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的失败，着重强调了辛亥后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但从袁世凯信誓旦旦忠于共和的话音刚落就敢悍然复辟，而在有了袁氏惨败的前鉴后张勋还硬要步其后尘来看，民主共和观念恐怕只是深入到少数人心，在全社会还远未如此。孙中山就作过这样的估计：“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①

这种情况说明：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以及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使封建观念、习俗等在中国根深蒂固，要去除它们十分不易。而这些东西不去除，近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就难以建立，辛亥的失败和民国几十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郑云山，1937年生，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374页。

欧洲、日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 西学东渐的三部曲

(香港) 鲍绍霖

近来，五四运动倡导者们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颇为中西学者所瞩目并引起了不少讨论。本文试图考察五四研究中这一重要的问题，考察其发展、意义及部分学者的基本设想、研究方法、成果和随之而来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加以探讨，以期使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潮流在历史的视野中得到恰如其份的一席之地。

五四时期中国国民性研究：方法、设想和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国民从束缚中，特别是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回复其活力。学者们详细讨论了五四时期一些主将们的倡议，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或各种对传统宗教、儒家伦理及其教条无故奴役、削弱国民的弊病的猛烈攻击。他们的努力在此不必赘述。但是，有必要注意一下研究五四时期国民性改造运动的学术著作中所暴露出来的两个普遍倾向。

首先，上述大多数学者持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设想，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国民性进行重新考察，只是从五四运动、

而不是更早的时期开始的^①。一位享有盛誉的专家曾宣称，中国人直到五四时期才“发现”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基础^②。

确定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思想反应的这种分期表面上看来似乎便于解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但实际上却难以或根本无法解释各个“阶段”之间可能存在着的“联系”。这些学者急于把五四运动奉为中国人最后的“觉醒”或“突破”，因而贬低甚至无视五四运动和它之前一些求改革的尝试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虽则大多数学者都能谨慎地注意并承认中国一些思想家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提出了质疑。例如一些学者承认，早在1895年，严复就已经要求“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同样，他们也很赞赏梁启超批评中国人具有“惰性”及无责任心的话^③。鲁迅在寻求理想的国民性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对此感兴趣的大部分学者的注意，部分学者甚至承认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④。然而，不应因此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人追求理想的国民性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几个学者对严复和梁启超的探索及影响作过恰如其份的处理。大多数著作以五四运动作为开始，或只集中论述五四运动，一开始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及其被认为首开文化改革之风的批判儒学和传统的价值观的论文，声称对文化改革的探求由此开始。相形之下，对严复或梁启超对旧传

① 刘再复、林岗：《论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国民性的反思——兼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另见陈来：《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载林毓生等著：《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1989年版；郑师渠：《辛亥革命以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6期。

② 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③ 刘再复、林岗：《论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国民性的反思——兼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施瓦支也注意到，梁启超在1900年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早已提出了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问题，见施著第39—40页。

④ 张钊贻承认了梁对鲁迅的影响，见张著《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香港青文书屋1987年版第51页。

统的抨击的论述则通常欠缺深度、粗略或没有清楚的结论^①。

其次，学者们强调五四运动的独创性和创新性的倾向使他们忽视了新文化运动口号的显而易见的外来根源。例如，学者们不难看出，梁启超只是到了日本并在那里积累了足够的关于西方的知识之后，才开始撰文论述文化和国民性的改造。但是，没有几个学者追寻他突然对此发生兴趣的原因以及对五四时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研究国民性的知识分子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可能是什么影响？另外，五四时期批评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几个领袖人物，包括陈独秀、鲁迅在内，也象严复和梁启超一样，都是在中国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人士。他们在转向文化变革或国民性探索中，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是否起了作用？梁启超所提倡的文化和国民性与五四领袖们所提倡的文化和国民性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显然是被忽视了。正如一位研究五四运动的外国学者曾宣称的那样，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之所以不同于日本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就在于他致力于重铸国民性，而后两者则没有^②。

从西学东渐三部曲的角度看国民性探索

长期以来，热衷于中西文化关系的学者们早已认识到，本世纪之初，明治时期的日本曾经是中国关于西方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下述探讨将表明，中国知识分子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在源自欧洲的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他们的现代文化观，包括寻求适合现代文明的国民性的观念。这些都是通过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的论著和译作获得的。换言之，寻求一种包括理想的国民性

① 刘再复、林岗在所著《对国民性的反思》一文中忽视了1899年梁启超的论著中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观点，直到后来在《传统与中国人》一书中才对此有所探讨。

② 见施著，第40页。

在内的现代文化的过程是一个相继发生于欧洲、日本、中国的三部曲。下面将讨论这一观点。

自18世纪晚期以来，欧洲人一方面为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深感自负。另一方面又企图探索一条能加快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他们着手研究、比较各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希望从中找出自己成功的秘诀及其它民族落后的原因。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著作。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分析的、解释的；从风格上说，它们又是实证的。其中一些著作看起来象西方文化史，另一些则五花八门，如孟德斯鸠的《法意》似与文化史无关，亦可归为同类作品。鉴于有些学术著作已对此作了探讨，此处仅指出一点，即尽管这些论著对各民族的具体评价不尽相同，但所采用的标准却是大体一致的。这样，在欧洲人中就出现了一些公认的文化标志。简言之，这些标志包括：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及该民族对此环境所提出的挑战的反应，民智的发展程度及知识的积累，民主政治的进步等等。从总体上看，在追求人民所渴望的进步及良好的国民性的过程中，上述文化标志在很大因素上取决于自由的程度，而这种自由的增加（或减少）应不受实际的或精神的权威的干预。许多欧洲人撰写专著，论述这种文化标志。他们对文化充满了强烈的乐观情绪，坚信人类能够“科学”地分析文化并从中发现决定进步的一般通则。在他们看来，现代文明在人类掌握之中。

在这股寻求文化进步的潮流中，欧洲人越来越关心国民性的发展，英国人尤其如此。一位研究者注意到，英国思想家们似乎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即一个民族的“成员”的“教养”是该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此处的“教养”系指所有希望进取的民族应该公认的一些价值观^①。在论述国民性的英国作家中，有两位可能是最重要的。塞缪·斯迈尔（Samuel Smiles, 1812—1904）极力倡导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他列举了理

① 《日本人，维多利亚思想1850—1880：流行民族观研究》，《牛津大学博士论文摘要》，1982年。

想的民族特性，如讲求实际、忍耐、勤劳、进取、勇敢、独立等。他的经典著作《自助论》（1859）、《性格论》（1871）、《节俭论》（1875）、《责任论》（1880）等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在此不必赘述。另一位是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其著名的《英格兰文化史导论》及其富于争论性的实证法促使不少时人以“科学”方法考察文化史及国民性。斯迈尔和巴克爾分别总结出了理想的国民性的构成成份及其获得方法。包括泰恩（Hippolyte Taine, 1828—1893）在内的大批受斯氏或巴氏影响的欧洲人都曾撰文讨论国民性问题^①。巴克爾的著作在解释各民族文化发展不平衡时曾对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好几个民族的国民性进行过比较。另一些书刊则剖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性^②，探索了历史事件或其它因素是否影响了国民性的形成^③。还有一些则探索培养理想的国民性的途径，包括提倡阅读名人传记^④。他们甚至相信，完全可以预测国民性的形成^⑤。

我在其它论文中曾列举文献说明，欧洲人寻求现代文化的这种热情是怎样传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怎样导致了一场“文明开化”热潮，以及他们关于现代文化的一些基本设想是怎样深入日本人

① 查卫克：《19世纪欧洲思想的世俗化》，剑桥，第206页；福祿达：《历史科学》，载《大题小作》，伦敦，1903年，第1卷第8页；戈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史与爱尔兰民族性》，伦敦，1861年，第4页。斯密斯是牛津大学著名教授。

② 赫莱欧克：《苏格兰民族的矛盾性格》，伦敦，1845年。赫氏乃一急进的自由思想家，巴克爾的亲密朋友。另一学者柴那写了八卷本的《国民性研究论文集》（1832）。另见《苏格兰民族性》，载《评论季刊》，1861年7月，另一篇同一主题的文章载于《伦敦观察者》，1862年1月。《巴克爾杂集、遗集》三卷中有许多关于巴氏曾访问过的国家的国民性的注释，包括德国、苏格兰、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

③ 福祿达：《改革对苏格兰民族的影响》，伦敦，1903年。另外，赫莱欧克在《苏格兰民族的矛盾性格》一书中考察了宗教对苏格兰国民性的影响。

④ 1844年5月12日，赫莱欧克向伦敦共产主义者第一支部作了关于自传在理想的国民性形成中的价值的演讲，随后将其出版，定名为《自传在个性形成中的价值》，伦敦，1845年。斯迈尔更是以其善于利用自传而著称。

⑤ 皮尔逊：《国民生活与性格：预测》，伦敦，1893年。

心的^①。同时,这些设想又先后通过梁启超及世纪之交在日本留学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为中国人所接受^②。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欧洲人提倡培养适合于现代化的国民性的口号影响了日本人,并且通过他们转而影响了中国人。

欧洲人关于国民性的观点对其亚洲学生的影响有两点值得注意:“地理决定论”与提倡自由。首先,欧洲人断言,民族性产生于地理环境各异的不同民族之中,又反过来影响各民族的发展。地理决定论可能源自实证主义者科学地解释各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尝试。例如,巴克尔曾宣称,由于热带地区的物产富饶易熟、自然环境变化无常,生活在那里的民族就可能既懒惰又迷信;而生活在温带的民族因有适当的挑战可能既勤劳又富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同时,欧洲人强调外部即非遗传因素的作用。这无异向人们暗示,国民性是可以培养的。巴克尔侃侃而谈英国人的“独立”习惯及其对自由的酷爱,法国人十足的“奴性”及西班牙人的“迷信”时,我们几乎难以指责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③。相反,他对一个国家国民性的形成因素所作的详细考察向希望进取的东亚人暗示出:第一,一个民族可以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从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第二,消除阻碍因素,特别是从政治、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明治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及后来中国一些具有变革倾向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援引巴克尔及其他欧洲学者的论述,强调在未来国民性培养中必须突出对自由的热爱。

明治时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明六社的作者们,撰写了一批论述日本的国民性及其改造的著作。例如,箕作麟祥(1846—1879)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各民族的自由与当地气候的相

① 鲍绍霖:《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与明治时代的日本》,第22—24页。

② 鲍绍霖:《晚清革命志士眼中的法国形象:其蜕变及意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学报》第17期,1986年,第363—385页。

③ 巴克尔:《英格兰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118—119页。

互关系》，节译了孟德斯鸠《法意》中讨论地理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一节。西周的《国民性》一文则考察了地理、政治及道德传统对日本国民性所产生的综合影响。中村正直发表了题为《论国民性改造》的演讲，提出：没有国民性的变更，则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造都会徒劳无功。中村还撰文论述了如何利用教育和道德来改造日本的国民性^①。福泽谕吉“独立自主”的口号脍炙人口，更是不必细表了。

肯尼斯·B·巴艾尔对日本民族主义与西化主义斗争史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令人钦佩的。他在研究中注意到，明六社的论敌，即民友社和政教社中的知识分子，包括德富苏峰（1863—1957）、田口卯吉（1855—1905）、三宅雪岭（1860—1945），都曾潜心研讨过日本的国民性，他们沿习着巴克尔和基佐的方式和风格，尽管在提高国民性的方法上各有不同的建议。正如一些学者曾注意到的那样，19世纪90年代日本兴起的文化及文明史学热潮标志着对国民性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的反思。据了解，上述不少日本学者对梁启超有影响^②。

梁启超甫抵日本就迷上了欧洲人对现代文化的探索并将之表现于其作品中。流亡海外前，梁启超虽已在倡导变革，但却很少提到文化。抵达日本后，文化（文明）一词便频频出现于其著作中。而且，梁启超开始撰文鼓吹上述的文明标准，特别是其中关于自由和国民性的提倡。这些都是昔日巴克尔介绍到日本来的。梁的《自由书》和《新民说》可能在中国人头脑中撒下了这两粒欧

① 西周：《国民性》，中村正直：《论国民性改造》，箕作：《各民族的自由与当地气候之相互影响》，以上三文分别载于《明六杂志》32期（1875年3月），30期（1875年2月）、4—5期。箕作文章紧随着巴克尔的地理决定论。

② 关于明治时代的学者及其弟子对梁启超的影响，可参见黄崇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45—67页；鲍绍霖：《梁启超之英国观》，载《第八届国际亚洲研究会会议录》，香港，1986年，第1365—1366页。

洲人心目中的文明最基本的种子。《新民说》号召国人以英为师，重铸国民性。梁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并将之纳入以《新民说》改造中国国民性的计划。梁所接受的这些美德正是斯迈尔曾倡之为理想的英国国民性的基本特征。同时，梁恪守着欧洲的文化史学传统，撰文论述地理条件与国民性的关系^①。

梁启超在世纪之交读者中的影响，包括对革命者的影响，在此无须赘述；1902—1903年前后在东京的激进派留学生人数的激增也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可以肯定，他们在那里出版的许多革命杂志深受梁启超以及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些论著的影响。1903年前后，至少有三种文化史专著及数部解释西方文化成功原因的著作由这些革命杂志译成了中文。这些文化史是由深受欧洲影响的日本学者撰写的，包括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高山林次郎所著《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所著《文明史》；福本诚所著之《当代欧洲》也译成了中文。另一些则是译自欧洲人，包括孟德斯鸠所著《法意》、斯迈尔的《自助论》等^②。这样，上述革命杂志就在其文章中继承了对现代文明的探索和对良好的国民性的追求，至少表面看来如此。一些杂志甚至宣称其创刊的旨趣即为追求文明^③。正如梁启超及其日本、欧洲先驱者们一样，他们也试图探索一条培养国民性的道路。他们中一部分人接受了欧洲的地理决定论的影响。例如，《云南》杂志宣称，其创刊的宗旨在于提倡主义、合作、公德、进取、冒险、平等、独立等，希望以此改良民族思想。该杂志在解释改良国民性的必要时说道：

国家学曰积人成国，人民之能否，国之荣枯系焉。书曰，民为邦

①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的关系》，原载《新民丛报》一、二号，1902年2月8日、22日；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但许冠三认为并非如此。

② 鲍绍霖：《文明观：中国报人眼中的英国和法国的形象，1895—1919》，《乔治亚大学博士论文》，1979年，第149—155页。

③ 《〈云南〉发刊辞》，《云南》卷一，1906年10月1日。

本，本固邦宁。然则捧云南以与他人者，罪不在政府，不在官吏，实在我栖息于云南之云南人也……何则？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为优，不适者为劣，天演之公例也。以我与西人较，我主彼客，其位异；我守彼攻，其势殊。虽无必胜之方，却有不败之理。而竟不然者，则中西人种之性质、之行为判然若云泥。彼以适于今日而占优势，我以不适于今日而归劣败故耳。①

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梁启超直至这些革命派的杂志都在不懈地继续着欧洲人和日本人对先进的国民性的追求。然而，此处有几点需要补充。第一，梁启超与激进派的学生对日本人及其欧洲导师们的倡议除全面接受外，更添加了自己的希望。他们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先进的国民性，而且还包含了复兴民族之魂的内容。他们更急切的是救国，因此他们理想的国民性亦包括慨然承诺、无私奉献、敢做敢为等品质。第二，革命派对梁启超醉心于英国国民性——一个强大的民族所应具有的品质——从未非议。他们将法国大革命的所作所为理想化并对之顶礼膜拜。他们引用梁的话宣称，法兰西人能够狂热地献身于自由事业②，不分男女老幼地投身于保卫自由的事业，做出最富有戏剧性的壮举③；他们坚韧、勇敢，义无反顾地忠实地捍卫着有价值的原则④。换言之，革命派所追求的国民性并不仅仅包含有一般公民的素养，而且还有一种投身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的精神和热情。第三，革命派最经常强调的国民性是对自由的热爱。革命派认识到，这不仅是变革政治体制所必需的，也是保证民族发展不受挫折所不可或缺的品质。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族统治，大多数革命者返回了大陆，对文化和国民性的兴趣转而由建设共和的热情所取代。几年之后，一批资深的革命者对政治革命的后果大感失望。他们创办了《新

① 《〈云南〉发刊辞》。

② 《军事与国家之关系》，载《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5月。

③ 《法国革命遗事四则》，载《国民日报》，1903年8月，第286—288页。

④ 同上，第289页；铁量：《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载《汉帜》第1期，第239页，1

《青年》杂志，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重新恢复了对文化和国民性的探索。五四时期的领袖们关于国民性的观点近人已有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但是，五四诸君并非亦步亦趋地效颦日本人或欧洲人，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中国人寻求新的更好的国民性时伴有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考察。这种考察不同于日本人或欧洲人对各自的传统文化所作的考察，因为它对传统的批判极为透彻、全面及不留余地。其次，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放弃了欧洲人、日本人乃至辛亥时期革命派曾侃侃而谈的地理决定论。最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于欧洲、日本乃至辛亥时期的先驱者们：他们把理想付诸实行。而从前对国民性或文明的倡导始终不过是口号或抽象的原则而已。追求理想的文明，追求免除专制体制压迫和干涉的自由，开发民智，走向民主政治，培养国民性，所有这一切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伦理大革命，要把中国人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可以看出，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研究，其根源可上溯到辛亥前的革命派，上溯到梁启超，上溯到明治时代的日本乃至欧洲。这并不象最近某些研究五四时期国民性及中国文化的论著中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候独立设计或发明的一套行动方案。确切地说，国民性和文化研究是人类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欧—日—中三部曲。

（责任编辑：李林）

（作者鲍绍霖，1944年生，香港浸会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王宪明、高曼 校订：鲍绍霖）

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

刘 平

匪民，在旧社会都被看作是土匪，它的基本群众是失去土地或职业的贫困农民和裁撤的兵卒。土匪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它的大量产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种表现，揭示土匪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活动规律，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本文对清末民初的太湖土匪进行一些探讨，希望大家指正。

一、太湖土匪成因探析

从晚清到民国，象其它的典型“匪区”一样，太湖土匪大量地滋生蔓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一般说来，清末以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处于动荡与崩溃之中，形成一个不断制造盗匪的温床。农村更是如此，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所在皆有。如外国商品的侵略、阶级关系的恶化、苛捐杂税的剥削、各级政府及军阀豪绅的敲诈、连年兵燹的摧残、剩余人口的急剧增加，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就太湖地区而言，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更形重要。

（一）地理环境与经济背景

太湖在古代又称震泽、笠泽，《禹贡》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之说；酈道元《水经注》一书中云：“吴为泽国，其藪具区，又曰震泽、笠泽，即今太湖也”，它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和泻湖封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古泻湖，面积时有变化，近代约有

2500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之一。

太湖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北接无锡、苏州，南连湖州、嘉兴，西靠宜兴、长兴，东依吴江、昆山、青浦，地跨江浙两省，并扼西、南、北入沪之通道，地形复杂，湖面岛屿众多，湖周围水道纵横，与阳澄湖、淀山湖等皆可往来。江南大运河自镇江、常州东来，又由北而南穿过太湖流域，江海贯通，河湖相连，构成了太湖地区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水网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太湖土匪的活动范围并不仅仅以上述湖区为限。每当政府大举进剿，土匪抵御乏力之时，便四散逃窜，沿途犯案，东可至上海、浦东，西可往常州、武进、溧阳，往南则杭州湾及天目山地区，往北则南通、海门地区，更可能的是，他们会在长江下游沿线及长江口的东海沿岸窜扰不定。

长期以来，人们以“鱼米之乡”来概括太湖地区的经济状况。太湖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础，太湖流域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自晋唐以来，一直是历朝政府的取给依靠。然而，“江浙两省，富庶甲于我国，而课税之重，人口之密亦甲于我国”^①。因而，各种矛盾异常激烈。

进入近代，太湖水利因年久失修，河道壅塞，导致水旱灾害频仍，民国年间，战火时起，遗祸更巨。每遇灾情发生，农民渔民

“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沿途乞食，络绎不绝，服毒自尽者亦日有所闻”^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天灾的打击，很容易造成大量的失业人群并随时把他们逼上绝路。天灾与人祸，交相侵逼，被迫离开了土地的农民（本地的，外地的）便成了饥民、游民、难民，衣食无所寄托时，便铤而走险，落草为寇，下湖为匪，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成了盗匪猖獗之区。

（二）太湖枪匪与淮军流入

近代太湖地区土匪横行，危害地方，推其原始，太平天国时

① 竺可桢：《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第93页。

② 《长江水利史略》第190页

期的“枪匪”与后来太湖土匪的大量产生很有渊源关系，而晚清时期旧军（特别是淮军）的裁撤，使太湖土匪在人数和装备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补充。

枪匪在咸丰初年出现于苏州地区。当时，吴江滨湖游民以捕渔小艇、猎鸟小船行动迅速，置枪其上，到处开设赌局，打家劫舍。稍后，平望镇有名铁砂锅者，“私营小舟，首尾尖锐，形如蚱蜢，四桨双橹，旋转灵便，行水面若飞，不畏风浪，名蚱蜢船，又名枪船，因舵后有木枪作标志也。”船上，“备西洋诸火器，每船五、六人，或七、八人。选勇健善泅者操船，号曰老大”。^①吴江素称“泽国”，环城有金鸡、淀山诸湖，另有三泖、大白荡、芦墟荡、吴松江等，支港纷歧，众水汇流，“广狭不可悉数，皆曲折可通。枪船驾轻就熟，出没其间，时劫商舟，商人苦之，按月贖资相酬，约弗劫。由是平望博徒，因致重赂，使屯镇拒捕。”^②由此枪匪势力渐大，平望周围的游手无赖，“如箭赴的，如水赴壑”，费玉成、卜小二、张斌、孙四等著名枪匪头目，无论昼夜，率其匪众，“游奕数百里内，几于充塞江湖矣。”^③这种情况表明，枪匪已经具备后来太湖土匪的活动特点。

枪船起后，滋蔓于太湖沿边，苏属之吴江、震泽等县，湖属之新市、练市、双林、乌镇，嘉属之桐乡、石门，都有枪匪踪迹，其平时行为，除抢劫水陆客商而外，还四处“开设赌台，包办私盐，招徕娼妓，设台演剧，而遇事生风，武断乡曲，颐指气使，无人敢逆其意。”^④李秀成进据苏州后，枪匪受招抚者甚众，如费玉成便受封为镇天豫，然而以游民、地痞为主要成份的

①② 王步青：《见闻录》（平望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557页。

③ 《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69页。

④ 万流：《枪船始末》，《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25页。

枪匪素无大志，“既非助清，亦非助洪，与两方俱通声气。”^①随着中外反动势力对太平天国进攻的加强，枪匪重心愈益倾向于清王朝。李鸿章率淮军进攻吴江、苏州时，就曾大肆收编枪匪。

太平天国失败后，枪匪并未绝迹，反而潜滋暗长，待机而发，随着湘淮军的裁撤，失业农民、手工业者、水手、渔民的增加，太湖又复处于一种“匪氛不靖”的状态。

晚清时期，青红帮势力与被裁革的淮军合流，使太湖土匪盐枭势力大增。咸丰年间，漕粮改由海运后，以贩私盐为主的青帮逐渐从江淮一带向东移动，“盖青帮者，当日漕河运丁，拜师傅拜老公之余孽也，久侵淫于淮河流域；克服苏湖之淮军，承其支派，虽遣不归，盘踞于浙湖郡县，而以贩盐为主，于是有巢湖帮之名称”。又与哥老会及地方游民混杂，“徒党愈繁，胆气愈壮，为寇为盗，滋蔓难图，势力所及，足以固结人心，终亦有恃而无恐。”太湖与长江沟通，素为私盐运道，土匪盐枭奔走其间，“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②清末民初的太湖巨匪余孟亭、罗虚义、徐老窝子、宋老窝子等均系被裁遣的皖藉士兵。迨后，各种散兵游勇充斥太湖，相率效法此种匪帮遗风，结党横行。

（三）辛亥时期的社会动乱

本世纪初年，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和举办“新政”，不断增加捐税名目，以苏州牙厘局为例，单是它所经办的各种捐税就有百货捐、茶叶捐、茧捐、丝经捐等28种之多^③。统治者横征暴敛，各级中小官吏书役乘机贪污中饱，推波助澜，造成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经常面临破产失业的威胁，因而不断激起他们的反抗。

① 万流：《枪船始末》，《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126页。

② 均见《中外日报》1905年10月24日。

③ 《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1906年春夏间，长江中下游阴雨连绵，被灾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或涌入城镇，或就地制造骚动，或流为盗贼。如这年夏天，震泽饥民捣毁平糶局，苏州、无锡、湖州等地普遍出现粮荒和饥民骚动。辛亥革命前夕，社会动乱更有所加剧，如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素称稳定的常熟县城也发生了抢米风潮，“米行被劫者杨信裕、桑仁记、倪月泰、朱森泰、彭盛泰、徐协盛、程万兴、倪月盛、史源盛、殷协和等十余家，每行约数百至千余石。”^①

剧烈的社会动荡局面，往往伴随着土匪盗贼的蜂拥而起。清政府不得不承认：“匪类纵横，日甚一日。……浙西有青帮、红帮诸匪，浙东有会匪、梟匪，以及宁、绍、台之海盗，丰、沛、萧、杨之刀匪，太湖之盐贩，苏松一带之青皮光蛋，久已结党联盟，肆行无忌。”^②太湖长江一带的土匪盐梟，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就一直未曾绝迹过，此时“乘间窃发”，益形嚣张。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梟匪首领董道奎在太湖东西山一带频繁活动，并多

与官军对阵，十月十二日晨，水师统领欧阳副将及署右营都司周某率炮船11艘至太湖会哨，在胥口，遇飞划营副统领徐某率快船11艘巡缉而至，两厢会合，同赴元山，时山麓某庙匿有董匪徒众百余，见师船驶至，“即先开枪拒捕，当毙勇丁二名，受伤一名，并伤领哨陈桂芳。于是欧阳副将即令炮击，徐副戎亦率快船发枪还击，相持至晚，损船五艘，不能再战，遂开至对山暂避，而匪亦于是夜乘机逸去。”^③另如吴江平望一带，“素为梟匪出没之区”，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到大帮梟匪，约有数百余人，专在江浙等处行劫，日前闻由该梟匪等竟敢强抢某营军械，开枪拒捕，意图报复。”^④省垣苏州也不安宁，城郊朱家庄

① 《时报》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

② 《署邮传部右丞蔡乃煌奏江浙人心思动请先事预防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原折）

③ 《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军事，第21页。

④ 《时报》宣统二年八月十三日。

地方，“道路多匪，往往攫取行人财物”，官方不得已，只好在那里设立巡警派出所，“沿途设立岗位，以防匪盗”^①。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农村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民的反抗与土匪的猖獗依然如故。民元时期，苏浙沪农村发生了多起“宰牲结社，齐心抗租”的事件。苏属光福地区的太湖匪首叶阿祥、罗虚义等人更是活动频繁，扰乱地方，他们纠合土客各帮匪，专在该镇及木渎、横泾等处招集流亡，置备枪械，掳人勒赎，声势汹汹，“……该帮匪等凶恶日张，旧枭党投入其间者日众，四处勒逼掳掠，乡民大受厥累”。^②

终其民国一代，太湖地区“无地不有匪踪，无时不有匪患”，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能不说是辛亥时期的社会动乱为之提供了一个契机，随之而来的军阀干政更加剧了盗匪活动。

二、太湖土匪之土客各帮

（一）太湖土匪土客各帮概况

江南地区较之其它地区经济发达，苏北、安徽、山东、河南以至闽广、两湖等地一旦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和大规模的战祸匪患，被灾难民便纷纷迁往江南，这种季节性的与非季节性的人口流动，往往有不肖之徒混杂其间。因此，江南居民便有土民、客民之分。太湖土匪中，也往往有土帮、客帮之别。土客各帮匪时而联合行动，时而划地自重，交相为患，这种情况各个时期都有，尤以清末民初为最典型。

所谓土帮，也称本帮、主帮，就是由当地土匪结成一帮或数帮；所谓客帮，就是外地土匪流窜而来，或是客民游勇流而为匪，结成一帮或数帮，如巢湖帮、湖南帮等名目。辛亥时期的叶阿祥、罗虚义各领土帮与客帮，盘踞于光福一带，就是一个例子。叶阿祥

^① 民国《吴县志》卷54。

^② 《苏乡帮匪猖獗记》，《时报》1912年11月30日。

又名“香山阿祥”，专在光福镇设场聚赌，光复后，势力渐大，叶乃竭力招集流亡，编成数队，凡本省各土匪谓之本帮，归阿祥自行统率；其籍隶外省及湖南、巢湖等匪投入者，谓之客帮，推罗虚义（罗老二）领帮^①。民初极其猖獗的殷阿昭、管大肚子、徐老窝子匪帮，也是由土客各帮混合而成。有材料证明，客帮比土帮势力更大，为害也更烈。

客帮中势力之大，为害之烈，当首推“巢湖帮”。咸丰同治年间，皖籍无业游民及被裁革的淮军士兵流落江湖，结党联盟，走私贩毒，时人以“巢湖帮”称之^②。其帮众散处江苏之苏、松、常暨浙江之湖嘉二属，“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也抢劫勒索”，至于清末，“太湖周围之游手无赖”，随声附和，党羽日多，滋蔓日甚^③。并且，随着淮军大量裁撤、皖省难民不断涌入以及巢湖湖匪、芜湖安庆等地哥老会势力东移，“巢湖帮”力量得到不断补充，其势持久不衰。

对于“巢湖帮”，清朝地方政府历来剿捕甚勤。然而，由于太湖之港汊牵连相通，“匪船在在皆可往来登岸”，帮匪得以此拿彼窜，“浙剿则窜苏，苏剿则窜浙，会剿则兵至为民，兵去仍匪，防固不胜防，杀亦实不胜杀。”^④从清末至30年代，“巢湖帮”势力在太湖土客各帮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江浙地方政治一大毒瘤，除地理形势为巢湖帮匪的嚣张提供了良好条件外，社会经济的敝败使大量的游民无产者成了匪帮取之不竭的补充来源，“盖受剿者有限，未剿者甚多；此辈本无恒业，饥寒所迫，不旋踵而仍为匪，其势然也。”^⑤官府不得已时，又施以招安，“勇匪相通”，融为一体，“决难绝其根株”。因此，太湖沿边各属，

① 《时报》1912年11月30日。

②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82—83页。

③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364页。

④⑤ 《开缺浙江巡抚聂缉槩奏浙省现办巢湖帮匪情形折》，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成了巢湖帮匪肆行无忌的场所。

“湖南帮”也是太湖土匪中的大帮，清末至民国年间，太湖土匪中也出了不少“湖南帮”匪首，如曾国璋、朱鸿贵、曹新甫等。该帮主要由被裁革的湘军士兵及其后人（包括耕种客田的不肖湘人）联结而成。曾国璋即系被裁革的湘军士兵，又是哥老会首领，清末活动于长江下游两岸，“开堂立会”，“肆行抢劫”，各地匪首如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等与之联结一气，各据地段，另有沙洲人九指头吴梅生、欧阳四瞎子等奉曾国璋旗号，活动于长江太湖一线^①。朱鸿贵、曹新甫等人是太湖沿边湖南籍客民首领，

“释兵则民，执兵则盗”，明里耕种客田，暗里打家劫舍。20年代以降，“湖南帮”势力有增强趋势，主要是湘籍散兵游勇在太湖地区的数量增多。

“河南帮”也是活动较为频繁的一帮，其匪众成份主要由豫东南光山、罗山等地游民及流落江浙的豫籍兵勇构成。由于人数的限制，该帮往往联合其它土客各帮行动。如1916年夏某夜，吴江南库乡何周氏家被劫，系“口操河南及江北口音之盗匪数十人打门而入，劫去现洋一千二百元，首饰衣服等件约值五六百元并刀伤事主臂上及亲戚吴陈氏之腿部。”^②需要区别的是，因为吴地方言“河”、“湖”通同，故各种记载中“河南帮”与“湖南帮”往往混淆。

“广帮”系一小帮，清末与其它客帮合流。太平天国时期，一批广东沿海的流氓匪棍流落苏州，以“保送粮土”为业，分散在苏州阊门一带，作恶多端，后被官府招为团练，称为“广勇”^③。太平天国失败后，“广勇”下湖为匪，形成“广帮”，以两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66—267页；另参见曹仲道：《清末沙洲帮会的活动情况》，载《常熟文史资料辑存》（三），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14日。

③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第39页。

广流民为主要成份。清末年间，“广帮”已形衰落，匪众多被其它客帮吸收——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小股土客各帮匪”活动中并不少见。

“江北帮”、“浦东帮”情况比较复杂，下面将分别详细谈及。

太湖客帮土匪中除上述名目外，还有湖北帮、湖广帮、山东帮、温台帮、水火帮等等，限于资料及篇幅，兹不一一论及。

（二）苏北难民与“江北帮”

太湖土匪客帮中的“江北帮”（江南居民一般把苏北称为“江北”），严格说来，不成其为“帮”。苏北土匪久驻江南的情况也比较少，他们往往通过联络江南土匪联合行动，寻机开往江南逞凶一时。如清末海州一带，“遍地皆匪，共计不下万余人，首要有百数十起，……行踪非常诡秘，见兵力较大，层层包围，均弃枪四散，捕鱼采樵”，“并通常熟、崇明、宝山等处各匪，潜往江南行事。”^①清末民初之际，苏北各地水旱蝗碱之灾为害甚烈，无以为生的农民、渔民便纷纷抛家弃舍，渡江南迁。“苏北人”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客民群体。

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即使在丰收年景，苏北流民仍会在一定季节成群南下。拿1912年来说，“江北各属无不丰收，人民咸歌大有”，而秋收刚过，沿运河、洪泽湖等处，竟有多数流民船只纷纷南下，虽经江苏都督一再通电堵截，各县民政长一再禁止，“究不能阻其前往，推原其故，此种流民无论年岁丰歉，皆于此时南下，俟春耕时再回（至今安徽还有此等游民）原地，彼等于此数月中盖以乞食为生，数口之家，往往藉此积蓄”^②。以往的农村习惯于周期性饥馑（包括粮食欠收及其它各种灾难）。苏北等地

① 《江苏巡抚陈夔龙为办理海属起事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端方档）。

② 《民立报》1912年11月13日。

的农民所遭受的痛苦太过剧烈，以至于他们的南迁已形成一种惯性，年复一年地进行着。

苏北难民流入太湖地区后，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宣统元年（1909年）夏秋，苏北大水，灾民纷纷避往江南“就食”、“索食”，“沿途持强攫取食物，任意骚扰乡民”，并且与当地乡民“互相争斗，大起斗殴之事”^①。当这种“骚扰”、“掳掠”仍不能果其肚腹时，有些生性强悍的难民便流为匪众，如当时太湖枭匪船只，“专与徐淮海难民混杂其间，乘机四出抢掠，沿途骚扰，乡民受累不堪。迩来常（熟）昭（文）等处，抢劫航船之案，时有所闻。”^②

民国以后，从当时的各种记载可以看出，流落江南的苏北难民及由难民生成的土匪已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江北帮”，他们往往联合其它各帮共同行事。如1917年夏某晚，浙江嘉善东北九里许之上泐地方，“突来枭匪四船，约有七八十人，皆安徽、湖南、江北口音，先向水警开枪，击毙巡士二名，夺去枪械二杆，复又抢顾新元三家，……”^③由农民而难民，由难民而土匪，这是旧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土匪活动大量产生的一种必然趋势。

另外，“江北帮”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其活动时间特别长。苏北难民流往江南，一部分在春季时返回原籍，一部分定居下来，以捕鱼种田为生，还有一部分流为匪类。由于连年的规律性人口流动，晚清以后，江北帮匪活动是与太湖土匪活动相始终的。

（三）门派林立的“浦东帮”

太湖与上海浦东地区毗连，从泛义上来说，太湖土匪中还包括“浦东帮”，而“浦东帮”的活动，在贩盐贩毒、走私军火、

① 《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② 《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③ 《时报》1917年7月21日。

抢劫轮船等方面与太湖及太湖土匪甚有牵连，因此，对“浦东帮”作些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太湖土匪在周边地区活动的情况。

近代上海一直是中外各种政治经济势力集中之区，人口流动频繁，社会犯罪率高，特别是浦东地区，盗匪活动相当猖獗，时人笼统地称之为“浦东帮”。究其原因，浦东地处上海东南，与昆山、嘉定、青浦、松江地区水陆相通，太湖的土匪盐枭时常流窜于浦东一带，又加上该地素为烟土及私盐运道，青红帮势力极其活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浦东“客民丛集，人口日繁”，土客民之间矛盾重重。如1917年初，“两湖、江北等处之客籍流民往往数十成群，持棒执斧，前赴各村砍伐树木，攫取菜蔬，所到之处，农产为墟，因此与乡民斗殴之事时有所见。”^①这些客民往往以地籍结合成群，演变为匪时，便以前述之“巢湖帮”（浦东帮又称“安徽帮”）、“湖南帮”等名目行动。

其中，在浦东土匪客帮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南北帮”，该帮大约出现于1915年至1916年之交，活动于浦东沿浦一带，以洋泾镇为中心，南北籍客民为主要成份，杂以地方游民，故该帮又分“南帮”与“北帮”。当时，南帮首领为赵云根，北帮首领不详，该帮匪等“不务正业，专事索诈，遇有新开店铺、新制房屋等，若辈辄往索取陋规，稍一不遂其意，即肆行滋扰，商民受害无穷。”^②同时该帮与青红帮颇有纠葛，如1917年，“青红帮匪首周某等与当地南北帮匪众联络，派人四出，请人入帮”，使“南北帮”势力相应大增^③，不但在本地滋事，且往来于长江、太湖及沿海等地，积年不绝。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月8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2月13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月9日。

至于浦东土民，因为各种压榨甚重，加上经常受到风雨灾荒的影响，“农民劳动终年，颗粒无收，加以米薪珠桂，呼吁无门，官厅搜刮如故”，往往激成闹荒风潮，一发难收。陷于困境的农民和渔民，便容易流为匪类，如南黄浦之长十八湾及夏家嘴等浦面为川沙、南汇至上海之航路，“沿浦滩两岸皆系盗匪藏匿之所，船支被劫必在该处为多，且该盗俱系浦滩两岸乡民，佯为捕鱼营生，以致被劫案件百无一二破获，航商受害甚深。”^①这类土匪不久便可发展成大股，如在1916年春，张家塘、鱼塘港、石港等处出现褚福生、陆伍、宋立周等三帮，“共二百数十名，驾船五十余只，船上插有褚字、陆字、宋字及八卦各旗，图谋不轨。”^②顾玉祺、徐老九等匪帮则在塘桥镇等地称贩私盐，聚赌抢劫。

浦东本帮土匪往往各据地段，结帮拉派，为害四乡。如1916年，南汇县太平乡白龙港等地出现了“白龙党”和“龙梢党”两帮土匪，纠集党羽数百人，持械掳人勒赎，良善乡民屡受其累。两党还与各处私枭及以前退队缉私兵勇、在官人役暗中联合，预备乘机起事，而所有枪械子弹，“均由太湖枭匪接济”^③。稍后，“龙梢党”匪首董国梁纠伙在泥城镇、万祥镇地界绑票抢劫，犯案累累，被南汇县知事派法警多名在万祥镇将董匪拿获^④。然而，该两党势力仍有发展，且与上海市区之“青毛党”、“三十六个党”互通声气。

上面对太湖土匪土客各帮作了一些分析。土客各帮匪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联合，而联合行动的情况又多于互相冲突的情况。

土匪一般都是极端实用主义者，各帮各派以至本帮本派之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月30日，1917年1月4日。

② 《时报》1916年3月6日。

③ 《时报》1916年4月5日。

④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间，为了各自利益，往往发生冲突与火并事件，比如由土客各帮混成的余瞎子帮与客帮沈老窝子一帮的冲突即是典型。1916年8月间，吴县侦缉队长潘秀清得报，光福之东渚、西星桥等处，盗劫聚赌时有所闻，而该处赌场系余瞎子为首要，“不分主客，共同聚赌”。不料，另一客帮匪首沈老窝子出而干涉，率同柴阿根、李阿福、小蓬等主客两帮开场聚赌，并将余瞎子驱逐。“余心有不甘，拟号召同类向沈交涉，连日暗潮甚烈”^①。但是，一般说来，太湖地区大规模的帮匪冲突并不多见。

为了对付官府兜剿镇压，太湖土客各帮匪徒经常联合行动。如护国战争时期的苏州周围各市乡，社会局面动荡不安，“匪盗之充斥，为历来所未有，虽经苏地当道迭派水陆军警及浅水兵舰驰往剿捕，无如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劳师糜饷，徒然攻扑一空”，后经派员探明，“该匪等本系在苏乡及太湖中之土客各帮乌合而成，……大小各帮已有十余起之多，大帮则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不等，小帮只有数十人、百人而已。”^②当太湖土匪有计划地采取行动或者抗拒官兵剿捕时，土客各帮往往“混合而成”，这是太湖土匪能够长期拒敌官兵、扰乱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太湖土匪的活动特点与社会危害性

与其它地区土匪活动一样，太湖土匪活动也有自己的特点，其社会危害是广泛的和多方面的。下面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散兵游勇与太湖匪患

土匪实际上是农业社会里游民无产者的一部分，他们从原来的行列中被迫游离出来，从事种种冒险与不法行为，是一支典型的“反社会”力量。从清末至民初，整个中国战乱频仍，匪患不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19日。

^② 《时报》1916年5月15日。

断。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相当数量的游民无产者为生活所迫，

“早在自寻出路，出路之最便捷最不花本钱而又可以侥幸图存的，莫如当兵与当匪，所以近数十年来的中国，几乎成了兵匪世界，中国兵匪之多，在近代几乎是空前未有。”^①马君武在20年代曾评论道：“今中国固遍地皆匪、遍地皆兵矣。人民何以乐于为匪为兵？因贫穷矣。何以贫穷？因失业矣。何以失业？因近百年生产事业起大变迁也。”^②“兵戈遍地，盗贼满山”的社会环境，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土匪脱胎于被压迫阶级，又成为整个社会的叛逆，他们为匪伊始，就具备了报复社会破坏社会的一切手段。

太湖地当东南富庶之区，匪患却长期存在。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经常性地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导致了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的无能与混乱。因此，“在社会和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土匪活动容易蔓延扩散。”^③特别是，太湖土匪中游勇散兵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居无定所，流窜犯案，在江南、太湖地区的破坏作用比其它成份的土匪更为严重。

散兵游勇主要指旧军队裁革下来的士兵、打了败仗的溃兵、开小差的逃兵。清末为练新军，有湘淮军、防营、绿营的裁撤；辛亥革命以后有民军的解散；北洋时期，大小军阀混战连年，溃军逃兵比比皆是。

旧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农民，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游民无产者和收编成军的帮匪组成（对农民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关系，一旦分离，就很少有可能回复原位），这些人当兵的目的是为了吃军饷，一旦饷源断绝，而原来的社会也不容纳他们时，便流散于各地城镇乡间，盗窃财

① 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下册），齐鲁书社，第840页。

② 马君武《战争为人口增多生产缺乏之结果》，《国闻周报》第1卷第13期（1924年10月）。

③ E·J·Hobsbawm, BANDITS, Penguin Books, pp22.

物，打家劫舍，由兵转化为匪，也即“兵匪”之一种。太湖地区的良好环境，成了各地散兵游勇麋集之区。他们结成大帮小股，为害地方。前述湖南帮、巢湖帮等，实际上就是被裁的湘淮军士兵和后来的湘籍皖籍士兵联合各种地方流氓分子结成的匪帮，特别是“巢湖帮”，“其根柢最深，其魄力最厚，土著无赖，从而附合之；营汛兵役，从而庇护之。……去一渠魁，复来一渠魁，接踵呼啸，历世积年。”^①

再如护国战争时期，吴江乘机“独立”，受到镇压后，“溃兵与太湖梟匪结合，到处骚扰”。“更有殷佩六率其败兵及平望水警余桂森部下等莫不退而为匪，加入大帮，专在吴县、吴江所属之各乡镇及太湖一带肆行劫掠，掳人勒赎，无恶不为”。他们曾在车坊犯案，得洋三千元，旋又窜至同里镇肆扰^②。政府不得不派出三艘兵舰及一营步兵“前往太湖分投痛剿”。

因此，辛亥以后，每每事变发生，军队的溃散与被裁都会使太湖匪患突然加剧。比如，1913年二次革命以后，“嫌疑之军队悉数被裁，凡此被裁之军队既绝谋生之路，流为匪类者盖十之八九焉。或者散布于四乡，或者聚集于城市”，掳掠劫杀，制造恐怖^③。至于驻防太湖周边的军队士兵开小差逃跑，流为匪类，作奸犯科，则是屡见不鲜。旧军队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固的武装团体，士兵具有很大的离心力。

一般说来，散兵游勇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且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和组织能力，流为匪寇之后，为害滋烈，往往成为官军劲敌。因而，讲到太湖土匪活动及其社会危害性，必须首先注意到散兵游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私盐贩卖与太湖匪患的主要表现

① 《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军事，第1页。

② 《时报》1916年5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12日。

③ 《时报》1914年9月10日。

太湖土匪活动的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盐枭活动的猖獗。在当时记载太湖土匪活动的各种材料中，除土匪、帮匪、湖匪、枭匪、强盗之外，还经常可以看到“私贩”、“盐枭”、“盐贩”、“私枭”、“盐匪”、“盐贼”这些字眼。盐枭等名目就是对那些武装走私食盐分子的称呼。私盐贩卖是太湖土匪日常的大宗活动，当政府缉私、剿捕情事频仍之际，这些私盐贩子断绝了生计，便四处窜扰，绑票勒赎，无所不为。

当时太湖地区的私盐，主要来源于淮盐、浙盐产区，因而政府缉私力量也特别注重这两个区域的私盐来路。拿浙盐来说，其中一部分由南汇盐枭私运，“每届阴历年底，辄有大帮盐枭前赴岱山等处潜购私盐，偷运至汇角海滩地方起岸”，专销于浦东、太湖地区的酱园作坊^①。而松江、金山沿海“各盐灶食盐每由私枭偷运前赴苏属各处私销，必从淀山河（湖）经过。”^②至于淮盐，当时销路为湘鄂皖赣各岸及建昌、通崇、平江专岸，宁扬地区亦食淮盐。苏松常镇太均食浙盐。实际情况是，江阴、常熟、沙洲至太湖一线，“时有淮盐私销”，苏属缉私营不得不“添租巡船”，增加兵力，“以防淮盐”^③。

大量私盐充斥城乡市场，“殊与盐课大有妨碍”，而缉私力量薄弱，防不胜防。太湖、淀山湖、阳澄湖、黄浦江诸水路，缉私官兵与盐枭船只时相遭遇，对仗结果往往是，兵多匪寡，则匪必弃盐而逃，匪众兵单，则兵必人枪有失，至于官兵与盐枭互通声气之事，也并不鲜见。渐渐地，在长期“围剿”、“拒捕”的对抗中，盐枭活动便开始变化成实实在在的土匪活动。因此，就太湖地区而言，土匪就是盐枭，盐枭就是土匪。

除私盐贩卖以外，太湖土匪盐枭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聚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月29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2月23日。

③ 《淮盐近状谈》，《时报》1917年1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2月20日。

近代史
③

赌抽头、掳人勒赎、劫车劫船、盗劫商民、强当强典强借、贩卖烟土、杀人放火、拒敌官兵等方面，无论是富家大户、官府中人，还是普通居民的生命财产经常面临威胁。1916年11月23日，华亭县属亭林镇忽来匪船三十余艘，匪徒数百人，由吴海珊、朱三瞎子、董双清等土客各帮匪首指挥，持枪列队登岸，先抢该镇巡警局枪械弹药，然后连劫新丰典当等各商号店铺数十家，致损失财产20余万元^①。太湖匪患影响所及，其大者，可以使汽车公司、轮船公司、商号厂家、银行受到严重损害；其小者，一般民众的日常用品常有被劫被盗之虞。可见，太湖匪患的影响，已深入到城乡各个阶层，贫富人等时刻都会处于土匪的威胁之中。

太湖各匪帮往往会在连续的抢劫等犯罪活动中得到发展，并在一定的时期内产生出数个著名的帮匪首领。如1916至1917年间，殷阿昭、管大肚子、徐老窝子、宋老窝子、陈先生诸匪首名字经常在苏沪各报及政府文件中出现，特别是徐老窝子，“迭在江浙两省犯有劫杀重案”，仅某次纠集吴子昌匪帮前往湖州织里镇“做事”，就连劫典当商号10余家，共得银洋四五千元及金银首饰衣服等件，并抢得浙江水师枪船5条，嗣后又率匪众开往莘塔，向典当硬当银洋不计其数^②。不久，在官兵大举追剿下，又窜往江阴、海门、小黑沙、崇明等处活动。

只要产生土匪的社会基础继续存在，匪患就不可能根除，清末至民初的数十年间，太湖土匪的大小各帮有数十上百起，帮众成千上万人，方老窝子、徐孟亭、夏竹林、叶阿祥、唐阿生、余瞎子、施小窝子、宋老窝子、徐老窝子、祖老窝子、乔老窝子（太湖帮匪中，至少有过四个乔老窝子、两个方老窝子）、吴海珊、殷阿昭、宗烈山、太保阿书等匪魁巨枭，都能在太湖地区风云一时。

① 《时报》1916年11月30日。

② 《枭匪首领徐老窝子之供词》，《时报》1917年1月5日。

四、对旧政府防剿太湖土匪措施的剖析

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对于土匪活动无不采取以剿为主、剿抚兼施的手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土匪是不可能的。拿太湖地区来说，一方面，广大失业人群为土匪队伍不断补充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太湖地区的有利地理条件，使各帮匪能够“忽聚忽散，时起时伏，击东则窜西，顾此则失彼，殊不易一鼓荡平，聚而歼旃也。”^①

首先是采用江浙会剿及省内会剿的办法。太湖地区的土匪盐枭以“太湖广漠，界连两浙”之利，滋生蔓延，“充斥其间”，遇官兵追剿，则“东拿西窜”，反之，来剿捕的官兵则由于“太湖水线匪熟，于兵以至无从着手”。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有鉴于此，“特派员带同武备学生前往湖面详加测绘，拟即咨会浙抚各派劲兵扼要驻防，以为严绝根株之计”^②。此后江浙地方大吏经常有两省会剿之事，“江有警则浙分兵以援之，浙有警则江分兵以援之”。1908年，余孟亭、夏竹林匪帮活动达到高潮，江浙联防，时已任江督的端方“令江、浙诸营合师环攻之”，并且“尽出南京锐师佐江、浙诸营入苏、松以击之”，大败余夏匪帮^③。每届冬闲时节，太湖土匪活动最为披猖，会剿活动也就相当频繁。1912年冬，苏浙境内连续发生劫案多起，后侦悉有枭匪300余人，浙军在嘉善县界与之发生激烈枪战，苏军连夜驰往会剿，得收一时之功。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各方面“每存畛域之见，未能同心协力”，配合甚差，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会剿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其次是长江与太湖联防，海军与水警厅协作，由海军派浅水

① 《时报》1916年11月26日。

② 《东方杂志》第1年第9期，军事，第369页。

③ 《浙案纪略》，《陶成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89—390页。

兵舰进入太湖助剿。1914年11月，海军接受苏省水警第二厅厅长赵会鹏的请求，派出两艘浅水兵舰进驻太湖东西山地区，因为当地盐枭湖匪出没无常，商船居民屡被抢劫，师船屡剿屡败。浅水兵舰速度快，火力猛，能起震慑作用，但收效也不大。如“振威”号浅水兵舰进驻太湖后不久，某日外巡归来，行至淀山湖休息，适有大帮盐匪押载私盐多船，拟往各乡贩卖，舰长周维屏得悉后，“忽发贪功之想”，急令开往追捕，盐匪见有追兵，立即严阵以待。兵舰先开炮轰击，匪船并不畏惧，竟蜂拥而上，将兵舰团团围住，枪炮交施，以致兵舰顾前失后，顿形慌张，加以周维屏等藐视土匪，以为土匪一见兵舰，“必然弃盐而逃，断无抗拒之理”，因此竟忘了把机关枪准备好（以往盐匪惧怕浅水兵舰，每见之必望风而逃，主要是怕舰上的机关枪），迨至支撑不住，机关枪已不及安放，舰身亦早着数弹，击成两大孔，周知败局已定，遂仓皇撤退^①。不久，相继又有“仁勇”、“昭武”、“静平”、“威靖”、“靖湖”、“钧和”、“安涛”、“洪平”等兵舰兵轮进驻太湖。

再就是使用消灭盐匪探目、赃窝的方法。匪探（又称匪线），指土匪往来活动的耳目；赃窝（又称赃家），指土匪活动所得的中转机关。任何地方的土匪活动一般都离不开匪探赃家。如1916年6月，殷阿昭、管大肚子、宋老窝子结成大帮，与水警游缉队在吴江对战失利，窜往北圩镇，为该镇陆警王巡官所悉，即会同驻防水警率队往捕，“该匪等消息灵通，早已闻风逃窜”^②。管大肚子又与徐老窝子合帮，“在小黑沙潜匿，由水警及‘钧和’兵舰等往拿，奈早窜往横沙海岛，亦未缉获”。后经水警侦探探明，“系陶才宗者通匪走漏”^③。故官兵与土匪对战前后，对匪探、赃家尤为注意。1916年深秋，徐老窝子率领羽

① 《时报》1914年11月26日。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6月29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0月13日。

党200多名，匪船80余艘，与大队官兵在常熟县界遭遇，徐部不支，败退至徐市，分成两股，分别向黎市、江市窜逸。该两处是曾经大肆骚扰常熟各市乡的巨匪许大、许三的老窝。二许本籍皖南，流落常熟，交结匪类，光复之际，曾为匪盗，后伪装改悔，在距常熟县城30里的江市、黎市两处耕种客田，各有150余亩，居然成为乡间富翁。徐老窝子每次到常熟“做事”之前，必先行联络二许，百计游说，求其指引地理，并为探听消息，窝藏赃物，二许故态复萌，与徐老窝子等匪帮狼狈为奸，水警多次前往常熟围剿徐老窝子等匪帮，但均为二许指示路线得以脱逃，因而官军对二许衔恨深切。这次便在水警第三专署督察员仇卓仁率领下，穷追至黎市、江市，捕获二许，并起获枪弹赃物若干^①。不久，徐老窝子再次与水警在无锡县境开仗交锋，身受重伤，潜往上海租界同仁医院治疗，被巡捕房发觉，转递苏省，旋即处决。简而言之，匪探赃家的存在，是伴随土匪活动始终的。

官府对待太湖土匪的最后一着是招抚。剿不胜则抚，这是旧政府的一贯伎俩，但其结果往往是最坏的，当时就有人讽刺这种作法：“大吏一赦为仁，羈縻以利禄，观其后效而劝未来，将谓野性能驯，群丑解散，不劳戎事，大功立致也。”^②由民而匪，由匪而官，忽匪忽官，官匪相济，以致后患无穷。当然，土匪受抚后成为官府的得力鹰犬，再去对付以前的同类的情况也是有的。如光绪末年，降清的沈小妹匪股即是一例，但该匪股不久即为余孟亭、李能掌一帮所破，“尽获其军械以归”^③。但是，相对而言，江浙沪的统治力量比较强大，对于太湖土匪的政策，往往是以剿为主、剿抚兼施。招抚再不成，又变而为剿，反反复复，了无止境，太湖匪患成了旧中国江浙地方政治的一个痼疾。

① 《时报》1916年11月25日。

② 《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军事，第4页。

③ 《陶成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88页。

所以，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对于太湖土匪，无论是剿是抚，抑或剿抚兼施，或是其它什么办法，都没能使太湖土匪根绝。这是因为，20世纪前期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各下层阶层都受到了强烈冲击，他们中的许多人脱离了原来的行列，在“反社会”活动中求生存，成为最容易制造动乱的分子。特别是民国以后，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已经失效，在这种背景下，所有地方都有可能成为盗匪的逋逃薮，而当时的太湖地区只不过表现得更有特色罢了。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刘平，1962年生，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教师）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

章 鸣 九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是古老的中国与英国在军事上的一次较量，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具有古老东方传统文化的中国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给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对这个问题迅速作出反应的，是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那么，他们当时是怎样认识的，现在我们又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认识？

（一）

下面我们先介绍魏源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介绍，基本上是辑录有关著作的原文，因此该书的本志部分应视为文集汇编，而不是著述。尽管在引录的著作中，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有褒有贬，甚至还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所有这些只能看成是原作者的观点。当然，魏源收录什么样的著作，特别是在所收录的著作中保留或删掉哪些内容，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思想倾向。例如，在介绍美国的情况时，收录了《瀛环志略》的有关部分，但将其中赞扬华盛顿的那段话删掉不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有关美国的公举大酋，四年更代，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等等，都是后来修改时加上的。魏源所引书籍非常广泛，难以

一一考订，不过引述他人的著作时，魏源在行文中间或文末常加按语，重要的问题还收录他自己的文章，以表明他的看法。这些才是我们评论他的思想认识的依据。

《海国图志》本志部分能够反映魏源对东西方文化认识的，主要有第71卷《各国教门考》、第23卷《回教考略》、第27卷《天主教考略》，此外第74卷的《国地总论》中的《释五大洲》、《释昆仑》，其内容是对世界四大宗教的评论和从地理学的角度对世界中心的考辨。对这两个问题，魏源除在所引录的文章的后面加有思想倾向极为鲜明的按语以外，还收录有自己撰写的文章，主旨在说明中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处于世界中心的优越地位。

中国是“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这本是中国处于封闭状态下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所形成的一种愚昧无知的传统观念。魏源的《海国图志》绘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各国的分图，界划疆域非常清楚，按理不应该再有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然而，魏源在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情况之后，又附上自己撰写的《释五大洲》和《释昆仑》两篇文章，对世界中心问题进行考辨。《释五大洲》开首就说，“梵典分大地为四大洲，西洋图说得其二焉，而强割为五为四”。他否定西洋图说把地球分为欧、亚、美、非、澳五大洲的说法，认为是“强割为五为四”，然后，依据梵典认为地球应分为东神胜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和北具庐洲。经他考订所谓南赡部洲应包括西洋人所说的亚洲、欧洲、非洲。他认为这三个洲本是一个洲，其理由是这三个洲都有陆地相连，西洋人“强割”为三。所谓西牛货洲就是美洲，因为美洲盛产金银矿，制成货币流布世界，所以他说：“墨利加洲当为释典之西牛货洲，非臆度也”。至于东胜神洲和北具庐洲因阻于南冰海和北冰海，还没有被发现，但他说：“地球所余之空度，亦凿凿当有二洲，又何疑焉”。他又依据梵典，说南赡部洲有“四主”，“东人主即震旦，南象主即印度，北马主即蒙古、哈萨

克，西宝主即大小西洋”。魏源把世界作如此划分之后，进一步论证中国在世界各国之上。他的论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论证亚洲的优越，他说，儒教、佛教、回教、天主教皆生于阿细亚洲，天文算法奇器亦皆创于阿细亚洲，而后流被于欧罗巴洲；非洲一直落后被称为“乌鬼之区”；美洲在明朝以前，“其洲中数千载，不过草木蕃殖，游牧射猎，竟无创教治世的圣人，及各国开垦通商始知有天方天主等教”。据此，他的结论是，梵典所说的四大洲中“南赡部洲为四洲之冠”，“赡部洲内又以阿细亚冠彼二洲”。第二步是论证中国在亚洲的优越，理由有二，一是按梵典所说，赡部洲有四主，东方人主，南方象主，北方马主，西方宝主，人为万物之灵，“四主中亦自以人主为上”。中国恰在亚洲之东方，且人口居天下三分之一，“生齿之繁，无国可比”。所以梵典说震旦（中国）为“东方人主”确然可信。理由之二，“圣人之出必在海滨，扶舆磅礴之气，必至平原近海”。印度正当热带，地过炎燠，人多裸袒；非洲亦偏于热带；欧罗巴又偏于冷带；唯震旦正当温带，四序和平。他说：“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

魏源不相信西方的地球图说，而杂以释典的四洲说，并牵强附会地去证明释典所说的正确；他又通过考订得出中国是在世界的中心，优越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结论，这是有悖于史实的。

让我们再看看魏源对宗教的评论。在魏源看来，西域有三大教，即佛教、天方教（回教）和天主教，都是“事天治本，即彼方之儒”，与中国的儒教“离立而四”，是世界上的四大宗教。魏源对佛教很少评论，对天方教采取了不屑一顾的睥睨的态度，而比较地重视天主教。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全文收录了杨光先《辟邪论》上下篇，并于文末有一按语。此按语除纠正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外，对《辟邪论》批驳天主教的观点是表示赞同的。杨光先主要批评天主教的“上帝创世说”，指斥天主教只信奉上帝，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祀祖先父母，认为这是“率天下而无

君父”。历官李祖白著《天学传概》一书，引用了六经中“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等语录，以附会天主教的上帝说。杨光先认为这是把中国古时的“先帝圣师”当成了邪教的苗裔，把历代的“圣经贤传”视为邪教之绪余，斥责李祖白“作此非圣之文，自毁周孔之教”，“不思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杨光先《辟邪教》一文，内容非常浅薄，不过是出于卫道的立场，为儒教争正统地位而已。儒教是“天秩、天序、天伦、天性立教”，所以是正统；而天主教“无父无君”，所以是邪教。对此，魏源都表示赞同，他撰写的《天主教考》（上、中、下），其中对天主教的批驳与杨光先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在贬斥天主教的同时，也殃及西方的自然科学，他将《天学初函》所收录的艾儒略的《西学凡》、高一志的《空际格致》等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与宣传天主教的书籍混在一起，一律加以批驳。虽说他承认《西学凡》等也是西方国家的“建学育才之法”，“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但总的说来，他认为这些都是末学异端，他说：“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①。他在介绍《天学初函》诸书后又以按语形式作了评述，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张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这段按语很清楚地表明了魏源把西学视为“异端”、“杂学”的对立态度，尽管他对西方“长技”有所肯定。

儒学不是宗教，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天主教是宗教，

① 本节引文均见魏源的《海国图志》。

但它不能代表西方文化，更不能代表近代西方文化。魏源何以将此二者进行比较？在魏源看来，天主教等西方宗教是“以事天治人为本”，所以是“彼方之儒”。他这是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将天主教提高到与中国儒学相等的地位。应该说，佛教、回教、天主教的教义、教规都旨在劝善惩恶，以“教化”作为统御人民的一种手段，这与儒家以“德化”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是基本一致的。不过，佛教是“以神设教”，天主教和天方教是“以天设教”，而儒家是讲“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是指自然，所注重的是现实的人际伦理关系。儒家讲“德化”，强调人的内心修养，通过“正心”、“诚意”等一套自我修养的功夫，达到个人人格的完美，没有鬼神之类的迷信色彩。魏源研究了天主教的神学理论，注意到天主教讲灵魂，也讲心性，其十诫大意也归于“敬天爱人”，但天主教强调人之灵魂心性“皆神之所为”；“敬天爱人”二者又以敬天为要。所以他批评天主教，“其言出于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又说：“历览西夷书，惟神理论颇近吾儒上帝造化之旨，余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所以，魏源将儒学和天主教进行比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毕竟儒学不是宗教，天主教不能代表近代西方文化。这种比较的结果，不仅增强了士大夫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盲目的优越感，同时因批评天主教而连及整个西学，斥西学为“异端”、“杂学”，对中国人向西方学习造成很大的障碍。后来洋务思想家长期不能突破“中体西用”的观念，恐怕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岂不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我觉得要解释这个矛盾，需要把握魏源的整个思想。这个问题我在下面将要谈到。

（二）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是“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

为篇”，他除收集介绍世界各国的史地著作和地图册子以外，还访问回归的华侨和来华的外国人，加以筛选，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笔之于书。所以，《瀛环志略》不同于《海国图志》，它不是汇编，而是一本著述。徐继畲还在介绍一个国家的情况之后，加上一段类似“太史公曰”的案语，阐明他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因此，通过《瀛环志略》能够比较明确地把握徐继畲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瀛环志略》通过对世界各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介绍，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在中国或者说在儒学文化圈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有自己独立发展进程的社会文明，尽管徐继畲没有使用“文明”或“文化”这样的概念。徐继畲特地详细介绍了建立在地中海沿岸的几个文明古国。他说，相当于中国虞舜时代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巴庇伦国，“始聚人民造宫室，是为西土第一国”，“其人习天文、善测量，度西土推步之学由此起”^①。徐继畲为了证实这一点，专门询问英官李太郭，李给他看用巴庇伦所造文字写的“文字册子”，他说：“余翻阅之，信然！”确信在中国传说中的虞舜时期，就已诞生了西方文明。其后，在相当于有夏帝芒之世，建立了“西土文教之邦”的犹太国。徐继畲说：“余尝闻之英官李太郭，犹太人最讲文字，西国各种书籍多犹太人所详解，故其国纪载独详。欧罗巴文士游学者，不于希腊，即于犹太，盖泰西絃诵之区也”。到有夏中叶，又有希腊国，“始织羊毛为衣，酿葡萄为酒，取橄榄为油，铸金锻铁作刀刃耒耜，又以文字传其土人，欧罗巴之开淳闷，通文字，实自希腊始”。周幽王时，罗马崛起，西汉中叶，建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土的大帝国。建都城于罗马，“声名文物之所萃”，“诸国仰之于周京”。由于罗马帝国占领欧洲大陆，才使欧洲土著人由“游猎为生，食肉寝皮”的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国家受到北

① 本节除另注出处者外均见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狄歲特族的侵扰，书册旧典扫荡无遗，“由是民变夷俗”。到明朝洪武年间，欧洲国家再度复兴。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英国等欧洲国家“驛致富强”，“駸駸乎富溢四海”，同时把欧洲文明传播到美洲。他说，欧洲人到美洲以后，“长国家而务财用，即荒裔其有幸乎！”明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航海东来，从此，南洋诸岛城池坚壮，楼阁华好，市里繁富，舟楫精良，大不同于以前“番族之荒陋气象”。在这里，我们暂不评论徐继畲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其实，徐继畲在讲到美洲、非洲、南洋诸岛的历史时，对欧洲人强占埔头，进行欺骗、扼榨、掠夺的侵略行为，多次作了揭露，并对土著民族的英勇反抗表示称赞。例如在介绍苏禄时，他说：“以拳石小岛奋力拒战，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者哉”。我们作如此详细的引录，旨在说明，徐继畲确实看到并且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存在着另一种文明，它发源于巴底伦、希腊、罗马，成长壮大于欧洲各国，已扩展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南洋五印度。这种文明扩展到东方就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

尤其可贵的是，徐继畲不像魏源那样，认为文明是创自亚洲，甚至是创自中国，然后“流被于欧罗巴洲”，而是认为欧洲文明有着自己独立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徐继畲称巴底伦是“西土第一国”，称犹太国为“泰西絃诵之区”，特别是讲到希腊时，更明确的指出：“欧罗巴之开淳罔、通文字，实自希腊始”。而且他还反复强调，“泰西远隔神洲，礼乐车书之化无由渐被”，“欧罗巴远在荒裔，周孔之教所不及”，“周孔之化无由之宣重译”，等等。在谈到安南、日本的历史时，他却说安南由野蛮进入文明是“渐被车书之化”，日本则是“制妨周汉，文同斯邈”。在徐继畲思想里很明确，周边的国家如朝鲜、日本、安南，其文明的发展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西方文明的产生则与中国古老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世界文化是多元的。

徐继畲在介绍古代巴比伦、希腊、罗马以及近代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城市的繁荣时，的确充满着欣羨赞叹之情；对这些国家的贤君明主，其中特别是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综观《瀛环志略》，对西方国家赞美之词，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些欣羨、赞美，表明徐继畲对西方文化的肯定。他从没有说过西方文化是异端。就拿他对西方宗教的态度来说，虽然他对佛教、天方教、天主教的教义并不赞成，对神话传说也不相信，但无激烈的批驳言论，只是说“其用意原无所谓非”，“必欲传其教于中土，则亦未免多事矣”。他甚至认为对西方宗教进行批驳也是多事。在《书王印川广文诗后》的文章中，他说：“信佛者愚，辟佛者亦多事”，“二氏之外，又益以回教、天主教，口诛笔伐不亦劳乎”。他还讥讽士大夫把批驳宗教作为“讲学格套”，“大抵儒者著书，中无辟佛数条，则以为不合绳尺，窥其隐衷，不过睥睨两庑牲牢耳”。他在这篇文章末尾的“自记”里说：“此种议论，俗儒所惊，然未必敢驳”^①。这表明徐继畲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同于魏源。

如果我们再以稍后出版的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相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徐继畲的思路与福泽谕吉比较接近。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首先阐明了文明的涵义。他从天赋人权观念出发，认为“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因此，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人民智德的发展水准来衡量。就智慧和道德而言，他更加重视智慧，认为“智的作用是重而广的，德的作用是轻而狭的”。他还认为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制度、文学、商业、工业、战争、政法等等，都应以文明为目标，其利害得失应以是否促进文明作为衡量的标准，“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就是

① 《松龕文集》。

得；反之，使文明退步的就是害就是失”^②。

日本文化属于儒学文化圈。福泽谕吉在回顾日本文明的来源时，肯定了儒学的历史作用，他说：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的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确实很大”。但是，他认为儒学只是在古时有贡献，到了近代，则再不能根据孔孟之学寻求政治途径。他参照西方文明对儒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综观《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批评儒学有三大弊病：一是儒学只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运用于政治则是主张以德化来统御人民。二是主张厚古薄今，迷信古人，成为精神奴隶。三是扼杀真正的文化，把人类神圣天职只限于德教一事。他认为，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对于维护人民的秩序，德化还能起些作用，在社会生活复杂化了的近代，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唯一的办法只能采取法制。他还指出，日本人民在儒学的熏陶下，道德水准与西洋人相比，可说在伯仲之间，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没有一样高于西洋，无法较量。他明确赞扬西方文明，要求日本人民应以欧洲文明为目标，向西方学习。由于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欧洲文明仅仅是当时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又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福泽谕吉在确定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同时，反观日本文化即进行了清理、反省，对儒学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徐继畲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谨慎态度，避免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直接的对比。但他实际上对传统的“尊德性”存在着离异的倾向，因而把才智与道德作为评判西方历史人物的两个标准，而且似乎更重于才智的标准。

当然，徐继畲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而且也说过中国“为

^② 此处引文均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于辰极”，以及“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等一类大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但读了张穆给徐继畲的信后，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张穆在看了《瀛环志略》已刻出的前三卷之后，写信给徐继畲，建议他必须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挪居亚细亚图之上。张穆提醒徐继畲说：“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而负谤至今”^①。看来，张穆所读的《瀛环志略》的版本，《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尚放在亚细亚图之后，所以才有必须挪居亚细亚图之上的建议，以后的版本确实按此建议作了更动，徐在《凡例》中说“谨绘一图于卷首，明拱极朝宗之义，不敢赘一词”，当是与此更动相适应而添加的。“伦物之宗祖”，“万方仰之如辰极”这些话是否是后来所添加，尚须进行考订。从更动地图顺序这一事实来看，徐继畲对张穆的意见是重视的。因为，在“严内外之词”的文化气氛之下，以前明徐光启等人为前车之鉴，在对待中西文化“进退抑扬之际”，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没有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没有提出仿效西方作某一方面的改革的任何建议。《瀛环志略》是一本社会地理学术著作，不是政论，也不是旨在向清朝政府提供治国治民的方案。我们不能以“文以载道”的要求来要求《瀛环志略》。它的可贵在于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那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尽可能有根据地、详细地向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这正是它不同于《海国图志》、高于《海国图志》的地方。

（三）

魏源与徐继畲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环境之下，徐身任封

^① 张穆：《复徐松龢中丞书》，《凤斋文集》卷三。

疆要职，其政治地位比魏源要高，但徐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却较魏为开明和宽容。这主要是由于徐继畲在福建办理通商事务，与外国人有较多交往接触的机会。在厦门的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毕业于神学院，获神学博士，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是博物学博士，他们给徐继畲提供地图、介绍情况，回答徐继畲提出的问题，为撰写《瀛环志略》作出了贡献。徐继畲在其序言中承认“其说多得自雅裨理”，在书中多次提到英官李太郭对他提出的问题所作的解答。此外，徐继畲还收集一些去过南洋的船员和华侨的口述资料。因此，《瀛环志略》的资料来源比较直接可靠。而魏源则缺乏这样一个条件。这大概是形成徐继畲与魏源之间思想差距的一个原因。其实，《海国图志》并不能反映魏源的全部思想，要从总体上把握魏源的思想，除研究《海国图志》以外，还应该研究他的其他重要著作，如《皇朝经世文编》、《默觚》、《圣武记》以及有关今文经学的作品。魏源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不是《海国图志》所介绍的那些域外知识，而是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复兴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对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起着直接的影响；洋务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90年代兴起的维新思想又与今文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上不如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思想比较陈旧，这并不能否定魏源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在于我们对经世致用思想应有一个正确的估价，这样，才能解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何以既提出“师夷长技”又称西学为异端、杂学。“经世致用”也叫“通经致用”，即要求运用儒学的经典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强调务实，注重功效，但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仍一本于儒学。“经世致用”既以寻求效用为基本目标，一切学问都要归于致用，因此，对宋学和汉学都采取批评的态度。宋学流于虚玄，汉学流于烦琐，都无裨于实用。批评宋学“空谈心性”，但不否定儒学的伦理道德；批评汉学的烦琐考证，但不否定经书。总之，经世致用之学批

评宋学和汉学，是因为其偏离了魏源等所理解的原始儒学，所以他说：“惟周公、仲尼，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①。经世致用之学是继承原始儒学，独树一帜，与宋学和汉学相抗衡，本身仍属于儒学。经世致用之学确实总结和继承了儒学中优秀和积极的因素，强调内圣与外王、学术与治术、道与器的统一，并抬高了“外王”、“治术”以及“器”在儒学中的地位。经世致用之学中所讲的“器”不是指一般的器物或技艺，而是指的“治术”、即“道”用之于治理社会、国家时所施行的一切政事。魏源说：“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于事谓之治。”^②这就是说，礼乐、兵刑、食货等一切治理社会的政事，都是“道”的表象，都是“器”，从而校正了宋学、汉学脱离社会实际的风气。但经世致用之学无论是讲内圣、学术、道，还是讲外王、治学、器，都没有超出传统儒学，没有吸收西学。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和《默觚》是他阐明经世致用理论的两部代表作。美国学者刘广京先生称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是“晚清经世之学划时代文献”，《默觚》是集魏源“毕生思想之精粹”^③。但在这两部代表性著作中丝毫没有涉及西学。由此可见，在魏源“经世之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尚没有西学容身的地位，西学既没有进入“道”，也没有纳入“器”，还没有“中体西用”的概念。这正是经世思想与洋务思想区别之所在。至于《海国图志》序言所提“师夷长技”，魏源的完整提法是“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包括“攻夷”、“款夷”、“制夷”，重心在对付夷人，“师夷长技”并非用以治理中国的内部社会。用以治理中国内部社会的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即《大

① 《默觚》，学篇九。

② 《默觚》，学篇九。

③ 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

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于御外是“师夷长技”，用以治内是传统儒学。所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既提出“师夷长技”，又斥西学为异端，这就叫“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两者并不矛盾。

(四)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不论是它的学术价值，还是它的思想内容都超过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但这两本书和它的作者却遭到不同的命运。《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他的机遇很有些类似洋务时期的郭嵩焘，成为悲剧性人物。而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却是蜚声不绝，不仅得到进步人士的推崇，也受到保守人士的好评。且看李慈铭对两本书的评论：

“阅徐松龛太仆继畲《瀛环志略》……其用心可谓勤，文笔亦简净。但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其褻职也以疆事，而或言此书实先入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

“点阅《海国图志》。魏氏此书体大思精，真奇书也。其采杨光先《不得已》中《辟邪论》上下篇，又自为论，以挾天主教之妄。往尝以为此等愚悖无理之言，不攻自破，彼丑夷之黠者，尚不肯自主于行教，何足费吾唇舌？由今思之，人理之泯斲，将不知所终极……当魏氏此书初出时，使朝廷先加意此事，密谕地方大吏饬郡县官，日讨国人而伸儆之，毋使其陷溺，事犹可为耳……”①。

李慈铭一贬一褒，态度很明确。被贬者是因为“夸张夷人”，被褒者是因为维护了儒学。如果《瀛环志略》再有象《文明论概

① 李慈铭：《越縕堂日记》咸丰丙辰一月二十八日，光绪丙戌十二月二十日。

略》那些批评儒学的内容，大概会遭到如同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被毁版的厄运。李慈铭的一贬一褒，说明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前期阶段，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心态，他们还存在着强烈的，然而却是盲目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不仅决定了《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的不同命运，同时还决定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必然采取与日本不同的途径。福泽谕吉提出的否定以儒学为主干的东洋文明，确定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这种思想在日本能为知识阶层所接受。《瀛环志略》和《使西纪程》的命运说明，这种思想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则绝对行不通。魏源及其《海国图志》不仅受到进步的士大夫、也受到像李慈铭这样思想保守的士大夫的欢迎，恰是因为适应了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心态。经世致用思想是总结、继承儒学的积极因素，以儒学以治内，学习西方的技能用以对外；洋务思想是“中体西用”，在维护周孔之道的前提下，逐步地有限度地接纳西学。它们都没有违背传统，而是企图弘扬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以中学溶化西学。而结果是日本向西方学习获得了成功，中国则是失败。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证明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那么，甲午战争则证明日本学习西方的途径优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途径。然而，依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也只能背负着周孔之道这个沉重的包袱，鹅行鸭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章鸣九，1933年生，《历史研究》杂志社副编审）

再论左宗棠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 的性质问题

董 蔡 时

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变本加厉，对我边疆地区蚕食鲸吞，无所不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左宗棠与李鸿章本来站在同一条战线镇压农民起义军，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他们两人开始分道扬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左宗棠转化为爱国派的首领，李鸿章则转化为卖国派的罪魁。左宗棠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首先反映在70年代的“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矛盾斗争上。

一、1874年前的新疆形势

新疆山河壮丽，雄踞祖国西部边陲。英、俄帝国主义对新疆虎视鹰瞵，有识之士莫不认为新疆之安危，关系到祖国西陲边防之大局。作为当时执掌西北地区军政大权的左宗棠，当然要“立国重开边”，整理破碎的旧山河了。

1866年9月，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陕甘总督辖区辽阔，包括陕西、甘肃两省，当时，宁夏、青海、新疆统归甘肃管辖。其时，陕、甘两省的回民起义如火如荼，新疆各族人民也闻风响应。1865年，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旋即攻陷南疆各城，其势力东至吐鲁番以东的辟展（鄯善）。1867年，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伪“哲德沙尔汗国”，意

谓“七城王国”（七城指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和阗、吐鲁番），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1870年，阿古柏匪帮侵占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阿古柏还先后与英、俄帝国主义立约通商，互派使节，俨然以独立国姿态出现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实际上，阿古柏匪帮已成为沙俄和英国肢解中国新疆的工具。

沙俄帝国主义为了侵吞新疆，1871年7月，乘中国西北多事之秋，悍然出兵侵占新疆西北的战略重镇伊犁，“设官置戍，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①。侵占伊犁一个多月后，沙俄政府不得不通知清政府，表示：“俄国无久占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光复之后，当即交还”^②。至此，中国军队反而瑟缩于塔城之北、巴里坤以东之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

此时，左宗棠已是花甲之年，戎马半生，百病丛生，本来已一再表示倦勤，准备告病乞休，但听说阿古柏与沙俄的疯狂侵略后，怒发冲冠，写信给部将刘锦棠说：俄人侵占黑龙江以北之地后，“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制者。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③。又写信给旧部浙江巡抚杨昌浚说：“此次力疾西徂，原为剿贼，亦以俄事非他人所能了，即才力十倍于我者，亦虑人不遽信，而机绪一失，……大局何堪！失此不图，后此求如目前局势，不可得也”^④。1873年冬，左宗棠积极筹备组建西征军，冒着与英、俄相对抗的风险，准备征讨阿古柏匪帮，武力

① 美国金楷里口译、番禺姚荣笔述：《西国近事汇编》1878年编，卷3，第61页。

②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交涉志二》卷54，第4页。

③ 左宗棠：《与刘毅斋京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7—48页。

④ 左宗棠：《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5页。

收复新疆。这与民族利益、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符合的，不料却由此引起了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二、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的开始

左、李之间的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其本质是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而不是什么军略分歧或派系斗争问题。

1873年夏，回民起义军的叛徒白彦虎率领残部数千，自肃州剽掠而西，逃遁新疆，投降阿古柏匪帮，代守乌鲁木齐，屡次率部流窜至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景廉的驻地古城（奇台）等地骚扰。景廉，字秋屏，旗籍将领，进士出身，不善治军，所部冗弱，不足御敌，遂连向清政府告急求援增兵新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须解决粮运问题。1874年10月，清政府命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粮运事宜。左宗棠积极筹备粮秣，整编西征军，秣马厉兵，隐然为西征军统帅。

1874年夏，日本出兵侵犯台湾。10月，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台事专约》三款。11月，奕訢提出购买铁甲舰等，实力筹备海防。筹备海防，无可厚非，但参与筹备海防的实力人物，动机各不相同。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企图利用筹备海防，建立由他控制的北洋海军，借以扩大其政治资本，进一步巩固、加强其政治地位。船政大臣沈葆楨因参与台湾之役，颇得朝野舆论好评，他在《复陈海防疏》中，推李鸿章为海防统帅。李鸿章认为筹备海防是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倡议的，又得到负有时望的沈葆楨等的支持，所以，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1874年12月上旬，上《筹议海防折》，挑起了他与左宗棠之间的所谓“塞防”与“海防”之争。

李鸿章奏陈时，摆出一副精通兵事，谙悉洋务，关心国家富强安危的架势，鼓其如簧之舌说：我“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及颇久，闻见稍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他说自古以来，国防重点在西北，惟自鴉

片战争以来，形势丕变，战争多在沿海。东南海疆万里，一国生事，各国勾煽，一旦生衅，兵连祸结，防不胜防。因之，就国防形势而论，宜集中财力，加强海防，于练兵制器之同时，应购买铁甲船6只，每只百万两，炮艇10只，以及其它辅助舰艇，连同练兵制器等，共需1000余万两。这样，可以组成水师舰队，沿海防务“声势较旺”。对于筹办海防的餉项问题，他认为“近日财用极绌，……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接着，李鸿章忽然笔锋一转，直指左宗棠。他说：“新疆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协餉300余万两，乾隆皇帝“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殊为不值。新疆北邻俄罗斯，南近英属印度，阿古柏“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号，并与英、俄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串一气”，对阿古柏只宜招抚，“准其自为部落”。况且英、俄“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如果出兵新疆，“师老财痲，尤虑别生他变”。所谓“别生他变”，意谓将激起对外战争。他接着又说：尤且新疆四邻，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断不能久守”。“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最后他图穷匕现，说若此议果定，“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餉，即匀作海防之餉”^①。为筹建北洋海军，李鸿章利令智昏，抛出上述出卖祖国新疆的论点，完全符合了英、俄帝国主义蚕食鲸吞中国新疆的需要。

左宗棠得知李鸿章借口大办海防，奏请抛弃新疆，为之怒气冲霄汉。他研究了李鸿章的奏章，后发制人，1875年4月中旬，针对李鸿章的卖国论点，奏陈自己的国事主张：

首先，他纠正了李鸿章说的：“新疆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的错误观点。他说新疆古称西域，汉朝以来即为中国领土，乾隆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附议复各条清单》，《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0—12页。

年间仅是戡定西域的叛乱，将西域改名新疆，并不是乾隆年间新疆始“归我版图”。正因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故“无尺寸可议弃之地”。

次之，从国防战略形势考察，中国必须收复新疆。他说中国定都燕京，蒙古环卫北方，百余年来无烽燧之警，实因乾隆皇帝戡定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隶关山亦无宴眠之日”。左宗棠这种国防战略观点，至今读来，犹觉新鲜生动。

又其次，他在奏折中指陈收复新疆的用兵次第。他说新疆“北高南低”，“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故用兵新疆，应先取天山北路。进攻北路，不收复乌鲁木齐，“无总要可扼”。新疆南路势在必取，因为南路自阿克苏以西之地，为富庶之区，产粮丰富，足以养我分屯列戍之兵，可免万里转输之劳。收复南疆，西征军可以就地筹饷。这样，西征大军就在新疆站稳了脚跟，然后可以议及收复为沙俄军队所占据的伊犁。若此时即停兵撤饷，自撤藩篱，“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宴然”。左宗棠立论的精神，在于收复新疆的一切失地。实施这一战略意图，其第一步为攻取乌桓，次之全歼阿古柏帮，收复南疆，最后议及收复伊犁。这些爱国言论，说明他成竹在胸，反映了他卓越、高超的国防观点与用兵新疆的战略观点。他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第四，值得强调的是，左宗棠虽然主张及时用兵新疆，但他并不反对筹办海防。他在奏折中说，论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惟事有缓急轻重，目前海波不兴，关外则贼氛极炽，用兵新疆有燃眉之急。海防并无燃眉之急，有常年经费足以筹办海防。问题是“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事实上，塞防经费苦于不

足，所部官兵欠饷至800余万两，一年只发一月满饷，即使停兵撤饷，于海防何益？即使停兵不进，“以征兵作戍兵”，“地可缩而兵不能减”，饷不能缺，又何从“停兵撤饷”？何从“移西饷作海防经费”？

第五，为了坚定清政府用兵新疆的决心，他向朝廷拍胸脯说：白彦虎残部一再被我打得溃不成军，不难一鼓歼灭。阿古柏“无远志”，残暴无人理，边民不服，收拾阿古柏亦非难事。他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阿古柏受土耳其的封号，与英、俄两国立约通商，互派使节，后患方长，如果此时不问，“必仍折入俄边，而我断送腴疆，株守穷八城，久戍防狄，岁无宁日，輓输络绎，劳费无所终极，不一、二年，形见势绌，而西北之患日亟，将求如目前局势，且不可得矣”。故此时停兵撤饷，“断无此理，亦无此办法也。”^①

总之，左宗棠认为“塞防”、“海防”都应重视，惟事有缓急，目前“塞防”急于“海防”。论者以为，“塞防”与“海防”之争是湘系与淮系的派系之争。但新疆是中国的新疆，收复新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之完整，能说是湘系的利益？是左宗棠的利益？这是一个不辩而明的问题。我们说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左宗棠争的是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论者以为无论“塞防”、“海防”的言论，都是救国的言论。这种论点，貌似公允，其实偏颇。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难道说为了筹办海防，倡议出卖祖国大好河山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疆的言论，也是“救国”言论？我认为持“塞防”与“海防”论者，绝大多数人是有识之士，爱国之士，惟有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焦点，在于收复新疆与抛弃新疆的问题是攸关国家安危，领土主权之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一场爱国与

^① 左宗棠：《答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70页。

卖国之争。

左、李的论争，几经曲折，左的理长，得到枢臣文祥的大力支持，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用兵新疆的建议，1875年5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三、西征期间左、李的矛盾斗争

左、李“塞防”与“海防”的论争，以李鸿章的失败而告终，李鸿章切切于心，日夕祈求左宗棠所指挥的西征大军所向败北，他运用个人手中的权力、声望与朋僚关系，从暗中破坏左的西征大计。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矛盾斗争在继续，在深化，其特点是外弛内紧，或明或暗。李的破坏手法有几种：

第一，唆使其党羽等上奏支持李鸿章抛弃新疆，大办海防的卖国观点。他四处发信，指使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等，拾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的唾余，奏陈西征军应停兵撤饷，抛弃新疆的荒谬论点^①。但同时，与左宗棠素无交往的山东巡抚丁宝楨、江苏巡抚吴元炳、湖南巡抚王文韶以及李鸿章的旧部江西巡抚刘秉章等，都一致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观点。

第二，与左宗棠争夺军饷，对左的协饷作釜底抽薪之计，唆使督抚拒拨陕甘协饷。1876年7月下旬，西征军发动了进攻乌鲁木齐的战役，各部嗷嗷待哺，需饷孔殷，李鸿章却写信给山西巡抚鲍源深说：西征军纷纷出关，将牵动全国大局，“以致骚然不靖，患且与国终始，悔可追耶”！就目前国家财政情况而言，户部既不通筹大局，又不深体时艰，左帅一有催求，“羽檄立至”，即海防全撤，岂足供此无底欲壑？老兄留饷自顾藩篱，确系“老成之见”^②。他这是在教唆鲍源深拒解陕甘协饷。左宗棠

① 李鸿章：《复鲍华潭中丞》、《复钱调甫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2、10页。

② 李鸿章：《复鲍华潭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17页。

上奏直陈：“海防”开办有年，有常年经费，西征则“经始之费”特别吃重。沿海是富庶之区，洋关关税收入宏丰，西北则是贫瘠之区，甘肃一省，通省丁粮不过20余万石。现在大军进薄乌垣，战事一触即发，而西征军积欠饷项达2600余万两，每年只发一月满饷。“今日海防之事，实急于出塞之事乎”？他请敕各省迅解协饷，以济眉急^①。

第三，破坏左宗棠借贷洋债。1876年底，西征军欠饷积至2700余万两，一年一月满饷也难以在年底发出；官兵遣散费300余万两须先发出，刻不容缓；攻克乌垣后，大军将南下发动攻势，无饷诸事不办，部队有饥溃之虞。不得已，左宗棠拟借洋债1000万两以应急，“仍归各省、关应协西征军饷分10年划扣归还”。这是对李鸿章破坏各省、关协解西饷的杀手锏。借洋债，循例须由海关出票，督抚加印。沈葆楨在太平天国晚期任江西巡抚期间，与曾国藩争权夺利，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后来，由于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推荐，出任福州船政大臣，曾国藩称沈葆楨是左宗棠的“死党”，可见左、沈之间交谊深厚了。左宗棠拟请老友沈葆楨一手代为经办借贷洋债。李鸿章写信给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的沈葆楨说：左宗棠拟借洋款千万两，以图新疆，堪称豪举。惟各省、关由陕甘协饷下分担还款，“未免吃力，何可独委请执事耶”^②？沈遂上奏反对左借贷洋款。李鸿章为此兴头十足，进一步挑拨左、沈关系，致书沈说：大疏奏驳左公借洋款等事，“剴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倾服莫名”。他又进一步造谣说：“季帅（左宗棠，字季高）误于谍报安集延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奉谕旨准借巨款，正拟月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渠向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事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但

① 左宗棠：《军饷支绌请速筹解济折》，《请敕各省匀济协饷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22—35页。

②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4页。

冀季老素尚推重执事，或者能受尽言。若出自鄙人之口，必是一场大讼案矣”^①。左宗棠当然不肯“服输”，他说：你两江海关不肯出票，两江不肯盖章，我可以向广东、向浙江商量嘛！你沈葆楨难不倒我。他哪里知道李鸿章在暗中捣鬼呢。

左宗棠原拟向英商借款，李鸿章搬动总税务司赫德唆使英商拒绝借贷。左宗棠说：你英商不借，我向别国借，难不倒我。他指责李鸿章在他借洋债问题上施放暗箭，是“家鬼弄家神”^②。后来借到洋款后，左宗棠慨乎言之道：由用兵新疆而借饷，借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寥寥数语，流露出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李鸿章的崇洋媚外，真有“神”、“鬼”之别了。

第四，利用办理马嘉理案，李鸿章散布战争气氛，上奏攻击左宗棠进兵新疆。在办理马嘉理案过程中，李鸿章一再对英妥协退让，把赢理办成输理，散布战争气氛，胁迫朝廷妥协。1876年夏，他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论海防饷匱》，强调不应开罪英国，应该妥协退让。过了6天，又上奏《中国人材财政均无把握不宜因滇事失和片》，点名攻击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说：“左帅进图新疆，倾国之力断不足以接济，识时务者多议其非”，“各省穷困若此，既欲图新疆，又须大办海防，必至穷兵黩武，继以颠覆，心切危之”。左宗棠征讨阿古柏匪帮，收复旧山河，怎能说是“穷兵黩武”？西征军是正义之师，又何至于“必将继以颠覆”？李鸿章完全站到了英国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儿皇帝阿古柏的立场上讲话了。说到底，他在坚持其抛弃新疆的立场。

第五，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串通一气，为英国卵翼下的儿皇帝阿古柏说项立国。1876年9月，西征军已攻取乌鲁木齐，锋锐正盛，随时可能跨越天山南下，进攻阿古柏盘踞的南疆。阿古柏惴惴不安，寻求其主子英国侵略者出面帮忙。英国则惟恐失去它肢

①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18页。

② 左宗棠：《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6，第18页。

解新疆的工具阿古柏匪帮，所以，1876年9月28日，威妥玛竟敦请李鸿章出面转告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喀什噶尔回王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探询中国之意，能否准客酋投诚中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该酋不敢深信左帅，欲向朝廷乞命。嘱密致钧处。”^①李鸿章狐假虎威，要挟朝廷，攻击左宗棠。总理衙门不敢作主，将李鸿章代威妥玛为阿古柏乞降“立国”一事咨照左宗棠，征求左的意见。左据实驳斥说：逆匪阿古柏伪号立国，窃踞南疆及吐鲁番，并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叛国逆匪白彦虎勾串一气，横行新疆达十余年之久，罪恶昭彰，威妥玛居然为阿古柏乞降，称逆匪阿古柏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既称阿酋愿降，又仅请为属国，免除朝贡，而对于“归我故土，缚献逋寇”只字不及，是何居心？令人莫测！左宗棠进而指出，“俄英其争印度数十年矣，印度东南之地为英占有，俄则觊觎其西北之地”。英国代阿古柏乞降，其目的是保全侵占我南疆等地之阿古柏匪帮，阻止我光复南疆，说到底，是要保存伪“哲得沙尔汗国”为印度屏障，“保其印度腴疆耳”。此何可许！为了坚定总理衙门诸大臣收复新疆的信心，他再次向朝廷拍胸脯说：只要粮饷、军火应手，“不至久滞戎机”，胜利是有把握的。英使调停，断难允准^②。

李鸿章阻挡不了左宗棠的西征军事行动，无可奈何之余，遂由制造流言蜚语中伤左宗棠，进一步滑到了恶毒诅咒左宗棠。1876年8月，左宗棠指挥西征军光复乌桓。翌年春，当西征军整军待发，准备进击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与阿古柏进行主力决战时，李鸿章宣称：美国福西特（Forsyth）对我说过，“彼曾住

① 李鸿章：《述威使代喀酋乞降》，《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7—28页。

②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0页。

喀什噶尔7月，谓回王（阿古柏）雄杰能军，与俄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①。殊不知李鸿章的言犹在耳，1876年4月，西征军连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西征军的辉煌胜利，竟使李鸿章恼羞成怒，诅咒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箠可下，朝廷日夜盼捷音，协饷如星火，……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②。他把西征军的覆败，寄托到了叛匪阿古柏的身上，其居心不可问了。事物的发展与李鸿章的愿望相反，左宗棠以不断的胜利粉碎了李鸿章对他西征大业的阻挠与破坏，1878年1月，西征军全歼阿古柏匪帮，光复南疆，而李鸿章却冷言冷语地说：西征军收复喀什噶尔，然而“白彦虎、伯克胡里（阿古柏子）不投俄，便归浩罕，终无了期”^③。

左宗棠在西征期间，一切政治设施，围绕着为开置新疆行省作准备，这是使西陲长治久安的正确决策。李鸿章却对左施放暗箭，他写信给朋僚攻击左宗棠说：“左相议改设疆吏，分置戍兵，端绪甚大，经纬需人，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殫莫究，病在无人，而用人犹未尽得法也。”^④

四、“塞防”与“海防”之争的继续，在 收复伊犁问题上左、李的矛盾斗争

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使中国军队在新疆站稳了脚跟，对于收复伊犁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因此，左宗棠把收复伊犁的问题及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左的主张又遭到了李的反对。如果说要不要征讨阿古柏匪帮是左、李“塞防”与“海防”

①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12页。

② 李鸿章：《复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③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3—4页。

④ 李鸿章：《复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第2—3页。

之争的第一个回合，那末，要不要收回伊犁，则是其第二个回合。只有研究左、李对收复新疆全过程的言论与政治、军事实践，才能论断左、李“塞防”、“海防”之争的性质。

1877年12月，西征军光复西陲重镇喀什噶尔，白彦虎率残部逃窜俄境。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对俄强硬交涉，“应把交还伊犁与送出白彦虎并为一谈”^①。

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赴俄办理收回伊犁及中俄新约事宜。崇厚既不谙边情边势，又无外交经验，在沙俄政府的软硬兼施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除偿还“代收”、“代守”伊犁巨额费用、增辟通商口岸等苛刻条款外，并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中国领土割让给沙俄。总理衙门命李鸿章、左宗棠等酌议崇约覆奏。李鸿章依然妄图节西饷以裕海防经费，又害怕否定崇约可能引起中俄对抗，将严重影响筹办海防，1879年11月，他覆奏说：“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又说，崇约必须承认，否则“侮必自招”，难免发生战争，其结果有“照现议而不可得者”^②。他还致书丁宝楨说：现在正在定购铁甲船二艘，需款200万两，大部分款项已经筹到，惟购船后尚须“选将、练兵，事理甚繁，经费尤窘，……俄事至此，已无结局，直累到四海穷困，内变浸作，而外侮益不支矣”^③。一句话，为了筹办海防，崇约必须尊重，应该放弃伊犁。

左宗棠收到总理衙门咨照后，怒气冲天，上奏驳斥说：（一）割去特克斯河流域，后患严重。该流域是产粮地区，是伊犁之粮仓，去此腴地，伊犁军食何出？（二）天山横亘新疆中部，南、北疆的西部通道全恃由伊犁经特克斯河流域，跨冰岭至

① 左宗棠：《上总理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2—3页。

② 《直督李鸿章奏建议交收伊犁补救崇厚订约失败事宜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7，第16—19页。

③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14页。

阿克苏一线。俄国侵占特克斯河流域，就切断了新疆西部南、北疆交通要道，兼裹哈萨克、布鲁特各部，使俄境与阿克苏、喀喇沙尔、赛立木相连，在我险要尽失，塞防不固，贻患无穷。(三)根据崇约，塔城边界又须修改，中国领土将再被侵蚀，俄部环居伊犁三面，伊犁孤城一座，何以自守？左宗棠提醒朝廷说：如不急起与俄力争，“新疆全境有日蹙百里之势”，陕、甘、晋、冀因之危急，那时再议筹边，“臣恐劳费不可殫言，大局已难覆按也”。最后他提出收回伊犁的对俄方针是：“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即是从外交途径谈判以收回伊犁，谈判不行，就决心武力收回伊犁。他说现在我已部署中俄边境防务，明春准备出屯哈密，亲自指挥武力收回伊犁的军事斗争。他再次向清政府拍胸脯说：只要粮饷、军械应手，胜利是有把握的^①。他又建议将崇约交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军督抚会议，各抒所见，以昭郑重。

崇约一经在高级官僚群中公布，官僚群中遂分化出大量爱国派，掀起了一股爱国浪潮，一致声讨崇厚卖国，要求废除崇约。在一派声讨卖国贼崇厚声中，李鸿章却竭力为崇厚辩解。他说：否定崇约，是“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左宗棠一马当先，上书总理衙门驳斥李的论点。他说崇厚所议条约尚须等候御笔批准，批准与否，权操在我，“是原无所谓允也”。他又进一步指出：“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则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轻轩，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迹，大抵皆然”。如果俄国一意孤行，挑起战争，我当檄南路之兵分道急进，直取伊犁，兼索白逆，“均有把握”^②。左宗棠实力备战，准备打仗，有力地支持了爱国官僚。他们参劾崇

① 《甘督左宗棠奏遵议伊犁交涉应付事宜折》，《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2—7页。

② 左宗棠：《答崇峻峰方伯》、《上总理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3，第44页。

厚的奏章如万箭齐发，唇枪舌箭，愈演愈烈，正气上升。这是近代史上清政府中分化出的爱国力量的第一次大集结，而爱国力量的中流砥柱则是左宗棠。李鸿章对爱国力量的集结，既害怕，又气恼，对左尤其恨入骨髓，破口大骂：中俄交涉，坏事始于张之洞等慷慨陈词，直至今日，节节贻误，“仍日进忧论，其源自左相发之”^①。“左帅倡言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顾后艰”。

在爱国舆论压力下，1880年初，清政府对俄态度强硬起来了，将崇厚革职，交刑部治罪。2月，派曾纪泽充出使俄国大臣，赴俄重开谈判，照会俄国崇约作废。3月，崇厚定为斩监候。李鸿章气急败坏，骂街说：“左帅主战，倡率一般儒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②。崇约刚订，“敌血未寒，盟书又弃”，将何以示信于天下？派曾纪泽使俄谈判，完全无此必要。

在李鸿章的咒骂声中，1880年5月，左宗棠以69岁高龄，统军“昇榑西行”，出屯哈密，以示“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军心悲壮，中外警动。这一军事行动，强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谈判，结果修改崇约，虎口夺食，收回了特克斯河流域。

“塞防”与“海防”之争，贯穿于戡定南疆与收回伊犁的全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李鸿章始终坚持抛弃新疆、放弃伊犁，左宗棠则适得其反；在他征讨阿古柏匪帮与实力备战，准备武力收回伊犁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又遭到李鸿章的反对、干扰与破坏。从左、李在收复新疆全过程的言论与政治、军事实践考察，他俩之间“塞防”与“海防”之争的性质，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而不是军路上的分歧或派系之争。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董蔡时，1921年生，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李鸿章：《复周福陝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32页。

② 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34页。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跃峰

近代中国，既是一部充满了民族灾难的屈辱史，又是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精神的斗争史。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紧侵略、神州沉沦、国将不国的危殆局面，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对于救亡这一历史课题作出的答卷。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当然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之一。于是，义和团运动也就必然地成为长期的民族文化积淀的外化形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研究义和团运动，可以使我们对二者的认识都得到深化。

一、忧患意识与反帝爱国

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而远古的爱国精神常常发源于深沉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萌发于西周初年。周初统治者鉴于夏、商之亡，深感天命无常，“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①，从而最早产生了忧患意识。不过，他们忧虑的还仅仅是周王朝的兴衰，姬姓家天下的安危。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诸子学派尽管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① 《尚书·号谕》。

千差万别，但都具有不同程度、不同特色的忧患意识。其中，孟子提出要“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①，把忧患意识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作为思考及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并从“民本”观念出发，发出了“忧民之忧”的呼声，为忧患意识注入“爱民”的崭新内容。著名诗人屈原被放逐之后，既忧楚国之危亡，又愤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忧愤至极，乃自沉汨罗，最先把忧患与“爱国”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了忧患意识的内涵。自此，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延绵不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历史上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其尤著者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诗人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明末学者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从忧国忧民到奋身报国，无数仁人志士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才使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之后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使华夏文明在迭遭冲击之下仍能延而不绝、并进而发扬光大。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忧患意识逐步弥漫于朝野各社会阶层。林则徐在充军新疆途中作诗曰：“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②。洋务派惊呼：“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③早期维新思想家“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忧国念家，万虑坌集”，“梦寐不安”，“行愁坐叹”，甚至“太息痛苦流涕”^④。资产阶级维新派鉴于“国

① 《孟子·告子下》。

② 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6，第13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朋僚函稿卷6，第37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王韬：《弢园尺牍》，第93页；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自序》。

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愤而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①。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满怀“亡国亡种之忧”，主张推翻腐败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争取国家独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下层群众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同样产生了浓郁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与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当然，由于知识水平的低下及小生产的阶级局限，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灾难深重的认识也有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矛盾中，乡村士绅在大多数场合客观地成为他们精神上的主脑和文化上的代言人）。

帝国主义以宗教作为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积极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开展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的不法教徒到处为非作歹，欺压良善，广大群众在愤恨之余，也产生了无穷的忧虑。

首先，从总体上，一些人认识到：“洋人传教，是中国一大变局”。传教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祸中国”。是以惊呼：“将来为害，何所底止”！^②因此而忧心忡忡。

其次，对于传教士千方百计地诱人入教，许多人认为是为了“迷惑其心志，变易其肺肝”，以利于洋人“率中国之民，启中国之变”。入教者越来越多，势必成为中国的隐患，“天下无事，戎伏于莽”，一旦有事，则入其教者，“皆云合响应，起而叛其长上”^③。且“胶固盘结，踞我堂奥，睨瑕伺会，森迅云合以起”，“虽有圣人，不能为之谋矣”！^④这是更深一层的忧虑。

① 《戊戌变法》（四），第399页；（二），第189页。

②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2，第52页。

③ 蒋敦复：《嘯古堂文集》，卷3。

④ 《庸庵文编》，卷2，第50页。

再次，对于传教与通商的关系，有人指出：“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①。对此，必须加以足够的重视。“今试思各口通商以来，腹地之脂膏被嗜吸者几何？直省之民人被诱结者几何”？帝国主义“阳托修和，阴怀叵测”，“不几欲使我至于民财尽竭、民志尽携而后已哉”！^②这是带有全局观念的忧虑。

对教会侵略满怀殷忧的广大群众不甘沉默，他们力图消除这一祸患。部分乡绅上书当道权臣，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声望，通过“合法”的途径，采取有力的措施，限制乃至驱逐教会势力。更多的人积极从事自发的反洋教活动。他们编撰、刊刻、散发了许多宣传品，揭露“逆夷教匪，外以和约通商，欺蔽中华”，“而其中之包藏祸心，实与寇贼一气”^③。外国传教士“藐我王章，侮我先圣，败坏我风俗，蔑绝我伦常，弁髦我官府，勾诱我子弟，窥伺我城厢”^④。“四处之劝教者，即贼之侦探也”。甚至愤激地将洋教称为“鬼叫”，宣言：“鬼王特叫鬼叫头到处煽惑人从鬼，好里应外合，谋中国的江山”^⑤。中国城乡各地到处掀起了反洋教斗争的浪潮。

在这一阶段中，除个别士绅曾将传教与通商联系起来分析外，绝大多数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都局限在传统这一点上。他们对教会侵略危害的认识也比较肤浅，且有不少失实之处。尽管广大群众激于爱国义愤纷纷投身于反洋教斗争，尽管各地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持续了30余年，但斗争的目的基本局限于焚拆教堂、驱逐教士、惩办教民。广大群众提不

① 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2，第10页。

②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18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918页。

④ 王明伦编：《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99页。

⑤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1298页。

出更高的反帝要求，他们的反帝斗争也就不可能有较大的深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的深化促使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亦随之深化。

“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心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泣下”^①。1898年8月，四川大足县余栋臣反教起义时发布告示，宣称：“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由是煽惑我民心，奸淫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②这段文字全面地声讨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对于帝国主义攫夺中国主权、割占中国领土、强占租借地、企图瓜分中国的揭露，在当时尤具现实意义。继之而起的义和团运动，正是广大群众忧患意识愈益深刻、日形普遍的必然结果。义和团声称：“其初祖曰忧世先师，深忧西教之害国家，思其扑灭之法不置”^③。说明了义和团运动与反洋教斗争之间的渊源关系，并证明忧患意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必要思想条件。

义和团的揭帖、乱语等宣传品，表明了他们对于民族危机的忧虑。他们宣称：“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④，这些侵略者“争权争教又争朝”^⑤，“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总要把国谋”^⑥。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君非桀纣，奈佐非人”！部分卖国官吏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工具，他们签订和约，“误国殃民”，且“羽翼洋人，趋炎附势，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7页。

②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92—93页。

③ 《义和团》（一），第299页。

④ 《义和团》（一），第120页。

⑤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2页。

⑥ 《义和团》（四），第149页；（二），第188页。

肆虐同群”^①。这是民族灾难深重、瓜分危机日迫的根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制止瓜分阴谋，他们挺身而出，为国除害，要在“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②。义和团还仿照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做法，借用佛教“劫”的观念来宣传、动员群众。“大劫当头，血水横流，白骨丛丛，即在今秋。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③。“庚子年上刀兵起，十方大难死七分”^④。这一方面是为了号召更多的群众参加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关于劫变的极端恐怖的描绘，也表明他们对民族灾难的忧虑之深。

长期郁积的忧患意识必然要物化为广阔炽烈的爱国行动。无数义和团群众怀着满腔的爱国赤诚，牺牲于反帝斗争的战场，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献出了生命，用鲜血谱写了民族解放斗争史的崭新篇章。

诚然，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在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没有与先进的阶级结合之前，是不可能完成救国救民、解除民族危机这一历史使命的。但是，义和团运动以血的事实教育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志士，也包括广大农民自身，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和清王朝的腐败，从而能够一度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又以更大的热情踊跃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这一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客观地成为50年后中国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二、夷夏之辨与笼统排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早在秦统一以前，中原地区的许多部落文化已

① 《义和团》（一），第112页。

② 《义和团》（一），第120页。

③ 《庚子记事》，第80页。

④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6页。

经融汇为以后来的汉民族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主体部分。而僻处周边地区的众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在文化上也不同程度地落后于中原地区，形成了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为中心的一个个亚文化圈，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民族间文明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形成了文化上的优越感，养成了民族自大心理。他们把边远地区称为“蛮荒之地”，把少数民族称作夷、狄、蛮、戎，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叫做“四夷宾服”。封建统治者尤其津津乐道于所谓“万方来朝”。中原王朝要维持并强化其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要削弱乃至摆脱这种统治，甚至称兵犯境、问鼎中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民族冲突和融合。一方面，少数民族每次逐鹿中原都给中原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灾难；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军事上无论成与败，在文化上却无一例外地要受到中原文化的同化。这些事实无疑又加深了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仇恨和歧视，强化了汉民族的民族自大心理，形成了文化上的夷夏之辨。“用夏变夷”还是“用夷变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谓“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谓不信”^①；反映了一部分封建士大夫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标明了华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界限。

与夷夏之辨联系较多的还有崇正黜邪观念。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宗，历代统治者尊崇有加，大部分封建士大夫奉为圭臬，大有囊括中国思想、文化之势。除道教和佛教因其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功能方面可以与儒学相辅相成，而得到多数统治者的承认外，其余各种社会学说一概被目为异端邪说、被斥为左道邪教。尤其是一些农民起义领袖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第2册，第195页。中华书局1975年3月版。

往往借助民间宗教宣传、组织群众，邪教又被赋予谋反的含义。

“佛老之教，或宗清静，或主空寂，离垢去欲，无干法纪，卫道之士，犹深恶之，为其外伦常而言道德也。此外邪教，以术愚人，徇私纵欲，挟势横行，小则渎乱彝伦，大则谋为不轨”^①。皆在被废黜被禁止之列。在封建统治阶级垄断知识、垄断学术的时代，崇正黜邪观念挟政权的力量而灌输于社会、浸润于人心。封建卫道者以崇正黜邪为神圣职责，“安分”的百姓也时时以崇正黜邪为言行规范。于是，崇正黜邪观念渐渐得到比较普遍的心理认同，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

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行闯入中国时，大多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由于民族自大心理作祟，他们很自然地将西方列强等同于落后于华夏文化的“化外”夷狄。西方列强以宗教作为文化侵略的工具，大量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在中国城乡各地招揽、收容教民，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中国历史上谋反的邪教。于是，在西方侵略者身上，夷与邪的形象重合起来，用夏变夷和崇正黜邪具备了共同的内容，并通过反洋教这一形式统一起来。

最初，广大群众的反侵略要求固然有些是出于对侵略者“外既肆其侵踞，内更逼及宫闱”的忧虑^②，出于对教士、教民“欺压农商，鱼肉乡里”的愤恨^③，但在更大成份上却是出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社会下层群众当时对西方文化不可能得到比较接近真实的全面了解，无论是对西方社会风俗的一鳞半爪的道听途说，还是对教士、教民所作所为的耳闻目睹，他们都感到大异于中土风俗，不可理解，难以接受。再加上传闻失实、穿凿附会、妄加揣测、蓄意夸大，西方社会的一切几乎都成了禽兽之行。

西方“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论少长，必男女自愿”；中国婚

① 《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11页。

② 《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18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491页。

嫁必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视封建包办婚姻为天经地义之事的中国人对西方的婚姻自主自然感到不可理解。西方“凡与人相见，问其妻，不及父母”，亦与中国首重孝道大相径庭。西方妇女可以从政，甚至可以继承王位；中国妇女必须“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女人干政被视为“妖孽”、“祸水”；于是西方的男女平等被歪曲为“重女轻男，自王国至臣庶，皆听命妇人”。西方妇女可以离婚、再嫁；中国妇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提倡女子“从一而终”；是以西方的婚姻关系被丑诋为“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兄弟叔侄死，可互娶其妇，同胞姊妹亦可娶为妇”^①。“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纲纪伦常廉耻礼义也”^②，西方人全不讲纲纪伦常廉耻礼义，岂不是禽兽？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西方宗教，加之谣传不实之词，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教会“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体共沐，无羞恶也。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以迷汤，蛊惑志”^③。是典型的邪教。“自古邪教之兴，皆足以败常乱俗，为国家之大害”。“左道乱政，法所必诛”^④！再者，中国最崇儒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继天立极，万世之圣人也”。西方传教士竟然“妄作妖书，丑诋唾骂。甚至蔓入曲阜，毁坏圣林庙寝”^⑤，是非圣无法。“出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即入于禽与兽之中”^⑥。

至于西方的照相技术，“以药涂镜面，摭人形貌”，更使人

①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7—8页。

② 《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490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919页。

④ 《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页。

⑤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96页。

⑥ 《嘯古堂文集》卷3。

感到惊奇。于是谣传传教士以妖术“切得妇女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卖与鬼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①。教民临终，教士为之祈祷，被说成是“私取其双睛”，“曰封目归西”。“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且“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②。这类凭空想像出来的毫无人性的恐怖行为，进一步“完善”了西方人的禽兽形象。

出于文化上的偏见和民族自大心理，西方人从形貌上观之，亦成了“羊眼猴面，淫心兽形”者^③。或曰：“类魑魅之形，具猴猿之象”^④，“某种半人而半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冠人者也”^⑤。堂堂中原礼义之邦，自然不能令人鬼并域；皇皇华夏衣冠之族，当然不可与鸟兽同群。“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义之邦，一化为倮虫鯪人之域，獐獐狃狃，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⑥

基于上述认识，大多数群众要反抗外来侵略，驱逐西方教会势力，首先是为了严夷夏之防，明邪正之辨。在他们心目中，“自开辟以来，我中华之所以甲于寰区者，赖崇正道耳”^⑦。孔孟之道、纲常伦教是国运盛衰的关键；崇正黜邪、用夏变夷是维持道统、昌盛中华的首要之途。所以，反洋教斗争中许多州县设立“防邪总局”，将“黜异端以崇正学”标为职志^⑧。

反洋教斗争既是自发的群众性反侵略斗争，又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当然，所谓文化冲突，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而言，亦具有反对西方文化侵略的性质。只不过广大群众是以落后的中国封

①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200页。

②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9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399页。

④ 《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60页。

⑤ 《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918页。

⑥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97页。

⑦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110页。

⑧ 《清季教案史料》，第1册，第109页。

建文化反对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从而决定了反洋教斗争不可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结局。

义和团运动主要是民族危机刺激下中国人民觉醒的结果。但是，作为运动主体的广大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仍然深深地受到传统的夷夏之辨的局限，他们的反帝宣传仍然以崇正黜邪为基本内容。诸如“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①；“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②；“天主、耶稣之教，欺神灭圣，不信佛法”^③，“大悖圣道”，“忘却人伦”；等等。与反洋教斗争时期民间流传的种种说法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义和团的许多骨干分子来源于民间宗教，而这些民间宗教大多是崇拜神佛的，因而义和团的揭帖、乱语中多处提到“佛教当兴”，将“邪教不敬神佛”作为侵略者的主要罪状而大加宣扬。

义和团在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仍然以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来宣传、动员群众，一方面，这类宣传出自民间，通俗明快，更容易为社会下层群众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广大群众对西方的认识仍然比较肤浅，他们尚未找到新的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只能使义和团运动的水平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

地主阶级中部分有识之士鉴于列强所显示的先进物质文化，早已提出了“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正确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亦已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准备引进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而那些仍然沉浸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封建顽固派却一概斥之为“用夷变夏”。广大农民群众与封建顽固派无论在阶级利益上是何等的尖锐对立，而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

① 陈振江、程献：《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0—31页。

②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③ 《义和团》（一），第510页。

度上却基本一致。在他们看来，既然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那么多灾难，怎么还能向他们学习？既然西方人都是具“犬羊之性”、与禽兽相类的夷族，还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学习？他们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西方文化，而是简单地采用了盲目的笼统排外的处理方法。封建顽固派乘机从中推波助澜，别有用心地诱发、煽动、助长义和团的排外情绪，遂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愈演愈烈，极大地干扰了义和团运动的方向，模糊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视线，冲淡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正义性。

义和团声称：“兵法易，助学拳，要擒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斯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①。1900年5月，京津一带义和团散布揭帖，宣布要于5月16日至6月14日（农历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一月之间，将“遍方铁道俱都毁拆”，告诫人们“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轨之中”^②。接着，北京义和团也大张揭帖，扬言要于27日“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③。后来，南京、厦门等地亦出现义和团揭帖，内称：“本帅所统神兵，不日由京到宁。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竿毁尽，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清”^④。许多史料记载：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盃，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⑤；“其称人也，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日，初不仅外间所传大毛、二毛、三毛已也。十毛之人，一落匪手，必杀无赦”^⑥。在所谓“上帝有

① 《义和团》（一），第112页。

② 《义和团》（四），第147页。

③ 《义和团》（一），第114页。

④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55、57页。

⑤ 《义和团》（二），第146页。

⑥ 《义和团》（一），第271页。

七怒”的揭帖中，义和团还对资产阶级维新派表示仇视，大骂“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①。

如果说，夷夏之辨在古代中国虽然带有严重的民族偏见，夹杂着大汉族主义的成份，但对华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所作的先进与落后之分还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近代以后，仍然用这种传统的观念来衡量中西文化，却连二者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之分也完全给颠倒了。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正确地认识、有选择地引进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才有可能改变中国被侵略、受奴役的屈辱地位。义和团群众不愿意接受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的事实，不懂得铁路、电线等洋事物既可以被侵略者用作奴役、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又可以被中国人用为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来侵略的手段；不懂得与外国人交往的既有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洋奴，又有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拘拘胶执于夷夏之辨，亟亟以求于崇正黜邪，固然可以激发朴素的民族感情，可以唤起下层群众的爱国之心，但也必将导致笼统排外倾向，从而给义和团运动深深地打上蒙昧落后的烙印。

三、天人合一与神助扶清

上古时代，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十分低下，把许多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灾变归结为上天的意志，臆造出一个个在冥冥中主宰着人类命运的神灵。随着社会分化为阶级及国家的产生，统治者往往借用神的意志来论证自己掌握政权的合理性，借用神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尊严、提高自己的威望。一方面是上天诸神的不断人格化，另一方面是世俗统治者的日益神圣化，于是逐渐构成一幅“天人交感”的画面。这在中国尤为典型。所

^①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1页。

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说统治者因为具有完美的德行，得到了上天的宠爱和庇护；上天是公正无私的，统治者掌握权力出于上天的选择，当然是合理的。世俗统治者成为上天意志的代表，上天成了世俗统治者冥冥中的后台，成为维护其统治权力的精神支柱。后来，历代君王又进而被称为“真龙天子”，干脆步入了神的天国，成为上天的儿子，具备了亦人亦神的双重身份。于是“君权神授”的神话更趋完备。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神秘色彩的“天人合一”论。

作为一种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天人合一”论几乎浸透了封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一切社会行为都发生着重要影响。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城乡各地的封建士绅以及安分守己的王朝顺民们，谁敢对皇帝的权力和地位提出怀疑？甚至那些被迫铤而走险、举旗造反的“盗贼”、“乱民”们也深受天人合一论的制约，往往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或制造一些“天命”上的依据。“篝火狐鸣”、“鱼腹丹书”的伪托，“苍天已死，皇天当立”的预言等等，都是极好的例证。直到近代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时，还从西方搬来了“天父上帝”和耶稣，把自己说成是天父的次子，是奉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解民悬”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们的天人合一论是以否定现行统治者的神授权力为基本前提的，表示上天已授权他们来取代当时的皇帝。事实上，统治者和造反者各自塑造了一个相互对立的上天。这种两个上天对立的现象表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如果说，封建统治阶级由于居于统治地位及对文字、教育的垄断而在文化上也占有主导地位，他们的天人合一论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文化；那么，历代造反者的天人合一论虽然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却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天人合一论的一种“反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文化。

广大群众从事反帝斗争时同样需要上天的眷顾和庇护，需要神仙在冥冥中为他们撑腰。反洋教斗争中即曾有人声称：“耶稣

太子，亡八鬼王，流传丑教，败坏纲常”。“触怒天地，开罪三光，圣贤仙佛，恼不可当，各家祖宗，悲恻凄惶”。以致玉皇大帝特差孙悟空“巡查中国事务”，出示晓谕百姓，“扫邪保护正道，灭鬼保护华邦”^①。把反洋教说成是上天的意旨。

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之际，这类宣传不胫而走，风靡一时。义和团组织上的分散性决定了他们的宣传口径亦不完全一致。概括起来，他们与神的关系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是说：玉皇大帝“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②。或曰：上帝“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③。这种说法表明：义和团是人不是神，不过他们天神暗中保护或从神那儿学到了“仙艺”，是所谓神传弟子。其二是说：上帝“降下八百万神兵。扫除外国洋人”^④。有人借用关圣帝君的名义宣称：上天“降下赵云，带领八百万神兵，收灭邪教”^⑤。按照这种说法，义和团成了奉上帝之命下凡扫灭洋人的“神兵”，只是这些神兵在天国中的地位很低，还需要地位较高的神仙（诸如赵云等）来统率他们。其三是说：“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⑥。或曰：“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⑦。这种说法把义和团说成了具有亦人亦神双重身份的神仙附体的人物，而设立坛场的义和团首领则成了上天下凡的“诸神”。在这些不同的说法中，义和团与上天之间关系的亲疏有明显的区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

① 《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167、168页。

②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4页。

③ 《义和团》（四），第147页。

④ 《义和团》（四），第152页。

⑤ 《义和团》（四），第150—151页。

⑥ 《义和团》（四），第148页。

⑦ 《庚子记事》，第12页。

的，即：“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上天因“鬼子闹中原”而恼怒，特假义和团之手“剿杀洋人洋教”。“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①。在反对外国侵略问题上，义和团成了上天意志的代表。这是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矛盾空前激化时出现的新天人合一论。

从下层群众借用上天名义提出自己政治主张的做法及他们在民间从事这类宣传的方式上看，义和团的天人合一论与历代造反者的天人合一论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重要的分别。历代造反者为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不承认现行统治者的神授君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天人合一论持否定态度，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天人合一论是一种反文化。义和团没有提出政权要求，不打算推翻清王朝，绝大多数义和团“灭洋”是为了“扶保大清不坏”^②，他们的斗争口号是“扶清灭洋”，并未否认封建统治阶级的天人合一论。在此方面，反映了他们与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的趋同性。当然，义和团所塑造的上天选择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下层群众作为自己的世俗代表，并授予他们以武装斗争形式反对外国侵略的权力，也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天根本不同。再者，大部分义和团以亦人亦神的面目从事反帝斗争，声称：“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③；“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④。在北京，有些义和团曾“以神自命，与王公论师弟兄”^⑤。张德成至天津，直隶总督裕禄“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⑥。表明他们以相对独立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阶级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自居，不是以清朝统治者臣民的身份，而是以与封建统治阶级对等或平行的神的身份来扶清、助清、兴清的。因而，

①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47、20、14页。

② 《义和团》（二），第188页。

③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3页。

④ 《义和团》（一），第120页。

⑤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31页。

⑥ 《庚子国变记》，第28页。

应该说义和团的天人合一论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亚文化。

义和团在“灭洋”的同时又广泛宣传“神助”、“扶清”，究其用心，大略如下：一、可以坚定人们“灭洋”的信心。近代中国与西方相比，物质上的落后已不待言。目睹了用近代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之后，人们很难相信充其量只有木棍、刀矛为武器的普通民众能够战胜洋人。宣扬神助，以“法术”来弥补反帝群众在物质力量上的不足，让人们把反帝斗争的前景寄托于冥冥中的上天，在封建迷信仍然很有市场的近代中国，可以给人们以极大的精神鼓励。二、可以争取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站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对于“聚众闹事”深怀戒心，惟恐危及他们的统治。义和团明确宣布以扶清为宗旨，可以减少乃至打消他们的疑虑，为自己的反帝斗争取得“合法”地位，以减轻或解除来自封建统治阶级方面的压力。一旦封建统治者化除了成见，认为义和团“民心可用”或“法术可恃”时，他们甚至可以“联合”起来共图“灭洋”大计。三、可以号召更多的民众加入反帝斗争行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痛恨已久，但是，长期以来群众性的反帝活动一直停留在分散的局部的反洋教斗争水平上。大部分民众未能参加反帝斗争，除了担心自己在物质装备上过于落后、不足以克敌制胜外，还担心封建统治阶级将他们与谋反的“乱民”一样看待，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剿杀。义和团的神助宣传基本上为他们消除了前一个顾虑。而扶清之说等于明确宣布：义和团“非是邪，非白莲”，与历代造反者根本不同，不但不会危害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可以使“大清一统靖江山”^①，冀使封建统治阶级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广大群众的后一个顾虑也就可以消释了，时人估计：对义和团的神助之说，“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②。史料记载：义和团“以扶清灭洋

①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8页。

② 《义和团》（二），第7页。

为名号，入其党者不胜屈指数”^①，“所至之处，人多赢粮景从，父兄莫可拴束，妻子不能阻挽，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②。这些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神助、扶清对于广大群众的号召力。

神助、扶清等宣传在吸引民众、扩大义和团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方面发生了显著的效用，但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广大群众反帝斗争的水平，埋下了义和团运动日后必然失败的祸根。

首先，所谓神助之说毕竟是一种迷信。冥冥中的上天诸神在一定限度内固然可以坚“灭洋”之心、鼓“灭洋”之气，但终究不能代替义和团去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也不能像义和团所宣扬的那样封住敌人的枪炮或授予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枪炮不入，刀箭不伤”的神话使义和团群众“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精神，但在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面前，也只能是“死者如风驱草”^③，徒使义和团遭受了极大的牺牲。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巨大杀伤力，懂得如何在战斗中隐蔽自己，在尽量减少不必要牺牲的同时，设法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岂不是更有利于反帝斗争的发展。

同时，用迷信来维持群众的反帝斗争精神，一定难以长久。义和团的“法术”在敌人的洋枪洋炮面前一再失灵，必将使神助之说不攻自破。失去了上天诸神的呵护，义和团运动难免会出现人心涣散的局面。八国联军攻占京津时，城内的大部分义和团一哄而散，与神助之说的破灭有极大的关系。

其次，扶清表现了义和团对清政府认识上的严重局限性。清政府对外屡战屡败，多次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和局”，不但失去了抵抗外来侵略的信心，而且丧失了代表中华民族、领导反侵略斗争的资格。义和团对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实质缺乏认识，既

① 《义和团》（二），第7页。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8页。

③ 《义和团》（一），第149页。

不能化腐朽为神奇，改造、更新清政权，又要将清王朝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加以维护，结果只能把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导向失败。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因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激化而颁布所谓“宣战”上谕时，义和团群众不懂得清朝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对立只是偶然的、暂时的，而他们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才是必然的、长久的；反而天真地以为清朝统治阶级开始参加并领导他们的反帝斗争了。他们对于清政府接连实施派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在庄王设立总坛令各团“赴庄王府报名注册”及制订《团规》以限制义和团等项别有用心措施，不但未提出任何异议，相反还主动予以配合。北京周围的义和团“日至庄王府挂号，络绎不绝”^①。义和团“已挂号者名官团，（旗上）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②。天津一带，“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③。其余各府州县义和团也大都打出了“奉旨”旗号。自此，清政府不但可以调动各地义和团，甚而将“京师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④。端郡王载漪、直隶总督裕禄等皆以义和团为护卫。北京义和团还主动捕杀所谓“白莲教”以表示对清王朝的忠诚，于是，义和团由与封建统治阶级对等的神下降为清王朝的臣民，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由“替天行道”转变为“奉旨”行事。不但义和团俯伏在朝廷的丹墀之下，连他们信奉的上天诸神也向“神授君权”低下了头。由“扶清”到“奉旨”，义和团的天人合一论也同时完成了由亚文化向主文化的回归。

但是，“宣战”之后仅8天，慈禧太后便于6月29日通过驻外使臣向帝国主义寻求妥协，并将义和团诬为“乱民”^⑤。7月

① 《庚子记事》，第86页。

② 《义和团》（一），第91页。

③ 《义和团》（二），第153页。

④ 《庚子记事》，第20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3页。

22日，慈禧太后又在上谕中声称：“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①，把战争的责任全部加在义和团身上，完全背叛了义和团运动。9月7日，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进一步表示：“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②。封建统治阶级的叛卖，使义和团运动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镇压，很快被绞杀于血泊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曾经大放光芒，到了近代却更多地暴露了其消极面。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继承了它的糟粕。传统的忧患意识、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他们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而发起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陈旧的夷夏之辨、天人合一论又决定了他们因不能正确地认识敌人、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而使运动迅即归于失败。

传统文化，主要是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社会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从小的方面说，可以制约每一个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决定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且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民思想保守、没有掌握新的思想武器，就是说他们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束缚，人虽然生活在近代社会，文化观念却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用中世纪的文化观念来分析、解决近代社会问题，必然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责任编辑：雷颐）

（作者欧阳跃峰，1955年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0页。

② 《义和团》（四），第52页。

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与思想近代化

——以《汉报》为中心

刘望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近代化，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工业革命、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墨血革命”，都像中国的古谚所说，“好事多磨”，经历了一条异常艰难而又曲折的历史途程。中国资产阶级在承担近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时，由于自身的软弱，不得不求助于帝国主义的支持，搬运西方的政治思想武器；又由于无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无从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因此，中国的近代化始终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之间，两岸绝壁，间道以行，长期陷于难以发展的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困境。这就是中国近代化所面临的形势，是无可奈何的历史选择。

湖北地处内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迟缓，其近代化进程，较之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更为艰难，帝国主义的控制也更为严重。在武汉，举凡银行、工厂、洋行、航运，无一不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最先设立和严加控制，而直接反映近代经济和政治的舆论宣传，则被英美等国控制几达30年之久。日本来得稍迟，直到1896到才开始经营《汉报》，但《汉报》一反英美扶植清王朝之所为，转而支持维新派，大张旗鼓地宣传近代文明，鼓吹变法维新，影响重大，后来居上。本文试从文化思想的角度，以《汉报》为中心，探讨日本在汉舆论宣传的巨大功用及其所具文化渗透的性质。

日本在华发行的最早一家中文报

日本在中国发行的第一家中文报纸，究为那一种？有关记载多有失误。如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认为：在福州发刊的《闽报》，“为日人报纸在华之第一种”^①。秋虫（即蔡寄鸥）所著《武汉新闻史》则认为：“日本人在汉口主办的汉字报，当以《湖广新报》为创始”^②。查《闽报》刊于1897年12月，《湖广新报》刊于1918年春，都不是日本在华、在汉发行的第一家新闻报刊。日本最早创办的中文报纸，实为《汉报》。

有关这方面的有力证据，是新近获得的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有关记载。据1900年4月2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濑川浅之进向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所上《有关当地发行报纸状况》的调查报告所记：1900年3月汉口及附近地区现正发行之报纸，“日刊中文报纸仅有一种《汉报》，该报系明治二十三、四年间（1890—1891年间）由英人所创设，一年左右即停刊。嗣后至二十六年（1893年）夏，有苏州人姚文藻者再兴之，后又贷与林松塘。林松塘接办有一年时间即陷于困境，难于续办，遂将停刊之事又告知姚。其时，我国熊本县人宗方小太郎适居上海，彼即与姚文藻商谈接办《汉报》一事。宗方筹金一千元，即于二十九年（1896年）一月与姚共至汉口，接受了《汉报》。当时，汉口尚未设日本领事馆，故请法国领事为中介，就《汉报》转让一事向道台衙门呈请备案，该报遂公然为日本人宗方所有。同年二月十二日，该报即发刊，此即为日本人在清国境内创办中文报纸之嚆矢。”^③这是当年濑川进行调查而上呈的秘密报告，详尽记述了宗方接办《汉报》的经过和发刊日期，说明《汉报》在《闽报》之前即已发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6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

② 秋虫：《武汉新闻史》43页，光明印刷商店，1943年。

③ 《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清国报纸杂件汇编》，见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刊，而比《湖广新报》则早20年，《汉报》系日本在中国、在汉口创设的最早新闻机关，是不容置疑的。

1918年充任日文报纸《汉口日日新闻》编辑的内田佐和吉著有《武汉的文化机关史》，内云：“《汉报》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二月，由宗方小太郎先生创刊发行，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发行新闻，以《汉报》为其嚆矢”。内田特地声明，有关《汉报》的创办经过，系根据当年濂川给他的挚友宝妻寿作氏的信件写成，该信详细介绍了“关于汉口新闻的历史”^①。内田的记述，验证了前引“秘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是完全可信的。此外，曾经大力资助过《汉报》的东亚同文会，在其所编《对支回忆录》一书中，亦谓宗方的《汉报》，“为日本人所发行的最早的汉文报纸”^②。进一步肯定了《汉报》的首创地位。

近代中国的有关新闻史著，何以难以判别《汉报》曾一度归属于日本，可能与该报的多次易主有关，加之宗方有意掩盖《汉报》曾为日本人所有，从而难识“庐山真面目”。

《汉报》由宗方小太郎自任社长，筱原邦成、柳原文雄、冈幸七郎（冈西门）担任主笔。馆内编辑、员司、杂役，全部聘用华人。日出一大张，版面古旧，与社会上一般新闻报纸左右分版不同，为上下对折两长条。不分栏目，上条为报纸正文，刊发论说、上谕、电传、新闻、督抚辕抄等内容；下条全部用于登载商业广告、各行告白、银钱汇价、轮船班期等商情消息。另发行小页附张，逐日转发“京报”内容，类似宫门抄，“俾观览者考察时政”之用，随报免费分送。《汉报》的发行量不算太大，但销行面甚广，除内销本省各州县以外，还外销天津、上海、南京、广东、福州、台北、安庆、芜湖、九江、长沙、常德、乃至日本东京等地，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

① 内田佐和吉著、薛钧玉译：《武汉的文化机关史》，《两仪月刊》1942年。

② 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平译：《对华回忆录》493—49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汉报》由于坚持“抑制旧党，援助新党”的方针，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府顽固势力，因此开罪当道，为政府所不容。1900年初，清廷颁布上谕，凡与康梁有牵连的书报，一律禁止购读和发行，违者严拿惩办。湖广总督张之洞据此立即发布命令，严禁《汉报》等多种报刊在租界之外发行。《汉报》遭此际遇，顿时失去销路，难以维持，最后被迫同意以三千两价银售归中国官方接收办理。1900年9月28日该报发行最后一号，宣布闭馆停刊。

《汉报》停版后，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一度沉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等为此焦虑不安，一再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发行汉文报纸。于是，1905年春遂有《汉皋日日新闻》的出版，小川爱日郎主办，规模不大，1907年并入《汉口日报》。

《汉口日报》由前《汉报》主笔、汉口日本侨民会会长冈幸七郎发起创办，1907年8月1日正式发行，日文版，主要为日本在汉侨民提供新闻消息，也向宜昌、长沙、重庆等地日侨发行，武昌起义时亦售与华人阅读。该报由冈幸七郎担任社长，山崎馨一（笔名五九楼主人）、宇都宫五郎（笔名三九楼主人）、中久喜信固、白仓清一郎、中野江汉等先后主笔。水野幸吉参与筹划并亲自主稿。日销千份左右，设社论、译文、评论等栏目。1917年《汉口日报》创刊十周年之际，冈幸七郎和日本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川越茂相继电请日本政府，要求扩大规模，增设中文版，向一般中国人广泛发行。中文版是否如愿发行，目前尚未发现原报或有关资料予以证实，有待进一步发掘。1926年，中国国民军控制武汉，日文《汉口日报》遂停刊。

1911年底，濂川浅之进与古闲发起创办《鹤唳》周刊一种，日文版。取名“鹤唳”，隐寓颂扬辛亥革命之意。该刊每期8页，打字印刷，主要供日侨阅看。1912年增设“脐茶”专栏，刊发社会桃色新闻，颇受日读者欢迎。1925年夏停刊。

1918年又有《汉口日日新闻》的创刊。该报系《上海日日新

闻》的分馆，由社长宫地贯道亲自主办，井村薰雄任总编辑，本间文彦、内田佐和吉等参与编撰。日出一大张（4页，星期日、星期一休刊），发行数月，因经费不继，遂于5月转让与本间文彦经理，不久复由奥野四郎接办。1923年，奥野去世，又由宇都宫五郎接充社长，内田佐和吉主编。前后发行近20年，1937年停刊。

1918年还有《湖广新报》的创刊，这是继《汉报》之后发行的又一家中文报纸。笹川洁任社长，吉福四郎经理，主笔以下职员全部聘用华人。先后应聘的有何何山、徐祝平（有记载说何、徐曾担任主编）、秦纵先、萧楚女等。该报系日本陆军省派驻长江流域之“中国中部派遣队”在汉言论机关。目的在于加强与中国地方官民的联系，由日本政府提供“巨额补助”。在机器设备方面，使用“吗里罗尔式”新式动力轮转机，开湖北地区使用动力印刷机器之先河。发行一年，适值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掀起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利权的反日浪潮。为抵制日本侵略，秦纵先、萧楚女等相继声明辞职。由于形势对日本不利，销量有限，办得并不十分成功，1922年即停刊。

以上介绍，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日本在武汉营造的主要宣传网络，日本朝野人士借助这些宣传机器，开始了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影响甚广。

传播近代先进文明的不速之客

鸦片战争以后，湖北社会虽然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但仍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直至1861年汉口开埠，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西方文明才开始流播，而以大众传播工具持续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技知识，是从《汉报》开始的。

在宗方接办《汉报》之前的30年，武汉报界的基本形势是：外国人办报纸有十数家，全部由英美垄断；1873年有民办报纸一

家，经营数月即闭馆，此后绝迹，直至1898年才有新办民报的出现；官方报纸也是在这年开始筹办，翌年发刊。至于以宣传民主共和、反清革命为宗旨的革命派报刊，则迟至1905年前后才零星出现，1908年以后才普遍发展起来。

在外报当中，大多由教会主办，多以宣传基督教义、介绍传教方式方法为主旨，读者对象局限于传教士和教民等少数人当中。较为正规的新闻纸如《汉口时报》，则多为英文版，发行范围狭小，无法在华人当中普及。英美等国也发行过一些中文版报刊，如《益文月报》、《字林汉报》等等，所刊内容也介绍一些天文、地理、格物之学和新机新理科技知识，但他们在政治上明显倾向于清政府，远离进步势力，反对维新、革命。加之比较重视经济效益，往往因经费不继而停刊，故寿命短，影响有限。

武汉是中国民办报纸首开先路之地，1873年即有艾小梅其人独资经营《昭文新报》，仿行泰西，期使“下情能达，时事周知”^①。可是，由于湖北社会的闭塞，无人购读，旋即停刊。内田佐和吉曾作过深刻的分析和描述，他说：“当时（湖北的）社会情形，十人中九人可以说是文盲，到乡间去更为蔽塞不堪，毫无事业之可言。至于新闻一事，更无成立之必要。若谈到在新闻纸登载广告，在商人方面绝无此种思想，在那种情形之下，无论鼓着如何的勇气，怀抱着如何的方法，要想经营这种新闻事业，不过是虚掷金钱，付诸流水就是了。其后改为五日发行一次，亦无有购读者，新闻仿佛是无用之物，莫不等闲的看待结局，不得已步入停刊之途。此亦足见办理文化事业之不易成功，热心于此事业之专家，莫不为之丧气。”^②文中所揭示的事实，充分说明湖北尚未步入思想近代化的新阶段，此后20多年，民营报纸一直

① 《汉口创设昭文新报馆》，《申报》1873年8月13日。

② 内田佐和吉：《武汉的文化机关史》。

无人敢于问津。

官办报纸始于1898年《正学报》的筹办，聘章太炎主编，因宗旨不合而未能正式出版。1899年以后，才有《湖北商务报》、《湖北学报》、《湖北官报》、《两湖官报》的发刊。这些报纸或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宗旨，或以“正心术、止流说”为旨归，公开规定：“凡邪说悖乱之说，猥鄙偏谬之谈，一概不录”^①。虽然也传播一些西方科技知识，但反对任何政治变革，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的舆论场所。

湖北社会舆论界的形势大体如此，不容乐观。但是，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和瓜分狂潮而形成的严重民族危机，迫使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思虑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湖北迫切需要资本主义文化的洗礼和“欧风美雨”的淋洒。在此关键时刻，宗方捷足先登，组创《汉报》，填补了湖北自身尚难承负的思想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宗方不愧是开发中国的“先觉志士”，他顺应了中国要求变革的历史潮流，大胆而果断地制订了“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②的办报方针，公开标榜以“开发中国之风气，鼓舞中国之士民，振作政治教育，劝兴农工商务，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以欲全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③。积极支持康梁变法，抨击慈禧太后和清政府。宗方还与自立会志士唐才常、林圭、毕永年、王照、胡石庵等常相往来，毕永年还一度担任过《汉报》主笔。自立军起事的有关会议曾假东文译社召开，《汉报》有甲斐、田野桔次等人出席。从某种意义上讲，《汉报》也是武汉地区维新派、自立会的代言机关。由于《汉报》采取了支持中国进步势力的立场，集结了当地的精

① 《正学报缘起》、《湖北官报凡例十则》，见《黑血·金鼓》18、90页。

② 前引《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清国报纸杂件汇编》。

③ 冈西门：《停报辞》，1900年8月28日。

萃，于是“旗帜一新，在江汉之间摆出严正阵势”^①，在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激烈较量。

《汉报》的宣传，涉及面甚广，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大力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呼号救亡图存。

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独立，是当时中国人民最关切的大问题，《汉报》以大量篇幅进行揭露，一再指出：“道咸以来，外侮迭乘，而沿江海各埠皆辟为通商口岸，门户洞开，漏卮莫塞。驯至民穷财尽，国计日绌，而外人之借口于游历传教者，足迹遍于内地，任其测水量山，勘矿探路，莫敢谁何！其醉心于利益均沾而处心积虑合而谋我者，已非一日。”^②甲午一役战败，

“遂以台湾一岛悉归日本之有，而中国南门之关键已失焉。已而旅顺亦归俄，威海亦归英，而中国北开之锁钥已失焉。自是德据东，俄窥北，英索南，法侵西，亦不能拒之。”^③

《汉报》还揭露中国利权已丧失殆尽，指出：“北海由南宁至龙州铁路已归法人办理；济安、沂州至胶州铁路已归德人办理；吉林至大连湾铁路复归俄人办理；上海至南京铁路，英人承办亦有成约；自芦至汉铁路俄又托名比国办理；由镇江至清江、浦口至德州铁路，英德又纠资办理。是向北京之北铁路为俄所有，今则北京之西铁路亦几归俄有；至自北之西南，英法德□各承理，所有将来扬子江一带沿江各省腹地之铁路，香港至广东及通汉之铁路，缅甸至四川之铁路，英人最重商务，必又操其权。中国各省之铁路，除北京至山海关数百里外，即尽入西人有。”文章还强调，“以铁路之名付于外人，实不啻以中国二十余省之宝地付之外人。……铁路既失，则威利俱失，胡以强，胡以富，

①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493—494页。

② 《支那近事平议》，1899年7月28日。

③ 《愤言》，1899年9月3日。

徒授人有管理中国之权而已，酿分割中国之衅而已。”^①“况关税厘捐之财源皆归外人所管，矿务商业之利权悉入外人所辖，财源已去，利权已失，是非贫之极何哉！”^②

《汉报》一再发出严重警告：“今日而敌国外患，更十倍于前朝”，“瓜分之论大炽，瓜分之祸已启”，“危亡之势，已成岌岌”^③，如不急起而图，必将为俄、英、德、法、美诸国“所割灭”，而沦为“白人之臣妾”^④。

二、猛烈抨击顽固派昏庸误国

对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汉报》的攻击矛头集中对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言论激烈，无所顾忌。

该报在揭露督抚疆臣的种种腐败时写道：“乃观近日将军督抚，……高坐堂皇，左抱幼女，右拥嬖妾，置政事于不问不闻，其误人家国者岂乏人哉。其间有庸懦不才者，有贪得无厌者，有信任家丁纵容舞弊者，有袒护门生调政优缺者，有卖官鬻爵不顾国体者，有老迈龙钟疏荒政事者，有徇情碍面重私忘公者，有文才有余经济不足者，有性情拘泥才少变通者，有畏难苟安遇事推诿者。嗟夫！大臣如此行为，无怪乎国日贫弱，一蹶不复振也。”^⑤对于官场的卑劣愚腐、不通外情揭露无遗。《汉报》还极为愤懑地批评清政府坐井观天、独守旧法的僵化态度，指出中国本是一个邦域大、土地沃、人口多、利源富、立国古、武备严、商务盛的泱泱大国，举世无可匹敌，而今日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成为一个“弱极、贫极、迂极、愚极、腐极、败极、卑极、陋极”的不开化国家。中国之所以败落到如此地步，皆因“中国之人独守数百年来之旧法，尚讲数千年前之陈言，徒恋蚁国之

① 《览中国各省铁路有感而书》，1898年9月8日。

② 《愤言》，1899年9月3日。

③ 《论中国时世》，1898年2月8日。

④ 《论东方时局》，1899年6月23—24日。

⑤ 《恭读正月三十日上谕有感书此》，1899年2月25日。

幻梦，强食蜗角之虚名，而未曾知有外人胜之者也”。“遂使外人乘此机，夺其利权，略其要地，跋扈强梁，恰如行无人之境”^①。该报还猛烈批评“守旧仇新之辈”破坏戊戌变法，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信口雌黄，非訾其坏乱祖宗成法，即诬以莠言乱政、党恶营私诸罪名，而国脉之绝续所不顾，善类之摧残所不恤。”^②大声疾呼：“中国之敝之危，至今日而已极，维新之图，刻不容缓。”^③

三、鼓吹相时而动，变法维新。

《汉报》在批判顽固派“不通天下之大势”后，进而指出：社会向前进化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变通者，趋乎时势者也。”^④只有“相时而动”，革故鼎新，中国才有出路。戊戌变法遭镇压后，《汉报》抵拒横流，继续宣传变法，为康梁撑腰。指出：“中国革新之气运虽挫折于戊戌之变，（然）世界之大势决不容中国之久因循。穷则通者自然之势也，若欲以今力遏其势而不败败者几希矣。”^⑤且戊戌新政已播下火种，“如木之申，如水之达，如火之燃，如风之发也”，是无法扑灭的，“遏之愈久者必发之愈强，兴也勃焉，可立而待”。文章还十分自信地说：“盖环球大局之所以愈出而愈新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天而不欲中国之亡、黄种之绝，则举行新政岂守旧者之能梗其议乎！”^⑥

当康梁遭清政府通缉时，《汉报》却针锋相对，大力称颂康梁是“一时英杰”，是中国难得的人才。康梁为了国家的富强，呕心沥血，“举天下利弊与所以兴利除弊之谋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百尔臣工所不欲言不敢言者，亦无不直言之长言之”^⑦，“所言之新政，皆有益于国家”^⑧。赞誉戊戌变法种种

① 《慎言》，1899年9月3日。

②④⑥⑦ 《新政转机论》，1899年8月21日。

③⑧ 《支那近事平议》，1899年7月28日。

⑤ 《论东方时局》，1899年6月23—24日。

举措，是中国亘古未有之大变局。

为了推行新政，《汉报》还公开要求慈禧太后将政权交与光绪：“今上践祚二十六年，爱民如子，无纤毫失德”，“太后一日不撤帘，今上一日不亲政，则数万万人之心一日不安，伏莽将乘隙而起”。“众怒难犯”，“背天不祥”，希望慈禧太后三思^①。有的文章口气更为强硬，要求“太后退养颐和，请皇上亲政”，如果不听，则“联列强竭忠诚以上告，务期俯从而后已”，甚而表示，此举“虽迹近要挟”，亦在所不惜，“天下当亦共谅”^②。

四、鼓吹仿效泰西，师法日本。

《汉报》大力宣传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和强盛，期使中国民人扩大眼界，急起仿效。有的文章写道：“欧美诸洲，强国相列，各拥大域，居要地，人智大（勇？），产物如山，海有火轮，陆有火车，道路如坦砥，电线如蛛网，国运之隆，文物之盛，兵备之严，财政之整，律例之明，机器之精良，无如今日者也。加之新益竞新，精益求精，凡天地之理与物，无不穷极焉”^③。今日中国，“欲强国势，必谋富强；欲谋富强，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采外长，采行外国之政治，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不以外人为仇，而反以外人为师。”^④

《汉报》还以更多的篇幅宣扬日本，鼓励中国向日本学习，以日本为师。如有的开导说：“明治以前，日本亦一守旧国也，诸国劫盟破其蔽塞安旧之习，导其发愤维新之基，易锁港为互商，易攘夷为通好，而维新之业遂成”^⑤。亚东各国，“惟我日

① 《论良心》，1900年2月17日。

② 《论英日宜联列强以防俄》，1900年6月21日。

③ 《横言》，1899年9月3日。

④⑤ 《论义民与乱民之异》，1900年9月7、9日。

本，首崇西法，而启雄图，骎骎与列强相犄角”^①。他们还引证说：“西人恒称，日本人善于学步，惟能变陈法而出新意，致有冰寒于水、青胜于蓝之誉，以其专精而又变通也”^②。并谓中日“同宗一姓”，“地虽相隔，情实相通，唇齿辅车，非他处所可比拟”，中国“不图富强则已，欲图富强，取法于西人，不如取法于日本。盖日本讲求富强之术，已有明效大验，且扶助中国之议出于至诚，可以无求不应也。”^③

五、提出一揽子的改革方案。

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汉报》无日不论，提出了种种方策和图案。

在政治制度方面，力主仿效英、德、日本，实行君主立宪。认为“君民共治，上下交亲”，较之“共和之治”，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日本在实践中已有成功经验，“维新以前，大权旁落，自尊王论起，而宪政之体成，今之能国于太平洋者，端恃此君民固结之公心”。如果崇尚民权之说，冒然躁进，“则将来之变局不可知也”。

为了维新和实行君宪，《汉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西方，鼓吹“富强之道”，提出种种改革方案。诸如：兴学育才，启迪民智，派遣游学，译刻西书，振兴工商，发展农业，训练新军，等等。

以上所列，仅是笔者所能查阅到的1898—1900年《汉报》的部分内容，但仅就这些，已经涉及社会变革的各个层面，康梁维新派变法的全盘方案的基本内容，《汉报》都一一进行了宣传。值得指出的是，宗方是以大众传播工具对外进行宣传，这对于当年文化还十分闭塞的湖北社会来讲，其传播之广、震动之大都是

① 《论新政新学可以存国之理》，1900年1月19—20日。

② 《论习西学》，1899年9月15日。

③ 《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君演说》，1900年5月17日。

前所未有的。湖北人民相对普遍地接触西方文化，了解世情国情，知晓君主专制的腐败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必要性，正是从《汉报》开始的。如果撇开《汉报》的私图，即为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大陆政策”，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一面，其在“畅言西学”、警醒国民、鼓吹变革、“救时济世”等客观方面，确实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湖北社会的思想近代化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曾称誉《汉报》是近代中国报刊之“卓卓者”^①。湖北舆论界亦多有肯定，认为它是“抨击时政甚烈”之“革命鼓吹机关”，“有足记述”^②。

借资扶植扩张日本利权

我们在肯定《汉报》所起的重大功用的同时，还不能不指出它维护、扩张日本在华权益，诱使中国倒向日本，扶植亲日势力的目的。

宗方之接办的《汉报》，以从事舆论宣传为己任，是完全基于当年日本对华政策的现实需要。自1890年以来，宗方即“提倡以发行报纸作为对中国的指导机关，为当务之急”，并积极游说朝野重臣，努力促其实现^③。所谓“指导中国”的真实内涵，在其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永泷久和水野幸吉的有关报告中有着浅显明白的注脚，文称：“为了我们日本能在支那的中部扩展势力和宣传政策，必须发行我们自己的汉文报纸”^④。而秘密收买当地报纸，“操纵湖北舆论”，借以“缓和排日思想”、“排斥欧美”，“亦为一有效方法”并“有利于日本利益”^⑤。有的则谓：“两湖不仅为政治上重要之地区，更为商业上将来有重大属望

① 《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

② 喻的痴：《樽园漫识》，《汉口中西报》1935年8月10日。

③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493—494页。

④⑤ 《水野幸吉致桂太郎书》，《渡边省三致小村寿太郎书》，《芳泽谦吉致桂太郎书》，见前引《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清国报纸杂件汇编》。

之地。在两湖地区大力扶植扩张我之利权，发扬我之国威，为我国朝野各界之夙愿”^①。宗方经营的《汉报》，正是为了实现日本帝国的“夙愿”而首先来到中国的急先锋。

《汉报》的宗旨也同样具有对华扩张的意义。该报内定宗旨三条，除前已论及的“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一条以外，还规定：“一、介绍日本之实情于支那之官民，使彼等产生对日之信赖”，“二、明唇齿辅车之义，举一脉相承之实”^②。这些规定，从字面上看并无明显的侵略含义，但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发现内中之深意。《汉报》创办的1896年，正值日本因签订《马关条约》而在中国获得巨大权益的年代，沙皇俄国和西方列强为阻挡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联合进行武力干涉，迫使日本将所侵占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接着掀起瓜分狂潮，划分势力范围，日本立足未稳，南下中国的“大陆政策”遭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因日本割占台湾而爆发的反日浪潮迅速兴起，“结俄制倭”的主张在清政府内部甚嚣尘上。这一严峻形势，对于日本颇为不利。为了防止清政府进一步倒向俄国，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汉报》因是而出，担负起“文力征伐”的重任，并且取得明显成绩。濑川十分欣喜地报告说：《汉报》创办之时，“正值清国南北战败之际，上下之感情不睦，对于日人尤厌忌之极。加之清国各地发行之诸报于是时竞相痛骂日本，倡道结俄制倭之论，朝野官绅之意向亦颇倾注之。《汉报》于此遂力辩支那各报之妄，抨击崇拜俄国热潮，申明唇齿辅车之义，极力融和朝野官民之感情”^③，取得了武力所难以实现的勋绩。不少论著称誉宗方是“对华先觉者”和“大陆浪人的指导者”，表彰宗方所建立的赫赫“文功”，都说明《汉报》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

①② 《水野幸吉致桂太郎书》，《渡边省三致小村太郎书》，《芳泽谦吉致桂太郎书》，见前引《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清国报纸杂件汇编》。

③ 见前引《日本外务省档案·有关清国报纸杂件汇编》。

《汉报》为贯彻上述宗旨，在言论上做得十分出色。在揭露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时，不仅抨击西方列强，也间而批评日本。通过“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怒火，引向日本的宿敌沙皇俄国的头上。《汉报》发表或转载了一系列专文，集中攻击俄国是中国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其“图华之心，每饭不忘”^①。戊戌之后，又乘机“蛊惑当道，游说颐和，以行其鬼蜮之谋，而冀偿历代相传之大欲”^②。三国干涉还辽，俄国恃功要挟，逼迫中国“订约要盟”，强租旅顺大连湾，其“处心积虑，固毒如蜂蛰而狠若豺狼也”^③。严厉批评清政府推行联俄政策。为了鼓励中国摆脱沙俄的控制，诱使中国转而倒向日本，《汉报》积极兜售“中日同盟”、“联日拒俄”，并且公开提出：“中国若去依俄赖英之心，而与日本结盟而不疑，即中国可安堵也”^④。甚而从种族主义出发，宣传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将为白人所统治，成为他们的奴隶。唯有中日提携，“统一黄种之势力，结亚洲为一团”，才能阻挡欧人之东侵，中国也才能“脱欧人将吞之虎门”，在亚洲有所“树立”。

《汉报》一再警告西方，中国形势危迫，如果沙俄逞志东方，势必挥师西进，威胁西欧，以遂其“统一地球”之野心。为此，呼吁英日联合，共同“保全中国”，制止沙俄对华扩张。同时倡议建立国际统一阵线，“共联列强以防俄”，遏制俄国称霸世界^⑤。

不难看出，《汉报》抵制俄国侵华，是从日本的基本国策出发，为实施“大陆政策”开辟道路服务的。

为了征服中国人心，消弭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汉报》大

① 《论英俄联盟》，1899年7月2日。

②⑤ 《论英日宜联列强以防俄》，1900年6月21日。

③ 《忧俄篇》，1899年7月11日。

④ 《登泰山记》，1899年3月13日。

肆散布中日“同文同教”、“同洲同种”、“同宗一姓”的论调，宣传亚洲形势险恶，“唇亡齿寒”，中日必须以亚洲为重，共同对敌。为此规劝中国捐弃旧嫌，“化尔我”，“忘恩仇”，“去畛域”，只要“中日亲善”，“联为一气，和如一家，乃足以保东方之局”^①。

《汉报》还大肆表白日本是中国的精诚朋友，宣传“日人重义好侠，岂肯坐视中国之危殆”，朝野内外“皆以扶助中国为第一要义”^②。甚而编造梦境戏言，宣传“东海游侠”（日本之化身）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富强，慈禧、光绪为酬其勋劳，愿以长江沿岸千里沃地相封赠，游侠丝毫不取，只求通商，飘然而归^③。

上述言论，似较平和友好，但只要联系该报之宗旨和用心，就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文化渗透的一面，即在“中日和好”、富强中国的词句下，期以培植亲日势力，征服中国民心。

此外，《汉报》在手法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宗方乐于从中国手中接办，承袭原有报名，沿用“大清”年号，赓续报纸序号，版面格式一律依旧，这种精心安排，让人难以觉察这是已经易主的外人所办报纸，而仍当作中国民人自办的进步报纸看待，从而易于骗取读者的信任。其次，《汉报》从不宣布社长、主笔人员的姓氏，馆内职员和撰稿人全部从华人中聘用，报中文字全部以中国人称命笔，开口“今上”、“本朝”，闭口“吾君”、“吾国”，乃至我国势、我利权、我土地之类，外人办的形迹，一丝不露。若公然标榜日本人所办，在当时反日甚行的历史条件下，必然遭到读者的厌恶。再次，《汉报》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不仅得到朝野权贵的支持和驻汉领事的直接参与，而且由政

① 《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君演说》，1900年5月17日。

② 《登泰山记》，1899年3月13日。

③ 《新战国策》，1899年3月13日。

府提供经费资助，是道地的日本官方在华言论机关。可是，宗方却以私人名义注册，以民办形式出现，与政府的关系，绝对予以保密，以免耸动视听，发生交涉事件和无人购读。至于宗方小太郎曾协助荒尾精在上海创办间谍机关“日清贸易研究所”、领衔倡组“同文会”、担任“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主任；冈幸七郎是日本陆军部的重要谍报人员、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助理之类的身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他们经营下的对华宣传，具有文化侵略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刘望龄，1935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教授）

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

尚明轩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论著对1912至1913年间国民党的组建与活动，都认为与孙中山无关，或说孙对这次组党“并不满意”，或言他仅是“勉强认诺”而已，对党事活动并未过问。然而有关史料说明，并非如此。国民党的组建与孙中山是颇有关系的，它实际上应视作是孙中山一生建党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国民党从建立到另组中华革命党，总共存在不足两年。虽然时间非常短暂，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既能在一些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关于建党的思想，又明显地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革命斗争的弱点。

孙中山对组建国民党的态度、认识以及领导作用等，目前为数寥寥的专题论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是值得注目的。本文拟就此问题再作一些考察，以求正于同好。

一

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点，是特定的阶级或阶层通过组织政党进行政治斗争，即“政党政治”。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认为此后中国也将像西方一样实行政党政治，因此，兴起了一股设会组党的热潮，先后成立了各式各样政党300有余，其中有明确纲领较为正式者也有30多个，中国社会出现了历史上仅有的政党林立的局面。这些政党的组织者

绝大多数为旧官僚、政客、立宪派或实力派军人，他们网罗一些同类和同盟会内右翼或失意分子等，表面标榜着为统一中国、建设共和及谋取人民福利而立党，实际上是利用组党作为达到拥护袁世凯的手段，与同盟会竞逐政权。

在这种政党蜂起的新形势下，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了巩固和建设新生的共和国，在1912年3月3日将同盟会进行了改组，从一个进行革命（即武装暴动）的秘密组织改变为从事合法的政治活动的公开政党。

同盟会改组后，由于规定的入会条件极宽，“凡国人已经成年，具普通知识，得为本会会员”^①，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纷纷涌入，泥沙俱下，虽人数增加不少，但内部思想的混乱和严重的分裂情况有增无减，活动上大有江河日下之势，仍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在同年5月1日临时参议院议长的选举中，在袁世凯的分化下，共和党与统一共和党达成协议，导致同盟会的候选人张耀曾落选。与此同时，共和党成立，提出“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和“以和平实利救国”^②的口号，竭力拥护袁世凯，对抗同盟会。共和党在议会拥有相当政治实力，并拉拢统一共和党，致使同盟会的主张经常遭到阻扼，对其活动和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着袁世凯专政倾向日趋明朗化以及中间党派同袁合流的严峻形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要避免“独裁之弊”，完成民主共和政治，就必须集结队伍，重新组合，建立一个较大政党，通过实行政党内阁，与反动势力正面抗争，来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一度热衷于实业，醉心于铁路建设的筹划和奔走，而对政治斗争没有寄予应有的注意，对于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第60页，台北1965年版。

② 顾文：《论民主党》，载《民国经世文编》第六册。

袁世凯迈向窃国专制和反动势力日益增强的局势也缺乏清醒的认识。但是，也并非象后来所说的那样反对建立国民党，忽视政党政治的重要和作用，反之，他是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政党政治的。从他当时倡导和鼓吹政党政治的情形考察，他赞同和支持组建国民党也是很自然的。

孙中山在1912年4月至1913年3月期间，即组建国民党前后，为争取创建民主共和政治，曾就政党政治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言论。除散见于演讲、谈话、函电中的片断话语外，孙中山以政党政治为专题的讲演就有8次之多，反复阐述中国实行两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度的主张，是他一生中鼓吹议会政治的一段罕有的时期。

早在1912年4月初，孙中山就指出：“当此共和时代，无论政党民党，有互相监督、互相扶持之责。政府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然现在我民党之势力，尚甚薄弱，恐未能达此目的。惟既具此心，不可不互相勉励，各谋进行，对于今后民国前途，获益非鲜。”^①并说：“今日政党过多，亟谋联合，鄙人对于自由党极愿商榷政见。”^②7月间，又明确提出：“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此一党转移到彼一党的。”“政党间的竞争也无可避免，……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③国民党组成后，他更是大讲政党政治，强调“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④。指出：世界上的民主立宪国或君主立宪国，“无不赖政党以成立”^⑤。“政党者，所以巩固国家，即所以代表人民心理，能使国家巩固，社会安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43页。

② 《在上海自由党公宴上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93—394页。

④ 《民立报》1913年1月20日。

⑤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5页。

宁。”^①因此，“今日欲巩固中华民国，政党最为紧要”，认为政党的基础巩固，则民国的基础自然巩固^②。并把政党政治视为不但是革命党人所应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而且也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要奉行的唯一的政治制度，说：“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轨者”^③。

他针对当时社会上一时掀起的组党热潮，提出搞政党政治，两党制较多党制更具有优越性，“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因此，同盟会与其他党合并，是为了使国中政党只存“进步、保守二派”，“以便政党竞争”^④。孙中山长期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对欧美的政治制度了解较多，所以特别羡慕英美的政党制度，称赞他们的政党政治是“世界上最完全政党之国”^⑤。希望中国能“以英、美先进国之〔为〕模范”^⑥，实行两党制。在孙中山看来，“天下事非以竞争不能进步”，因此他赞成政党间进行政治竞争，视政党竞争是“绝好之事”，“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⑦

如何进行党争？孙中山认为党争是有条件的，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即参加党争的政党都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论“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富〔福〕为前提”^⑧。要“讲求政党应有之道德，研究政党应用之方针”^⑨。

综上所述，孙中山对政党的性质、任务和在政治生活中的必要性和实际地位，以及政党应具备有党德与党争的方针等，都一一加以阐述。凡此种种，表明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尽管认识

① 《民立报》1912年9月21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3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97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03页。

⑤⑥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41页。

⑦⑧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8页。

⑨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37—38页。

和推行程度有异，却和黄兴、宋教仁同样是赞同甚至热衷于政党政治的。

孙中山论述政党政治的目的，主要是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一大政党，赢得国会，执掌政权，纳民国政治于西方式的正轨，代表和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建设民国民主共和政治的要求。这些论述不仅对于民国初年防止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实际斗争，促进中国政治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还为丰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中山正是基于对政党内涵和本旨以及政党政治的认识，并适应当时客观形势的变化，从开始便赞成并支持组建国民党的。当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孙中山说：“今则共和成立，我同盟会目的已达，并不能再言破坏。凡赞成共和者皆我良友，故须广为联合，以巩固共和；若仍坚持同盟会以前手段，是为守旧。故改组一事，今日为必要之事。”^①他与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当时把组建国民党视作是“时势所趋，不得不然”^②，并不存在“勉强认诺”或“并不满意”的情况。

二

孙中山是组建国民党的发起人和支持者。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正放在“实业建国”方面，脱离政治活动，无暇顾及党务，而同盟会本部于4月25日迁到北京后，由担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的宋教仁（7月21日接替汪精卫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因此，领导组建国民党的实际工作落到了宋教仁等人的肩上。

宋教仁一直醉心于欧美的议会政治，想通过议会道路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认为只要组织一个“强大真正之政

① 《国民党成立大会纪略》，《时报》1912年9月1日。

② 《孙中山教国伟论》，《平民日报》1912年9月3日。

党”，通过参加竞选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组建内阁，掌握政府的实权，就能够将袁世凯引向宪政轨道，达到建设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因此，他全力投入了“纵横联合，扩充党务”的活动，“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①。经过他的奔波，终于和政见相近的一些小党派洽商成功。就这方面来说，国民党的成立是由宋教仁促成的。但是，孙中山在这次建党活动中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首先，这次建党的发起人和决策者是孙中山和黄兴。早在国民党组建前，孙中山、黄兴即电告北京同盟会本部宋教仁“提议改组”，“命与他党合并”；并函电磋商“与他党谋合并之方”^②。基于这样的事实，宋教仁当时便声明：“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③。孙中山在1914年另组中华革命党时，也仍以“国民党理事长”名义明确宣称：“新旧两党皆文发起”^④。

其次，从同盟会与他党合并过程的事实考察，可以窥见孙中山在组建国民党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

最早与同盟会商议合并的是全国联合进行会，时在1912年5月中旬。全国联合进行会由于感到其政纲与同盟会相似，遂与同盟会议定合并，一切会员行动均置于同盟会宗旨、政纲及议决案范围之内。其时，孙中山在广州准备北上，他申明赴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调停党派”之事^⑤，说明他是在关注着组建政党的活动。

组建政党被正式列入议程，是7月16日同盟会本部举行的全体职员大会。会上，代理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报告拟出的《改

① 《宋教仁复孙武书》，载《缔造共和英雄尺牍》卷一。

② 《民立报》1912年8月17日；《石叻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③ 《民立报》1912年9月10日。

④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148页。

⑤ 参见上海《申报》1912年6月4日；《江西民报》1912年6月2日。

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案》，由于遭到许多人反对，决定提交全体会员大会讨论。21日，同盟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商议了改组政党，并选举宋教仁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当时，北京出现了内阁风潮。宋教仁等人为掌握议会多数，更加积极联络友党，遂与在临时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的统一共和党商谈合并事宜。在谈判中，统一共和党提出合并三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去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将此三条件征得孙中山及黄兴之许可”，然后由同盟会本部政事部主任干事张耀曾拟出党名、党纲及组织草案，于8月5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亦参加）正式谈判。7月，3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党纲及理事人选达成最后协议。旋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亦愿意加入合并。接着，北京同盟会本部于8月10日召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席会议，听取宋教仁报告会商经过及合并条件，得到多数赞同通过。宋教仁等立即在当天将通过情况报告给孙中山和黄兴，请他们作最后的决定。

孙、黄接到电报后，均明确表示对改组“深为赞成”，并于同月13日联名通电同盟会各支部征求意见：“文等以上列各条（按：指合并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展。”^①

8月11日，宋教仁等同合并各党召开筹备会议，商定了组织细则等。13日，以中国同盟会等5党支部名义发布了组党的《国民党宣言》（稍后全国联合进行会也加入宣言）。至此合并工作基本完成，专等孙中山来北京主持成立大会。

孙中山于8月13日离上海乘轮北上，24日抵京。翌日孙中山不顾旅途劳累连续参加了两个大会。上午在同盟会本部欢迎会上再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95页。

次阐述了组建国民党的目的，号召同盟会员对会外人应本“一视同仁、互相亲爱之宗旨，以巩固中华民国”^①。下午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又发表了演说，高度评价国民党的组建说：“今日合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并把成立国民党视为“中华民国富强之嚆矢”^②，充分肯定了同盟会改组国民党的积极意义。

稍后，孙中山又进一步赞誉国民党的组建，认为“其功与南北统一同”^③，并满怀喜悦地期望：“同盟会破坏于先，国民党建设于后，改数千年之旧惯，辟二十四〔世〕纪之新国，抚今思昔，最快平生。”^④还要求党员应该“以当年经营革命之精神，用温和稳健之手段共谋建设民国之事业”^⑤。

再次，从国民党组建后孙中山所给予的实际支持考察，亦表明他是在力所能及地关注着党的活动。

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9人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被选举为理事，9月3日，理事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由于注意力放在实业方面，又行止无定，不愿担任。经过宋教仁等力劝坚留，始行就职。9月15日晚上，便以理事长身份召集国民党议员、理事、参议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人选问题，至深夜始散。16日，又召开国民党理事会，就国民党的财政问题和对北京政府应采取何种态度等问题，与理事们进行了商议讨论。

孙中山在9月17日离开北京忙于铁路建设事业后，虽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他自己对于国民党事并非“一切不问，纯然放任”，也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支持，而是依然关注着党务工作。10月4日他在上海就党务工作给国民党本部的领导人发一

① 《民立报》1912年8月31日。

②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10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85页。

④ 孙中山：《致国民党诸先生函》，北京《民主报》1912年10月14日。

⑤ 《民权报》1912年10月7日。

指示专函，强调指出：“政党作用，捐弃私人之小嫌，努力国家之要政，不尊一时之大权，而筹百年之安策。甚望诸公以立国之大计划、立法之大规模，与政务研究会切实讨论，发为政策，为议员之后盾，各省之模范，使天下人民知吾党谋国之深远。民心向顺，共和巩固矣。”并告知本部时与华侨同盟会通讯，报告情况，勿使海外同志生觖望之心^①。对于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孙中山或则通过讲演、谈说要求同盟会改组（如山西等地），或则用函电敦促同盟会改名（如南洋、上海等地），以推动国民党各地方支分部的建立。当上海国民党交通部由于职员选举发生问题使组建工作遇阻时，孙中山就“特依三党（按：指前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之请，指定办事人三十员，以谋党事之进行”^②，稍后又委任陈其美等为名誉总干事、杨谱生等为名誉交际干事，迅速扭转了筹组僵局，组成了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并积极开展工作，成为当时党务活动成绩卓著的地区。与此同时，孙中山闻悉国民党特派员于德坤返黔组党惨遭杀害，立即一日数电，分致袁世凯和唐继尧等，要求“彻底根究，公平处决”^③，表示了国民党理事长对党的斗争“不能漠视”的声援。

孙中山在国民党组建以后的言论，主要是宣传他的兴办实业的主张，但对国民党的思想建设也经常发表意见。他认为：“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不可以用欺骗手段逸出范围之外”^④，提出：“政党出与人争，有必具之要素：一党纲、一党员之行为正当。”^⑤因此，要求在党争中注意党德。“以道德为前提，所有政策，一秉公理，然后以之谋国，其国以强，以之谋党，其党以昌；若竞竞于势力之盛衰，

① 前引《致国民党诸先生函》。

②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502—503页。

③ 《民立报》1912年12月17日。

④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37页。

⑤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5页。

则前清政府之势力，较诸革命党相去奚翅万万，而革命党卒告成者，公理所在也。”并告诫说：“政党之争，在大端而不在细节，……今吾国政争，淆公私为一途。不顾舆论，不论是非。其事之出于他党也，虽至良之策，而反对维力；其事而出于本党也，虽极恶之政，而拥护维谨。甚至政见不合，波及私交，攻讦谗害，无所不为，党德至是，扫地以尽，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矣。”^①他大力号召党员“此后更当以党事为己事，以国事为己事”^②。即使在出访日本期间，也仍然告诫国民党人“注意党纲党德”^③。这些意见，对刚刚建成的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必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国民党本部的经费，党员方面仅有入党须纳入党费一元的规定，收入有限，主要是靠领导人和担任行政主管的国民党员筹措。孙中山在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方面也煞费苦心，曾多次与战友等一起设法接济或者托请他人给予赞助。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孙中山感到十分欢欣和兴奋，认为“胜利归于我党”^④。他宣布政见要首先研究政党内阁问题，研究好宪法，在其足迹所到之处，都极力宣传政党内阁的主张，实际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宋教仁角逐政权的政治活动。

当然，上述的诸项工作和活动，虽说明孙中山支持了国民党，但做的是远为不够的，并没有认识到将党事放在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给予充分的重视。孙中山后来谈到对党事“一切不问”，“置身事外”的说法，从他在党中并未负起实际责任，尤其是对领导政争这一当时党务的重点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

① 《在杭州共和、民主两党浙支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74—7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5页。

③ 《“孙文与横滨”展》9页，日本1989年版。

④ 《就选举大总统问题答宗方小太郎问》，《孙中山集外集》199页。

而言，是符合实际的。若从他的支持国民党的活动和作用来说，则并非如此。

三

孙中山一生的建党活动凡5次，始自1894年的兴中会，终至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在这5次之中，人们对组建国民党贬者甚多，尤其对国民党的党员成分和党纲有不少的批评。

孙中山这次所建者是政党，其他都是革命党，不是政党。国民党为了扩张“党势”，争取多数，不择手段地广为吸收党员和发展地方势力，来者必纳，凡国会议员、内阁人员、各省代表和官员，大都挂名党籍，而挂名党籍者无不在干事之列。全党的党员数目，从“部分资料显示，有些分支部有数千党员，据此估计，全国应有数十万人”^①。从形式而言，确实声势十分浩大，并一度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是，发展党员“不计品流之纯糅”，吸收了一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等，“龌龊败类，混迹其间”，导致党的革命精神较比同盟会时代大为减退，甚至造成党人翻云覆雨及阅于墙而不能外御其侮的恶果，诚然是潜伏着党的组织解体、革命事业失败的危机。

在党的纲领问题上，显然只顾迎合与其他党合并的需要，抛弃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消除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土地国有”的民生主义，削弱了革命性，妥协色彩更加浓厚了，与其他党派的纲领并无显著的区别。这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当同盟会的势力日益削弱不联合他党难以致胜的情况下，为适应议会斗争的形势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虽然如此，“国民党政纲中的‘厉行种族同化’属民族主义，‘发展地方自治’属民权主义，‘采用民本政策’属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轮廓仍厘然可见”^②。尤其在《国民党宣言》中对“采用民生主义”的解释，

①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192页，1985年台北版。

②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183页。

说明它并没有真正“废去民生主义”，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是延续着同盟会的宗旨的。孙中山本人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降低自己的政治纲领，他在这一时期的公众场合多次宣讲民生主义，并昼夜匪懈地通过办实业、筑铁路的途径使中国日臻富强，是坚持了原则的。孙中山对国民党几次嬗递所秉持的宗旨主义有个总的估价，他说：“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始终一贯，无或稍改。”^①事实上，兴中会以后包括国民党的各次改组，都显示了阶段性的历史意义，程度不同地承袭着三民主义的宗旨，也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大小不一的贡献。

孙中山在这次建党中所以积极倡导“政党政治”，是希望通过它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一主观愿望确是良好的。但是，现实的中国又没有为这一理论提供政治、社会基础，并不具备建立政党政治的主客观条件。首先，在长期专制制度之下的中国人民，缺乏接受政党政治的心理准备，当人们对政党为何物还不大清楚的情况下，要想仓促建立政党政治是不可能的。其次，孙中山被袁世凯的假象所迷惑，认为他是真正拥护共和的，把政党政治的希望建立在对袁封建军事势力抱有幻想的基础之上，然而，袁世凯是不会让政党政治的锋芒触及他的利益的，当他一旦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直接威胁而凶相毕露时，政党政治的美梦也就随之完全破灭了。

国民党跃居优势的时间极为短暂，就在国民党刚刚在议会大选获得胜利后的1913年3月，袁世凯就遣人暗杀宋教仁于上海。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宋案”的枪声中认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决定诉之武力。但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仅是南方的国民党人，而国民党作为党的组织功能并未能发生任何作用，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也没有显现党的组织力量。这次革命，由于发难地区偏于东南一隅，特别是国民党内部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2页。

危机的爆发，在袁世凯的军事政治双重压力下，不及两月以惨败而告终。同年11月国民党遭袁世凯命令解散。

应该说，组建国民党是孙中山一生建党活动中失败的记录。但是，这一段曲折的路程也教育了孙中山，为其后来的建党活动积累了有益的东西。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回顾了这段经历，经过深刻地反思，接受了对国民党缺乏实施有效领导遭致一败涂地的教训，认识到在党的组织上必须重新下功夫，就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另行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在恢复民权、民生两主义的革命纲领，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和加强党内纪律等方面，都较国民党大有进步。不过，孙中山在总结教训时对失败过多地归咎于党的组织涣散和毫无纪律，于组建新党中采取立誓约、按指印等一系列形式主义的手段，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导向了民主的反面，给新党发展带来重大阻碍，致使其变成了一个狭隘的小团体。这也许是非孙中山始料所及的。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尚明轩，1925年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

孙中山图片考

俞 辛 焯

有关孙中山的史实图片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后人直接感受孙中山的风貌和活动史实的资料，也是研究孙中山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每一张图片都应准确地反映其历史背景，即何时何地与人及为何而照诸问题。但由于时间的流逝，或不经认真考订等原因，关于孙中山的几幅图片，有的所标日期有误，有的反映拍照目的与史实不符，未能反映历史真实。1986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孙中山先生画册》（以下简称《画册》）和《孙中山传》、《宋庆龄传》、《中华民国史》等专著中所附有关孙中山的图片，均有这种情况。而且由于互相转引翻拍，造成一错皆错的后果。

最近，笔者与同仁编译、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在日本活动密录》（1913.8—1916.4）一书（以下简称《密录》）是研究孙中山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在日本的重要资料。《密录》是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的《有关各国内政之杂纂·中国部——包括流亡者在内的中国革命党问题》（以下简称《中国革命党问题》）第6卷至第18卷的有关资料编纂的。该资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日本警视厅给外务省的简报。当时警视厅派便衣警察，以保护为名日夜监视、跟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警察将其侦察情况于当日或翌日写成《孙文动静》或《关于×××之事》这样的简报，以“乙秘第××号”编号，逐日报送外务省政

务局第一课（主管中国问题）。此次孙中山在日993天，除10几天遗缺之外，天天都有按日期编排的《孙文动静》，准确地记录了孙中山每天的活动情况。下面根据《密录》对孙中山在日本这一时期的几张照片进行考订。

一、所谓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的合影照

《画册》第381号图片（见图1）说明写道：“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时合影”。该照前排9人，中排10人，后排10人，共29人，孙中山在前排当中。此照经国内外的画册广为翻印，影响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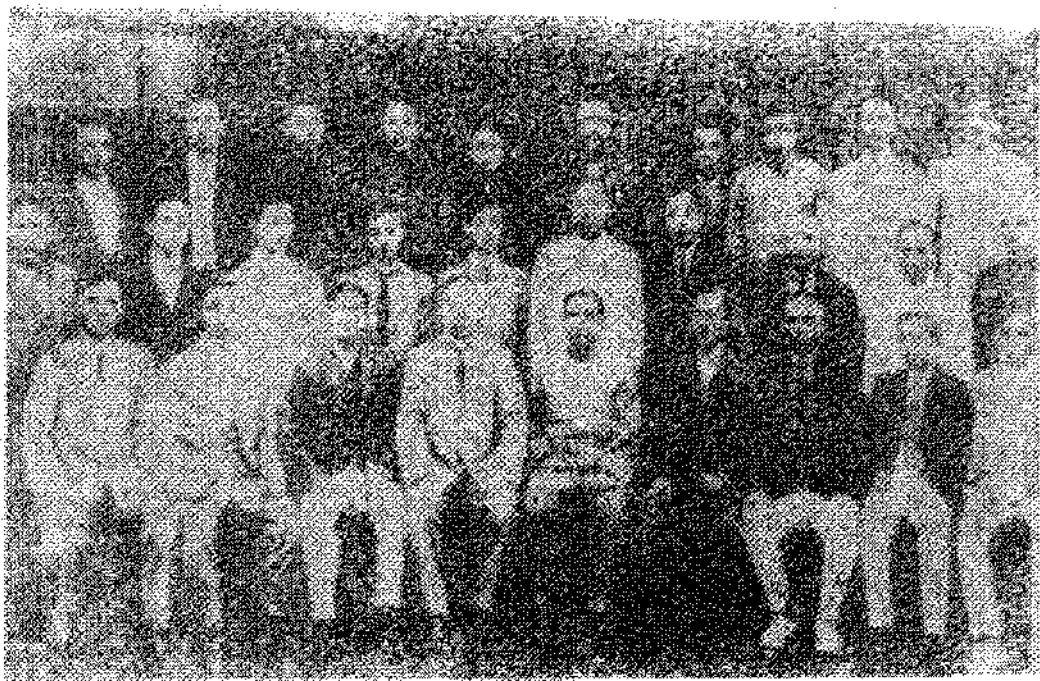


图
1

为了搞清事实，首先应澄清一下中华革命党成立的日期。中华革命党成立日期有二：一是中华革命党召开党员秘密大会，选出党的领导干部的日期；二是召开公开的成立大会的日期。

一般都认为中华革命党成立于1914年6月22日，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等均持此说，其实不然。据《密录》6月23日的《孙文动静》，22日上午只有宋蔼龄来访，下午访客有陈其美、曹亚伯、叶夏生、夏重民，孙没有外出参加会。晚上来访者较为集中：“晚七时二十五分，胡汉民、白逾桓、张白麟、

周应时、周震鳞、杨庶堪六人来访议事。他们似乎是特意聚会。孙先发言一个小时，后各述己见，争论激烈。十时十分均离去。

晚七时二十五分，徐忍菇、丁健南二人来访，没有参加议事。七时三十五分离去。晚八时十分，邓家彦来访，参加议事，十时十分离去。晚八时三十分，陆惠生来访，参加议事，十时十分离去。”^①

由此可见，中华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未来，22日晚上只是一次讨论会，研究讨论了一些问题，而不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大会。

那么，何时开了党员大会？笔者认为6月21日。《关于中华革命党之事》记载：“昨天即二十一日，下午一时起，中华革命党党员约四十七、八人在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三号的民国社聚会议事。议事内容素来是保密的，因此尚未详细得知。据闻，陈其美作为总理孙文的代理，对中华革命党总章逐条详细说明，并给各位介绍了初选中当选的各部部长。各部长也讲了话。然后，陈其美唤起大家注意：‘今后各位把报告提交有关的专任部长’。此外，似乎没有其他特别的决定，云云。”^②

这次会议内容与党员大会情况相吻合，该日应是中华革命党召开第一次党员秘密大会的日期。但此记载中却没有合影的记录，且孙中山此日也没有出席会议。据6月22日《孙文动静》载，下午五时三十分胡汉民、居正访孙，谈到晚八时五十分，大概汇报了大会情况。此日孙也未出门，未参加大会，未有与大家合影的机会与条件，也没有合影的记载^③。

孙中山被选为该党总理既不是22日，也不是21日，据6月18日《孙文动静》附记：

“十六日，〔孙〕在民国社会见陈其美、田桐、胡汉民、周应时、刘承烈、柏文蔚、居正等，协商中华革命党干部人选，设总理、协理、各部长，结果推选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协理。但因黄兴目前投资一万日元，在目白台盖房，似另有打算，因此尚未定。

① 见《秘录》第157页。

② 见《密录》第632页。

③ 见《密录》第156—157页。

此日初步决定的干部如下：

总务部长陈其美 党务部长田桐 财务部长张人杰（现在法国巴黎） 军事部长柏文蔚〔蔚〕 政事部长胡汉民”^①

此日也没有合影的记载，且与会的不到10人。由上考证似可先下一个结论：16日至22日即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后未曾合影。

那么，7月8日召开公开成立大会时是否合影？此次大会原定7月8日下午3时至6时半在东京民国社召开，但因出席者愈来愈多，临时改在精养轩。据日警侦察，出席者205人。孙中山是“下午2时30分乘人力车至筑地精养轩出席中华革命党党员会。”^②会议先由居正说明中华革命党总部成立理由和今天召开大会的宗旨，然后孙中山作了约一个半小时的讲演。接着陈家鼎等4人发言。讲演结束后，招待茶点，6时30分散会^③。孙中山未参加招待会，6时10分回寓^④。此日的《孙文动静》和有关大会的材料均没有合影的记载，从大会的程序来说也没有合影的机会。而且如合影的话，按常理应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同与会者200余人一起合影留念。如孙与少数人合影，其中中华革命党的要人应居大部分。但《画册》381号图片的29个人中却只有4、5人。这也是此照非该日所照的证据之一。

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此时陈中孚（中排左起第五位，即孙中山之后的）不在东京。他于1914年6月中旬奉孙之命赴东北，9月19日才回到东京^⑤，而却出现于照片之中，这便证明此照不是中华革命党成立时拍的。

那么，《画册》中第381号照片是何时照的呢？笔者认为，是1915年9月25日。次日《关于中华革命党之事》记有如下内容：

“帝制问题也日趋有所进展，不久将实现帝制，形势处于紧迫状态。对此，连中国国内的知识阶层人士也迫于形势，表面上表示

① 见《密录》第154页。

②④ 见《密录》第168页。

③ 见《密录》第633—635页。

⑤ 见《密录》第657页。

赞成，而背地里持衷心反对意见者也不在少数。在东京的革命党人认为，这对革命是一良好时机。最近以来，散居于海内外的同志，正与其他各种结社取得联系。近日已互相沟通关系，所以决定将在最近举旗。本月二十八、九日前后，在东京的党员中，包括重要人物在内，将有许多人乘神户（或下关）开出的笠井丸回国。为此，昨天二十五日，在作为革命党总部的民国社，以孙文为首，为诀别三十余名重要人物而摄影留念。”^①

这里所说30余名，与381号图片的29人其数接近，而且照片中的19人在这前后时期与孙有来往，其中陈中孚也在东京。9月26日的《孙文动静》中也记有：“下午2时20分，孙文乘人力车至赤坂区青山北町民国社，和在那里的同志谈30分钟。后在院中和30来位同志合影。4时回寓。”^②据《中国革命党问题》的有关材料，孙与他人合影只有3次，与30来位合影只有9月25日这一次，是孙为送别即将回国参加反袁斗争的同志，在中华革命党总部民国社院内拍摄的。

二、与梅屋庄吉夫妇的合照

梅屋庄吉是1895年1月孙在香港相识的日本朋友。他在港经营照相馆，后在新加坡经营电影院，1905年回日本经营电影制片厂，大力支援孙的革命运动。1913年8月孙赴日至1916年4月归国的这一期间，受到梅屋夫妇热心的支持和关怀，孙与宋庆龄的结婚也得到了他们的协助。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

《画册》393号图片是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在东京的合影（见图2）。其说明中写道：“1915年，孙中山在东京与梅屋庄吉夫妇合影。”此处所云1915是错误的。据《密录》记载，1915年梅屋庄吉夫妇未与孙合过影。但1914年11月18日的《孙文动静》中记有：“十七日……下午一时三十三分，梅屋庄吉夫妇偕照相师来访，面谈。而后孙和梅屋夫妇乘车至曲町区有乐町大武照相馆，

① 见《密录》第734—735页。

② 见《密录》第4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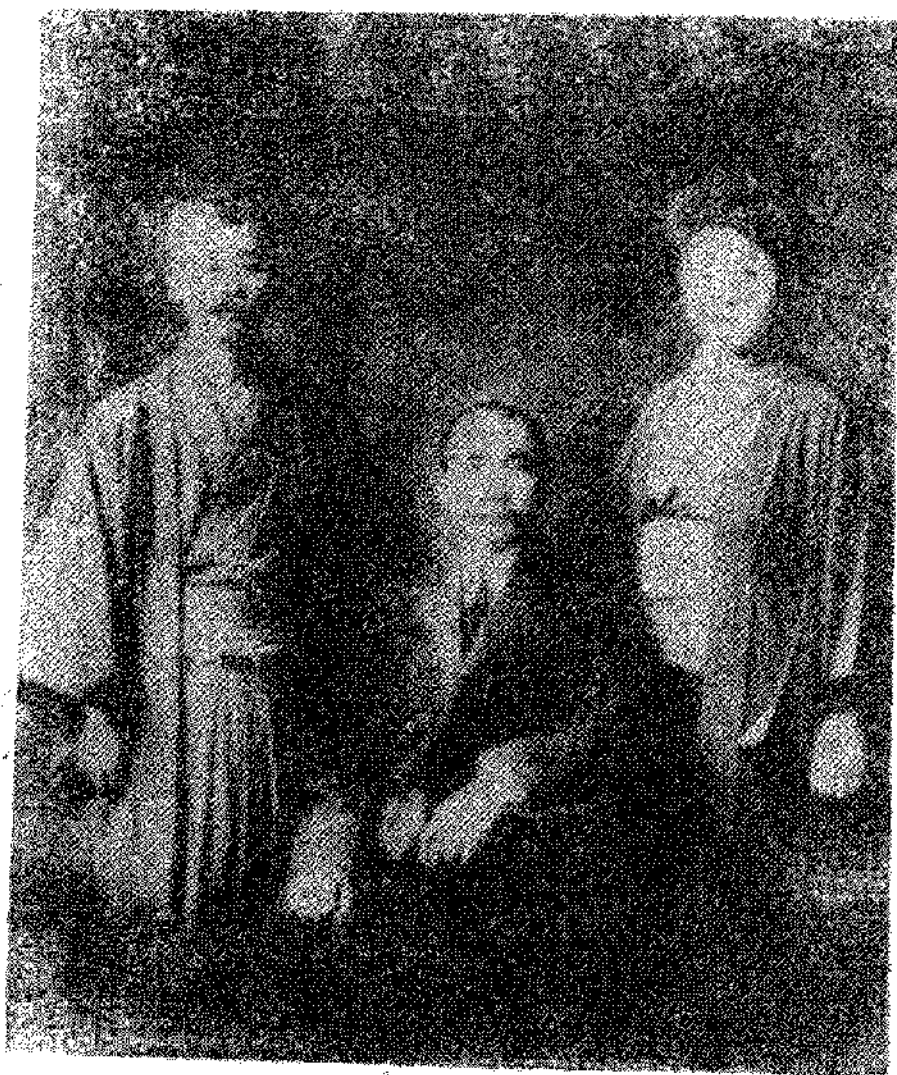


图
2

三人合影。三时五分离开该馆，至同路上的国技馆观赏菊花。四时离开该馆在京桥区尾张町某茶馆逗留，五时八分返寓。”^①

据此记载，三人合影日期应为1914年11月17日。

三、《画册》396号图片的合影时间

《画册》396号图片是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人的合影（见图3）。其说明写道：“孙中山、宋庆龄结婚后与梅屋庄吉夫人合影。”据有关孙、宋结婚前后时期的记载，梅屋夫人数次偕孙、宋去购结婚所需的生活用品，但没有3人合影的记载。据记载，1915年10月27日“下午3时30分，孙偕同居的宋庆林〔龄〕乘车至大久保百人町350号，访梅屋庄吉，5时15分告辞回

^① 见《密录》第275页。



图
3

寓。”^①如此时合影不会只3人，至少有梅屋夫妇与孙、宋4人，或者在场的家属也同影。且27日的《孙文动静》中也没有合影的记载。

那么此照又是何时的？笔者认为，这是1916年4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国前与梅屋夫人合影的惜别之照。1916年4月25日《孙文动静》记载：24日“下午3时15分，梅屋庄吉夫人来访”，

“下午5时，孙文偕宋庆林〔龄〕和来访的梅屋庄吉夫人乘车至麹町区有乐町一丁目3号大武照相馆合影。5时50分，在照相馆和宋庆林〔龄〕、梅屋夫人分手”^②。此时庄吉较忙，常是梅屋夫人只身来访，22日下午也是梅屋夫人偕孙、宋去国技馆、上野公园游览参观。此后的4月28日孙中山离日回国，与梅屋夫人未再见

① 见《密录》第468页。

② 见《密录》第582页。

过面。可见这3位的合影是惜别之照。

四、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照

《画册》394（见图4）、395号图片（见图5）说明写道：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后合影。”在此，应先要搞清孙、宋结婚日期。宋庆龄由上海抵达东京是1915



图
4

年10月24日下午^①，孙亲自到车站迎接，从此两人同居。《画

^① 见《密录》第466页。



图
5

册》397号图片是孙、宋的誓约书。该图片的说明写道：“孙中山、宋庆龄结婚约书。”约书日期为1915年10月26日。现在都认为两人结婚日期是1915年10月25日。但在中国习俗中结婚与订婚是有区别的。前《誓约书》是订婚约书。该约书中写道：“此次孙文与宋庆琳〔龄〕订婚约，誓约如下诸事：一、按中国国法尽速办理婚姻手续。二、……”^①。主婚人是日本律师和田端。

① 《画册》397号照片。

孙、宋于10月25日下午4时30分曾乘车去访和田端，并受晚餐招待，7时30分回寓^①。26日，与和田端无接触。由此推断，《誓约书》是25日签署的，书26日是因双日吉祥之意。

订婚后，两人是否举行过结婚典礼？对此，说法不一。据孙、宋结婚前曾热情帮忙过孙、宋的梅屋家长女千势子回忆，结婚典礼是在梅屋家举行的^②。她说，孙中山穿的是礼服大衣，宋庆龄戴的是无边有带的女帽，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拍了照。在席间的有犬养毅、头山满等人。宋庆龄也曾对来访的日人仁木女士说，出席结婚宴会的有头山满、和田端、秋山定辅、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菊池良一等人^③。如前所述，孙、宋于10月27日下午3时30分至5时15分访梅屋宅。如千势子的回忆是准确的话，就在此时举行了结婚典礼。久保田认为，此时停留在梅屋宅的时间只有1小时45分钟，举行结婚宴的可能性较小，25日下午或晚上在和田端处举行典礼的可能性大^④。可是11月6日《孙文动静》的追记中记载着：“据悉，孙将于10日和宋庆林〔龄〕结婚，并请十来名同事。”^⑤可是10日的《孙文动静》中却无有关记载。此日孙、宋也未外出，来访者的时间也分散，没有举行结婚典礼的迹象。11、12、13日的《孙文动静》也遗缺，前后几天同样没有举行典礼的迹象。在现有回忆中，作为当时参加者的千势子的回忆是有参考价值的。如千势子对孙、宋帽子和服装的回忆正确的话，现有《画册》中394、395号中孙的服装和宋的帽子则不是在那时穿戴的。而且，如前所述，在这样场合下不会梅屋夫人与孙、宋3人合影，一定会与出席者全体合影，或是梅屋夫妇与孙、宋夫妇合影。由此判断，此照不是两人订婚或结婚典礼时照的。

394、395号图片是何时照的？笔者认为，这是1916年4月24

① 见《密录》第467号。

② 东田让治著《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第290—291页，日本六兴出版社1975年版。

③④ 久保田文次、久保田博子：《孙文与宋庆龄结婚日期》，（日）《辛亥革命研究》创刊号，第9—10页。

⑤ 见《密录》第473页。

孙与梅屋夫人合影前或后在同一时间同一照相馆照的。其根据是这3幅图片中有许多相同之处。

第一，孙、宋穿的包括衫衣在内的衣服款式和宋戴的帽子与同梅屋3人合影照完全相同。第二，宋帽子上的装饰带位置与形状也与合影照无异。第三，宋戴帽子的斜度是一样的。第四，孙前额上的发型是一样的。第五，孙领带结下的小黑窝相同。第六，宋上衣左领前边左侧与右侧领子相比稍微隆起些，两幅照片隆起的位置和角度也相同。第七，照片中的照明光线都是从前右侧射过来的。在这3幅图片中，唯一不同的是宋的上衣领子交叉处内衬衣上的胸饰。在394、395号图片上那一胸饰是有的，而在与梅屋合影的那张照片中则看不清晰。如何解释这一不同点呢？这与拍照时光线和角度有关。在那张3人合影照中，宋在左侧，身子往右倾斜，因此从前右侧打过来的光线几乎直照宋的胸前，于是胸饰在灯光直照下直线反射，在照片中反映为白色，所以看不到了。此种反射作用在宋的领子花纹中也可看到。2人合影时，宋在孙的右侧，其身子往左倾即向孙一侧斜，因此照明光线与领子的照射不是直射，光线相对地比直线弱一些，因此，领子上的花纹尚能看到。但3人的合影照，除左侧后部较暗的部位外，几乎看不到领子的花纹。这是由于光线直射引起的反射作用所致。因此，可以得出3人合影照时宋在胸前戴有小胸饰品，但因照明光线的反射而来能显现出来。

前梅屋夫人与孙、宋的合照和孙、宋二人的合照，是26日晚8时40分大武照相馆的大武丈夫亲自送到孙中山寓所的^①。

综上考证，孙、宋所谓结婚照的时间与梅屋夫人、孙、宋3人合影照的时间相同，而不是2人的订婚或结婚典礼后的照片。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俞辛焞，1932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见《密录》第584页。

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美〕周质平

一、胡适所说的科学

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两句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当时对这两个口号提倡最力的是《新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当时青年提出了六项建议，其中第六项就是“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并为“科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务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①并指出科学是根治迷信、无知的唯一利器。在这段文字里，科学显然被界定为一种思维的方式，可是随后在讲到科学的功用时，有许多却是指可以应用的自然科学。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写了一篇《本誌罪案之答辩书》，他明确指出：提倡民主与科学是《新青年》创办三年以来，主要的方向，也是《新青年》受到社会攻击的主要“罪状”。他把反孔、非孝，种种打倒旧道德、旧伦理、旧政治制度的起因，都“归罪”於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文末，他指出：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作者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不但把《新青年》杂志的使命，定在推行民主、科学上，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为提倡民主、科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

陈独秀对民主、科学的这种态度，在36年后(1955年)又受到胡适的批评。胡适说陈独秀把民主和科学“人格化”成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人格化的抽象概念，往往等于“神化”。一种神化后的概念是可以引起“盲目的迷信”和“盲目的崇拜”的^①。胡适在1923年写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总结了自19世纪末年以来“科学”一词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

这三十年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②

过份的推崇科学，过份的神化科学，过份的强调科学的万能，结果是把科学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权威，一个新的迷信，一种新的宗教——科学成了它自己所要打倒的对象。“科学”一变而成了“不科学”。

胡适对“科学”的解释与态度和陈独秀是不同的。他特别强调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而不是它的实用性。他在晚年所写的一篇手稿中，对“科学”这一概念有总结性的说明：“科学的真意义只是一个态度，一个方法。”接着他说道：

科学不是坚甲利兵，飞机大炮，也不是声、光、电、化。那些东西都是科学的出产品，并不是科学本身。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这个方法并不是西洋人单独发明的，乃是人类的常识加上了严格的制裁和训练。

他更进一步指出：

① 《胡适手稿》，台北，第九集，第501—504页。

② 《胡适文存》，台北远流版，第二集，第121页。

科学的精神不是致用，只是求知，是纯粹“无所为”的寻求知识，是为真理而寻求真理，为知识而求知识。

胡适说：这种“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科学精神”，在五四前后很不容易为大家所接受^①。

陈独秀强调的是科学的实用性——科学可以破除迷信，增加生产，医治疾病，造福人类。胡适则认为：科学诚然有这些功能，但这些功能并不是科学本身。换句话说，胡适是从哲学的层次来理解科学的。在这个哲学的层次里，科学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是不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二、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

胡适这种科学精神的实际应用，就是发挥在考据和整理国故上。1919年8月，在一封写给毛子水论国故学的信中，他首先要毛子水抛开“有用无用”的成见，抛开“狭义的功利观念”，而用“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学术。在这封信里，胡适还说了一句以后常为论者所引用的话：“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②。胡适为了强调“学问是平等的”这一点，就不免过份夸大了“发明一个字的古义”的意义。“发现一颗恒星”是“宇宙之大”，而发明一个字的古义虽不至于是“苍蝇之微”，但也绝不能将这两件事等同起来，使许多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自以为是逍遥穹苍之中——把推敲一个字的古义认做了科学工作。

胡适对整理国故的态度，到了1928年有了相当的改变，可以说是从纯粹的“为真理而真理”的非功利的治学观点，渐渐了解到学术研究与国计民生完全脱节，也有危险和荒谬的可能。1928年，胡适写《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他指出：清代的考证学由于

① 《胡适手稿》，第九集，第545、548、553页。

② 《胡适文存》，第一集，第440页。

受限于纸上的材料，始终不能由故纸堆走向实验室，三百年朴学的成绩，终究不过是“故纸堆的火焰”而已。他将清代考证学的成绩总结为：

我们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典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

虽然胡适一再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评为合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①，但论到清代学者的总成绩时，他是极其严厉的。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

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不发生影响。^②

从上引的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胡适并不赞成与国计民生完全脱节的学术研究。

拿胡适评判清代考证学的标准来看1920年代的国故整理。我们不得不说：国故整理毕竟不是西洋科学的渡海东来，而是乾嘉考据的变相复兴。我们将上面这段胡适批评清儒的话，只要略改数字，也一样可以用来评判胡适毕生“考据”的成绩。这就是说：胡适考据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胡适一辈子40年考据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典小说的整理，一小部份禅宗史料的整理，以及《水经注》疑案的审查。我们也不禁要发问：这些成绩于人生有何益处？于

① 《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11、119、109页。

② 《胡适文存》，第二集，第5页。

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这样评断胡适在整理国故上的贡献，显然是失之过苛。但如就对“人生有何益处？”“於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这两个问题来谈胡适的考据，则上面这段套用他自己文字改写的话，却也并非完全失实。

总的来说，胡适往往贬低清儒考据成绩，而夸大20年代整理国故所能引起的社会作用。他在《给浩徐先生信》中表明了他对整理国故的期望：

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智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①

因此，胡适把整理国故的工作称之为“捉妖”、“打鬼”。胡适一方面说，要“为学术而学术”的来整理国故；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出，整理国故，“还他本来面目”都不过是手段，而“解放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

如果胡适所说“三百年的第一流聪明才智专心致力的结果仍不过是枉费心思的开倒车”，真是清代学者的总成绩，那么，他对20年代整理国故所能发生的社会影响，未免太过乐观了。他之所以夸大这一运动的社会意义，在我看来是因为他高估了所谓“科学方法”在整理国故中所能发生的作用。

其实，科学方法终究只是个“方法”，套用晚清人习用的话是“用”，不是“体”。整理国故更需要的是中国旧学的根底，是对先秦两汉，隋、唐、五代旧典的熟悉。胡适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感喟：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

① 《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26页。

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①

方法是可以传授的，然而，二、三流的学者有了科学方法，依旧不足以成事。这正可以说明：方法亦有穷时！

胡适在《庐山游记》中说：他之所以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为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是为了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是要人敢于怀疑，敢于向权威挑战。我有时忍不住要问：胡适的考证真能发挥如他自己所说这么大的作用吗？我们真能从《水浒传考证》或《庐山游记》中寻得思想和学问的方法吗？胡适确实为我们在国学的研究上开了许多门径，立了许多榜样。他是整理国故的首功，在这方面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但是我总怀疑：人们到底从胡适的考据中，学得多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防身本领，倒是他的文章如《问题与主义》，《信心与反省》，《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以及在《新月》杂志上所写几篇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对人们在思想的解放与对权威的挑战上，所给予的启发与鼓舞，是远远超过他的考证文字的。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有过极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由于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杂有一部分浇魂壘的话头，虽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险，容易发生流弊。”由此引出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并举办了许多演讲，讨论中西文化问题，在吴稚晖看来，这些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这样的措词当然过激，但他指出：胡适“所发生的一点革命效果，不够他们（二梁）消灭。”结果表面上是提倡新文化，骨子里却是复古。这话却有一定的道理②。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对“整理国故”的“整理”两个字，下过一个定义：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

① 《胡适的日记》，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5页。

②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下册，第1—11页。

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

经过这样的一番“整理”以后，才可以“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才可以让人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也不过如此”^②。类似的意思在一封1925年写给钱玄同的信中，有更形象的说明：整理国故并不是“挤香水”，而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③。

胡适曾经多次用“还他本来面目”来描述整理国故。也曾不止一次的说明：整理国故与发扬国粹无关，与“发扬民族精神”亦无关。整理国故只是为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④。这样的叙述，在表面上看来，完全是中性的；但骨子里“真面目”，或“本来面目”都含有“丑陋”的意思。所以整理国故实际上是揭露中国历史上或学术上的虚妄，对有“自大狂”的中国人，下一针砭。

但是，我们细看胡适整理国故的成绩，不得不指出：胡适对中国哲学的某些阐释，不但不能稍煞“国粹派”的自大心理，却反而增长了他们的气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庄子》一篇中，虽多次提到“生物进化论”，说：“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他引了《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在这几句话后说：“‘自化’两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接着又引《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为天均。”胡适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⑤。

① 《胡适文存》，第一集，第735页。

② 《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26页。

③ 《鲁迅研究资料》，第九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第85页。

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499页。

⑤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1968年版，第二卷，第111—115页。

我很惊讶：胡适能如此轻易的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解释《莊子》，固然有其新意，但却不免是用20世纪的科学眼光来索解先秦的子书，把《莊子》“现代化”了。结果为了求得“本来面目”的国故整理，就不免越整理去“本来面目”越远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40年以后，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公开忏悔”的表示过：“莊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侮辱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①。

但是，胡适《哲学史》出版之初，真是风行一时，两个月内，即行再版^②。这可见其影响之大。胡适把近世以来最重要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进化论，轻易的浓缩在《莊子》的十一个字里。这还不足以助长中国人的自大狂吗？这还不足以让守旧的国粹派用来做排拒科学的护身符吗？

三、科学与自然

胡适对科学的另一种阐释，是强调科学与自然的对立性，他常将科学解释为人类用来控制自然的一种力量。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到荀子的哲学，特别引了《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这一段话，评之为“要人征服天行以为人用”，并说这竟是倍根的“戡天主义了”^③。胡适常以这种“戡天”的思想来解释近世的科学。如他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中说：“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车，叫‘乙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

①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卷首，第2—3页。

②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再版自序》。

③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十一篇〈荀子〉，第30页。

来。”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极其肯定的指出，由于科学在多方面的成就，“这个两只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①。

这样突出科学与自然的对立，多少给人一种“科学是人为的”，“科学是不自然的”，甚至于是“反自然”的暗示。以这样的观点来阐释科学，对几千年来沉浸涵泳在老莊哲学中，强调与自然取得协调的中国人来说，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多少让人觉得：要科学，就必须与“自然”决裂，这是许多中国人所不愿为的。

冯友兰在这一点上，为科学做了一个更圆融的解释：

科学的目的是，或其目的之一，亦是欲发现宇宙间的许多道理而使人遵照之而行。人若遵照这些道理而行，他可以得到许多利益。我们常说：科学能战胜自然。就一方面说，它是能战胜自然；就另一方面说，它之所以能战胜自然，正因他能服从自然。^②

换言之，“科学”并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征服自然”固然有其价值，而“服从自然”也显出他的智慧。胡适在批评中国人“乐天”、“安命”、“知足”、“安贫”这些德性时，往往失之过苛，指为“懒惰”、“不长进”^③。其实，若就“服从自然”这一观点言之，中国人的这些德性也并非一无可取。在那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之下，中国人的“乐土”、“安命”、“知足”，与“安贫”正是高度的“服从自然”的科学态度与精神。

四、为科学寻中国的根

从1918年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1921年写《清

① 《胡适文存》，第三集，第7—8页。

② 冯友兰：《新世训》，《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四卷，第443页。

③ 《胡适文存》，第三集，第3—8页。

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再到1933年夏天在芝加哥大学讲《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以至于他在晚年写的一些文章中，胡适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在为现代的科学思想找一个中国的根。

从先秦的子书里，找到“生物进化”的观念，从清代的朴学中，发现“科学的精神”，这是有他的一贯性的。到了1933年，胡适把“中国固有的传统并不反对科学”的这个理论，扩大到了整个儒学的传统，他在《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的英文讲稿中写道：

说到现代科学与孔教的关系，我要指出：孔教如果能得到正确的阐释，绝无任何与现代科学思想相冲突的地方，我不但认为，孔教能为现代科学思想提供一片沃壤；而且相信，孔教的许多传统对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态度是有利的。①

胡适接着指出：孔教有一种尊重真理，并承认“知的有限”的传统。他引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来说明这种“知识上的诚实”。同时也引了“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说明承认“知的有限”。在同一段文字中，他又引了王阳明《答罗整菴少宰书》中“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几句话来说明儒教尊重真理的传统并不曾中绝。而且到了15—16世纪，进一步发展成了一种对权威怀疑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胡适看来，是“科学精神最好的表现”②。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胡适多少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命题。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固然带着“不可知论”的怀疑态度，但同时也是一种极端入世的“实用主义”，除了入世以外，对其他问题，全无兴趣。说这种态度有利科学发展，固可；说他有害，亦未尝不可。

① 胡适：《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海登编，《世界宗教现代趋势》，1934年英文版。第46页。

② 同上，第47页。

至于王阳明的那几句话，在我看来，无非是提出个人人格的尊严，要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个思潮在晚明李贽、袁宏道等人的著作里，有更进一步的阐发。这点叛逆的精神为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发挥了一定的先驱作用，但对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实在看不出太多直接的关联。

胡适在他晚年，更把赫胥黎研究古生物学的方法直指为“这就是中国最近三百年中的朴学家所谓‘考据’或‘考证’的方法”^①。他把这两种方法等同起来，多少是为自己当年提倡整理国故做某种辩护。在胡适主观的意愿上，是希望史家能把整理国故与提倡科学看做同一性质的工作的。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无论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之中，用的是如何缜密的科学方法，从事小说考证与从事科学工作，毕竟是两回事。

整理国故是应该的，而且国故也是值得整理的。但是若把整理国故视为提倡科学的实践，这就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了。这两件事虽不至于全不相干，但基本的性质是不同的。整理国故是向后看，是要为过去纷繁冗杂的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而提倡科学是向前看，是要为中国引进一些过去所欠缺的知识或技术。把科学抽象化到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结果是使许多人企图从小说考证中找寻科学或科学方法，那就不免是在一番苦苦追寻之后，科学依旧是虚无飘渺不在人间。

胡适晚年在他的英文论文《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中，明白指出：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比科学的内容更为重要，他说：

我有意的不谈中国哲学的科学内容，这不只是因为在过去四百年
来，〔中国的科学〕和西方科学的成就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同时也因为，在我看来，科学精神或态度以及科学的方法远比天文学家，历法改革者、冶炼者、医生或植物学者所得出实际或实验的结

① 《胡适手稿》，第九集，第501—504页。

果重要的多。^①

由于胡适过分强调科学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不免使人感到科学似乎是没有内容的，似乎一谈内容就落于“下乘”。其实晚清人把“格致”或“科学”界定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基本上并没有大错。诚如胡适所说，在中国固有的学术范畴中，尤其是清代的朴学，并不缺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也不缺乏“拿证据来”的科学精神。然而中国之没有科学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之不足以带来科学，岂不甚明。

冯友兰在他1940年出版的《新事论》中，对这个问题有很独到的见解。他说：

民初人对于所谓西洋，所知较多，知道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讲不通的。他们以为这种说法，是所谓“体用两概”。他们以为我们如果要有“西学”之用，如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先必需有“西学”之体，即西洋底纯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他们以为清末人只知所谓西洋的“物质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民初人于是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对于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鄙视，至少亦可说是一种轻视。清末人所要推行底产业革命，不知不觉地延迟下来……清末人以为我们只要有机器，实业等，其余可以“依然故我”。这种见解，固然是不对的。而民初人不知只要有了机器实业等，其余方面自然会跟着来，跟着变。这亦是他们的无知。

冯友兰把清末人的看法称做“体用两概”，而把民初人的看法指为“体用倒置”，他认为，从学术的观点来说，纯粹科学是体，实用科学是用。但是自社会改革的观点来说，“用机器，兴实业”反而成了体，而“社会之别方面的改革”是用。他认为这两个时代人的见解“都是错误的”。他指出：“清末人若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下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民初人若

^① 胡适：《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摩尔编，《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心智基础》，1967年英文版，第107页。

照着他们想法，想下去，或照着他们的说法说下去，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却很难得到。”^①

冯友兰在此虽没有明确的指出“民初人”到底是谁，但把胡适视为这段话中“民初人”的一个代表，当非大谬。套用两个时髦的名词，胡适在提倡科学的时候，过分重视“软件”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没有“硬件”的“软件”是发生不了作用的。胡适多少认为：要有声、光、化、电，必须先从改变“思维方式”，或改变“精神”及“态度”下手。冯友兰则认为：有了声、光、化、电，“思维方式”、“精神”、及“态度”自然会跟着做一定的改变。

胡适谈了一辈子的科学，却始终不愿将科学“落实”到实用科学与工业上，始终只谈“心理建设”而不谈“实业建设”。他的这个态度真是愈老弥笃，1961年11月6日——胡适逝世前三个半月——他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台北召开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时重提他35年前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的老话。他所谓的“社会改革”，实际上不过是打破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的传统看法。并进一步说明：正因为东方人在科技上的落后，所以东方文明是受物质条件控制的“唯物的”文明，丝毫没有精神的成份可言。倒是我们一向认为“物质”的西方文明，在精神上有极高的成就^②。

胡适始终认为科学发展，必须先“在意识形态”上下工夫，而“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似乎是可以凭空发生的，是可以抽离整个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而任人移植的。胡适从来不谈“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的改变。我们虽无意把“生产方式”的改变视为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但完全不提这一点而希望有“意识形态”上

① 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247、248页。

② 《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版，第25册，第137—143页。

的变革，这也难免落空。

胡适对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所以有那么一套看法，正是因为他虽在物质文明鼎盛的美国有过长期的居留，他体验过物质文明中的精神成份。然而对绝大部分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人来说，要接受胡适的这一套说法，缺少的正是一个实际的环境，所带给他们的经验。实际的环境有了改变，就是想要维持旧有的观念都不可能了。

胡适谈科学的态度，使我想起他自己说过的两句话，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他说：“科学虽不专为实用，但实用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小程子临死时说‘道著用，便不是。’这是绝对非功用说，如何能使科学有发达的动机？”^①“道著用，便不是”岂不正是胡适谈科学的基调吗？

我丝毫无意将中国科学之不发达怪罪在胡适一个人的态度上，但他的言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确曾发生过主导的作用，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雷颐）

（作者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① 《胡适文存》，第一集，第386页。

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 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

杨奎松

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问题，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研究颇有进展。但限于资料不足，以及对问题的理解不同，其中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在此，本文特提出几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就教于明者。

（一）关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目的及其军事计划。

目前，有关“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情况，人们多半都是从苏联学者卡图诺娃的《加伦在中国》一书中了解到的。根据卡图诺娃的描述及其所引证的资料，人们通常认定，这个由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有三：（1）希望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的派人到华南地区去，“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2）希望为代表团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3）请求“共同商讨中国作战方案”。而对于这个所谓“中国作战方案”，人们或者很少提及，或者直接了当地把它称作“广州政府准备开展的北伐计划”，即“中国新的北伐作战方案”。但是，这样一种说法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必须指出，关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在卡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一书的引文中实际上是有过某些

正确的表述的。这就是卡图诺娃所引述过的下面这段话，即国民党中央基于各种考虑，已“于代表团出使莫斯科之前，决定转移战场，将战事转至西北地区。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在于此。”他们准备“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讨新的作战方案，并就此探求高见”^①。从这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并非象我们上面所见到的那样，是为了要求苏联派人到华南去帮助编练军队，考察红军和讨论中国新的北伐作战方案，而是准备与苏联方面共同商讨“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问题。

当然，产生这样的误解，主要还是由于卡图诺娃书中关于这个“转移战场”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的“要点”，概括得使人不得要领。根据卡图诺娃的概括，当时由“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所提交的这一方案的要点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内容：（1）说明孙中山目前实际上只控制着广东一省，但影响所及达到六省之多，可用兵力约有8万人；（2）说明北洋直系军阀政权实际上也只控制着很少的地盘，实际兵力也只有8万人；奉系的兵力也相当于这个数字；（3）说明在外蒙古及其库伦南部与中国接壤地区，孙中山正有一支新军在那里组建起来，它完全是仿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而组建的。孙中山因此可以以这支武装作为“第二路军”向北京政府“进攻”。根据这样一种概括，我们当然看不出有什么“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相反，它似乎告诉我们说，孙中山的主要进攻力量和军事布署仍在南方，他只不过在蒙中边界处已经建立了一支“新军”，可以作为“第二路军”向北京政府进攻而已。

说孙中山曾经在蒙中边界甚或外蒙古境内建立过一支“新军”，这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自然无异于天方夜谭。而要从卡图诺娃的上述概括中看出孙中山有过转移战场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的设想，自然也是枉然。那么，关于卡图诺娃引文中

^① 卡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5页。

所谈到的国民党“决定转移战场，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孙中山国民党是否真的通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向苏联方面提出过一个“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呢？很显然，只有真正了解了这个问题的事实真相，我们才能够搞清楚这个“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什么。

要了解孙中山这时是否有过一个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战略设想，我们似乎有必要先将时针从1923年倒推到1920年。因为资料表明，还在1920年秋天，孙中山就曾经有过一个多少近似的想法。根据目前所看到的1921年斯拉特霍夫关于广州政府情况的一份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还在1920年秋天，孙中山就曾经派遣过他的代表前往苏联，打算缔结“一项军事条约”。其内容根据国民党的这位代表的说法，就是主张苏俄红军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向中国的新疆进攻，直逼四川，那里将会有四万名左右的国民党人为这次事变作好了准备并与之相配合^①。毫无疑问，我们多半可以把这一设想看作是孙中山国民党“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作战计划的最早胚胎。

在1920年以后，我们又从孙中山同越飞的来往信件中看到了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的更进一步的设想。在1922年底，孙中山曾正式向越飞提出了请苏联从新疆或外蒙古向国民党进行包括“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在内的大规模援助的计划。据他说，这样做只是由于他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作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在广州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为此，他强烈要求苏联方面能够给予支持，并立即派出一些能够胜任的人，用早日行动的观点同他就此进行深入的讨论。他甚至希望苏联能够支持他从1923年就开始实施这一计划。而为加强苏联方面对于实施这一计划的信心，他断言：他现在几乎可以迅速从四川

①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

调动一万兵力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接取苏方的任何援助^①。对于孙中山的这一计划，苏联方面似乎也表示过一定程度上的赞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23年5月11日越飞给孙中山的电报中清楚地看出来。越飞为此通知孙中山说：“我们准备协助您利用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并将提供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炮，两辆装甲车，以及其它军事物资和军事教官，以组建一所包括各个兵种的军事学校^②。

由上所述，人们恐怕不至于再对孙中山是否有过一个“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发生什么怀疑了。事情很清楚，孙中山确实有过一个这样的方案，并且是他酝酿已久的计划了。因此，当越飞通知他苏联方面对他这个方案感兴趣，并且承诺要为他装备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以训练军队之后，他自然立即做出了“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的决定^③。所谓“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显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组成的。尽管在苏联方面的建议里，这种讨论还将包括讨论苏联方面所提出的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给予200万金卢布援助的问题，但至少在孙中山国民党人看来，代表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正如孙中山在9月17日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当然是讨论“一份关于我们军队在北京西北甚或更远地区及其附近进行军事活动的建议”^④。因此，所谓“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红军，并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尽可能多的派人去华南帮助编练军队，以及希望商讨中国新的北伐作战方案的说法，明显地是不正确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苏联方面商讨那个已经多少得到苏联方面承诺了的“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即在“中国北方的或

① 孙中山致越飞函，1922年12月20日。

② 越飞致孙中山信，1923年5月1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③ 孙中山复越飞函，1923年5月12日。

④ 转见韦慕庭：《孙中山——一个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的“建议”。

那么，这项新的“建议”或“作战方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笔者有幸看到了这份由蒋介石署名的，被称作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关于中国革命新方案”的历史文件。它同卡图诺娃在《加伦在中国》一书中所概括的所谓“要点”，的确相去甚远。因为国民党人在这一方案中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目的，即希望“在靠近苏俄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适当地点，建立我们的军事基地”。方案声称：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使他们确信，国民党暂时不可能在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东南部地区建立巩固的基础，甚至也不能通过单方面的“北伐”来打败占有地理优势和得到列强军事援助的直系军阀。因此，他们急切地渴望能够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在外蒙古或新疆各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当然，考虑到外蒙古距离北京较近，他们更加渴望苏联能够帮助他们在外蒙古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他们相信，兵源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在中国东北、新疆、内外蒙古以及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招募解决，而他们要求苏联方面同意并予以援助的，只是经费、教练和足够装备三个混成旅，总兵力为18000至30000人的枪、炮、弹药和骡马、汽车以至飞机。考虑到这样做对于苏联在外交上难免发生麻烦，因此，他们提议，可以以红军的名义对于这支军队加以组织和训练。同时，考虑到这样一支军队的组建和训练问题，他们提议在两年之后再由此发动进攻。他们甚至早已设想好了进攻的步骤与阶段，即第一阶段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地区；进而夺取北京；第二阶段控制黄河流域及陇海铁路，夺取洛阳、开封和徐州；第三阶段占领长江流域，夺取武昌和南京^①。不难看出，在这个方案里其实并没有说到孙中山已经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支新军的情况，事实上，这恰恰是孙中山国民党正在计划的内容。同时，孙中山国民党也并没有把敌人的兵力估计到只有8万人的如此可怜的程度，方案中清楚地说明，敌人的兵力总共有“一百万人”。也正是考虑

^①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关于中国革命新方案》，1923年9月。

到这种敌人十分强大而广州方面军队弱小且无训练的不利情况，他们才下决心要转移战场到西北来的。因此，他们事实上也并没有提到要把西北地区的兵力当成“第二路军”的情况^①。

当然，要让苏联真正支持孙中山实行这样一种大胆的计划，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在当时与苏联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的外蒙古建立军事基地，还是要求苏联红军从其境内攻入中国新疆以帮助国民党在新疆建立一个军事基地，这都严重地不符合苏联的外交利益。因此，当苏联很快注意到国民党其实在西北地区并没有孙中山所保证过的那种便利条件，而实行这种计划只能把苏联卷入到一场新的外交争端当中去的时候，苏联军事当局理所当然地要用这样的回答来表示拒绝，即“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②。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国民党的这一“将战事移至西北地区”的“新的作战方案”，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从而造成了后来历史学家的种种误解。

（二）关于陈独秀于1924年三次向共产国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问题。

自从苏联学者格鲁宁根据某些历史档案资料，指出1924年陈独秀曾三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之后，国内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对陈独秀在1924年间提出退出国民党的情况进行了考证。他们发现，“陈独秀对国共党内合作是抵触的，从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到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陈独秀每年都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这些主张之所以没有实现，“与党内多数同志反对退出国民党有很大关系”，即“陈独秀反对党内结盟的主张在中共党内缺乏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据此，一些研究者显然还接受了格鲁宁的说法，相信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左”

①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关于中国革命新方案》，1923年9月。

② 卡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20—25页。

倾思想，甚或可以说就是“左倾宗派主义”。然而，说陈独秀1924年三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这是否正确呢？由于这主要只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我们不妨首先就苏联学者和这些中国研究者所列举的事实本身做一番考证。

关于1924年陈独秀三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人们所依据的据说是陈独秀在1924年7月13日，9月7日和10月10日分别写给维经斯基的信，而资料来源则是格鲁宁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格鲁宁摘引了陈独秀在其中两封信（7月13日和10月10日）当中的两句话，来证明陈独秀这时始终是在“推行退出国民党的路线”^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格鲁宁所引述的陈独秀的原话中，我们还看不出陈这时明确主张退出国民党。以格鲁宁所引7月13日的信为例，格鲁宁所引的原话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停止过去那种形式的全面支持，我们应该有所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能支持国民党左派所从事的一些方面的活动，否则，我们就支持了自己的敌人。”在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无条件无限限制地支持国民党的情况是不满的，因而提出了应当有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即以支持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工作方式，但我们却不能断然地由此得出结论说，陈独秀“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格鲁宁对此显然是清楚的，因此他在列举了这段话之后，只是说陈“把自己的见解故意说得含糊不清”，但“翻译”过来，“只能意味着要求退出国民党，停止和国民党合作”。为了证明他的“翻译”，他提到了中共中央7月21日发出的《第15号通令》，说这一通令是陈独秀与毛泽东“要求做好与国民党分裂的具体组织准备”。但格鲁宁并没有引证通令的任何内容。同样，格鲁宁谈到了陈独秀9月7日给维经斯基的信，并认为这封信和10月10日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另一封信一样，也充分表现了陈独秀极力“推行退出国民党的路

^① 转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1期。

线”的情况。但他并没有引证陈在这封信中是如何表述他的这种要求的。而格鲁宁在引述的陈独秀10月10日的信时，也只引述了其中的一句话，即陈指出“国民党应当停止其军事行动（包括北伐）并放弃政府”，否则“它就不可能从右向左转并靠拢群众”。可我们从这句话中还是看不出陈如何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要证明格鲁宁所做的高度概括究竟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我们有必要具体地回到陈独秀的那三封信上去。

首先，在第一封信里，陈独秀确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作出了相当悲观的估计。从陈独秀的信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关于国民党目前的情况，我们发现所有右派都是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的话，那么他们都是我们的同志。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因此，现在支持国民党，正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控制了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在他们的国内政策中可以看到许多反劳工的东西，而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俄的东西。……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正是从这种估计出发，陈独秀提出了应当制定新的政策，停止过去那种全面支持国民党的作法^①。然而，这种新政策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否就是主张退出国民党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多半也必须从陈独秀与毛泽东所签发的那个第15号通告中去寻找答案。因为，陈在信中特别告诉维经斯基，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一个“如何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的通告，希望维经斯基能够给以指教。而这个通告，恰恰就是格鲁宁用以“翻译”陈独秀7月13日信，说明陈独秀已经着手退出国民党的具体组织准备，却又没有加以引证的那个第15号通告。

从《中央通告第15号》中，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等人这时所设想的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的基本办法主要有这样几条：（一）公

②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7月13日。（关于信的时间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信中特别提到中共中央发出第15号通告的情况，而这个通告的发出日期是7月21日。同时，信中还谈到了中共中央尚未收到第三季度经费的情况。这些看上去似乎都表明信是在晚一些的时候发出的）。

开谴责右派，并在国民党内开展派别斗争；（二）今后凡表示左倾的分子，不应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时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以巩固和加强共产党人的力量，削弱右派势力；（三）准备迅速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使之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独立团体，进而“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①。

关于在这个通告里，陈独秀等人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左”还是右，这其实不关紧要。问题是在这里面是否有格鲁宁所说的那种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很显然，至少在通告里也没有明确的文字上的这种要求表现出来。相反，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文件中很明确地表示了目前仍旧要通过在国民党内组织派别斗争的方法来反抗国民党内的反劳工及反俄倾向。通告中关于成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国民对外协会”的主张，首先也是建立在组织左派的基础上，只是在他们认为不得已时才准备组成“新国民党”，但这显然还只是未来的事情，并且这种“新国民党”是否排斥党内合作方式，也还没有具体的设想。当然，结合陈独秀7月13日信，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国民党内这时左派力量以及中派的革命性的估计是相当悲观的，并且在思想上做好了与右派国民党人公开斗争以至决裂的准备，但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这一点就断言陈独秀等人已经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或开始推行退出国民党的路线，却未免失之草率。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从1924年1月至4月这几个月陈独秀及其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有关文件看，人们是绝对看不出在他们中间究竟有谁存在过任何一种对这种合作形式怀有抵触的情况的。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甚至对于任何一种公开的倾向斗争都会感到担心，生怕“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②。这

① 《中央通告第15号》，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23—22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82—184，186—196页。

种情况只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亲自帮助中共中央召开了1924年5月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才真正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正是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才特别提出了开展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问题，主张“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同时规定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性质，要求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使加入国民党^①。很清楚，陈独秀对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是与这次会议所强调的斗争精神有密切关系的。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明显地是以这次会议的精神为基本前提的。象开展派别斗争，这本身就是会议的要求。只是陈独秀根据几个月的实践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内的派别并非只是左右两派，而是还包含着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中派集团，孙中山等人就是代表着中派的势力。象主张左倾分子均不再介绍加入国民党，自然也是对这次会议中不再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策略的一种发展。而陈独秀之所以对局势的发展看得如此严重，对国民党中孙中山一派也开始失去信心，以至准备受到右派控制的国民党同自己分裂而组织未来新的国民党，更是同当时的具体形势有关的。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右翼势力抬头，孙中山公开准备召开二中全会，讨论国民党右派提出弹劾共党案的前夕。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领导人公然同意讨论这样一个明显地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弹劾案，不能不表示强烈的不满和严重的反感。在预感到会议会做出不利于共产党的决定的情况下，他们坚决地主张提高警惕并考虑到未来可能的政治出路，即组织一个在他们影响之下的新的国民党，这恐怕还不能简单地看成就是主张退出国民党吧？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准备只具有被动的形式，即只有当国民党确实通过了一个严重不利于共产党的决定，它才会发生效力；而当事情并没有如此发展时，它就不会发生效力。显然，对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应战式的准备，我们决不应当把它看成是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82—184，186—196页。

种主动的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事实上，当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之后，陈独秀于9月9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这封格鲁宁并没有引证的信中陈独秀究竟是怎样写的呢？

在8月21日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一方面没有接受邓泽如等人所提出的弹劾共党案，但另一方面却通过了一个要求在国民党内组织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全权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它同时规定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有关国民革命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一切决定必须通知该委员会。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决议对于历来主张只在组织独立和批评自由的基础上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共产党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更何况，这样一个决议竟然是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亲自倡议下写入国民党的文件的，这更不能不让他们深受刺激。他们反对这个要求他们把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有关国共合作和两党关系的一切决定预先通知国民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是理所当然的。陈独秀在信中明确认为：国民党的二中全会“给了我们很大的打击”，允许国民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拥有全权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这实际上是试图“使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反对这种倾向”，同时希望共产国际建议并提醒鲍罗廷不要落入圈套，并且应当经常与中共中央进行商量^①。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这里并没有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甚至也没有再指责国民党完全控制在右派手里。事情很清楚，国民党并没有按照所谓右派的提议来弹劾共产党，尽管它到底还通过了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决议。显然，如果我们因此把陈独秀反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干涉共产党独立性的决议的言论，看作是一种退出国民党的表示哪怕是暗示，都是不合情理的。

同样，要从10月10日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中，找出退出国

^①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9月9日。

民党的言论来，也是难乎其难的。在这里，陈独秀突出表示的只是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在国民党革命方针问题上的分歧，即中共中央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按照俄国革命方式把党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民间去，通过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联合的暴动来最终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避免为了利用那些军阀的军队反而使国民党的革命走上妥协甚至反动的道路；而鲍罗廷却一味地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行动方针，坚持实行保持国民党在广东的一切政权及其根据地的政策。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与鲍罗廷在涉及国民党的政策的各个问题上“都没有一致的政策”，从而使广东的共产党人简直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做。为此，陈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①。在这里，陈独秀的确主张国民党必须根本改变政策，并且对继续按照这种军事革命方针行事的国民党的前途感到悲观，因此，他强烈希望共产国际能够对鲍罗廷提出警告，要求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行事。但这充其量不过表明了陈独秀仍旧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政策，放弃军事革命方针，我们决难从此得出所谓陈独秀正在主张退出国民党，或者“继续推行退出国民党的路线”的任何印象。

由上不难看出，说陈独秀1924年曾经三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不确切的。

（三）关于四一二事变后中共中央内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围绕东征、南征和北伐的争论问题

目前，关于四一二事变后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围绕着东征、南征和北伐问题的争论，人们基本上都是从张国焘、蔡和森等人的回忆中得到具体印象的。除张国焘回忆自己当时主张北伐^②，蔡和森却回忆张当时“主张南伐而取广东”^③外，

①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年10月10日。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04页。

③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人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根据上述回忆断定：“鲍罗廷起初主张东征讨蒋”，后来转而赞同加伦“先北伐，后东征”的主张，罗易坚持“不征不伐”，“在两湖搞土地革命”。上海周恩来等“主张迅速东征讨蒋”，瞿秋白“主张先东征后北伐”，谭平山及张国焘“主张南征”，陈独秀等同意北伐，蔡和森“主张北伐，但必须以立即进行土地革命为前提”。最后，“争论的结果，罗易的主张一度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4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决定推迟北伐，巩固根据地。……但是，两天之后，这个决议实际上又被撤销，继续北伐的主张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内部占了上风”。进而根据鲍罗廷的意见，“撤销了这个决议”。

仔细考察这些说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说法有些很不准确。

(1) 关于南征。我们知道，这次争论发生的时间，应该在4月12日之后，至4月16日中共中央决议作出之间的几天里。同样，我们又知道，广州李济反共发生于4月15日。由于广州事变发生的消息到达武汉时，中共中央的决议实际上已经形成，故所谓南征，即“首先打李济”之说，实无产生之可能。因此，在此之前，尽管李济已经脱离了武汉政府，靠向蒋介石一边，但由于李开始时反共态度尚未完全公开，人们在讨论中多半还没有提出“南征”的问题。恰恰相反，人们这时在讨论中不仅没有把广东看成是必须征讨之地，反而是把广东看作是必须巩固的湘、鄂、粤、桂四大根据地之一。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所议论的，只是“南下”问题，而非“南征”问题①

(2) 关于谭平山与张国焘的态度。由上可知，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这时并没有提出任何“南征”的主张。那么，谭平山和张国焘是否坚决主张“南下”呢？应该说也不是。在4月13日中共

① 关于“南征”的说法只是在4月15日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上，才由罗易谈到过。这是因为人们到这时才得到关于广州事变的情报，“南下”才变成了“南征”，但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已经不可能有这种主张了。

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上，谭平山最初虽然反对立即北进，但其意见亦非南下，而是主张为了解决财政和发展农民运动，应当首先以数月时间巩固湘、鄂、粤、桂四省根据地。而在此之后，他虽然渐渐地对单独坚持两湖地区信心不足，提出过“不是北进，就是南下”的主张，但他的意图仍旧是强调巩固根据地问题，并没有明白提出“南下”问题。相反，他明确表示，如果能够确保武汉安全和有可能实行土地改革，他是赞成立即北伐的。至于张国焘，他更是从未提出“南征”或“南下”，他几乎自始至终就是罗易主张的坚定支持者，反对北进，主张首先在两湖及两广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事业再说。

(3) 关于瞿秋白的态度。说瞿秋白提出过“先东征后北伐”，也是没有根据的。这次讨论实际上只进行了四天，即从12日进行到15日，16日就已经形成文字决议了。在第一天，瞿秋白对北伐是“半赞成半反对”，处于犹疑状态。第二天，由于鲍罗廷说服了瞿秋白，他已经转而支持鲍罗廷的意见，只是强调应当首先巩固根据地并准备军队。第三天，瞿秋白更倾向于支持鲍罗廷，但由于参加会议的中央局代表张国焘和谭平山都更倾向于罗易，因此他只得表示服从多数决定。但毫无疑问，瞿秋白从来没有提出东征的主张。

(4) 关于东征。东征之议最初产生于何时，又系何人所提？考诸历史，说此议形成于四一二事变之后，最初为鲍罗廷所提，是不正确的。其实，东征之议最初是加伦所提，并且是在四一二事变之前，而不是在四一二事变后。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明显地准备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了。国民党中央为了有效地控制局势，便于制裁反叛行为，曾决定迁都南京，故拟定了以南京为中心的作战计划，并着令第四军等部东进^①。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人早就是这个计划的制定者。当时他们曾经认为，武汉政府可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8日。

以在一两个月内顺利地夺取宁沪地区,取得东征作战胜利^①,但鲍罗廷对此颇感担心,故开始即不十分赞成^②。至四一二事变发生,蒋介石已经控制住长江下游约10万军队^③,闽、粤、桂、川等省军队也公开拥蒋,东线主力朱培德骑墙,鲍罗廷更无意考虑东征问题。所以,在四一二事变之后,除在上海的李立三、周恩来等曾于中共中央讨论结束之后有一要求东征的报告送交武汉以外,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中间,包括鲍罗廷在内,其实并没有人提出过东征问题。

(5)关于中共中央4月16日决议。首先,4月16日决议是不是罗易的意见占上风的结果?按照今天的说法,当然是。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简单。4月12日,当中共中央局最初开始讨论国民党的北伐计划时,由于鲍罗廷没有参加,罗易很容易地就说服了中央局的成员,使他们同意了他的首先巩固根据地,暂不北伐的主张。但13日和14日,鲍罗廷参加讨论之后,情况立即发生变化。中央局三人中,瞿秋白开始支持鲍罗廷,张国焘支持罗易,谭平山犹豫不决,倾向于罗易。当然,因三人中两人支持或倾向于罗易,鲍罗廷的北伐主张自然处于可能被否定的地位。然而,15日,由于陈独秀参加会议并支持鲍罗廷,彭述之写信表态支持鲍罗廷,蔡和森也参加会议并倾向于有条件地赞同北伐主张,故中央局中的多数人实际上已经在鲍罗廷一边。4月15日,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严格地说,只是鲍罗廷在和加伦等人研究后,部分地修改了前此的主张和罗易也作出妥协的结果,并不是罗易的主张占了什么上风。因为,在此之前,鲍罗廷提出的北伐

①② 《罗易在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3—15日。

③ 据当时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中的统计,可知当时长江下游拥蒋之白崇禧部、何应钦部、李宗仁部及贺耀组部等,合计已达8万人,而由忠于武汉政府的程潜统帅的江右军约3万人,其中40军已拥蒋,而忠于武汉的第二、六两军在事变前后很快就被解除武装,仅少数回到汉口。

计划，是主张进攻河南，会师冯玉祥，然后北上夺取平津特别是张家口，打通与外蒙古及苏联之间的联系，获取军事援助，以至在西北靠近苏蒙边界的地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巩固的根据地，之后再转进西南，最后向沿海发展。但在15日，据罗易说，鲍罗廷“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使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他不再说要到北京、张家口、长城去，今天他说，这个计划中要占领陇海路”^①。这意味着，鲍罗廷已经改变了他原来的到苏蒙边界去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同意暂时把北伐局限在河南地区了。尽管这个计划仍旧明显地带有进攻性质，但限制北进的距离毕竟为几天来争执不下的双方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基础。罗易立即撇开这一计划中的进攻倾向不谈，开始表示同意这个“纯粹是一种防御措施”的计划，他甚至断言自己昨天就有过一个类似的主张^②。正是根据这种妥协，人们达成了一个《关于北伐问题的决议》。一方面，人们接受了鲍罗廷为了“扩大”革命，必须“继续北伐”，“给奉军以决定性打击”的主张，另一方面，人们也接受了罗易关于为了“深入”革命，不应当立即去占领京津等地，而应当首先“巩固革命的基地”，“发展工农的力量”的主张。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多半不应当把4月16日决议看成是罗易的主张得到赞同而鲍罗廷的主张遭到失败的结果。同样，既然4月16日决议并不是罗易主张得到胜利的结果，而只是双方意见妥协的产物，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中共中央此后同意武汉政府4月18日北伐决定，是因为“两天之后，这个决议实际上又被撤销，继续北伐的主张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内部又占了上风”。其实，尽管后来罗易矢口否认他曾经同意过鲍罗廷的妥协计划，声称是中共中央后来反而改变了当初的决议，转而“同意了国民党关于立即派军队到北方去的决定”，^③人们只要略为

①② 《罗易在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4月13—15日。

③ 罗伯特·诺恩等：《罗易赴华使命》一书中关于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文下罗易自己加的注。

细心一些，就不难注意到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决议明文规定：共产党同意“为了扩大和深入中国革命，必须给奉军以决定性打击”，只是目前应以防御为目的，通过继续北伐占领陇海路，而不应向京津地区推进。对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应当“考虑”共产党的“意见”^①。武汉政府随后的北伐自然是考虑过中共中央意见的。其首期计划正是以陇海路为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后，很快就回师武汉巩固后方，将河南交予冯玉祥^②。因此，说中共中央在4月16日两天之后就撤销自己刚刚通过的决议，转而赞成他们本来不赞成的鲍罗廷或国民党的北伐计划，这是不确切的。恰恰相反，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正是根据4月16日决议与国民党中央达成了某种一致的意见，促成了国民党中央4月18日关于二期北伐决定的实现和首期计划的实施。

（四）关于罗易给汪精卫看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问题。

关于罗易给汪精卫看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时间，目前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如6月1日说，2日说，3日说，和5日说等^③。但是，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

自1927年5月中旬至6月下旬，罗易、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总共收到来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5份左右语气坚决的电报指示。从汪精卫后来所列举的罗易提供电报中的五点内容看，罗易交给汪精卫的电报当是5月底由斯大林签发的关于必须“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改变国民党现存机构、组织工农新军和革命军

① 《罗易驻华使命》，第176—177页。

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0页；刘建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

③ 分别见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史》，第453页，等。

事法庭的那份尽人皆知的重要电报^①。但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份重要电报罗易及鲍罗廷只是到6月4日才正式收到，6月5日才开始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传达，6月10日中共中央才开始讨论复电问题，15日才形成正式意见致电共产国际^②。因此，该电不可能于6月5日之前由罗易交至汪精卫手中，即6月5日也不可想象。

作为交接电报的当事人，汪精卫本身的回忆就充满矛盾。他先是说6月5日^③，几个月后又变成了6月1日^④。而对于罗易离汉回国的原因，他先是说：“过了不久”，罗易又来找他，告诉他说，“鲍罗廷同志和C.P.同志反对他将这个电报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所以他不能不走”^⑤。后又说：“那个时候，兄弟忽然听得罗易要走了，不解其故，后来才知道，罗易因将那决议案交给兄弟，大受鲍罗廷的责备”^⑥。在时间上，他更是特意把他得知罗易离开武汉的时间提前到6月13日前后。可实际上，罗易直到6月23日仍旧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直接参与中共中央的政治决策，直至他得到莫斯科要他卸任回国的通知之后，他才被迫离开工作准备回国^⑦。在此之前，汪精卫又如何能够得到罗易回国的消息呢？

可以肯定，汪精卫并不是实事求是的。他的上述作法显然具有某种意图。他似乎是想告诉人们，罗易之所以能够把这样重要的电报交给他，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什么特别的关系。为此他大讲他看到电报之时的义愤之状，而且还特别利用罗易回国这件事来作文章，让莫斯科来证明罗易此举完全是破天荒的，没有先例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另一位当事人，罗易在这一点上恰恰同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1辑，第416—417页。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电》，1927年6月15日，《罗易赴华使命》。

③⑤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

④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

⑦ 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77—78页。

汪精卫的说法是不同的。罗易告诉我们，汪精卫在回到中国路过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都答应给他以全力支持”，因此，在莫斯科和汪精卫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关系。罗易正是根据这种特殊关系来考虑对于汪精卫的策略问题的。他相信汪精卫是可以实行莫斯科的某些具体计划的，条件仅仅在于莫斯科必须保证迅速实现他们答应过的那些“必要的援助”。据此，他曾首先根据国际的五月指示拟定了一个使汪精卫“能在武汉政府内重新建立有效领导权的具体行动计划”，同时要求莫斯科明确地向汪精卫保证迅速提供曾经答应过的“必要的援助”。随后，只是在“莫斯科的保证到来”已经“为时太晚”的情况下，他才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地将莫斯科的电报和盘托出，企图借此向汪精卫表明诚意并施加压力。他甚至声称：“虽然莫斯科没有直接给他发电，但电报显然为他发的，因为内容是重申他在莫斯科时对他本人许诺的保证”，“里面就有要向他转达的信息”^①。

罗易向汪精卫提供的电报里是否有着罗易所说的内容，目前还是一个颇难考证的问题。但汪精卫同莫斯科有过某种特殊关系，则不难证明。根据苏联学者近期披露的斯大林与莫洛托夫这一时期的来往信件可知，汪精卫回国前显然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等人在中国革命，诸如对蒋介石的态度等问题上，达成过某种共识，为此，汪精卫得到了苏联方面将提供1100万金卢布援助的慷慨许诺。因此，还在汪精卫刚从欧洲到达之初，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就对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态度。他们当时即把共产国际关于必须立即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推进中国革命走上革命的民主专政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指示，告诉了汪精卫，而汪精卫并没有表现出他后来所说的那种义愤之情，却出人意料地表示：“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②。显而易见，向汪精卫透

① 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74—76页。

②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

露或转达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并非自罗易始，罗易至多不过是继续了这种作法并将它推向了极端而已。不过，这种作法显然也并非自罗易止。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罗易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盘托出之际，共产国际领导人竟然也亲自打电报给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理解，解救目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土地革命”，与农民合作而不是反对他们。为此必须“更加紧密地与共产党团结起来”，“改组国民党”，并“从工人和农民中提拔新的领袖”，以便使国民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革命力量，并获得牢固的基础^①。考虑到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与罗易给汪精卫的电报在内容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似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的这种作法同样也是为了向汪精卫表示他们的真诚和他本人的关切程度。也就是说，他们在犯与罗易一样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他们和罗易一样相信，自己与汪精卫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汪精卫与莫斯科之间存在着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当然是汪精卫所绝对不愿意承认的。因此，汪精卫不能不极力加以掩盖。以致他敢于拿出罗易给他的电报作为反共的资本，却丝毫不敢透露共产国际领导人亲自给他发来电报的情况。不仅如此，他还要大摆迷魂阵，故意把时间搞颠倒，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我们后人也要相信他当时完全出于政治目的的种种说法，就未免有点草率了。

那么，罗易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的确切时间究竟是哪一天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必须肯定，汪精卫关于6月初的说法，统统是欲盖弥彰的障眼法。因为，从事情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人蔡和森和瞿秋白的文章及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件事至少发生在武汉政府二期北伐的郑州会议之后，即6月中旬以后。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是分两段叙述自5月中夏斗寅、许克祥叛变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汪精卫同志的电报》，1927年6月21日。

至7月初这段时间的党内斗争的，第一段自5月中至6月中，题为“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第二段自6月中旬至7月初，题为“政治局的后一阶段。”很显然，他只是在第二段分别叙述了中共中央6月23日至6月26日政治局会议后，才提到罗易“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的情况。尽管蔡和森在这里只是说，由于罗易把国际来电告知汪精卫，“大约老鲍也有电致国际”，所以6月底“大约国际有电报调罗易回去”^①，并没有说明罗易把电报交给汪精卫的具体时间，但在这一段而不是前一段叙述此事，表明蔡和森多半认为此事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可以佐证的还有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他当时谈到：“在汪接到冯不反蒋的电报时非常震怒”，“在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汪表示被人强奸，并表示不能在武汉立足。恰好，此时得到了ROY（即罗易—引者注）给他的电报，得到了新的出路”^②。冯玉祥是何时有不反蒋的电报呢？我们知道，自6月13日郑州会议回汉之后，汪精卫是兴高彩烈的，他称冯玉祥“当面告诉本席”，冯“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决不同蒋合作^③。6月17日，冯才秘密电邀蒋介石等赴徐州会晤，至徐州会议后，即6月21日才有电报表示不反蒋，力主宁汉合流^④。这些情况说明，罗易将电报交给汪精卫的时间，实际上应当在6月21日以后，并非在6月初。

其实，说罗易6月初将电报交给汪精卫，一个半月之后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才下决心分共，也是不合情理的，汪精卫坚持此说只不过是力图掩盖自己徐州会议前后与罗易的多次密商，以便造成自己早就有了反共意图的假象，并非因此后一系列矛盾所激被迫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②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

③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32页。

实行反共的情况。可以肯定，自6月初，罗易已经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大部分内容通过各种方式透露给汪精卫了。罗易后来曾特别说明：我当时多次与汪精卫晤谈，“极力指出当前的危急局势和共产党人将如何支持他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声称他先是“向汪精卫提交了一个使他能够在武汉政府内重新建立有效领导权的具体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包含着需要莫斯科“给予支持”的重要内容。只是由于莫斯科的电报来得太晚，他才被迫在把电报直接交给了汪精卫^①。在这里，罗易告诉我们，他并非一次性地将电报和盘托出，至少事先已经使汪精卫同意过一个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为基础的行动计划。鉴于罗易在回忆中提到的那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召开由地方会议所选代表参加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认可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等等^②，实际上都是6月15日以后才提出来的^③。似乎可以设想，在6月初，至少在6月中以后，罗易就已经不止一次地将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透露给汪精卫了，而汪精卫最初无疑也是同意的。至于汪最后借电报发难，那纯粹只是一个形式问题。那只是汪精卫在冯玉祥联蒋，唐生智等将军们已经失去控制，而来自莫斯科的迟到的并且是大大削减了的援助^④已经无法帮助他有效地摆脱危机的情况下，所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条解脱之计了。

至于罗易究竟何时把国际电报交给了汪精卫，依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还难以得出十分准确的日期。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断，罗易最早是在郑州会议前后陆续向汪精卫透露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的，而把电报交给汪精卫，则是在罗易等人得到徐州会议的消息之后，即6月23日以后。不过，这倒不是因为如罗易回忆所称：“汪精卫认为共产党人已出卖了自己，便着手与右翼

① 《徐州特别会议第一、二次会议》，1927年6月20—21页。

② 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75—76页。

③ 转见罗伯特·诺思等：《罗易赴华使命》，第330—338页。

④ 到6月下旬斯大林最后决定可以提供给汪精卫的援助，实际只有大约400万卢布左右。

谈判”^①，而是由于22日共产党人得知冯玉祥联蒋之后，意识到汪精卫正处于极端孤立和动摇之中，进而相信这正是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为此，在6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必须的行动步骤问题。从目前可以看到的罗易当天的谈话看，他当时提出新的7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试图对汪精卫等所谓真正的左派领袖“采取决定的步骤”，不搞任何外交手腕，“将共产党的决定告诉他”，使之了解共产党人支持他的原因和计划，以便在双方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同时，他在建议中把国际五月指示中关于改组国民党、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和强化土地革命措施的内容也统统排列了出来^②。显然，罗易正是据此在23日与25日之间采取了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与汪精卫进行一次谈话，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议，“将共产党的决定告诉他”。以至当汪精卫“由于以往痛苦的经历产生了不信任感，他要求看一下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时，考虑到“在那种非常需要他的信任的时刻”，罗易因不敢冒失去汪精卫信任的风险，竟不得不答应了他，甚至最终把电报的副本交给了他^③。

这里强调23日之后，相信已有足够的理由。至于提出25日之前，则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26日以后罗易大约“已不管事了”^④；其二，共产国际致汪精卫电在26日也已经到了汪精卫的手上，这时罗易已无必要再去送电报了；其三，瞿秋白曾谈到：“在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汪表示被人强奸，并表示不能在武汉立足。恰好，此时得到了ROY给他的电报”^⑤。就笔者所知，这一阶段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频繁举行，一周多达三次，

① 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75—76页。

② 《罗易在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6月23日。

③ 参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75—76页。

④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⑤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第69—70页。

分别为周一、周三、周五晚上九点至十一点钟左右。22日（周五），即得知徐州会议情况后就有过一次联席会。此后若还有联席会，当在25日（周一）。但是否仍旧如期举行，再未见有过文字记载。故瞿秋白说“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很有可能是指这一次。所谓“恰好，此时得到了ROY给他的电报”，想必不应超出两三天以外。

当然，6月23日至25日之说，还仅仅是一个大致的推断，具体的时间仍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但以上分析论证似可说明，前此关于罗易把国际电报交给汪精卫的时间的说法，以及罗易交出电报的经过、原因及其动机的说法，都是不大准确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国际也在这时给汪精卫发过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的事实，那么，以往关于罗易回国原因的说法，恐怕也是值得重新研究和考证的。

（责任编辑：李林）

（作者杨奎松，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

1925—1937年间民族工矿业 与航运业中的联营活动

王 方 中

拙稿《1927—1937年间的中国民族工业》曾经提到了30年代民族工业中的联营活动^①。这里，拟对20—30年代民族工矿业和航运业中的联营活动作粗浅的探讨。

(一)

所谓联营，就是在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同归于尽，共同协定限制生产数量、生产规模，划分销售区域，分配销售定额，统一销售价格等等。包括了所有这些内容的联营活动不多，一般只有其中的一项或几项。19世纪航运业、电讯业中就有过联营活动，如1878年、1883—1889年招商局与英商太古、怡和公司订立过齐价合同，1887年中国电报局与丹麦大北公司、英国大东公司订立过齐价合同。20世纪初年开滦、抚顺也达成过在沿海市场控制销售额的协议^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民族工业中，只有火柴业有过联营活动。20世纪初年，四川的9家火柴厂产品销路不畅，各厂滥价竞销。1905年乃联合成立“华洋统销公司”，规定各厂每年的产销数额，公订价格，并统一销售。这9家公司还通过“提费缴办公

① 《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3页。

② （澳）蒂姆·赖特著、李必樟译：《南京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和对工业的管制》，见《近代中国》第1辑，第67—69页。

益”，给当地政府一定的报效，换取共同专利25年的特权^①。

为避免日趋激烈的竞争，1908年广州及邻近各县的13家火柴厂成立了“启源堂”，经广东劝业道批准管理六府一县的火柴工业。各厂购买氯酸钾、赤磷等原料，必须报经启源堂转报海关发给护照，在货物进口时交海关查验放行，每桶收银币4毫作为启源堂的经费。限制原料无非是为了限制产量。还规定各厂不得相互仿制商标，违者每一商标罚银20元。此外还经劝业道批准获得在各厂周围5华里以内不得再设新厂的专利权^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除火柴业外，民族工业中再也见不到联营活动。原因不外两个。第一、大战结束以前，民族工业的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还过得去。竞争不激烈，利害冲突不大。第二、民族工业规模还比较小，有的行业，厂子不多。例如，在1920年华商上海水泥公司成立以前，中国水泥工业中只有启新一家，当然不可能出现联营。

从1920年起，中国进口贸易值逐年增长，市场渐趋紧张，竞争渐趋激烈，民族工业中的联营现象逐渐多起来了。首先出现联营的是水泥业。大战结束后，水泥进口迅速增长^③。与此同时，国产水泥也在增长。1922年以前国内水泥市场一直是由启新垄断的。1923年8月，1920年9月创办的华商上海水泥公司开始出货。1922年创办中国水泥公司于南京龙潭，日产水泥500桶。1919年，全国水泥产量64,194桶^④。1922年增至1,564,892桶，1923年1,753,063桶，1926年2,284,444桶，1927年2,268,513桶^⑤。在华外厂产量也在明显增长。1922年全国水泥总供给量已达273

①②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13—15页，第15页。

③ 1916年进口水泥827千担，1918年862千担，1920年1,752千担，1922年3,179千担，1924年1,788千担，1926年2,417千担，1927年1,916千担。见方显廷、谷源田：《中国水泥工业之鸟瞰》（1934年12月5日《大公报》第11版）。

④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157页。原单位为公吨。按每桶=170公斤折算得出。

⑤ 方显廷、谷源田：前引文。

万桶，1926年359万桶，1927年373万桶^①。而1931年全国水泥销量不过278万桶^②。这还是水泥需要逐年增长的结果，20年代肯定没有这么多。在外货侵占了40%市场^③的情况下，国内市场上供大于需的矛盾日趋尖锐，民族水泥工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④。为避免两败俱伤，1925年7月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与启新洋灰公司签订为期5年的联合营业合同，划定销售区域，规定销额，议定售价^⑤。联合给两公司带来了利益，并在抵制日货方面发挥了作用^⑥。1927年中国水泥公司收购了太湖水泥厂的全部设备，产量由每日500桶一跃而为2,500桶；年产量由1927年的13万桶上升到35万桶^⑦。竞争更趋激烈。三家公司筹备联营，但终因中国水泥公司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次联营未能成立。

骆驼绒的生产过程简单，利润优厚。20年代下半期，上海毛纺织业内外纷纷设立新厂。竞争加剧，售价逐年下降。维一、先达、纬纶、胜达、天翔等5个厂为了保持高额的利润，于1929年春成立了“中国骆驼绒总发行所”，集中5个厂的产品联合销售。由5厂各派代表2人参加管理，他们议定各厂的出品划一售价，不得私自变更价格。到年终如有存货才可自行处理，但不能贬低售价。同年因有的工厂破坏联营公议，内部矛盾加剧，联营结束^⑧。

大生一、二、三、副厂虽然同属大生资本集团，但是，即使在早期，各厂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1925年由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千家银行以及永丰、永聚钱庄组成的银行团接办大生各

①②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第184页，中，第79页。

③ 1922年外货水泥占国内市场上水泥供给总量的42.72%，1924年占44.93%，1926年占36.35%，1927年占39.18%。见《刘鸿生企业史料》，上，第184页。

④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205—207页。

⑤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第191页。

⑥ 《刘鸿生企业史料》，史中，第196、199页；《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219页。

⑦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序，第8页；《刘鸿生企业史料》，上，第225页。

⑧ 《上海民族毛纺织业》，第61—62页。

厂后，由于各厂债权人不同，银团对各厂的控制程度以及各厂的经营情况互异，彼此间的竞争十分激烈^①，营业蒙受了损失。银行与董事会乃于1930年组织一、二、三、副厂联合售纱处于南通（后改称联合批发所），规定每厂每日销售的数量，统一内销工作。

我国搪瓷厂绝大部分集中于上海。1930年，上海各厂组织了“国产搪瓷联合产品所”。“售价一致，以免同业间之竞争”。这个组织维持了3年。1933年8月以后，“此项联合销售组织即行瓦解，于是近年内各厂竞争甚烈，价格下落”^②。

1908年广东民族火柴工业成立的启源堂虽然在短期内限制了新厂的开设，但这种垄断没有、也不可能持久。到1923年，广州的火柴厂已达21家，年产火柴16万多箱，当地市场容纳不了，同业间的竞争趋于激烈。1927年以后，瑞典火柴在华南以香港为基地，大量侵入我国市场。瑞典火柴每箱售价比同级广州火柴低3—4元。各厂为了共同抵御瑞典火柴，并减少同业竞争，1930年成立了“维业堂”，议定统制产销的办法：一、根据各厂的排梗机数计算产额，确定每月总产额为63,600笠（合10,000箱）。火柴积压或畅销时，则按同一比率加成或减成，不得私自增减产量。二、各厂于每旬将产、销、存数量列表报堂，作为确定下月产额的根据。三、由维业堂成立推销处，凡广州市内各厂生产的火柴都要交推销处统销。邻近各县的工厂可自行推销，但必须报推销处审查登记。四、为了防止同业竞争，在推销处售货时，将畅销货与滞销货搭配出售。维业堂在缓解同业竞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厂资力和设备技术落后，加上当地火柴与瑞典火柴税

① 大生纱销一向注重本地，以供附近的手工织户织造盛销东北的“沙布”之用。1927年大生棉纱在本地销售数量还占全年售纱总数的81%。1928年前后日商洋布大量侵入东北、华北，南通沙布北销顿减。1928年大生棉纱本销、外销之比变成2比1。大生4个厂子竞争加剧应与此有密切关系。

② 1936年《申报年鉴》，第707页。

负不同，维业堂仍无力同瑞典火柴竞争。及到1931年广东省政府征收内地消费税，瑞典火柴每箱增加了12元税负后，瑞典火柴才逐渐退出广东市场^①。

从1914年民族火柴工业在东北起步之日起，日本火柴厂就跌价竞销，几年间每箱价格下降了14—15元。民族火柴厂也被迫降价。竞争使双方都受到大损失。在21家民族火柴厂当中，先后歇业者8家，日商奉天燐寸株式会社也倒闭了。1923年，吉林省的中、日火柴厂彼此妥协，共同组织北满联合会，规定生产比例，并联合采购原料及贩卖制品。接着沈阳的惠临公司发起组织奉天火柴同业联合会（又称南满联合会），并吸收营口的三家火柴厂参加，在沈阳、营口、四平、洮南等地设立批发处，共同议价，联合销售。1925年，中、日火柴厂共同成立南北满联合会，划分销货区域，订立售货公约，使东北地区的火柴市场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②。

1926年，瑞典火柴公司以投资合作或收买的方式控制了东北3家日本火柴厂，就地生产火柴，跌价倾销。瑞典火柴在沈阳每箱售价6.9元，沈阳惠临厂的火柴每箱成本9.8元，虽跌至每箱8元出售，也还是无法与瑞典火柴竞争。民族火柴工业曾企图与瑞典公司妥协，共同成立东三省火柴联合会，划分销区，公订售价，但瑞典方面拒不参加。中、日火柴厂联合起来与瑞典火柴竞争，也抗不住瑞典火柴的压力。几经周折，1931年4月东北政务委员会制定了“东北火柴专卖条例”。火柴专卖施行以后，不仅瑞典火柴公司任意跌价竞销和收买工厂的活动受到了限制，华北等地的火柴也无法贩运出关了，从而造成了中、日火柴厂联合垄断东北市场的局面^③。

①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87—91页。

②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92页。

③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92—96页。

(二)

进入1931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市场危机日趋严重，民族工业中的联营现象越来越多了。

为抵制日货，1931年7月1日，华商、启新、中国3家水泥厂签订为期一年的联营合同，内容是协定销数、协定售价、划定联业区域、限制扩充或添加机器、联合对外。三公司在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投标供应水泥时，为了抵制日货，甚至把价格跌至成本以下。三公司的联营在抵制外货方面发挥了作用，营业情况也有好转。1931年华商盈利达48万余元，为1930年盈利额的635.64%。启新的盈利也从1930年的114万元增至1931年的154万元^①。1936年2月启新、中国、江南三水泥厂签订为期5年的联营活动，内容主要是分配销额^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卷烟、胶鞋等获得发展后，对包装用纸盒的材料的需要随之增加。我国进口黄版纸（Strawboard）市场几乎被日本独占^③。黄版纸制造本轻利重，因此20年代先后出现了6家纸厂（江苏2，浙江2，上海1，天津1），年产黄版纸34,000吨。集中在上海附近的5家厂子的年生产能力达29,500吨，而上海市场上的需要量每月经仅1,000余吨，而且这个需要量还要被进口货占去一部份。因此黄版纸严重过剩，导至各厂削价竞销，最低时每吨只售40元左右。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2年秋，除上海的竞成外，其余5厂组成国产版纸联合营业所于上海。联营的内容包括：规定各厂生产品种，各厂产品按成本作价

①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第220—221页、223页、224页；《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264页。

②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251—252页。

③ 1929年进口黄版纸49,789担，其中由日本和日本奴役下的台湾进口者41,281担，占82.9%；1930年进口27,286担，其中由日本和台湾进口者21,732担，占79.7%；1931年进口10,332担，其中由日本和台湾进口者7,230担，占70%。见1931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第469页。

由联营所收购，定价出售，所获利润除拨充该所经费外，按产值比例分配给各厂；划分产品销售区域（如天津振华的产品不南运，限定在冀、鲁、豫、晋销售）；如仍有滞销，则采取各厂轮流停工的办法以资节制等。联营所成立后，各种版纸的价格由下降而趋于稳定，不仅各厂有盈利，而且有利于抵制进口洋货^①。

中国出口锑产数量，1927—1929年呈上升趋势。1930年开始下降，1931年降至最低点，此后逐步回升。1929年上海纯锑市价每吨339元，1932年7月跌至245元的最低点。后即盘旋上升^②。湖南生锑出口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价格的最低点也在1932年^③。这年5月，湖南锡矿山锑商乃联合湖南11县锑商在长沙成立“湖南锑业联合贸易处”，“整齐步伐，统一对外贸易，以避免洋商之剥削”。联营的内容是：限制生产，提高锑价。“经此一番整顿，洋商黔驴技穷，无法再逞。锑商夺回操纵之权后，形势顿然改观，湖南锑业生产实际上又已恢复原状，而得其利”^④。湖南锑业的联营出现在处境最艰难的1932年，显然是为了挣扎图存。但联营的作用未必能象资料中所说的那么明显。

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生丝产量锐减。川丝出口得以骤增。这一年川丝的出口值达1647万元。此后情形逐渐恶化。30年代初，由于东北的沦陷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川丝出口量、值都在剧减^⑤。出口价格也显著下降。四川丝业严重衰

①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第130、132、304—305页。

② 张家佑：《中国锑矿之生产贸易及经营》，见《中行月刊》第16卷第5期，1938年5月。

③ 1927年每担平均出口价格15.11元，1929年11.38元，1931年13.19元，1932年8.91元，1933年10.44元，1935年17.23元，1937年38.52元。

④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894页。

⑤ 1929—1935年四川生丝出口量值表（单位：担、千元）：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量	28,971	24,658	21,586	15,057	11,209	8,515	4,799
值	17,802	19,481	14,181	9,234	6,924	2,669	859

据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进出口贸易统计》。

退。为了挣扎图存，1932年重庆几家丝厂乃组成“久和公司”，集中力量联合经营以摆脱危机，但维持一年多就告失败。1933年四川地方政权成立川丝整理委员会，于同年3月将四川各地11家铁机丝厂集中于一个联营公司——大华生丝公司，试图“统一经营，齐一品质，免除竞争原料，竞售产品，团结对外，以谋川丝的复兴”。但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狂潮的冲击下，它的力量毕竟太渺小了，加以内部矛盾重重，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次价高，只经营一年多，就以亏损120万元而倒闭^①。1935年卢作孚任建设厅长后，提出四川丝业“当照英美各国托辣斯之组织，筹设一大规模之丝业公司，独揽全川丝业”，先从统一铁机厂家着手^②。准备以高压手段接收组成大华的11厂以及其他机械丝厂的资产，遭到丝商反对。延至1937年5月成立了官僚资本性质的“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③，虽然也是垄断机构，但与原来大华生丝公司的联营在性质上已有很大的不同了。

自1914年久大精盐公司创立于天津塘沽，到30年代已有13家精盐公司^④。受行盐引岸制度之阻挠，精盐行销并不顺利。1933年举行精盐公司登记时，核定全国总销量，以130万担为度，由各厂分任销额，并规定3年之内，“不得增设新厂，限制复严”^⑤。虽然没有联营的形式，但有联营的内容。

1931年国民党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率由从价7.5%提高到40%，自1931年起火柴进口大幅度减少。1931年进口量为1930年的30%，1933年为8.6%^⑥。但是，1933年以后，火柴业危机却日趋严重。

① 温少鹤：《回顾重庆生丝输出业》（《重庆工商史料》，第1辑）

② 《统制全川丝业计划》，见《四川经济月刊》第5卷第2、3期。

③ 李枏：《记四川丝业公司》，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④ 卞锦涛：《中国之盐业及盐民生活》，见《新中华》第3卷，第13期，1935年7月。

⑤ 1936年《申报年鉴》第583页。

⑥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35—36页。

主要原因是，1932—1933年火柴工业盲目发展，工厂增加，产量增大，造成生产过剩，产品严重滞销；1933年12月，国民党政府提高了火柴统税税率，火柴的统税负担占到了出厂价格的50%左右^①；日本火柴大量走私入口和在华外商火柴厂（主要是日厂，分布在天津、青岛，美国有两个厂在上海、镇江）对民族火柴工业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34年10月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在给财政部的呈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火柴业的情形：“营业范围愈狭，过剩程度愈深，供求不能平衡，同业竞争愈烈。卖价逐步下落，成本早已不保。高税无法转嫁，亏蚀与日俱增。危迫情形，为从来所未有”^②。1930—1932年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盈利都有四、五十万元。1933年降至6.2万元，1934、1935两年共计亏损93万多元^③。1933年12月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曾请求国民党政府设立火柴统制委员会，规定各厂产销数量、审定火柴价格、限制设立新厂。但国民党政府以“外人在各通商口岸设厂，原为条约所许。生产限制，既无正式法令以为根据，自难施行”为理由拒绝了这个请求^④。1935年7月华中火柴业乃成立国产火柴制造同业联合办事处，规定各厂的生产限额（各厂存货过多时，联合办事处有权命令各厂减少或暂停工作），各厂生产的火柴，都必须交联办处发售^⑤。大中华在联办处中掌握了领导权。美商美光火柴公司和镇江内河贸易公司（合称美内团）资力雄厚，设备先进，是国产火柴的劲敌。如果不把美内团拉到联营组织中来，国产火柴业的联营就有可能遭到破坏或无法进行。同时美光也感受到走私进口的日本火柴的威胁，在对待走私火柴的态度上与民族工业有一致之处。1935年7月乃迁就美内团

①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164、197页。

② 杨德惠：《中国的火柴工业》，见《商业月报》第16卷第9、10号。

③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170页。

④⑤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173、175页，第181页。

的条件（美内团对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有否决权、保证美内团不受排外活动的影响），由联办处与美内团合组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产销管理的内容是协定产额或销额，减少及限制火柴的制造，以防止生产过剩。1936年6月，大中华又和美光、汉口楚胜火柴厂3家成立“汉口火柴合作委员会”，作为管理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两湖的市场就由它们3家瓜分了。联办处和产销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取得了一定成果，售价有所提高，各厂获利丰厚^①。

日本在华的火柴工业和走私入境的日本火柴是民族工业的巨大威胁。为了减轻威胁，1936年3月，屈从日商的条件，中日火柴商共同成立了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原来的联办处此时成了联营社的上海分社。联营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分配生产箱额、统一产品销售、规定销售价格、承转火柴印花等^②。双方签订的“火柴统制同意书”规定日商在实际销售数额外多得10万余箱的产额。日商多得火柴箱数，就减少了本国火柴的生产箱额。日商火柴厂都在北方。此举对华中方面的火柴厂影响较小，对北方同业的影响很大^③。联营社的理监事、经副理都被大中华、丹华、振业等少数大厂和日方代表占据，小厂则被剥夺了参与社务的权利^④。联营实际上是大企业垄断产销的组织。它的垄断活动主要通过三方面来进行。一是联营社通过控制氯酸钾的护照来控制这种火柴原料。各厂自己领不到护照，各厂主要的原料就被有力地控制了。二是联营社通过统一管理印花来控制产销，因为火柴不贴印花不得出厂，更不能发售。三是派设驻厂员，监督各厂是否按照协定的产销额进行产销，并检查是否贴了印花等。联营社还通过国民党政府强制规定未加入联营社的华商各厂必须在

①②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176、186、190页，第216—218页。

③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204、236页。

④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114页。

1937年2月前加入联营社,否则取消注册,停止售花发照^①。联营社的成立对大厂很有利,在分配生产限额时偏袒大厂的倾向极为明显。联营社核定的华中地区21家火柴厂的总产额较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的实际产量减少12.35%,而大中华的核定产额较实际产量只减少7.21%^②。由于总产量减少,火柴售价逐步提高^③,日本厂和大中华都获取了很大利润。1936年实行联营后,当年大中华就盈余83万元,1937年3月前盈余33万元^④。一些中等厂子也有好转。联营社的组织对于小厂及未加入联营社的华厂^⑤却是不利的。一些小厂就由于任意削减产销额而蒙受了损失。美内团也没有加入联营社。1937年2月,在对美内团作出重大让步(美内团拥有否决一切决议的权利,对美内团领取运照及原料运单不加任何限制,提高美内团销数比率)的条件下,由联营社上海分社与美内团签订产销合约,成立销售调节委员会,分配各自的销数比率^⑥。

1933年,上海各煤球厂,“因售价跌落,亏耗累累,莫不希望早日联合,以冀涨价,以谋恢复”。1934年1月10日乃成立联合营业所。但营业所规定的售价,大家都不遵守,矛盾重重。到2月15日,营业所就解散了^⑦。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1935年章华毛绒纺织公司曾与上海振兴、安乐二厂订约分配销额。1936年满期后,续办联合营业一年,分配营业比额,成立驼绒纱联合营业所,集中管理业务。同年又与天津仁立厂成立军呢联营,分配营业比率,章华占63%,仁立占37%^⑧。

①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228,230页。

②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119页。

③④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247,248页。

⑤ 粤、晋、川、云、贵、甘、陕等省未加入联营社。鲁、冀的火柴联营事实上也未办起来。见《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111—112页。

⑥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223—224页。

⑦⑧ 《刘鸿生企业史料》,中,第127—128页,第67—69页。

早在1922年，民族资本纱厂就实行过联合限价与减工。30年代，民族棉纺织业也经历了深刻的市场危机。虽没有成立正式的联营合同、联营组织，却也采取了实质与联营活动并无二致的措施。如1933年4月上海华商纱厂决议自4月22日起至5月21日止全部实行减工，每星期六及星期日均停止夜工。到5月10日，上海各厂又决定俟上述减工办法期满后，仍请各厂斟酌情形，自由减工^①。1935年无锡华商纱厂也决议减工30%至50%。上海橡胶业中也有过类似情况。进入30年代，由于危机日趋严重，上海橡胶业同业公会乃于1935年6月召开全体大会，决议缩减生产办法，以资救济^②。

山西阳泉矿的煤，“因受正太路运费奇昂影响以及同业互相排挤”，“销路日蹙，不得不跌价竞卖，……倒闭者纷纷不绝”。1936年乃组织合作社，实行“分产合销”。结果是煤价提高了，而且影响到天津煤价。往年冬季过后，天津煤价例须大落。1939年却是冬季过后，每吨仍为16元^③。井陘、正丰两矿也实行“分采合销”^④。此外开滦煤矿与中兴煤矿也达成过控制销售额的协议^⑤。

中国的碱业市场向来为英商卜内门公司垄断。1925年永利碱厂出碱以后的三、四年中，卜内门曾多方进行破坏。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永利占了上风。1937年5月，永利与卜内门订立协定，在中国（包括香港）分销纯碱、烧碱、洁碱，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定期3年^⑥。

北洋航线，为日轮包办；南洋航线，又为英商垄断。中外航运业竞争最为激烈的是长江航线。早在1921年左右，招商、太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30页。

② 1936年《申报年鉴》，第706页。

③ 《矿业周报》第351号，1935年9月；第378号，1936年4月；第381号，1936年5月。《晋省救济煤业计划》，见《中行月刊》第11卷第6期，1935年12月。关于天津煤价，请参看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95页。

④ 《矿业周报》第352号，1935年9月。

⑤ 蒂姆·赖特：前引文。见《近代中国》，第1辑，第74页。

⑥ 陈调甫：《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见《工商史料》2。

古、怡和就创立过同盟办法，限制跌价竞争。但因各公司暗订回扣，致名存而实止^①。1931年，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长江货运开始衰落^②。1932年1月日寇对淞沪发起的侵略战争加快了这种衰落过程。1933年上海汉口间、汉口宜昌间、汉口湖南间之三大航路，各国轮船之装货总吨数为130万吨，较1932年减少83万吨^③。长江航运业营业一落千丈。“凡属行驶长江之轮，均告亏折。”太古轮在长江下游（沪汉间？）往返一次，过去运货之水脚可收3万元，1933年减为四、五千元。怡和之不景气“为近数年中之所罕有”。招商、三北因吨位过剩，将轮船出租给国民党政府，“籍收租金以为挹注”。宁绍也“亏耗至巨”。只有日清因有本国政府补助，甚为活跃，大肆跌价捣乱^④。1934年航行长江之船只虽较“一二八”事变前减少了五、六艘，但仍是货少船多，“上水船有装三四成载脚者”，太古、怡和、日清甚至将水脚减至只收原价3/10^⑤。日清毛利自1928年即大幅度下降，1932年亏损15万元^⑥。招商局的亏损额自1929年显著加大^⑦。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5年招商、三北、宁绍三家华商轮船公司乃联合太古、怡和、日清，共计六大长江轮船公司，轮船65艘，铁驳88艘，实行“营业公摊办法”。在汉口上海线和汉口宜昌线内之各种营业，无论上下水均在公摊范围之内。所谓公摊，就是6家公司行驶该线之轮船，一律估定公吨，收入之水脚，依公吨比例分配。下水从7月22日实行公摊，上水从7月25日实行^⑧。以

① 余定义：《最近三年之交通建设》，下，见《中行月刊》第12卷第3期，1936年3月。

② 参看《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50—251页。

③ 《长江航运状况》，见《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5期，1934年5月。

④ 《长江航业衰落》，见《银行周报》第17卷第46期，1933年11月；《去年长江线内航业概况》，见《银行周报》第18卷第4期，1934年2月。

⑤ 《长江航业不振》，见《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3期，1934年9月。

⑥⑦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54页，第252—253页。但招商局1933年盈利43万元。

⑧ 《长江六轮船公司同盟水脚公摊》，见《四川经济月刊》第4卷第1期，1935年7月。

6个月为期。1936年1月决定继续办理6个月。此举多少减轻了外轮竞争造成的威胁^①。

川江也是船多货少，跌价竞争很厉害。各轮“皆抱有与其无货放空，不如跌价滥卖”，各轮上下水运费，竟有跌至原价4/10者^②。1933年冬川江航业公司太古、怡和、民生、招商、聚福、三北、捷江等7家乃“联合组织同盟公司，签订大打关合同，约法三章，即各公司水脚援例增加后，不得妄自增减”。但所订水脚标准，过于繁苛，而且层层盘剥，引起货帮反对，甚至联合实行罢运。1934年同盟公司破裂，自动解散。“自此各公司即狂跌水脚，相互竞争，棉纱每件由24元减至3.5元，暗中再打九折及两九五扣。外商轮船以资本雄厚，跌价竞争，视为常事，而华商及规模较小之外轮公司，已感精疲力竭之苦。于是长江航业大有一蹶不振之势。惟民生公司以握有川江上游霸权，非外轮公司所能垄断，且经营其他事业尤多。1933年度该公司客货收入达323万元，1934年且盈余数十万^③。在这种情况下，太古等只好放弃抵制，转而采取与民生合作的态度，再次实行同盟。参加的有民生、捷江、太古、怡和、日清、三北等。主要内容是“各轮船均照清册吨数，以五成支派营业载脚”。如果“货件畅旺，临时斟酌比例加载”^④。万县也设立了航业联合办事处，其主要任务也是确定水脚（运费）和分配载额^⑤。这对于限制跌价竞争应有一定作用。

以上所列1931年以后的联营活动，次数显著多于1931年以前。分布的行业有水泥、造纸、锑矿、生丝、精盐、火柴、煤球、呢绒、棉纺、橡胶、煤矿、制碱、航运等，也比1931年以前

① 余定义，前引文。

② 《川江航业近状》，见《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12月。

③ 《长江航业多受外商操纵，国轮运业难维现状》，见《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2期，1935年2月。数字与《民生公司史》，第86页有出入。

④ 《川江中外轮公司恢复合作》、《川江轮公司组航业营业处》，见《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6期。

⑤ 《万县设立航业联合办事处》，见《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6期。

广泛得多。但就全部民族工业来说，联营所涉及的范围还是不大的。1931年以前的联营，除水泥行业外，都发生在上海附近，1931年以后则有向内地扩散的趋势。联营的内容不外两点。一、限制产量、限制生产规模、分配销售额。二、限制价格，或提价，或禁止跌价。有的没有后面这项内容，但限制产量，其终极目的也还是为了防止跌价。水泥业、版纸业的联营还有划定销售区域的内容。这些都是30年代市场危机普遍而且严重、物价狂跌（特别是1935年以前）的反映。在联营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彼此大体上是平等的。一种是大企业起了支配作用，大企业的利益摆到了首位。联营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大企业压制中小企业的手段。这以火柴业最为典型。大部分联营纯系企业之间的活动，有的（如四川生丝、火柴业）则有政权的作用，但这与国民党政府搞的经济统制（如蚕丝统制）有原则的不同。

联营是一种具有垄断性的活动。早期联营的产生可能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行会传统有一定关系，但就整体而言，联营恐怕还是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影响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垄断组织形式中，联营与卡特尔最为相近。不仅联营的内容，如限制价格、规定销售范围、规定产量等与卡特尔相同，参加联营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在个别情况下，参加联营的企业失去了商业上的独立）、法律上和财务上保持独立，联营是一种初级的、不持久的垄断活动，也与卡特尔相同。1931年以后，由于市场危机日趋严重，联营以后企业之间的明争暗斗难以停止，联营鲜有维持达一年以上者。

卡特尔最初产生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特别在德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而在国外市场的扩张方面又遇到了激烈的竞争，卡特尔便在19世纪下半叶广泛发展起来。上述30年代中国的联营活动，除锑矿、生丝两业是由国外市场萎缩引

起的之外，其他都是国内市场狭小的结果。在一个4.6亿多人口^①的大国，年产34,000吨的黄版纸、55万吨的水泥^②、100万磅的绒线^③、约110万箱的火柴^④、年消费十二、三万公担进口生橡胶^⑤的橡胶产品等等都难以找到销路，长江上十几万吨的轮船吨位^⑥都吃不饱，可见国内市场是多么狭小。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国内市场狭小的原因当然不同于德国。食盐是特殊商品。精盐市场的狭小，根子在落后的运销制度。对于其他的商品来说，国内市场狭小的原因不外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⑦、农业危机的严重、农民的极度贫困、交通的落后等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工厂、公司以及在中国推销商品，使得本来就狭小的市场变得更加狭小，把本国企业逼到了几乎无处容身的地步。这一点，在水泥、火柴、棉纺、航运等行业中最为明显。橡胶^⑧、驼绒纱^⑨、版纸等的缩减生产和联营也与外货的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列宁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⑩中国的情况与此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中国社

① 胡焕庸：《中国八大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第4页。

②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157页。原为国灰销数。

③ 《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第106页。

④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43页。

⑤ 《上海民族橡胶工业》，第32—33页。

⑥ 1934年太古、怡和、日清、招商局四大公司长江航线所配轮船吨位为124,241吨。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48页。1936年民生公司在长江航线上的吨位为20404吨。见《民生公司史》，第50页。

⑦ 关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请参看拙稿《本世纪30年代地方进出口贸易严重入超的情况、原因和后果》（《近代中国》第1辑）。

⑧ 参看《上海民族橡胶工业》，第32—35页。

⑨ 参看《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第99—102页。

⑩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3页，1972年版。

会是封建社会，由于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在这里，不是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引起垄断^①，而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在它的童年就有垄断的倾向。早期的垄断采取专利（办）权的形式，即在同一地区、在一段时期内不允许再开办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厂子。官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都有专利权是不言而喻的。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不少也是有专利权的，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及继起的华盛纺织总厂、轮船招商局等。民营企业享有专利权的也不少。如天津自来火局获准在直隶省境内制造火柴的15年专利，重庆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获准在川东地区25年制造及贩卖专利，汉口燮昌火柴厂获准在汉口15年制造专利^②，1899年峰县中兴煤矿获准百里内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斤、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③，1904年张謇曾呈请清政府禁止他人在海门设立纱厂以侵犯大生利益并且可能获得了批准^④。此外如北京丹凤火柴公司、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等^⑤都有专办权。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的逐步开拓，专办权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20世纪初年清政府也否决了一些专办权申请^⑥。辛亥革命后，专办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1915年华新纱厂申请在直、鲁、豫三省专利30年就未获批准^⑦。1919年农商部正式通令废止专利权^⑧。专利权废止后，民族工业的垄断越来越多地采取联营的形式。专办与联营都是垄断的形式，但二者的差别却是分明

① 火柴业在30年代的联营可能是唯一的例外。1930年6月，苏州鸿生、上海燮昌、镇江燮昌、周浦中华4火柴公司合并成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191万元。接着大中华吞并了九江、汉口、芜湖、扬州、杭州的一些厂子。到1934年，大中华共有7个火柴制造厂和1个梗片厂，总资本增加到365万元，年产量约占华中地区的50%，占全国的15%（《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61、66—67页）。大中华的资本集中无疑是以以后火柴业得以顺利实现联营的重要条件。

②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10—11页。

③④⑤⑥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1111页，第1114—1117页，第1117、1120、1122页，第1124—1125页。

⑦ 周志俊：《北方实业家周学熙》，见《工商史料》2，第31页。

⑧ 汪敬虞：前引文，第1124页。但未详原始根据何在？

的。一、专办与联营都是市场狭小引起的，但市场狭小的原因却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本国市场发育程度太低的结果，后者则除了与市场发育不足有关外，更多的是主要由外国侵略造成的市场危机引起的。二、专办是从封建政府获得的一种特权，封建性质很明确。有的联营也借助了政权的力量，但总的来说，联营是民族工业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垄断的形式，资本主义性质相当明确，越到后来越是如此。三、专办是限制办厂。1905年四川火柴业成立“华洋统销公司”和1908年广东火柴厂成立“启源堂”时，虽然两者的主要内容已是联营，但是还是把专办作为其活动内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限制办厂已不可能，所以除精盐业有过“不得增设新厂”的规定外，就再也见不到专办的痕迹，联营的内容全部限于前面概括的那些。

中国的联营，特别是30年代的联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点。垄断资本主义的动力和决定性动机是获取垄断利润，即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联营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工矿业、航运业在市场危机日趋严重条件下的一种挣扎图存的手段，它们的动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扭转亏损的局面。

火柴业、制碱业，航运业的联营活动都把外国在华企业包括进来了。在国民党政府无力驱逐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甚至对之作些微限制也不可能的情況下，把它们包括进来也在情理之中。但像火柴业那样一再屈从于日、美企业的苛刻条件、以牺牲本国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去求得外国企业的合作，则典型地表现了民族资本家的软弱性。永利碱厂在与卜内门公司竞争中的表现、民生公司在与外国航运业的竞争中的表现则要坚强而有效得多。

联营深刻地反映了国内市场的狭小，是一种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但是，联营在解决市场狭小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却是微弱的。促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市场危机的问题

有哪一个联营能够解决的呢？在外货倾销的条件下，参加联营的企业限制价格下跌，还无异于将市场出让给帝国主义势力，使市场变得更加狭小。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联营对外国在华企业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如火柴、制碱、航运等业）。对参加联营的企业本身来说，联营一般能在短期内缓和一下竞争，提高一点价格，增加一点利润，暂时改善一下艰难的处境。对于得不到本国政府保护的民族企业来说，联营不失为一种自卫手段。

（责任编辑：宋士堂）

（作者王方中，192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

“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

徐 辉 琪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烈钧“目击时艰，如芒刺背”^①，慨然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此时虽被排挤于“中枢”之外，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开放政权”加以系统考察和剖析，不仅为正确评价李烈钧所必需，对研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不无必要。

（一）

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开放政权”，还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个月，即1931年10月18日就开始了。这天，他与徐谦、程潜、张知本、陈嘉佑等国民党人联合草拟了一个“提案大纲”。“大纲”共分9项，其中第1项为“切实保障人民，实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第2项“本第1项原则，人民得自由组织团体或政党”，第3项“缩短训政时期，入宪政时期”，包括“六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筹备会设立后，于一年内开国民大会，决定国是”等，第4项

① 《致叶楚伦先生书》，拙编：《李烈钧文集》第86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以下引文凡未特别注明出处者，均见《李烈钧文集》，只注明篇名和该书页数。

“实行自治，发展地方”^①。这些，即是李烈钧后来所概括的“开放政权”的主要内容及实施步骤。

同年12月2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李烈钧将上述“提案”择要向会议提出。同日，他还与孙科、邹鲁、伍朝枢、陈公博、李文范等人联名提出了“国民代表会大纲提案”，就“国民代表会”的组成及性质进一步陈明意见，主张：“国民代表会由每省职业团体共举代表十人组织之”，“宪政未实现以前，国民代表会为民意代表机关，关于内政外交之重要事项须得其同意”，“国民代表会筹备宪政进行事宜”^②。但提案均未被采纳。

此后，李烈钧本其主张，继续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权，进行宪政”。并于1932年2月8日在洛阳所作《国民应奋起挽救国家》报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开放政权”的提法。他说：

“民为邦本，主权在民，自昔已然，二十世纪尤是。我国目前唯一救国良方，要自开放政权，实行民权始，务使人民直接间接参与政治”^③。这一表述，较完整表达了李烈钧“开放政权”的思想。

但国民党政府对李烈钧的大声疾呼，依然置若罔闻。李烈钧为此愤然发出了“人醉我独醒”的感叹^④。并以“身体益弱”为由，拒绝出席1932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

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电召李烈钧到南京参加组织国防委员会。李烈钧以为借此机会可进一步申明“开放政权”的主张，毅然前往。2月19日他自上海到南京，当天就向国民党中央提交了“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提案”。在提案中，李烈钧写道：

“我国今日所处之形势，不得谓非严重。苟欲打破此难关，渡过彼岸，则亦唯有对内政大改革，对外侮大奋斗，而始终贯彻其精

① 第669页。

② 第670页。

③ 第678页。

④ 《与冯焕章同登泰山》，第680页。

神，乃能济之”。关于“内政大改革”，其最低限度应包括：

(1) 厉行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明令许可人民自由组织政党。“其有妨害前项之法令取消之，各地官吏、党部有妨害前项之行为，分别禁止严办之”。(2) 国民参政会全部民选。(3) 扩大地方自治权，各县人民得选举县官、议员，各省省长同时实行民选。最后强调说：上列各项，“既在本党范围之内，而又为旧调重弹，且最平常之事，是在能行”，而且应该做到^①。随后，华北形势危急，李烈钧“北上视察”。3月25日返回南京。

据李烈钧说：他“此次自沪晋京，再北上至北平、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处，复南返往京，奔走五十余日，所从事者，即为抗日与开放政权两事”^②。可谓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然而，也恰如李烈钧自己所说：“惟说力既不足，而行动乃如春秋衡士”，所抱主张，“几成孤调”^③。

3月30日，迫于全国舆论，国民党中常会决定7月1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这使李烈钧感到鼓舞，兴奋地称它是“确定开放政权之步骤”，“将使中央政权真正操于国民”。但他很快发现，国民党政府并无“诚心”，更无事实之表现；所谓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不过借以搪塞舆论而已。他气愤地指斥说：“自中常会决议案发表后，人民认政府有公开政权意向，而未认有此诚心。以事实无表现，各地党政机关，严厉取缔，一如昔时故也。此层苟不先予解放，但见江河日下耳。”^④

鉴于国民党政府徒以“空言”骗世^⑤，4月22日，李烈钧不

① 第667—688页。

② 《在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御侮大会的演说》，第699页。

③ 《致马相伯诸公电》，第860页。

④ 《致蒋委员长江电》，第853页。

⑤ “空言”为李烈钧用语，“空言骗世”也是李烈钧的意思。其原话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屡次所宣示者，宜不致再托空言。”（《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电》，第700页）。

顾“血压高至一百九十度”，决定再到南京，作“最后之建议，以求心之所安”^①。到南京后，他遍晤国民党中枢要人，陈说“开放政权”必须实行。但反应冷淡，其言终“难见用”。为此，5月15日，李烈钧抱病给国民党中央拟了一电，发前并分送汪精卫、居正、孙科、经亨颐、叶楚傖等人，望作“有力之主张”。该电痛切指出：“国事危殆，亦云极矣。救之之法，昔曾陈述，时至今日，仍当积极图之，犹之父母有疾，不能不用药也。……为今之计，诚宜迅颁罪己之文，广开言路，凡昔党内外所建议，其有裨于救国者，迅采行之；而负政治责任者，尤应审度大势，早定方针”。电末，李烈钧还特别称此为“最后之哀呼”^②。可见其情绪多么激愤。

就在李烈钧此电发出后半个月，6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以“时局关系，筹备不及”，决定停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原拟讨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一事自然也化为泡影。这样，李烈钧的这次努力倒真成了“哀呼”。

但李烈钧非但没有气馁，反而进一步激发了要求“开放政权”的决心。6月14日，他自上海致电蒋介石，一面指责国民党政政府“措置之非”；一面提出当前“急宜办者二事：一严令军政各机关，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秘密处置，亦不得滥用军法。其二，是非得失，公开辩论，取消文电检查，修改民众运动组织法，切实保障言论、出版诸自由”^③。把问题提得更为尖锐。

11月，“福建事变”发生，公开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对待“福建事变”，李烈钧根本上持反对指责态度。但他同时认为，事变实因南京国民党政府“设施鲜能适合国体，洽人民公意”所酿成，提出唯以迅速“开放政权”为根本“救济之法”。并发表“谈话”称：“闽事独立，留心国事者，

① 《赴南京途中与中央社记者的谈话》，第701页。

② 第847页。

③ 第854页。

咸抱分崩之痛，而于其所标志之开放党禁、公开政权则认为法律、政治所当然，人民权利所应享。特并国旗以改换之，未为当耳”^①。所以，他力主“和平解决”，而解决的关键首在于“探其原因，改革本身，以求见信于天下”^②。李烈钧的认识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比起国民党政府视为“叛党叛国”，一意军事进攻，则显然温和得多、理智得多。这也说明了当时李烈钧的旨趣所在。

这以后，李烈钧高血压日益加重，多次入医院医治，医生劝他“少说话”，“静养为宜”。但一旦病情好转，他便又无所顾忌地呼吁“开放政权”了。例如：1934年4月13日，他致电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斯时对外，诚为难事，然撑持大局，本赖全国民大会。会期既经决定（指1933年9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民大会于1935年3月召开——引者），犹不能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束缚，遂致民族力量无由表现。本党政策，何异尽走死路，而放弃生路也”^③。同时，自1934年后，李烈钧更多地将“开放政权”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加以呼吁。例如：1935年3月12日，他应邀出席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二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大家固以信徒自居者，亦曾研究三民主义与政策，何以不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而必云须先贤再世者，何也？以总理能做得到的，我们不能做到故也。……请各位同志看看总理遗像下悬的遗嘱，明明指示吾人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现在唤起民众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乎？共同奋斗乎？……我们一点都学不到，一样都做不到，国家何以不危险？还来说什么救国，可耻可

① 第711页。

② 《在上海与新新社记者的谈话》，第711页。

③ 第857页。

耻！”^①据目击者记载：当李烈钧演说之时，“会场中颇引领。故屡闻多数鼓掌声。迄说毕，则众议欣然，似称快者。虽亦有不妥者，乃怀惭，非反对也”^②。又如：同年12月25日，在上海“云南起义二十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说：今日“国事虽严重，苟能急起直追，合全民之力，奋勇图存，必可救之。特必须立大志，树信用，重大节，养成打虎精神，更效先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博爱精神，实行民权，运用民力，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③。打起孙中山的旗帜，是这时李烈钧要求“开放政权”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数年间，李烈钧始终不渝地主张和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而且态度越来越坚决，情绪越来越激昂。李烈钧曾形容他当时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④。这是毫不夸张的。

（二）

李烈钧何以坚决主张并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呢？

综观李烈钧的言论和行动，首先是为了抗日的需要。李烈钧明确说：当此国家危亡之秋，摆在国民党面前的首在确定一总方针，而此方针“必以迅现全民政治及积极抗日收复失地为最大关键”^⑤。又说：“救危图存之法，首当一致抗日。然欲一致抗日，必先求全国团结，则速行全民政治，实为坦途”^⑥。就是说，要抗日，就必须“开放政权”；“开放政权”，既为抗日所必需，又是抗日的重要保证。所以，李烈钧一再宣布：他的主张

① 第715—716页。

② 《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纪念二周年会上的演说》题解，第716页。

③ 第720页。

④ 《〈李烈钧之言论〉自序》，第718页。

⑤ 《致国民党各中央委员函》，第682页。

⑥ 《在纪念云南起义会上的演说》，第684页。

归结起来就是“对外主张积极武力抵抗，对内促成民治实现”^①；他的全部活动“即为抗日与开放政权两事”。

事实上，李烈钧主张武力抗日不仅十分坚决，在行动上与要求“开放政权”也是同步进行的。1931年12月24日，也就是前述李烈钧等向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两个要求“开放政权”提案的同一天，李烈钧又与阎锡山、居正、王法勤等十数人联名提出了“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提案。该提案严厉谴责国联于“九·一八”事变后一味实行“延宕主义”，谴责国民党政府一味依赖国联而采取“不抵抗主义”，指出：“在此生存死亡间不容发之际，为国家主权领土而牺牲，为人类公理正义而奋斗，为我民族存续而流血，义之所在，皆不能因循迁缓，再取无抵抗主义，退却揖让，以自取灭亡”。最后要求国民党政府迅派十万劲旅，增防锦州，“以铁血主义”，死守锦州^②。1932年10月9日，李烈钧又与冯玉祥、柏文蔚、程潜等联名通电，指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再次要求国民党政府“于政策上须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榆关，10日李烈钧对报界发表“谈话”，愤慨表示：日本侵略野心“益暴露于世，在我唯有贯彻武力抗日主义。盖坐而待毙，毋宁战而一死”^③。与此同时，为激发全国军民奋起抗日，李烈钧在“谈话”和“演说”中还对唯武器之“亡国”论调多次加以批驳，指出决定战争胜负主要不在武器之优劣，而在于战争性质和有无“民族精神”。并以淞沪抗战为例说：“至于御侮一层，国人颇有以武器不及敌国为虑者。其实战争之胜负，首视民族精神与是非曲直”。“故淞沪之战，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均能摧破强寇者，则民族精神为之也”^④。

① 《在上海与〈申报〉记者的谈话》，第685页。

② 第671—672页。

③ 《在上海与〈申报〉记者的谈话》，第685页。

④ 《在南京与记者的谈话》，第686—687页。

李烈钧主张积极抗日，还突出表现在他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支持和声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为挽救华北危机而建立的一支抗日武装，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冯自任总司令。当冯玉祥在北方一揭起抗日旗帜，6月14日李烈钧就与王法勤、朱霁青、邓家彦、傅汝霖联名致电国民政府，称赞冯玉祥为抗日“猛虎”，要求“授以重权，使当大任”^①。同时与柏文蔚、程潜等致电冯玉祥，称“民族国家之存亡，胥系于此举”^②。7月12日，抗日同盟军一举收复多伦，全国振奋，李烈钧也为之欢欣鼓舞，致电冯玉祥祝贺。电中说：“今公尚未接受政府之意，而先已快人民之心，不贪高官，不惜性命，惟仁是求，惟义是赴，旬日间传檄收复四县，今且血战攻克多伦，举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首收复之，捷报飞传，闻者雀跃。公等之业诚伟矣！”^③但与此相反，国民政府却认为有碍“中日交涉”，横加指责，肆意攻击，进而公然调集军队，压迫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李烈钧对此“亲痛仇快”之行径极为愤慨，公开斥责为“千古奇闻”；一方面致电冯玉祥，表示当继续“联合诸人，再申正论，为历史略存正气”^④。同时，甘冒“龙逢、比干之祸”，致电国民党中央，说：“昔张学良不战，而弃数省，苟为有罪也，则冯玉祥一举，而复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应为有功。国家纪纲，有罪者诛，有功者赏”。“苟不然者，则天下后世，其谓之何哉”！^⑤到后来李烈钧虽也赞成“和平”解决，并自愿充当了“调停”的角色，但主要还是为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留有斡旋的余地，而且坚持认为冯玉祥举兵抗日“志在救国”，本无可指责。关于这一点，在稍后李烈钧为《察哈尔抗日实录》一书所写

① 第703页。

② 第703页。

③ 第859页。

④ 第859页。

⑤ 第848页。

的《序》中可看得十分清楚。该《序》一方面盛赞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奋起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一方面指名斥责国民党政府继与日本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之后，派大军威逼取消抗日同盟军，致使“自是国内遂无复有举抗日之旗者”^①。此时距冯玉祥通电“收束军事”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是李烈钧起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的起点，那么反对妥协退让、坚持武力抗日则是它最直接的原因。

其次，李烈钧主张“开放政权”还由于受到全国抗日救亡热潮的鼓舞和影响。李烈钧每强调“开放政权”，几乎都提到“人心”。他说的“人心”，概括起来就是：人民要求积极抗日；为着抗日，人民应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项自由。例如李烈钧说：“事变以来，举国愤慨，人心固极可用”^②；抗日与“开放政权”，为“全国民众一致之要求”^③。并明确说：“今人民之希望于政府者，皆政府所应急起施为者也”^④。

有的时候，李烈钧也常说“人心涣散”的话。例如他说：“我国今日之大患，为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⑤。但一则强调“开放政权”的必要；二则批评国民党政府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压制，着眼点仍是为着激奋“人心”，“一致对外”。李烈钧在谈到召开“国民大会”时就说：“国难日亟，欲全国人民共赴国难，须有人民代表会议之设立，始足表现全民意见”^⑥。又说：“共赴国难，必须合全民力量，一德同心，乃克有济。然空言无补，果欲达到救国目的，必迅将政权公诸人民，使人民直接间接参预政

① 第709—710页。

② 《在徐州的书面谈话》，第692页。

③ 《在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御侮自救大会的演说》，第699页。

④ 《致蒋介石电》，第708—709页。

⑤ 《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第718页。

⑥ 《在南京的谈话》，第674页。

治，走上全民政治之坦途”^①。所有这些，清楚表明了李烈钧主张“开放政权”含有顺应民心的极大成分。

第三，李烈钧主张“开放政权”是出于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这与前面两点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一、认为国民党政治腐败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李烈钧愤慨指出：“政治腐败，外患紧迫，全国人民莫由用其智能，以赴国难，此我国最大危机。盖病入膏肓，陷于九死一生者久矣”^②。又说：国民党政权自建立以来，“内乱外侮，均予人民以极惨之痛苦，而人民于应有权利，从未享受”^③。揭露不谓不深刻。二、不满于国民党政府无视全国舆论，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李烈钧毫不隐讳地指责说：“对于救国之法，则政府与人民所见未能尽同”^④，政府设施，实未能以慰民望”^⑤。三、基于此，李烈钧特别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国难当头继续剥夺人民权利，实行军事高压乃至屠杀的政策。在致蒋介石电中，他气愤地质问说：“本党马上定天下，必欲于马上治之，天下人岂能尽戮耶”^⑥？表示对军事独裁极端的不满。

因此，在李烈钧看来，国民党要团结全国人民担负起抗战的责任，摆在第一位的当是改革政治而不是军事。因为“筹维军事，仅以治标，革新政治，乃为根本”^⑦。“革新政治”，“开放政权”，对国民党来说实为“唯一大道，唯一生路”^⑧。

最后，李烈钧主张“开放政权”也还由于认为它为“共和政体”所必需，且明确载入国民党的政纲。李烈钧讥讽说：“我国

① 《在南京“拥护和平统一大会”的演说》，第674页。

② 《致国民党各中央委员函》，第682页。

③ 《致蒋委员长书》，第858页。

④ 《在徐州的书面谈话》，第692页。

⑤ 《致蒋委员长寒电》，第854页。

⑥ 第710页。

⑦ 《致上海商会等团体电》，第691页。

⑧ 《在徐州的书面谈话》，第693页。

名为共和政体，而事实上国民无政权可言。国难如彼，政体如此，未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消”^①。又说：“若仅尽义务而不使享权利，甚至一切设施皆与共和国精神相反，是以奴隶待人民也”^②。同时强调指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即把保障民权，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明文写于政纲之中。李烈钧并进而抬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称其以民族、民生、民权三者并言，目的即为“求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之平等”。所以李烈钧说：“自我国政体而言，自总理三民主义而言，开放政权实不容或缓也”^③。这里，李烈钧实际是在为他的“开放政权”寻找合法的依据，显然这个依据也确实存在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李烈钧是作为一项救国主张而提出“开放政权”的。或者说，李烈钧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为着吸引和动员全国民众“共赴国难”而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的。它集中表现了李烈钧炽热的救国愿望和决心。

其实，从历史上考察，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开放政权”并不偶然。早在辛亥革命、护国和护法运动中，李烈钧就以坚决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权”而著名。1927年9月以后，他虽然以支持蒋介石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但仍认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当属之四万万人民”，主张《国民政府组织法》应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④。并第一个提出了在国民党内反对“党阀”的斗争，说“党里头既有了党阀，党阀就可以操纵全党，党的势力就成了党阀的势力，各处的地方就成了个人的地盘”，是极“危险”的事^⑤。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他失

①③ 《在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御侮自救大会的演说》，第698页。

② 《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提案》，第688页。

④ 《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的报告》，第657页。

⑤ 《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的报告》，第627页。

势被排挤出国民党“中枢”。1931年5月，因胡汉民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引起宁粤矛盾公开激化，25日唐绍仪等自广州通电指斥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要求蒋“即行引退”，

“以党政军之权还之全国人民”^①。27日，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李烈钧虽没有到广州，但从列名唐绍仪等通电和被推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看，他是持支持态度的。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迫于舆论同意释放胡汉民，宁粤双方谋求召开“和平统一会议”，结束内部之争。本文开头说的李烈钧与徐谦等草拟的“提案大纲”，原本就是准备向“和平统一会议”提出的。可见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不仅有其思想基础，在行动上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还应该看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切实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呼声愈来愈高。1932年12月30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争取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宣布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②。在国民党内，也还有一些人坚决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速行宪政”，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如何香凝发表《时局意见》，指出要改变腐败的政治局面，必须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力，建议由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并无党无派者及各省市县士农工商妇女兵士组织一“人民监政委员会”，对政府及官吏严加监督^③；李根源、黄炎培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即日明令，允许人民自由组织政党，并切实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各自由，以便全民共同努力国事，用立实行宪政之基础”^④。就是胡汉民，也与陈济棠等连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国民

① 第664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③ 上海《申报》，1931年12月24日。

④ 上海《申报》，1932年3月30日。

党履行“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之政纲，国民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评之完全自由”^①。等等。所有这些，虽然其出发点不完全相同，在实际上却对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包围，引起和促进了内部的变化。从这方面说，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不特与这一潮流相适应，且以其坚决和持久推动了它的发展。

(三)

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开放政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按李烈钧本人说法，他主张“开放政权”的“要点”是要求国民党政府“以平等待同胞，以至公至诚治天下”^②，又说他所以坚持“开放政权”是因为“认结合全国人民智勇，为解救国难之根本问题”^③。并一直把“开放政权”与实行“全民政治”或“民主政治”相提并论。照此说来，其“开放政权”就应该包括所有党派、团体和全国民众在内。这才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开放政权”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恰恰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李烈钧远未能摆脱其阶级偏见，继续坚持反对共产党，把共产党排除于“开放政权”之外。

李烈钧公开宣称：“国民党外，并无他项政党”^④。一笔勾销了共产党的政党地位。甚而在“谈话”、“讲演”中，依然把共产党诬蔑为“匪”，声称于军事“围剿”，言论、出版之防止“赤化宣传”仍当“积极进行”^⑤。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

对于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李烈钧虽有所

① 《三民主义月刊》4卷4期。

② 《在南京的谈话》，第685页。

③ 《在南京的谈话》，第693页。

④ 《在上海的谈话》，第700页。

⑤ 同④。

指责，但在所谓“安内”即“围剿”共产党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主张“安内”、“攘外”应“兼筹并顾”。所以李烈钧在谈及“安内攘外”时，除了主张“积极抗日”，同样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至所使用的语言同蒋介石没有什么两样。

李烈钧反对共产党，丝毫无损于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但却由此为他的“开放政权”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说明“开放政权”是极为表面、极不彻底的。在日本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刻，依然坚持反对共产党，拒不承认共产党的地位，根本谈不上“结合全国人民智勇”，“解救国难”。

实际上，对于国民党来说，不是要不要向共产党“开放政权”，而是放弃敌对立场，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两党合作。这才是动员全国人民“挽救国难”的根本途径，也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唯一“坦途”。李烈钧一方面把“开放政权”称为“救国”的“坦途”，一方面则又坚持反对共产党，岂非南辕北辙？从这点上说，李烈钧的“开放政权”确带有滑稽的意味。由此亦可见其所说的“全民政治”或“民主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

关于这一点，从李烈钧要求蒋介石同意“开放政权”中也看得十分清楚。李烈钧多次表示：国难当头，国民党能否“开放政权”，关键取决于蒋介石的态度。这话本身没有错。因为蒋介石当时名义上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但实际大权独揽，在国民党内居于“主宰”地位，“开放政权”不经他的同意是不可能实行的。但进一步考察李烈钧的言论，就决非仅此原因了。

诚然，在李烈钧要求蒋介石同意“开放政权”中，“挽救国难”是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对国民党的现状表示极为不满。这在前面已有述及。但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内容，或者说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一、涨大“吸力”，“增加政府作用及力量”。

李烈钧说：“钧亦不过以事急情迫，欲于过渡期间，冀其足以增加政府作用及力量而已。困难加重，离心力亦益增，政府诚宜斯时涨大其吸力，所谓势顺宜求正助，势逆宜多得旁助也”^①。这虽然是针对他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一事而说的，但所谈论的正是为何“开放政权”，意思是很清楚的。类似的话李烈钧在致他人电中或公开场合似也不加掩饰。例如他在《致太原诸友电》中说：

“保障民权，发扬自治，作精神之鼓励，不特自固根本，亦收拾众望，奋起有为之善法”^②。将“开放政权”与“自固根本”、“收拾众望”联在一起。二、提高蒋介石在全国的“信仰”。李烈钧明白对蒋介石说：“今日救国事业成败，系公一身，公之威望殆普及全国，而信仰尚待普及全民。是则叠电所陈，或即能收兹宏效，又意中事也”^③。三、“开放政权”为“安内攘外”之

“根本”。李烈钧说：“斯时救济之法，仍以迅速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束缚，使在法律、政治上受平等待遇。斯实为集智聚能安内攘外之根本要着”^④。所谓“安内攘外”，如前所说，即是“抗日”与“剿共”。对此，李烈钧曾公开发表“谈话”说：“开放政权”，“必可于实际上增加抗日与剿共能力”^⑤。正由于此，尽管蒋介石反对“开放政权”，或仅口头表示而无实际行动，李烈钧则多次向报界发表“谈话”，说“蒋介石已亦深觉过去之错误”^⑥，“抗日决心益坚，对政治态度大改态”^⑦，甚而称蒋主张“彻底开放”^⑧。也正由于此，李烈钧“不惮劳瘁”，反复“进言”，急切而又近于哀求地对蒋介石

① 《致蒋委员长俭电》，第853页。

② 第862页。

③ 《致蒋委员长江电》，第853页。

④ 《致蒋介石函》，第710页。

⑤ 《在上海的谈话》，第701页。

⑥ 《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第696页。

⑦ 《在南京的谈话》，第693页。

⑧ 《在上海的书面谈话》，第695页。

说：“今日救国御侮，首在能善用愤慨之人心，与庞厚之民力，唯公能决之”^①。“实行民主政治，实立国必循坦途。公既能诚意领导，众望自集，何虑内忧不息，外侮难平”^②？所有这些，都清楚说明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开放政权”始终与维护 and 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此总起来看，李烈钧实际描绘了一幅理想式的图画。他主观上希图通过“开放政权”，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或者说在“全民政治”、“民主政治”名义下把共产党以外的政治力量聚在国民党的周围，实现抗日救国。但由于坚持反对共产党，注定了它是不现实的，最终也不可能达到“救国”的目的。

综上考察，可以清楚看到，有两个问题贯穿于李烈钧“开放政权”主张始终。一是“积极抗日”；一是坚持反共。这就在实际上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历史矛盾之中，从而使“开放政权”行动本身具有二重性。因此，对李烈钧主张和要求“开放政权”，应放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严重局限的一面，全盘肯定或简单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不过，李烈钧既然怀抱满腔“救国”热忱，主张积极抗日，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态度迟早是会改变的。事实上，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和中国共产党的再三呼吁，1937年2月他毅然在宋庆龄等“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提案”上签名，表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为“团结御侮”刻不容缓之根本国策^③，终于走上了真正救国的道路。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徐辉琪，194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① 《致蒋委员长江电》，第851页。

② 《致蒋委员长书》，第857页。

③ 第725—726页。

失败的外交记录

——抗战初期的日本外交综论

王建朗

在抗日战争的最初一年半中，拥有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占据了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军事胜利，这是不争之论。然而，在军事战线取得胜利的同时，日本的外交却是一部失败的记录。狂妄蛮横、目光短浅、行为混乱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特点。由此，日本外交开始走进一条死胡同。本文谨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粗略的分析。

“现地解决”

自从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以来，它就一直在积极进行策动华北独立的阴谋活动。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机。日本政府所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要求“现地解决”。7月8日，日本政府提出了“不扩大事态，通过现地交涉迅速解决”的应对方针^①。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地注重于这一对策的前半句，并将之概括为“不扩大方针”，在扩大和不扩大之间作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但对这一对策的后半句，即“现地交涉”方针所隐含的内容却未予深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值得剖析的问题。

所谓现地解决，就是要在谈判中撇开中国中央政府，而由华北

^①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20卷，第64页，东京1973年版。

地方当局与日本驻军商讨决定事件的解决办法。日本此举目的有二：一是以此突出华北的特殊性，削弱中央政府对华北的控制；二是便于他们从对华北地方当局的讹诈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日军驻兵华北，直接构成威胁，且华北当局一些负责人的态度当时明显较中央政府软弱，日本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所难以给予的东西。7月11日，日本外务省训令其驻华使馆：“日本政府准备迅速在现地解决卢沟桥事件，所以希望南京政府不要妨害对于时局的紧急处理。”^①当日，日本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了日本政府的这一要求。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现地解决”的伎俩颇为担心，它坚持声称事件的最后解决权在于中央。中国外交部在当晚的答复中指出：“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须经中央承认后才能生效。”^②另一方面，南京政府连续致电华北当局负责人，要他们作好“积极作战之充分准备”，并再三指示他们在谈判中应持的立场。7月10日，蒋介石致电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嘱其“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③7月12日，蒋介石在致宋哲元电中详述了中央政府的看法。他认为此次卢沟桥事变难以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事，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蒋介石表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叮嘱宋哲元说，“此次胜利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与敌方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

①②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第20卷，第126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1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矣。”^①7月16日，蒋介石在致华北诸要员的电中进一步表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他承担，该电称：“今事决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愿独负其责也。”^②

卢沟桥事变后，由军委会参谋总长、军政部部长、训练总监等人组成的中国统帅部会议，自7月11日起每天就事态的发展进行会商，决定中方的应对策略。在7月14日的会议上，训练总监唐生智指出，宋哲元现在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之外从事妥协活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他建议“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③看来，南京政府是采纳了唐生智的这一策略。

7月19日，中国政府公开发表了蒋介石于17日所作的“庐山谈话”。讲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卢事解决的最低立场，指出任何解决方案不得违背以下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④庐山谈话为华北的谈判立场定下了一个大体的框架。

中国政府还企图诉诸于国际社会的压力。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政府送交了有关中日冲突的备忘录，批驳了日本“现地解决”的主张。该备忘录明确指出：“中国方面现仍准备谈判任何种荣誉之协定，惟中国国民政府对于谈判解决之基本条件，不得不加以密切控制，盖恐吓地方当局，促成华北分

①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60页。台北1984年版。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第二卷，第53页。台北1981年版。

③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第215页。

④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2—585页。

裂，原本为日本军人惯用策略，而为世人所熟知也”。^①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甚为恼火。7月17日晚，日高向中国外交部递交照会，指责“中国政府不但仍继续挑战的态度，并以各种手段与方法妨碍冀察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对于华北安定不断加以威胁”，“要求即时停止一切挑战的言动，并要求不妨碍地方当局实行解决条件”。但中国政府仍然努力争取在中央级外交机关进行交涉。中国外交部在致日本的答复照会中再次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出之武装队伍撤回原地。”照会表示，“至事件解决之道，我国政府愿经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地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② 中国政府并请英国政府帮助转达中方的撤兵建议。

日本断然拒绝与中国外交部交涉。7月18日，日本外务次官堀内谦介对转达中国政府意见的英国驻日代办道滋（J. Dodds）声称，卢沟桥事件是日本与华北地方当局之间的事情，日本目前正致力于地方解决，它不接受南京政府的这一提议^③。7月20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辩称“冀察政务委员会乃有别于其它地方政权的大规模特殊政治形态”，南京政府“主张我方和冀察政权对话，必须经其承认，完全是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新的障碍。目前事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一面阻碍现地协定，一面不断调中央军北上。”^④

在华北，日本威胁讹诈地方当局的活动正在加紧进行。日本

①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6辑，《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54页，台北1986年版。

② 台湾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第四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03页，台北1964年版。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7年，第3卷，第231页，华盛顿1954年版。（以下简称FRUS，后列数字分别表示年、卷、页数）。

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5—18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不满足于7月11日华北当局所作的让步。。在那次协议中,华北方面接受了日方关于惩办事件责任者并向日本道歉,撤退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取缔排日活动等要求。日本逼迫华北当局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如罢免所谓排日要员、撤出在冀察的中央系统各机关等。19日,第29军代表与日本驻屯军代表签订了包含上述内容的“细目协定”。

南京政府不安地注视着日本与华北地方当局之间的谈判。它坚决反对“现地解决”的阴谋,坚持中央政府的核准权。中国外交部在19日给日方的照会中再次强调,“任何现地协定,须经中央政府承认”。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为解决纠纷愿按国际公法,或有关条约的一切解决办法,接受调停或仲裁”。^①

同时,南京政府也准备作出一些让步以求得事件的妥协解决。23日,南京政府的中枢要员讨论了宋哲元报送来的7月11日的现地协定。尽管会议对华北地方当局让步过多有所不满,但为了消除日本人所谓“中央妨碍地方解决”的借口,以示中央和地方的一致,也为了避免谈判破裂,中央政府电复宋哲元,表示“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同时希望宋哲元向日方声明:一、第三十八师撤离宛平县应为临时性的;二、对于共产党的镇压及其它排日团体的取缔应由中国自行决定”^②。

这里,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已从“庐山谈话”四条件的最低立场上后退,因为7月11日协议的一些内容是与四条件相违的,承认这一协议表现了南京政府尚愿妥协的意向。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所一直坚持拥有的中央决定权实际上是以现地解决的方案为基础的。如果日本的欲求不太过份的话,卢沟桥事件是有可能以中国方面的部分退让而告解决的。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5页。

② 《作战经过》,第2卷,第61—62页。

然而，日本方面无节制的扩张欲望最终粉碎了“现地解决”的希望。在日本内部，尤其是军方，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外交解决的势力。他们认为，“多年悬案的中国问题，如今才是解决的绝好机会。所以，没有必要进行当地谈判，如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①他们主张以武力解决卢事，一举夺得华北的控制权，而不以外务省所标榜的“现地解决”为满足。日本对华外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军方擅权已成通例，他们在对华外交中拥有巨大的发言权，卢沟桥事件也不例外。

日本陆续向华北大举增兵，它所表现出来的意欲借此控制华北的意图使宋哲元等人产生了疑虑。南京政府向华北派出的特使、军委会参谋次长熊斌亦于23日晚由保定抵达北平，向宋说明了此次中央政府的抵抗决心，指出日军必将发动大规模进攻，希望宋提高警惕。宋哲元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下令停止原已与日方议定的第37师的撤退，并令第132师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随着廊坊事件的发生，宋哲元更加明白了局部妥协的无望。26日，宋哲元对前去华北的外交部特派员孙丹林表示：“战事恐不能免，外交大计仍应由中央主持”，^②表明了华北当局再无与日本妥协的幻想。

“广安门事件”后，冲突空前升级，日军悍然在华北发起全面进攻，占领北平、天津，由此，卢沟桥事件发展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所谓“现地解决”就此夭折。它宣告日本以武力威胁华北当局、在排除中国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分裂华北的图谋彻底破产。问题的解决不再局限于华北，而取决于中日两国举国兵戎相见的结果。

① 今井武夫著、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02页。

“直接交涉”

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之后，日本政府企图竭力缩小中日战争的国际影响，它把这场战争解释为只关系到中日两国的事，坚决排斥第三国的参与，而鼓吹中日间的直接交涉。这一伎俩与它此前所鼓吹的“现地解决”同出一辙，手段依旧，只不过是应用范围扩大了一些而已，其目的在于阻止国际社会的干预而任由它以在中国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来勒索中国政府。

与此针锋相对，中国政府则竭力强调中日战争对远东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影响，希望把列强引进中日问题的交涉中，借列强之力压迫日本，以获得一种条件不致过分苛刻的结局。中国方面认为，“目前的中日纠纷，如得各国参加，来谋解决，即令我国不能无所牵就，仍是于我有利。反之，如坠日本计中，实行两国直接交涉，虽然成功，亦是失败。”^① 中国政府对在没有列强保证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能否尊重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所达成的协议极为怀疑，认为“日本背义无信，目无公理，如由两国直接交涉，毫无其它保证，无论条件如何，其结果必使中国国家生命陷于随时随地可被消灭之危险，永无独立自由之机会。”^②

促成事件的“国际化”，即让中日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使国际社会来参与中日冲突的解决，是中国政府的既定策略。它早在7月16日就向九国公约签字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指出日本的行为“实属破坏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后果。”^③ 7月下旬，蒋介石频繁召见列强驻华使节，先后呼吁英、美、法、德、苏等国政府从中斡旋。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84页。

② 同上书，第38卷，第10页。

③ 《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第254页。

日本政府拒绝其它国家的调停。英、美经过多次协商后，于8月上旬由英国驻日代办道滋和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GreW）分别向日方表示了愿在中、日之间斡旋的愿望，但为日方所婉拒。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声称，日本正与中国方面进行有关接触，如果英、美想要做些什么的话，那就劝告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迅速作出反应。^①

确实，这时日本方面也在考虑停战议和问题。7月31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面奏天皇，认为现在“以外交手段结束战争为最善之策”。^②天皇对此表示同意。日本谋求乘此平津在手的有利时机压迫中国政府，达成对其有利的解决方案。在此紧要关头，它岂能容得英美介入。8月上旬，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日华国交全盘调整案要纲》，日总理、外相、陆相、海相等内阁核心要员议定了《日华停战条件》，日本所提出的条件主要有：中国承认“满洲国”；中日议定共同防共协定；减轻特定关税；增进中日经济联络等。曾任日本外交官的船津辰一郎接受了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接洽的使命。只是由于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的发生，这一活动才告中断。

中国努力求助于有关国际条约组织，意图使中日战争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在国际讲坛上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唤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国际联盟是中国所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中国是国联创始会员国之一。《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影响联盟任何一会员国与否，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须采取适当有效之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③据此，中国政府于9月12日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国联向日本发出与会邀请。日本拒绝了邀请，声称只有中日

① FRUS, Japan, 1931—1941, I, 340.

② 《日本外交史》，第20卷，第103页。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270页，1961年版。

直接交涉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日本对国联大会采取藐视态度，公然于国联开会期间对中国非军事目标的南京和广州这样的平民集中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连续轰炸。日本的这一野蛮行为，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英、美、法、苏以及德、意政府都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国联大会亦通过了谴责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的决议，称这一行动“已在全世界激起了极端的厌恶与愤慨”。^①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有关中日战争的决议。决议由两个报告书组成。第一报告书指责日本违反条约义务。该报告书在结论部分指出，“对日本以陆海空军对中国实行军事行动一节，不得不认为与引起冲突之事件殊不相称，……上述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职权认为有理由，且系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大会通过的第二报告书驳斥了日本所声称的中日争端只能由两国自行解决，第三国不得介入的说法，认为“目前中国之局势不只关系冲突之两国，且对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许多国家和人民皆已直接蒙受其影响，……故国联有依照盟约及条约下之义务，以谋迅速恢复远东和平之职责与权利”，“现在之冲突，牵涉日本之违反条约义务，非仅由中日两国政府采用直接方法所可解决之问题”。

国联决议对中国的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支持。决议声明：“大会表示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并建议国联会员国应避免采取一切其结果足以减少中国抵抗之能力、致增加中国在现时冲突中之困难之行动”。决议建议国联会员国“应考虑各该国能单独协助中国至何种程度。”^②

由于在远东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并非国联成员，国联大会后不久，又召开了以维持远东现存秩序为宗旨的九国公约各签字国会议。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开幕。日本身为签字国

① 顾维钧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50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59—362页。

仍然拒绝参加此次会议。日本在致各国政府的照会中辩称：“此次会议显系出于根据国联决议而召集者，而国联既下有关日本帝国名誉之断案，且对帝国复采非友谊的决议，不得不使帝国认为此次会议难期由关系国举行充分而无隔阂之交涉，以使中日事变导于根据事实之公正妥当的解决”，“再则，此次中日事变为基于东亚之特殊事态，且与中日两国有生死攸关之重大关系，若由对于东亚利害关系不同，甚至毫无利害关系之各国开会解决，其必反使事态益趋纠纷，而有碍正常之收拾”^①。

为了对抗和破坏九国公约会议，日本在10月下旬开始促请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以期排斥其他国家的干预。对此，中国政府有所觉察，并未作出积极反应。蒋介石在11月5日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 Trautmann）的谈话中，对德国调停表现出一种并不热心的态度。他的谈话主要表示了中国方面的三点意见：一、如果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二、日本人现在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它不对中国作友好的姿态，却提出非份要求，假如日本继续作战，中国不会放下武器；三、中国现在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注的对象，各国“有意要在九国公约会议的基础上觅取和平”。^②11月7日，蒋介石在答记者问时，否认当时流传的有在九国公约会议外进行调停的说法，他声明：“中国立场始终为尊重九国公约及国际一切条约。中国除竭诚与合法集团努力合作以外，决无单独行动之理。中国最重信义，断不自行违反一贯之立场。”^③

为了尽量争取日本来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再次向日本发出邀请，声称会议拟组成一个人数有限的委员会，仅由与远东有

①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83页。

②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8—1945》（《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第4辑，第1卷，第780—781页。

③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01页。

关的少数国家参加讨论。但日本还是在11月12日拒绝了这一邀请。日本复函声称：“日本既迫不得已而采取目前之自卫行动，则此项行动自不在九国公约范围之内”，“日本政府深信以集体机构，如比京会议所为之干涉，徒刺激两国之民情，而使各方引为圆满之解决更不易得。”^①

针对日本的观点，11月15日，九国公约会议通过了一个批驳性的宣言。宣言不承认日本所鼓吹的中日战事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的观点，指出“现在聚集在布鲁塞尔的各国代表认为，这场冲突实际上涉及1922年华盛顿九国公约和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全体签字国，实际上也涉及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使国际交通中断，国际贸易受阻，给各国人民带来一种恐怖感和愤慨，使整个世界感到不安和忧虑。”针对日本要用武力“使中国放弃现行政策”的企图，宣言指出：“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国家动用武装力量去干涉他国内政的法律依据。”

宣言对日本主张的日中两国单独交涉解决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认为“如果听任他们自己解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日中两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达成给该两国间的和平、其它国家的权益保障以及远东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带来希望的协议”，“恰恰相反，倘有一切理由相信，如果这个问题完全留待中日单独解决，则武装冲突——随之而来的生命财产的毁灭、混乱不安、动荡不定、苦难、不和、仇恨和整个世界的不安宁——将永无止境。”宣言最后宣称，对于日本“固执与所有其它签字国相反的见解”，“各国代表不得不考虑其共同态度”。^②

当然，正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国联和布鲁塞尔会议无论是在制裁日本或是在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方面均未取得实际成果，这是事实。但这两次会议的积极意义也绝不可忽视，它使世界更

①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87页。

② FRUS, Japan, 1931—1941, I, 410—412.

清楚地了解了中日冲突的真相,使世界舆论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不难看出,这两次会议的决议或宣言都是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的,这打破了国际间从前对中日冲突“绝对中立”的状态,中国在国际讲坛上赢得了正义的一票。会议使中日问题的解决“国际化”,挫败了日本企图“直接交涉”的图谋,使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注目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道义上的援助必将为以后的物资援助打下基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曾这样分析说:

“舆论上之同情在国际战争上,往往发生不可思议之助力”,

“国际联盟会员60余国,其心理上之同情与精神上之援助,其力量亦正不可忽视”。^①

倒蒋扶汪

布鲁塞尔会议之后,陶德曼再次在中日间牵线搭桥,但由于日本政府提出了过于苛刻的要求,“陶德曼调停”未有任何结果。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1月18日,日本政府再发表“补充声明”,表示“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意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②日本政府的声明关死了与中国现政府进行对话的大门。

对于这种强硬的没有回旋余地的对华政策,在日本政界和军界内部,亦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种顽固坚持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树立傀儡政权的想法是要使日本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的下策,因而要求修改这一政策。近卫本人后来曾回忆说:“识者对此声明之批评,谓为非常失败,余个人亦认为系最

^①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48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387页,东京1955年版。

大之失败。”^①但强硬派仍然坚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5月9日，广田外相在会见外国记者时重申，日本政府绝不与国民政府打交道，即使它现在愿意接受日方在1月份所坚持的条件。^②

5月下旬，随着日本内阁的改组，日本政府的立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这次改组中，一向主张对华强硬的陆相杉山元和外相广田弘毅都离开了内阁，被一般人视为温和派和亲英派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宇垣是反对近卫声明的。他在出任外相前提出了四个条件：1. 强化内阁，以求统一；2. 外交一元化；3. 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和平交涉；4. 必要时取消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③。宇垣企图把被军方分割了的外交权真正收归外务省，强化外务省的权力，推行他所希望的外交方针。在近卫认可这四条件之后，宇垣才同意就职。6月17日，宇垣在会见外国记者时发表谈话，暗示中日将有议和可能。

随着宇垣的登台，中日之间通过官方的及民间的多种渠道展开了秘密接触，然而，当这些接触即将进入实质性的交涉阶段时，所有的谈判都面临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日本此时并未彻底放弃“不以国民政府对手”的方针，它仍以国民政府的改组亦即主要是蒋介石的下台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而这是蒋介石政权所万难接受的。谈判能否继续下去，关键在于日本是否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松动。

在日本决策集团内部，围绕着这一问题出现了政策争论，强硬派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一项不可更改的条件，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不可能与中国现政权达成任何协议。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暂且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 《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国，1911—1941》（《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缩微胶卷，第2卷，第0895号。

③ 《日本外交史》，第20卷，第211页。

避开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棘手问题，他们认为“久战生乱，是古今的铁则”，日本应在国力竭尽之前解决中日问题。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在8月18日的一份计划中指出，日本应该把握战争的真正目的，没有必要拘泥于蒋介石下野这样的具体问题从而使自己蒙受不利。从对苏战略考虑，他们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日本就需要准备至少再打十年。这与经营“满洲国”比较起来，每年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在此期间，将至少会发生日苏之战。这样，中国的反日分子就会奋起行动。而且，“第三国正坐待我之消耗，难道我们竟能甘中其计吗？”他们认为这是日本的“自取死亡之兆”。他们要求日本从兴百万之师，而结果只在于惩罚蒋介石一人的迷误中走出来，“暂时主动地对蒋介石的下野持以宽容态度”，以求一举解决中国事变^①。宇垣外相也主张变通处理这一问题，他准备安排一次他与孔祥熙等人的直接会晤。

然而，强硬派的势力远比宇垣等人强大得多。当时，日本军队正积极准备进攻武汉，日本上层的许多人寄希望于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在内阁中支持宇垣意见的只是少数。随着9月29日宇垣的辞职，计划中的宇垣、孔祥熙会谈告吹，日本对华政策再次倾斜到强硬的倒蒋政策上来。

在坚持倒蒋的同时，日本开始谋求建立取代中国现政府的傀儡政权。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如在汉口陷落之后，蒋介石政府仍没有分裂或改组时，则以现有的华北和华中的傀儡政权组成新中央政府。如蒋政府分裂或改组而出现亲日政权时，则将其作为中央政府的组成部分，进而成立中央政府^②。随着汪精卫卖国集团的出现，日本逐渐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汪精卫等人身上，企图把他们从国民政府中分裂出来，以汪代蒋，组成一个由日本人所控制的新的中国中央政府。

① 堀场一雄著、王培南等译：《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170—17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同上书，第155—156页。

10下旬，日军先后攻占了广州和武汉地区，日本决策层中弥漫着一股狂热而过于乐观的情绪，准备在中国扶植起一个新的傀儡政权。日军方对局势作为极为乐观的判断，认为“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蒋介石政权已沦为地方政权”，“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战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今后的重要任务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①。日本政府11月3日新发表的声明也反映了这种情绪。该声明声称，“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已退为地方政权。”这一声明公开修正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提出“即便是国民政府，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门外。”^②

这一声明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有所指，这时，日汪之间的暗中谈判正进入最后关头。11月20日，日汪达成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日华协议》，其主要内容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承认日军在中国平津地区的防共驻军，并将内蒙地区划为防共特殊区域；承认“满洲国”；密切中日经济合作，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给予日本特殊的方便；赔偿日本在华侨民因事变造成的损失。双方还达成了作为努力目标的“秘密协议”，其核心是中日结成军事攻守同盟，日本在中国的内蒙及其它必要地区驻扎军队，在战时实行共同作战^③。日本从汪精卫那儿得到了目前蒋介石政府所不愿给予的东西。日本决心以汪取蒋而代之。

然而，日本错误地高估了汪精卫集团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第573页，东京1967年版。

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401页。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5—87页。

他们曾相信，在汪精卫发表亲日声明后，云南、四川、广东等省的地方军队将会陆续响应和支持汪精卫的行动。事实证明，日本在对汪精卫的估计上犯了巨大的错误。在汪精卫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之后，其所获响应甚微，不仅日本方面原先估计将参加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许多重庆政府的军政要员未有任何起事迹象，就连原先汪派中的许多要人也未响应汪的声明，追随汪精卫者，实寥寥无几。近卫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此为余等观察之错误”^①。

可以说，汪精卫的出场亮相是完全失败的一幕。它不仅未能解脱日本对华外交的困境，而且将其导入更加迷茫的歧途。因为汪精卫集团既无实力，又无人望，它无助于日本收拾侵略战争的残局。相反，日本对汪精卫集团的扶植倒妨碍了它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秘密接触。汪精卫出逃后，蒋介石要其外籍顾问端纳（W·H·Donald）转告英美方面，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不想与日本谈和，并且还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②。

坚持倒蒋和推汪出台反映了日本对华外交的浅薄和混乱。事无巨细地潜心研究中国几十年的日本在这里忽略了两个关键点，表现出它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无知：一、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及蒋之个性。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国民政府带有浓厚的蒋介石的个人印记，它不可能象日本的内阁更替那样，撇开蒋介石实现政权更迭。向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下台，即向蒋本人要求其下台，蒋介石绝无接受之可能。二、抗战初期中国政局结构的变化及民族意识的高涨。确实，在国民政府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派别，有的甚至曾经刀戈相向。但是，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在蒋介石终于举起抗日大旗的时刻，中国各路军民同仇敌忾空前团结，蒋介石的地位也空前巩固，其个人声誉达到生平之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95页。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500页，台北1973年版。

顶峰。在这种时候，指望各地方实力派蜂起反蒋，实在是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民族意识。除了极少数人如汪精卫之流外，有多少人能不顾民族大义，甘愿被世人骂为“汉奸”呢？

在日本内部，并不是没有人看到倒蒋扶汪的缺陷。如代表宇垣与中方秘密接触的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就认识到，坚持以蒋介石下台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是对中国现实缺乏了解的想法。他对宇垣说，如果不和蒋介石交涉而想解决中国问题，实在是太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了^①。但是，这种声音在日本政府中是微弱的。又由于日本对华外交政出多门，外交当局并不真正拥有对华外交的决策权，日本军方势力实际上操纵着对华外交，这就不能不使日本对华外交陷入无理智的混乱之中。

“东亚新秩序”

在国际外交上，为了造成有利于其侵略中国的态势，日本推行了一条联合德、意以对抗英、美、苏的路线，企图通过强化法西斯轴心来牵制对中国抗战持同情态度的英美苏等国。日本的决策者希望以此阻止苏联卷入中日战争，“挫败其侵略东亚的企图”，“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使美国至少保持中立态度”，以便于日本全力以赴对付中国的抗战^②。

7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讨论日、德、意的结盟问题。会议认为“帝国须迅速同德、意缔结协定，须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的结盟关系，加强各协定国对苏的威力与对英的牵制，这些步骤将有利于我对当前支那事变的迅速解决”。会议决定与德意签订一项秘密协定，“对德国方面，要其扩大防共协定的精神，从而将其引向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对意大利方面，则主要利用其牵制英

① 《日本外交史》，第20卷，第218—219页。

② 僧夫清三郎主编，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3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国。”^①

根据会议的决定，日德之间展开了关于缔结秘密协定的谈判。就眼前而言，联德政策似乎有利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德国是英美等国的头号潜在敌对国，强化日德关系，无疑使自己更加站到了后者的对立面，这就使英美等国对日本更加警惕，也将使日本与它们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全球性的战略对抗意义。

在中国战场上，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它与英美法的矛盾正逐步加深。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本固执地把英美视为中国抗日的后盾，认为“由于英国怂恿，中国才对日本采取挑衅态度，因此才发生目前的中日冲突。”^②日本把中国的继续抵抗，归因于外国的援助和鼓励，因而它要采取对抗措施。近卫在1938年7月6日对记者声称，是外国的援助在延长中国现政权的寿命，延长中日战争。他认为，外国应对战争的延长负责。近卫并扬言，“日本将采取经济的和外交的措施来劝使列强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③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从政治、经济上牢牢地控制中国，使中国在各方面都成为日本的附庸。但英美等列强早已捷足先登，在中国占有了最大权益。因此，日本所要得到的东西，就不仅要从中国人民手里去夺取，还要从其它外国人手里再作一次夺取。

凭借着它在中国的军事胜利，日本对英美在华权益大肆侵夺。它不容许列强在中国与其平等竞争。它在受其控制的沦陷区内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性措施，全面打击在华外商，大举排挤英美在华势力。如日军以有碍军事行动为借口，限制长江中下游的

① 角田顺编：《现代史资料》，第10卷，第172页，东京1964年版。

② 约瑟夫·C·格鲁著、蒋相泽译：《使日十年》，第23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③ 《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第3卷，第0001号。

航行，禁止外国商船行驶。但同时日本商轮却可以自由来往，它们只运载日本货物，拒载其它外货。日本还先后成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等垄断公司，垄断华北中沦陷区的煤、铁、盐、航运、水产等事业。日本甚至还以运送军需品为名，将大量货物不纳关税而直接投入中国市场，从而使其它外商处于无法竞争的地位。

中国海关过去一直处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控制之下。列强通过控制海关不仅获得经济利益，还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日本不断以军事占领相威胁，逼迫英国在谈判中屈服，同意将天津、上海等沦陷区的海关税款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但日本把这一巨款掠夺到手后，却拒不履行它当初同意拨付该税款所担保的中国应付外债款额的允诺。

日本对在华外国人的身及财产侵犯事件也层出不穷。为了便于其采取行动，6月下旬，日本宣布不承认外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要求他们在日本占领区内应服从日本法律，必要时须和中国人一样接受检查^①。于是，日本与英美法等国之间的摩擦显著增加。1938年夏季的交涉案件达430件之多，其中，有关英国的案件169件，有关美国的案件130件^②。

1938年10月，日军在取得占领华南和华中重镇广州与武汉的重大军事胜利之后，自以为已基本具备控制中国的能力，因而对其外交方针也相应作出突破性的调整，公开对“门户开放”原则提出挑战。从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尽管在实际行动上早已否定了“门户开放”，但为了减少阻力，它在口头上一直表示尊重“门户开放”的原则。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在德国取得慕尼黑外交成功的刺激下，日本在11月3日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也试图以软硬兼施的手法

① 《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第3卷，第0906号。

②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207页。

迫使西方国家在远东作出类似的重大让步。近卫在声明中意味深长地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远东的新形势，”并表示日本要“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次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则进一步公开声称，日本认为九国公约已经过时，尽管“有关废除的决定尚未作出”^①。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变化，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一点也不想加以掩饰。他称他的前任们面对变化着的新形势仍一再保证要维护门户开放的原则，只不过是徒劳地想调和原则与现实而已。他说他不想那么做，因为他知道，要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直话直说”^②。有田的所谓“直话直说”就是要公开宣称，日本必须控制和支配中国的某些领域，其它外国人不得分享。

12月8日，有田八郎对英美驻日大使明确表示，他认为新的事态“事实上已使把东亚变成各国半殖民地的九国公约等旧国际体制解体”^③。12月19日，有田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日本天然资源缺乏，又没有大的国内市场”，只有建立“东亚新秩序”，实现“日满华合作”，才能满足日本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有田宣布，“东亚以外的国家的经济活动，必须服从因‘新秩序’所属各国的国防和经济安全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定的限制，并不得享有任何政治特权。”^④

如果说日本外相的谈话还带有某些外交辞令的话，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则坦率得令人吃惊。白鸟在东京接受一德国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声称：“刻下日本之根本任务为建设新中国，所谓新中国者，实质上亦即第二满州国。中国境内将成立若干以联邦制为基础之各别独立政权，对日本之政治军事关系采同

①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401页。

② 《使日十年》，第273页。

③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210页。

④ 《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第3卷，第0084号。

盟形式，新中国与日本并将缔订关税同盟。”白鸟还宣称：“英国在远东之统治地位，此后已不复存在”^①。

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宣布使早感不安的列强更加警觉起来，促使它们进一步看清了日本要独占中国的意图。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认为，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宣布“将消除对日本人真实意图的所有疑问”，“毁灭指望通过与日本‘合作’来保留我们在华权益的任何希望”^②。就连一向对日本存较多幻想的克莱琪的观点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他在11月10日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表示他对日本的野心已不再怀疑，他认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在华的外国商业^③。

“东亚新秩序”的出笼从反面有力地推动了英美长期以来迟疑不决的援华行动。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亨培克力主对华援助，他认为日本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除非日本的进军被中国人或其它一些国家所制止，否则，美国与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面对面互相对抗的时刻就会到来。”他要求美国政府果断地采取措施，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提供援助^④。英国外交部也认为，日本的新政策“只是意味着对其它列强的排斥或在日本自己所定条件基础上的接纳，这种政策的含意参见‘满洲国’的例子便可一目了然”。克莱琪主张与美国共同进行反击。12月5日，他敦促英外交部尽早与美国采取平行行动，以迫使日本不得实施它的新的对华政策^⑤。

英美政府终于决定采取援华行动，先后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

①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594页。

②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3辑，第8卷（以下简为DBFP, 3/8），第251—252页，伦敦1984年版。

③ 同上书，第215页。

④ FRUS, 1938, II, 572—573.

⑤ DBFP, 3/8, 229, 362—363.

万美元的桐油贷款、50万英镑的滇缅路物资贷款和500万英镑的平衡基金贷款。这些贷款数额虽然有限，但作为战时英美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它标志着英美援华的开始，对于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重大的鼓舞作用。

在采取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的同时，英美法还在外交上对“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进行反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12月30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有田八郎递交了一份美国政府的语气强硬的照会，指出机会均等等原则是过去列强共同承认的，不容由一方的片面行动加以取消。照会批驳了日本所谓“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说法，指出形势的改变“是由于日本的行动所致”，

“美国政策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范围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并自命为那里的掌权者和司命者。”^①1939年1月14日，英国政府正式照会日本政府，指责所谓“东亚新秩序”有违九国公约，“日本政府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由日本、中国和满洲所组成的三国联合体或三国集团，日本在其中将拥有绝对的权威，中国和满洲则处于从属地位”。照会强调指出，英国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以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变动，表示“英国将坚守九国公约的原则，它不同意对该条约内容的任何单方面的修改。”^②1月19日，法国政府也向日本递交了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照会。

“东亚新秩序”的宣布实是日本政府的愚蠢之举。英美政府原本顾及其在华利益的保存，力求与日妥协。日本处于可利用这一自保心理的有利地位。但“东亚新秩序”的宣布公开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彻底断绝了英美保存在华权益的希望，促使它们选择对抗求存的战略，日本因此而公开走上了与英美相对抗的道路。以后，美国对日态度逐步强硬，陆续宣布中止美日商约、增加对

① FRUS, Japan, 1931—1941, I, 823—825.

② DBFP, 3/8, 403—404.

日禁运品种和增加对华援助，正是日本为渊驱鱼的结果。

作为侵略国的外交，它的使命应是尽力使战事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结束，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尽可能少树敌国。从“现地解决”、“直接交涉”的失败，扶植汪精卫集团，到联合德意、宣布“东亚新秩序”而与英美为敌，人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日本在一些重大的外交问题上，有时朝着这一方向作了一些不成功的努力，有时则完全背离了这一方向。因此，完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是失败的外交。在中国，它未达到利用其军事胜利获益的目的；在国际舞台上，它给自己四面树敌，给中国增加朋友。这样，到1938年年底时，日本的外交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一条毫无希望的漫长道路，这条道路将通向孤注一掷自寻毁灭的太平洋战争。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王建朗，1956年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

略论日伪新民会

曾业英

新民会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仿照伪满洲国协和会，组织和控制的一个所谓民众团体^①。它号称“中华民国新民会”，实际活动范围仅限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它成立于1937年12月24日，解散于1945年8月24日^②，前后经过近8年。依纲领的变化，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成立到1940年3月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开张为第一阶段，从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开张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宣布解散为第三阶段。本文拟以此为线索，对其历史作一初步考察。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使此次未曾有之大事变之目的及效果成为悠久绝对的”，换句话说，为使它此后能永远占领和统治中国，一面物色汉奸走狗组织伪政权，一面指派伪满洲国外交大臣、协和会重要头目张燕卿为筹备委员长，负责筹组中华民国新民会，以谋“以日本为东亚中心势力”的东亚诸民

①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供认说：“本军自事变以来，……举凡进攻作战，或肃清讨伐，无不先编设宣抚班，其次指导结成新民会。”（《凡和亲乃事业之最大要素》，《新民会报》第72号，1940年8月20日）

② 《新民会解散》，北平《实报》1945年8月24日。

族的所谓“大同团结”^①。12月14日，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粉墨登场。紧接着，张燕卿也完成新民会的筹备工作，于24日在北平宣告成立。当天，新民会发表《宣言》和《纲领》，宣布“与新政权表里一体。首先拥护新政权为反共战线之斗士，进而培养民力，实现友邻之共荣，而终极之目标为贡献于人类之幸福与世界之和平”^②。其纲领是：

(1) 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2) 开发地产，以安民生；(3) 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4) 于剿共灭党旗帜之下，参加反共战线；(5) 促进友邻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之和平。公开亮明它是一个“护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政权，参加反共战线，促进与企图灭亡中国的所谓“友邻”日本缔盟的汉奸傀儡组织。因为国民党这时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所以它“剿共灭党”并提，既反共，也打倒国民党。这是初期新民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新民会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何谓新民主主义呢？它解释说：“新民主主义者，以实行王道为志者也。”又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亲乡、治国、平天下九项，为新民主主义实现王道之程序也。”^③关于“王道”，它说：“别于霸道而言也”，其基本原则，第一是全体性，或者说全体主义，普天之下，一视同仁，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第二是协和性，或者说协和主义，亲仁善邻，敬老慈幼，人不相贼，家不相乱，国不相攻，万邦协和^④。关于“格物”等实现王道的程序，它说：格物，就是“去物欲之私”。致知，就是“达良知之域”。诚意，就是“立志身体力行无自欺”。正心，就是“择善而固执之”。

① 《本会成立之动机》，《新民会报》第二号，1938年4月15日。

② 《新民会报》第一号，1938年4月1日。

③ 熊势岩吉著，金连挥译：《何为新民主主义》，《新民周刊》第四期，1938年5月2日。

④ 熊锦庭：《王道政治之意义》，《新民》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2月15日。

修身，就是修养人格，为社会平和，遵守不相侵越之范围，以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之横暴，劳动主义之抗争”，消灭于“无形”。齐家，就是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分，各相亲爱”。亲乡，就是“亲亲之道，推行于乡”。治国，就是“齐之以礼，道之以德，生之以产”，或者说实行礼治主义、德治主义、生产主义。而礼治主义就是人人守其分，复其礼，得其和，进而获得国家和平。德治主义就是孝父母，敬长老，养孤救贫。生产主义就是除去生产上之不均，实现“工业之农村化及机械文明之农村分散”，并反对无条件分配土地，“而趋重于开发地利，企图生产之增加，依生产方法之改良，及副业之奖励”。平天下，就是“世界和平”，其道在于“文化相同者之同盟联络，如日本中国满洲可为一联合体，复由日华满之联盟，进而为大亚细亚之联盟，此后以亚细亚为中心，协和万邦，成为王道之天下。”^①而前面所说的“全体主义”，又是什么货色呢？该会首都指导部撰文指出：“德、意诸国的觉悟，反民主反共产思想的膨胀，于是形成法西斯蒂派的思想，也就是全体主义。”^②原来，全体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由此可见，新民会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混合物。它鼓吹新民主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人民“去物欲”、“达良知”、安分守己、“亲仁善邻”，与日本侵略者“同盟联络”，以实现其称霸中国和世界的野心。一句话，就是要中国人民放弃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爱国斗争。

新民会成立时仅20余人，活动经费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拨付（1940年后改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政总署”拨支）。1938年度预算为252万元，后逐年上升，至1942年度增至

① 能势岩吉著，金连渠译：《何为新民主主义》，《新民周刊》第四期，1938年5月2日。

② 《敬告青年》，《青年》创刊号，1938年6月15日。

2,220多万元。此外,侵华日军还不时给予直接补助,如1940年度和1941年度就分别补助过610万元和430万元^①。其会长起初长期空缺。仅由张燕卿任副会长,直到1939年10月,才在侵华日军和兴亚院的斡旋下,确定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出任首任会长,并于12月2日正式举行推戴式。早期新民会以中央指导部为中央领导机关,由缪斌和日人早川三郎任部长、次长。中央指导部设总务、教化、厚生三部。分别由日人小泽开策、宋介、缪斌任部长。地方由省、道、县指导部领导(北平另设所谓“首都指导部”),至1939年12月10日止,先后建立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首都”、冀东、冀南、保定、鲁南、鲁西、鲁北等省、道、都市中央直辖指导部18个,县、市指导部98个^②。

新民会成立后,首先以极大力气抓“精神工作”,其中央指导部总务部长小泽开策亲自制定的1938年度《工作大纲》,赫然开列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精神工作”。该大纲规定此项工作的任务是:“(甲)倾力于使一般民众理解新民主主义指导理论,实施使民众知悉此次事变之真义及新政权保持之重要性之方策,并迅速矫正国内纷乱之思想及讲求国民思潮之统一策;(乙)开始国共两党之理论斗争,彻底展开剿共灭党之思想战;(丙)确立国民之核心的指导力,绝灭中日满间之民族的感情的利害的纠纷与磨擦,并为恢复基本的原有东方文化起见,实施以日本为东亚安定势力之大同团结之基础的建设诸方策;(丁)对日本向中国之物的人的进出,讲求唤起国民的欢迎之舆论方策;(戊)与满洲帝国协和会密切提携,必要时则加以协助。”^③为实现上述任务,

① 《新民会中央总会会务概况》,第32—33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2年度。

② 中央指导部总务科资料室编:《回顾本年度会工作》,《新民会报》第48号,1939年12月20日。

③ 《新民会报》第二号,1938年4月15日。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先后创办《新民报》、《新民会报》（旬刊）、《新民周刊》、《新民》（月刊）、《新民青年》（月刊）、《华北合作》（月刊）等报刊，作为宣传阵地。出版发行《新民精神》、《新民主主义》、《新民会大纲说明》、《新民主主义讲演集》、《新民会是作什么的团体》、《怎样确立东亚和平》、《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东方精神与新民会》、《新民会讲演集》、《共产党毒扰中国阴谋之解剖》、《由新民主主义批判三民主义》、《新民歌曲集》等丛书和小册子。组织和举办映画班、宣讲班、话剧团、电台广播、巡迴图书车、中小学生作文比赛、学术座谈会及有关中日两国文化上各种展览会等活动。通过这些报刊、丛书、小册子和活动，新民会着重宣传了以下汉奸理论和思想：（1）“此次中日事变，全因主义之不同，即共产与反共产之争，而非民族与民族之争。日本军民绝未以中国全体民众为敌”^①。（2）日本帝国素以“亲善和平”为对华政策。这次事变，完全是为着中日永久“亲善”，东亚永久“和平”，迫不得已而“应战”的^②。（3）中国生产落后，已无建树独立经济体系希望，非“联日”不能“兴邦”^③。（4）华北“新政权成立是中国苏生的第一步”。“新民会是为民众解除痛苦的教化机关”。“新民主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原理”。“复兴东亚民族在发扬东方文化”。等等。^④

与此同时，新民会认为青年是国家的中坚，因此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青年的“思想训练”和“活动指导”。1938年3月18日，它联合北平教育界，发起成立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设立总务、中学、小学三个组，开展以下活动：（1）扑灭共产党“邪

① 《中华民国新民会庆祝武汉陷落宣言》，《新民会报》第16号，1938年11月15日。

② 志浩：《剿共灭党运动的意义》，《青年》第一卷第二期，1938年7月1日。

③ 《告青年书》，《青年》创刊号，1938年6月15日。

④ 《首都指导部会员宣传工作实施大纲》，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第18—2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39年12月。

说”，排除国民党“谬论”，并根绝其他一切“恶化思想与行为”；（2）发扬东方固有文化道德，以建立新民信仰中心；（3）纠正学生“不良习惯”，养成“高尚人格”，以达师严道尊境地^①。5月1日，又成立中央青年训练所，召集各县青年，“授以文武合一之教育”。接着，5月3日，清苑、良乡等县青训所相继成立。15日，津海道青训所也宣告开所。自此以后，各地纷纷组织青训所，为进一步扩大青训工作培养“指导干部”。迄至1939年12月，已发展到100余所，毕业生达10,700余人。为养成所谓“良好国民”，它还指示各地成立新民青年团。自6月南皮县第一个新民青年团成立起，至1939年底，先后成立县团40余个，各县分团504个，人数达19,700余名^②。

此外，倡导“剿共灭党”是新民会这时“集中精力，黽勉从事”的又一重要活动。为了造成声势，它于1938年6月13日至18日举办大规模运动周。在这一周里，新民会各级指导部与各地会员全体出动，一面“网罗各级职员、教育家及地方士绅等，组织演讲班，对各学校各团体巡回演讲”；一面“网罗各级职员、教育家及地方士绅等，组织实践班”，“没收反日抗日图书、反新民主主义文书及国民党标帜”，将从前国民党部所“指导之民众教育馆及民众学校，改为新民教育馆及新民学校”，“慰问友邦日本军及伤兵”，普及新民歌、新民青年歌及新民体操等。19日，又召开“剿共灭党大会”，表决四项提案：（1）向全国民众及海外华侨通电，铲除共产党扑灭国民党，一致拥护中华民国新民会；（2）与日本及伪满洲国共谋“亲善提携”，通电结缔东亚反共战线；（3）通电慰问日本“友军”；（4）推选代表赴日本“大使馆”特务部或现地“友军”处致谢^③。充分暴露了新民会

① 《新民会新民青年运动实施委员会成立宣言》，《新民会报》第四号，1938年5月15日。

② 《青年训练之过去与将来》，《新民周刊》第44期，1939年12月。

③ 《剿共灭党运动实施大纲》，《日伪北京新民会》，第190—192页。

认贼作父的丑恶嘴脸。

(二)

侵华日军为巩固华北占领区，自1939年秋起，对新民会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强化”措施。先是任命安藤纪三郎中将为该会顾问，继则免去张燕卿的副会长职务，改由王揖唐、安藤纪三郎、缪斌三人充任，以便消除张燕卿带来的伪满洲国协和会色彩。至1940年3月1日，更进而宣布与军部宣抚班“统合为一”，对新民会实行大改组。

与宣抚班合并后的新民会，从纲领到组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纲领方面，由过去五条修改为四条：（1）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王道；（2）实行反共，复兴文化，主张和平；（3）振兴产业，改善民生；（4）善邻缔盟，建设东亚新秩序。最突出的变化是不再“剿共灭党”并提，而仅言“实行反共”了。用新民会自己的话说，就是“已表示不敌视国民党矣”^①。究其因，除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国民政府，在策略上转向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外，还和这时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与蒋介石集团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变化有关。汪精卫虽公开投敌了，但仍沿用“国民党”名称，新民会再提“灭党”，“易生误会”^②。蒋介石集团虽尚未投降，但已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说明蒋记国民党已无甚危险，自然不用再“灭”了。

在组织方面，首先，将领导机关由过去的中央、地方指导部改为中央、地方总会，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调整，以强化日方对会务的控制和领导地位。以中央总会为例，除中央机关外，又

① 中华民国新民会：《新民会会务详细报告》，《新民会报》第97、98号合刊，1940年12月。

② 新民会中央总会：《关于对敌用语统一之件》，《新民会报》第61、62号合刊，1940年5月。

新设了全体联合协议会和中央委员会。而在中央机关内部，又于先前教化、厚生部之外，改设和增添了秘书厅、中央训练处、设计部、训练部、监察部。除中央训练处外，其他各厅、部表面均由中方任正职，日方任副职，但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方手里，新民会不过是其“军部之一翼，……换言之，军部若兄，新民会犹弟也”^①。其次，从这时起，会务职员有了明确的中系、日系之分，其比率“大概三人中，以中国系二人，日本系一人之比率为标准”。二者关系，为中系人员立于“第一线，与民众相接，而日系则由内部指导及协力”^②。这一事实反映了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的险恶用心。

新民会改组后不久，汪伪所谓“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与日本结成“和平轴心”。在此形势下，新民会提出它的总目标是“内求和平统一之实现，外期善邻缔盟之成功”^③。为实现这一目标，它在组织上进一步采取了以下措施：（1）力求中央指导力的“一元化及强化”。1940年7月会长王克敏辞职后，立即推戴新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为会长。次年5月，为解决“各种事务之部门区分过多，且过于复杂”的问题，它再次实行机构改组，在事务执行方面，创设一事务总部，以总其成，并推戴建设总署督办殷同代替缪斌为副会长，一扫过去之散漫状态。（2）先后于1940年6月25日至27日，12月9日至13日和1941年10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华北伪政权于1938年4月17日改北平为北京）召开一次直辖总会事务主任会议和两届全体联合协议会议，将日本侵略者“强化灭共体制”和建设“新民乡村”等意旨下达于新民会各地方组织。（3）致力于发展分会，尤其是农

① 有末大佐：《所见》（大要），《新民会报》第72号，1940年8月20日。

② 安藤纪三郎：《对于中央总会所指示者加以补充说明》，《新民会报》第72号，1940年8月20日。

③ 《第二届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第6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1年。

村分会，并力图把农村分会与保甲制度、新民合作社、乡村公所、劳工协会有机地统一起来。迄至1940年12月底，“农村分会会员人数达507,191名。商业分会会员人数达82,978名。职业分会会员人数达13,136名。教育分会会员人数达34,150名。官吏分会会员人数达28,601名。宗教分会会员人数达8,001名。各分会会员之总数为674,057名之多”^①。

在思想上，新民会鉴于过去“出版物之发刊编辑，均无系统，特加整理而统制之”。除《新民报》外，中央总会新创和保留的刊物，主要有《新民会报》、《新民运动》、《新民月刊》、《新民青年》、《新民儿童》等。至于宣传内容，它要求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现值中央政权（指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于和平建国之机运应育成助长之，同时宣传欧洲之战乱与英法之惨败，各国援蒋中止及反共和平归顺等”；（2）鉴于共产党游击队日趋活跃，应着重宣传警备队，“自卫”团体的活动，“俾反共宣传，大事活泼”；（3）协助“模范地区之建设工作，而将其成绩向敌方及内外宣传”^②。

为使“日华亲善及反共亲日之气运益见增进”，新民会利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多次开展所谓“兴亚”纪念活动。如北京市就曾于1940年7月5日至7日和1941年6月中旬至8月8日，两次举办此类活动。活动期间，除举办全市“兴亚”民众大会外，市内各公园均免费开放，由新民会在入口处散发反共传单及漫画。各电影院一律放映“足资启发反共亲日思想及宣传友邦日本文化风景之影片”，并在电影入场券上加盖“兴亚纪念”、“亲日”、“反共”字样，以广宣传。各人力车、电车、公共汽车均粘贴“剿共和平建国”标语。各机关长官皆召集部属训示“兴亚”纪念活动的意义和感想。各中小学校普遍举办以“兴亚”为内容的

① 《第二届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第28—29页。

② 多罗尾光道：《指示教化部关系事项》，《新民会报》第72号，1940年8月20日。

手工、图画、作文作品展览。等等。其反共亲日宣传，既无孔不入，又不择手段。

但是，新民会认为反共亲日，首在根绝赤化、抗日思想。因此，它历来十分重视检查、没收宣传共产主义及抗日思想的书籍与印刷品。新民会中央总会接收北京各学校、各图书馆图书、报刊杂志后，随即组织人力，依“社会主义”、“抗日”、“国民党”等类编成禁书目录六万数千余部，分发各省总会、督励省内各地方总会严行检查没收。1940年7月，北京“兴亚”纪念周期间，北京市总会就曾组织检查班，分东、西、南、北城四路，对市内各书店进行突击检查。凡新民会历次调查及宪兵所发各应禁书目录内的书籍，概行没收，其他书籍也须从内容到作者思想、背景，进行严格审查，然后视情况作出相应处理。以上事实说明，新民会实行的完全是文化专制主义。

在政治上，新民会以治安为会务工作重点，积极配合日本侵略者和华北伪政权推行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3月30日至4月3日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它遵循侵华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主要采用演讲、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演剧及小册子等各种方式，大力宣传治安强化运动的意义，号召民众戮力同心，躬亲实践。到七八月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时，由于该次运动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它一面设立“共产地区调查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体系”，进行所谓“调查”；一面组织各种武装团体，直接参加剿共。新民会这时组织的武装团体，计有：河北省以三河县为中心的武装自卫团，人数达“千数百名”，编成两个政治工作队，“与日本军及县警察队相协力，以对抗八路军”，山西省省总会组织的先锋队和五寨地区新民会训练所长亲兼团长的“对抗共产军自卫团”。省总会先锋队又分工作先锋队与武装先锋队两种，一由武装先锋队掩护工作先锋队，向八路军“所在地区进行其工作，并励行乡村自治”。此外，还有山东、河南两省的红枪会，

其会员相当一部分被新民会收买。山东泰安道莱芜县为中心的“兴亚剿共军团”，其数也在千名之多，而且配备有“小枪、轻机关枪及迫击炮”等轻重武器。自11月1日开始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重点在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并在日军占领区实施物资统制政策。据该会中央总会事务总长喻熙杰说：新民会在这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异常努力”，“如山东之盐及火柴之统制配给或对其灭共重点地区生活必需品之封锁等工作不遗余力，使八路军无活动余地，同时对于占领地域内之良民，实施圆满物资统制配给，以防利敌物资之流出。此等工作自实行以来，已获得良好之效果。”^①喻是在新民会第二届全体联合协议会作会务报告时说这番话的，虽不排除有其表功的成份，但所言新民会“异常努力”于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却是事实。昔日功劳簿，今日罪行录，这是喻熙杰始料不及的。

（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基地。为了巩固这块后方基地，日本侵略者仍然十分重视发挥新民会的作用。战争爆发当天，其华北方面军就散发了一份《新民会扶植大纲》及《大纲说明》，对为什么要加强和扶植新民会及如何加强和扶植新民会等问题作了详尽说明。该文件强调：（1）加强和扶植新民会不仅是加强南京汪伪所谓“中央政府”的策略需要，而且是与共产党“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的需要。（2）新民会应是“彻底的中华民国的新民会”，日本人参与新民会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新民会日系职员只是顾问和监察，“如果象现在这样以日本人中心进行活动，不仅妨碍第三势力的结成，而且也不可能从教化团体性质再向前发展”。

^① 《第二届议全体联合协会会议录》，第27—28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1年。

(3) 不允许汪伪政权新国民党和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进入华北，新民会应主动对新国民党和东亚联盟，“加以指导，万不可处于被动地位”^①。12月13日，又召集新民会中央总会日系职员会议，重申上述意见。

新民会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意旨，于1942年1月先从组织上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整顿：(1) 将各级事务局改为事务部，由中央事务总部而达于县事务部，形成“整然一贯之体系”；(2) 撤销道办事处，创设道总会，“举现地工作指导之重点，集中于道，而以省总会统筹全局，并实践政会联络之机构，庶期运用敏捷，克收成效”；(3) 采用参事制，各级总会由华系会务职员负责执行职务，另设参事，“由日系会务职员充任，并于参事中遴派一人为主席参事，从来道、县联络员职务，即由首席参事担当，以举政会一体之实绩，而加紧协力建设”；(4) 加强中央领导机构，“将原有之宣化科、弘报室、资料研究室并合而设置宣传局，以完善宣传机构，非但推进会运动之宣传，且对大东亚战争作最大努力。此外复将原有之全联事务局及连络局，改并为政治局，以谋各级委员会运用灵活，并充分发挥联协制度之效能”^②。接着，又于10月27日至31日举行全体联合协议会，通过以下新纲领和基本方针。其新纲领为：(1) 发扬新民精神；(2) 实现和平反共；(3) 完成国民组织；(4) 团结东亚民族；(5) 建设世界新秩序。这个纲领的突出特点是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相呼应，将原来的“建设东亚新秩序”，改成了“建设世界新秩序”，并增加了所谓“团结东亚民族”的内容。其基本方针为：(1) 接受所谓因大东亚战争而使建设新中国由“理念而充分进入实践领域”的历史任务；(2) 做“国民组织的指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52—5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② 《新民会中央总会会务概况》，第1—2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2年度。

导体”，“从偏重于会务职员作全体活动，开展到会员职员发动国民大众，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3）领导国民大众扫除“苏联共产主义附庸”、“英美自由主义附庸”和所谓封建残余势力；（4）发扬东亚的中国的民族意识；（5）“革新”政治、经济体制，创造第三文化；（6）以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强化华北参战体制，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7）以“准确”反映中国社会构成特性与民众生活状况为路线，采取分会、外围团体、青少年三种运动，领导国民大众完成新国民组织，树立国民总动员体制^①。

到了1943年2月，朱深接替王揖唐为会长，喻熙杰继任副会长后，新民会甚至表面上撤出了大部分日系职员，仅留下少部分并入顾问部，以便改变“大日本新民会”的形象。

在实际活动方面，新民会这时将以前散漫纷歧的各种运动，综合整理成一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作为统一开展的唯一运动，要求官民上下，戮力同心，共策进行。该运动以所谓“东亚解放”为目标，所谓“新民精神”为指导思想，所谓“教民”、“保民”、“养民”三大运动为实践要纲。并以“忠国家”、爱东亚、“重道义”、尚勤俭、负责任、守纪律为基本要领，要求国民在忠国家方面做到灭私奉公、明哲保群、忠贞“爱国”、和平反共；在爱东亚方面做到反对英美侵略主义和世界赤化政策、实行中日合作、争取所谓“东亚解放”；在重道义方面做到崇尚东方精神、克服自由主义、反对个人主义、肃清功利主义；在尚勤俭方面做到勤以补拙、俭以养廉、节约物资、增加生产；在负责任方面做到精神积极、态度严肃、意志坚定、工作紧张；在守纪律方面做到维持公共秩序、遵守团体纪律、恪守个人职责、服从上级命令。总而言之，就是要忠心耿耿、服服贴贴而又行之有效地为日本侵略者称霸中国和世界服务。

^① 《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第27—29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3年度。

为此，在“教民”方面，新民会积极推行新民主主义“中心思想运动”，以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据该会宣传局供认，仅1942年，它就编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批判》等各种论著约270件，各种讲演稿、广播稿、讲义稿约95件，各种传单、标语、宣言、文电以及歌谣之类的通俗宣传品约50件^①。在“保民”方面，它积极参加了以所谓“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降低物价”等为目的的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附带展开分会强化运动、青少年运动、妇女运动、民众运动等重点工作。截止1942年底，其直辖总会分会数已达13,490个，会员达3,642,199人^②。青少年团团员仅天津就28,000余人，各地许多青年被编成“新民突击队”。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华北先天道总会、华北明道总会、华北理道总会等所谓民众团体先后向该会履行了备案手续^③。在“养民”方面，它极力推行节约运动和增产运动。鼓吹生产消费合理化、婚葬简单化、废除虚礼、廉洁贮蓄，倡导春耕、开垦、植树、凿井、家庭副业和合作运动。等等。^④

1943年1月9日，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应日本要求，正式宣布参加“大东亚战争”。新民会为强化参战体制，特于20日举行临时全体联合协议会，拥汪精卫为名誉会长，定是年为新国民运动实践年，着重开展剿共与增产运动，以增强战力。在剿共方面，它本着“钢的组织，铁的纪律，干的精神”，以思想对思想，组织对组织，武力对武力的方针，致力于：（1）与军事剿共相呼应，展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并着重国民组织与所谓

① 《宣传局工作报告》，《新民会中央总会会务概况》，第14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2年度。

② 《新民会创立六年之回顾（上）》，北京《实报》1943年12月24日。

③ 《组织部工作报告》，《新民会中央总会会务概况》，第8—11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2年度。

④ 新民会：《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之理论与实践》，《告全华北青少年》，第70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2年12月。

“自卫力量”的强化，“情报调查工作的运营”，以期摧毁共产党的地下组织。（2）协助华北伪政权施行所谓“善政”，以期把握民心，达到与共产党争夺民众的目的。（3）对各地军警、“自卫团”、先锋队、突击队、武装青训生等反共武力施行精神训练，灌输反共思想和技能，“以利剿共清乡工作的进行”。

（4）联络社会、宗教、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所谓民众团体，成立“华北民众团体反共大同盟”。（5）开展青少年运动，特别是对各县青少年团内的青农与青工，施行反共训练，以养成反共主力。（6）强化保甲制度和乡村联防机能。等等。①在增产方面，它以“确立食粮合理供应体制”为根本方针，致力于：

（1）实施农产品生产费调查，为华北伪政权厘定新食粮政策提供依据。（2）协助华北伪政权推行以低价收买为主要特征的新食粮政策。（3）确保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平衡，以免谷贱伤农。（4）打击中饱、投机、操纵、囤积居奇等行为。（5）做好食粮保管、运输工作，严防流入八路军根据地。（6）加强合作社工作，指导农事改良，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与生产效率。（7）强化农村分会组织，发起所谓“农村复兴”及农民还乡运动，提倡东方文化道德及敬老、慈幼、爱乡、守土精神，以恢复农村秩序。等等。②

与此同时，为“昂扬战意”，新民会还积极推行“肃正思想”与“革新生活”运动。在肃正思想方面，它通过各种宣传班、宣传网和识字夜校，极力鼓吹以下谬论：（1）“大东亚战争乃是谋中国生存……的战争”，是全东亚的所谓“解放战争”，不仅要“全面拥护，更要唤醒华北的一亿民众，为了这伟

① 《新民会与新国民运动》（1944年5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第377—3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2月。

② 《新民会与新国民运动》（1944年5月25日），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第378页。

大的历史行动而献身”^①。(2)“中国社会本无阶级的分化，何来阶级革命的要求？中国本无共党存在的社会根据，何来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②(3)1943年10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同盟条约》，是“最平等最合于理想的国际条约，……我们应该理解友邦的好意，并为自身庆幸”。等等。^③但是，由于物资缺乏，财政困难，其宣传方式已远不如此前多样，而只能以口头宣传为主了。各地新设的识字夜校，成了它的主要宣传阵地。在革新生活方面，新民会以每月八、九两日为决战生活日，积极提倡防空、防谍、拒毒、回收废品、献纳钢铁、避免一切不正当的消费。号召妇女努力革新家庭生活，养成勤劳、朴实、节约、清洁等美风，以促进国民生活的合理化。等等。

新民会倡导、推行“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长达三年多，满以为能协助日本侵略者取得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可是，事与愿违，不仅大东亚战争没有取得胜利，连其自身也随着日本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而被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8月24日，新民会被迫宣布解散，从而最终结束了它长达八年的罪恶历史。

(四)

以上事实说明，新民会并不是什么民众团体，其发起既非出于民众的要求，所作所为也不反映民众的意愿，纯属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团体。因此，与其说它是“中华民国新民会”，不如说是“大日本新民会”。在漫长的八年中，它给中国人民制造了无数的

① 陈幸平：《大东亚战争三周年纪念感想》，《新民月刊》第六卷第一期，1944年12月31日；冯司直：《参战体制下华北民众的觉醒》，《新民月刊》第四卷第二期，1943年2月1日。

② 徐洙：《谈谈剿共建国问题》，《新民月刊》第四卷第八期，1943年8月1日。

③ 陈幸平：《中日盟约与中国前途》，《新民月刊》第五卷第一期，1943年12月31日。

苦难，但也从反面留下了诸多启示。

首先，新民会曾一度“剿共灭党”并提，但自1940年3月与宣抚班合并后，就不再坚持“灭党”，而专门“剿共”了。这件事从反面说明了国民党的抗日热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否则新民不会自动停止对国民党的打击。由此可见，否定或不重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初期抗战中的作用，固然有悖事实，但任意夸大其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新民会自始至终以“剿共”为最高目标，并为此投入了全部心力和物力。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真正的民族英雄，以任何方式否定这一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新民会在协助日本侵略者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过程中，始终把“精神工作”放在首位，调动一切力量，利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以售其奸。而其“精神工作”的主要对象则是青少年。事实上也确有部分青少年受其蒙骗，误入歧途。由此可见，“精神工作”和青少年问题是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都十分重视的问题，革命的阶级和政党对此更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新民会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曾得意于一时，但终究不能得势于一世。连它自己也承认共产党“越灭越多”^①，新民主主义“非当地民众所能接受”^②，因而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任何反动势力都是不能长久的，革命人民对此应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宋士堂）

（作者曾业英，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第二届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录》，第43页，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1年。

②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森冈皋的回忆》，转引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9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张静江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考析

陈 国 强

1926年张静江出任中常会主席，任期虽短，前后不过数月，但他却是孙中山之后的首任中常会主席，并且身当风云激变的大革命时代，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过相当影响。

一、张静江出任中常会主席的缘由

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党已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党。由于历史久，势力大，党内汇集了自同盟会时代以来形形色色来路复杂的成员，也形成了党员论资排辈的积习。那么，张静江又何以在此中出人头地，并登上主席高位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张静江的国民党元老地位和孙中山老友的身份。张早年经历复杂，他与孙中山也有很深的私谊关系，由此形成了他在国民党中特殊的地位。

张静江出生于浙江吴兴南浔镇的巨富之家，1902年，张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担任大使馆商务参赞，不久他投资经商，在巴黎和英国伦敦开办通运公司，屡获暴利，成为当时沟通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贸易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不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并受时代风云巨变的刺激和新思潮激荡的影响，张摆脱了传统的忠君观念，较早地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1905年张静江与孙中山的相识是他一生中重要转折点，他从

此结束了孤独地宣传革命的经历，而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中一名坚定有力的成员。此后，他以捐输资财赞助革命的独特方式对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孙中山对他的疏财仗义之举曾给予高度评价^①。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拟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张坚辞未就。二次革命失败后，上海的革命党人多秘密往来于张家，由其资助生活，或蒙其馈赠旅费出走日本。1914年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张受命担任财政部长。其间，受孙中山的信托，全权筹划并掌管革命党的基金事宜。

在长期的共同革命生涯中，张静江和孙中山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孙中山誉张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张静江长期患病不良于行，1923年前后宿疾转剧，孙中山曾几次亲自延请名医为张诊治^②。1925年孙中山病重临终前，张静江以“久病之人”，“驰赴京师、远道来探”，并一直守护在旁，是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之一^③。

张静江早年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和他与孙中山不寻常的关系，为他赢得了“德高望重”的美名，也确立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张静江当选为第三名中央执行委员，就是他在党中地位特殊的明证。

其次是张静江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关系极深。张蒋两人早在辛亥革命前就相识相知，由于陈其美的关系，彼此往还密切，蒋并时常得到张经济上的资助。1913年孙中山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蒋于同年10月29日宣誓加入，其主盟人便是张静江。陈其美被刺后，蒋更时时奔走于张氏门下，两人关系日臻密切，张还是蒋当年结拜金兰的盟兄。其时，张对蒋常给以指教规劝，对蒋的言行有很大影响力，而蒋对张则敬礼有加。蒋介石在1921年致张的一

① 《孙中山选集》第205页。

②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

③ 同上，《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封信中曾说：“关于弟今后之处世行止，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聆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终身无长进也。”^①对张抱以极大的信赖。蒋并把张与孙中山并论共提，在他心目中，孙、张都是他所敬惮的“良师”、“畏友”^②。

张、蒋之间这种深切的关系，正是后来张全力扶持、抬举蒋介石，而蒋曲意推崇、倚重张静江并把他推上中常会主席高位的张本。

第三、蒋介石当时需要借重张静江这位元老作他的政治靠山，而张静江也乐意鼎力助蒋并自觉地扮演了蒋氏军师的角色。

1924年5月，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随即识时地收起了先前反对联俄联共的奇谈怪论，而处处以“左”派的面目出现。他运用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诡谲手腕，联甲倒乙，软硬兼施，逐个排除竞争对手，地位迅速上升，很快成为令人瞩目的党中“后起之秀”。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蒋介石跃居中央常务委员，跻身权力核心，成为广东革命政权内与汪精卫并驾齐驱的军事强人。“三二〇”事件后，远居上海的张静江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抱病南下”广州。为了扶持蒋介石，填补汪精卫出走后广东政坛上的权力真空，张静江以其半身不遂的病残之躯，决意留居广州，斡旋各方，参预机密，替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人所共知的蒋氏幕后军师^③。

当时，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作为“唯一能为蒋氏出主意的人”，虽不具备正式名义，却扮演了左右全局的实际决策人角色。“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

① 1921年1月10日《与张静江书》，《蒋介石自友录》第1集卷三。

② 1921年1月21日蒋致戴季陶信，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10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版。

人都来他这里求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就教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①对张静江倾力相助，蒋介石自然感念在心，他为免除张在幕后指手划脚的诸多不便，于是把张从幕后推到前台，将他扶上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的高位。

此外，在对待党内西山会议派问题上，张静江也赢得了更多的资本。对邹鲁、谢持、居正等西山会议派反共排俄的分裂行径，张静江曾以党的元老身份，旗帜鲜明地“忿然”反对，保持了与广东革命政权相一致的正确立场。唯其如此，他才有资格出任国民党中央常会的主席。

二、对张静江任期时间等问题的考证

增设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职务，是蒋介石、张静江之间微妙关系的曲折反映，也是蒋张合谋从党务上向共产党发动攻势的重要步骤之一。1926年5月15日，在张静江、蒋介石等策划和蒋的提议下，国民党召开了以“整理党务”为中心的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打着“消取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两党关系的幌子，先后提出限制、打击共产党的四个议案。其第三案即为选举中常会主席案，由谭延闿、蒋中正、谭平山、伍朝枢、程潜、经亨颐、甘乃光、陈公博等联名提出。案由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皆于临时开会时推举，责任既散而不专，党务之处理自难尽善”，建议“因革命进行之需要”，为“使革命之中心益复确定，党务之责任得以专一”，“应推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②。此案当经5月19日会议通过，但决议案对原提案中关于主席的任期由“其任期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集时为止，并求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追认”，修正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设置，应否继续，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下次开会时决定之”。这项修改，表明主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1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② “选举主席提案”，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5月26日。

席职务系一种临时过渡的办法，而非永久不变的制度。根据决议案的规定，当时中常会主席的职权也很有限：“甲、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为其主席；乙、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名册妥为保存；丙、督促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各部长之进行。”^①可见中常会主席并无特别的无上决定之权，这与此前的总理和其后的总裁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5月20日二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按照事先达成的默契，张静江当选为中常会主席。由于国民党总章中并无设置主席的规定，张也并非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且张当时的身份是中央监察委员而出任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被人指为“本身性质上自相冲突”，引起党内不少的异议。事前陈公博曾为此与鲍罗廷再三辩诘^②，选举过程中李济深更大唱反调，“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席了。”^③尽管遭遇到波折，张静江终究还是被蒋介石扶上主席的宝座，成为国民党名义上的领袖。

7月6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张静江以足疾为由辞去中常会主席职务，改推蒋介石担任，蒋从此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张的这一举动，一则为成全、满足蒋介石独裁集权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是他避怨远嫉、不居名而负实际责任的一种姿态。由于北伐在即，蒋介石后顾之忧，故在北伐期间仍请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由张“秉政中枢”，担负后方实际党政责任。

台湾刘绍唐主编的《民国大事日志》有谓张静江当时曾表示愿代理三个月。如据此推算，则张代理至同年10月初即当交卸，但彼时北伐军久攻武昌未下，进取南昌的战役也正处于胶着对峙中；广东后方的情形也日趋复杂化，并正为第二届中执会及各省

① 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234页。

② 陈公博《苦笑录》上册第四章，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22页。

区联席会议的召开作紧张的筹备中。前方军事正急，结束代理自不可能，而张静江本人也丝毫不愿放弃主席的“责任”。有记录说：“在去岁（指1926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中，同志均有恢复党权，改正错误之意志。本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乃在提案委员会中讨论此案时，张静江同志竟谓机关虽可统一，主席不得变更；二次讨论此案时，张同志又谓：如主席有变更，而此次又一致议决请汪（指汪精卫）复职，是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①张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之倔强坚决由此可以概见。事实上直到这年年底，12月31日，张静江偕同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自广州抵达南昌时，仍代理蒋介石的中常会主席职务。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自述其辞去中常会主席职务的时间是在1927年3月武汉二届三中全会开会之时^②。所以，在二届三中全会取消中常会主席制度之前，国民党中央有两位主席同时存在。

对张静江代理期间的具体职务，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陈果夫在“民国十五六年一段党史”中称“蒋先生原为中常会主席，因出师北伐，以主席职务分别请张静江、谭延闿先生代理。中执会之下分党务会议与政治会议，静江先生代理党务会议主席、谭组庵先生代理政治会议主席及国民政府主席。”^③朱家骅则回忆

“时已出师北伐，先生（指张静江）任中常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后方一切，由其总握”^④。朱家骅与张静江虽然公谊私交甚厚，且有姻亲关系，但朱其时专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尚未参与政治，而时间又距数十年之后，说张兼任政治会议主席显然是他的误记。陈果夫在二届二中全会后担任蒋介石兼部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38页。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6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初版。

③④ 均见台湾《张静江先生百岁纪念集》，台湾世界社1976年9月初版。

长的中央组织部秘书，以后又代理部务，是当时把持党务的实际负责人。张陈关系又非比寻常，他的回忆本该是可信的，但其实也并不真切，并语焉不详，没有交待清楚。按：政治会议的前身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政会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常会则是中执会的常务执行机关，两者在人员组成上有交叉重合的关系，但却是彼此独立的，中常会定期集会，中政会则因事而定。1926年6月2日张静江、宋子文被推为中政会常委——当时原常委五人中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古应芬四人告假，惟留谭延闿一人不能开会。组成中政会三人常委会。7月5日蒋介石经与张静江、谭延闿商议后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名为政治会议并归到中央常务会议中，成为受常务会议督导的下设机关，由此中常会主席便兼任了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两个主席。在7月17日常务会议上，张静江被推为常务会议代理主席，而谭延闿则为政治会议代理主席^①。所以张静江虽然名义上在7月6日代理了蒋介石的中常会主席，由于上述组织结构的变动，到17日以后他代理的实际职务是中常会中的常务会议主席——并非陈果夫所言之党务会议主席，常务会议职权兼及党政，并不只局限于党务方面。

不过，由于谭延闿在国民党中资历声望均不及张静江深厚，且谭为人劲气内敛、圆通世故，长于折衷调和，不似张静江的锋芒毕露、独断专行，故即便是在政治会议中——“每次开会，每有问题，都不大讨论，他（指张静江）自以为是的都通过，自以为不是的总搁起”^②。正如陈果夫在回忆中所说“重要事项则决策于静江先生”。其时，张以国民党中央代理常务会议主席的身份，成了坐镇后方的核心决策人物。

①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6册。

② 陈公博《苦笑录》上册第69页。

三、如何评价张静江任期内的所作所为

张静江出任国民党中央会主席是蒋、张彼此借重、关系微妙的结果，它适应了蒋介石集权独裁的需要。张任职前后，作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军师和政治靠山，为蒋介石的抓权植势、排除异己、巩固权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蒋介石限共排共、并最终确定反共清党大计起了核心的决策作用。同时也无须否认，北伐开始以后，张作为代理中常会的常务主席，“居守中枢”，对安定后方，并为前线筹饷筹粮，提供物资接济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对于这期间张静江的所作所为，陈果夫曾作过如下的评价：“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应为中央常务会议——引者）主席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定。”^①一语道出了张静江在其时密谋策划反共清党中的核心作用。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陈国强，1966年生，南京大学历史所研究生）

① 台湾《张静江先生百岁纪念集》。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科全书”

——读《辛亥革命辞典》

胡 绳 武

近年来，各种类型辞典的出版，种类之多，使人目不暇接。但全面反映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辞典，尚不多见。最近由章开沅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时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实是一件值得学术界十分欢迎的事情。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由这次革命所开的民主先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海内外学人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步，走过了80个年头。这80年间，资料的发掘数量之多，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从论著讲，专书有数百部，论文则多达数千篇。人们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视角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进行论析与阐发。《辛亥革命辞典》就是在这样一种资料汗牛充栋、论著琳琅满目的基础上，以研究阶段总结的形式对这场革命作出一个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总括，可谓“成如容易却艰辛”。

辞典洋洋110万字，分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会社党团、思想理论、历史文献、报纸期刊、典章制度、史迹、纪念设施、研究著述、研究机构、学术会议等12大类，收词目3200余条，以介绍辛亥革命的史实和史料为主，同时反映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和成果，书末置三个附录：《辛亥革命大事记》、《论文目录索引》、《词目分类索引》，内容广博，思想明晰，堪称

我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科全书”。

这部辞典的特色是：

一、全面性：

作为一部辛亥革命史的专史辞典，它所分的12类内容基本上包罗了自晚清至当前关于辛亥革命的史料和研究状况，客观地介绍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史料与评论。无论是对欲入门的初学者，还是研究有素者，都可从中获致自己所需涉猎的内容。它的分类，既给人们一种俯视的整体把握，又有助人们多层面多视角去探究其更深层次。如“历史背景”类，内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中外关系等几个方面简明而又扼要地勾勒出晚清政治风潮骤起和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萌生与初步发展的画面，揭示了辛亥革命在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情势下爆发的必然性，显得轮廓明了，系统清晰。

全面性，意味着该辞书所收的条目较之以往有关辞典的内容更为广博。以“历史事件”类言，它依时间顺序收录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前后至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的所有重大事件。通过这些事件，人们可以从纷繁的历史事实中了解辛亥革命从筹划、爆发、成功乃至失败的全过程并把握住这场革命的主脉线。“历史人物”类，则有点有面。既着重收录辛亥革命的先驱、先烈以为点，又兼收与革命事件有关的清方人物、立宪派人物和其他各界重要人物以为面。辞书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全部设条收录，既可补其它诸如《近代史词典》、《革命史辞典》之不足，也可免学人的多方查寻。辞典所设的“思想理论”类和“社会党团”类，一方面从思想——清末民初的主要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一方面从组织——清末民初的主要社团组织与活动，展示了导致和制约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因由的方方面面，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典章制度”类所收录的民国初年的法规、官制等词条，是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范围和程度。“报纸期刊”类，共收目450多条，涉及地方各

省，展示了当年形形色色舆论导向的面貌。其搜罗之宏富，实为目前各辞典之冠。“研究著述”类所设的条目，则罗列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每一辞条所介绍的该著作的基本观点，一方面有助于读者了解以往研究的领域、层面与角度及其林林总总的学术观点与争鸣动态，另一方面可以导发读者审视过去，把握现状，从中省思开拓未来的研究课题。此外，有关研究著述、研究机构、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史迹、纪念设施的介绍，或为新创，或更广博，有助于了解辛亥革命的各个方面。如“史迹，纪念设施”类收录了海内外有关辛亥革命的遗址及先驱们的墓地和纪念建筑。这些词义既可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类似词目互相补充印证，为读者增添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又从更深的层次窥视后人对先辈革命业绩的景仰，增加人们对辛亥革命在社会心理方面所造成的影响的认识。总之，应该说，这部辞典，较全面而又系统地展现了辛亥革命的全貌。

二、科学性：

科学性尤如工具辞书的脊梁骨，一部辞书如果在科学性存在着问题，就会影响到它的价值。由于《辛亥革命辞典》的编委对辛亥革命研究有素，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功底扎实，屡有心得，多所建树，因而就保证了这部辞典能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他们的学术功力还表现在这部辞典十分注意吸收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辞典汇总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所阐释的观点尽可能做到为多数研究者所能接受。同时，它尽力融汇吸收史学界的新成果，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水平。例如，过去的研究一般都沿用武昌起义后的头几天，湖北军政府中曾设立“谋略处”以行使最高权力。近年有学者通过缜密考证，提出“谋略处”属子虚乌有，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因此辞典未将“谋略处”立条，以免再度以讹传讹。辞书还吸收了一些学者对以往辞书中出现的二百多名民国人物的生卒年进行订补的成果。等等。由于编者态度严

肃，这就增强了这部词书辞义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了它的质量。

发掘新词条，是辞典的一大贡献。新词条，有以往因研究未及或因资料匮乏而不能立条者，亦有本书所独创者。如反映留日学生及华侨抗议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爱国行动的“大阪博览会事件”，记述蒙古族人民开展反清斗争的“独贵龙运动”，披露孙中山早期宣传活动的“镜海丛报”，新近发现的“经铿黄氏家谱”以及“美国圣荷两市中山纪念堂”等辞条，属以往辞书所未见的。而“研究著述”、“研究机构”、“学术会议”以及“纪念设施”等几类内容的设置，则属这部辞典所独创的条目。

辞书对有些词条的释文，提高了这些词条涵义的精确度。如以往对“四大寇”，常释为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志趣相投，经常聚谈反清，倡言革命，时人称为“四大寇”。辞典则据史籍补充了“四大寇”一词的来历，言明“寇”系广州方言对强盗的泛称，原义是指外省人结成团体以乞食多事的落魄者。指出时人对孙中山等冠以“四大寇”，乃谑称也。又如，过去坊间对“十八星旗”的释义，或谓“星用红色示意光明”，或称“红地黑星，星间联以虚线”云云，词义不甚明白。辞典编者根据武昌起义纪念馆所藏旗帜原件，再参考该旗帜的制作者李白贞的回忆录，对“十八星旗”作如是释义：“红地，中为黑色九角形图案，缀有十八颗黄星，内、外两圈各九颗”。这样的释义，既明瞭，又准确。

辞典由主编章开沅教授撰写《序言》。《序言》对海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作了鸟瞰式的回顾总结，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意见，并对今后的研究作了展望。读者将可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以便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推向更广和更深的领域。

辞典令人稍感不足的是：由于撰稿出自众手，文字的风格不尽一致；更因内容庞杂、交叉，给条目的分类造成一定的困难，以致词目分类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另外，在“历史人物”类

中，如能适当地扩大些条目，把与辛亥革命关系较多的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收入，如朱尔典、莫理循等人，看来还是必要的。但是这都无伤大雅。应该说，把这部辞典称之为集全面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的专史的辞书，并不过誉。

（责任编辑：卫香鹏）

（作者胡绳武，1923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有益的新尝试

——读《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

雷 颐

人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在诸种社会关系之中，“友朋”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因此，中国古代把“友朋”列为“五伦”之一，而古希腊也有谚语说：“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能猜出你是谁”。说法虽不相同，却都说明了“朋友”关系值得重视。

大约有感于“朋友”的重要但以往历史研究对传主或谱主“朋友”的忽略，美国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主编了《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可谓别开生面。而挑选胡适作为这种另辟蹊径的研究对象，是颇为适宜的。因为胡适青年时代就“暴得大名”，跻身社会名流，更加他性喜交游，以至当时流行“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不乏讥讽的戏语。但这确反映了他的交游之广与友朋之众。把胡适与他的各类朋友逐一作比较研究，不仅能克服传统史学研究过于突出传主或谱主而“难能平视、环视、详视传主或谱主周围的人与事”^①这种不足，而且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一种更为丰富的“众生相”。恰如主编者所言：“一个人是社会与历史中的一个点，无论大小，总还是点。有影响力的人物，能从自身的点与别人的点连系起来而成为线，再由线的交织构成面，面的组合可构成体。”

① 李又宁：《编者序》，《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版，第5页。

“胡适和他的许多交游，包括朋友和论敌，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其间的点、线、面、体之中的多样关系及多种演变，错综复杂，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是时代的一部分，都是饶有趣味而且富有意义的历史题目，从其中不但可发掘多样的个人史料，而且可发现多样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多样关系。”^①

《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收有论文十篇，作者为张朋园、周质平、杨天石、汪荣祖、易竹贤等，大都为一时之选。这些论文分别研究了胡适与梁启超、赵元任、钱玄同、陈寅恪、陈衡哲、王云五、徐志摩、任鸿隽、胡堇人及汪孟邹等人的关系，并以这些关系为关结点，扩散开去，深入地探讨了他们各不相同的政治态度、学术观点和心灵深处复杂的感情世界。读后，确使人感慨顿生。

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来说，影响最大却又最难于处理的，莫过于与政治的关系了。

世事如潮，中国近代政治更是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在这急剧发展的政治风云面前，年龄相差不过18岁的梁启超与胡适，却成为判然有别的两代知识分子代表。张朋园在《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一文中，搜集大量史料，细致分析了梁、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代知识分子的微妙关系。

1917年胡适回国时，痛感国内政治的腐败黑暗，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潜心文化事业。但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却不能不谈论、评论、乃至卷入政治。而此时的梁启超，在晚清民初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20余年后虽已政坛失意而退归学界，但心中仍存政治抱负，企盼能“东山再

^① 李又宁，《编者序》，《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第11页。

起”。这样，他的目光不能不转向以胡适为代表、声名日隆影响剧增的北大知识分子群，对其进行多方联络拉拢，希望能引为同道，重新组党。尽管胡适对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对其早年的启蒙之功和后来的学术建树满含敬意，但对名声不佳的梁氏研究系的政治拉拢，他还是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梁氏心腹林长民曾多次邀胡出来组党，均被胡适拒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宗孟（指林长民，笔者注。）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语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覆。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相强，自取愤事。”“研究系近年作的事，著著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①对胡适的拒绝，梁启超、林长民十分不满。林长民尖刻地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②

但胡适终其一生却无法摆脱政治的纠缠。他先是参与创办《努力周报》，对北洋政府抱有希望，但终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又一度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进行激烈的批评，但在政治恐吓之下立即又噤若寒蝉。“九一八”后他又创办《独立评论》评议政治，及至抗战爆发又出任驻美大使，实际从政，却又备受孔、宋排挤，颇不得意。他对国民党虽有种种不满，但对共产党更是坚决反对，自然，也受到共产党的严厉批判。总之，他的一生实际常常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终也“失贞”，如梁启超、林长民一般。

相对说来，胡的好友钱玄同、赵元任、陈寅恪等远离政治，也就保持了自身的“清白”。

杨天石先生在《钱玄同与胡适》一文中，以从未刊布过的“钱玄同日记”为基础，详细论述了人们知之不详的钱、胡间种种交往。就个人性情来说，钱玄同远比胡适激烈，在文化、学术

①② 转引自《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第34、35页。

上对文化保守主义批判更为果决激进。但对政治，钱玄同始终保持“远距离”。从钱玄同日记中得知，“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是忧心如焚，时刻关注事态发展，但又深叹自己缺少“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能力，简直不知“究竟该做什么事才对”^①。但他很少发表政见，而是出于一种良心的自慰，谢绝参加各种宴会。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惨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讌，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②

赵元任是胡适的挚友，陈寅恪与胡的交往也不浅，他们都可称为学界泰斗，但对政治也都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周质平先生在《胡适与赵元任》一文中，对胡、赵二人对政治的态度，作了精彩的对比：“胡适不谈政治是勉强的克制自己，而赵元任不谈政治却没有太多‘强忍’的痕迹。”^③“强忍”终归困难，因此胡适便屡屡违背“不谈政治”的誓言。恰如周文所说：“胡适常劝学生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把自己铸造成一块有用的材料，而不要罢课游行，在街上贴标语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胡适自己却常常为了政治而走不回图书馆，走不回教室。放下了只有上卷的哲学史与文学史，去写《独立评论》上的政治文章，去干驻美大使。”“倒是赵元任真正响应了国难当前，走进图书馆的号召。在国事最危急的时候，专心于一门与政治绝无关联的学术。”^④当然，赵氏并非没有爱国之心，抗战时期为

①② 转引自杨天石，《钱玄同与胡适》，《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第191页、192页。

③ 周质平，《胡适与赵元任》，《胡适与他朋友》，第一集，第131页。

④ 同上，第132页。

不少抗战歌曲谱曲，广为传唱。但离政治，毕竟还远。

在人们的心目中，陈寅恪是位与政治完全绝缘的人物。但实际上，陈氏内心对政治却异常关注，忧国忧民。只不过他未将自己的政治情怀象胡适那样表现出来，而是化作一首首隐晦的诗文，以抒愤懑。在颠沛流离之中一直以学术为根本，淡泊自守，殊使人敬。对此，于陈寅恪研究有素的汪荣祖先生在《胡适与陈寅恪》一文中，作了细致的引证分析。读来使人感慨良多。

胡适与钱、赵、陈等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腐朽政治中颇为典型（当然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模式。一种是“失贞”与统治者合作，希冀能某种程度的改良政治。但这却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到头来不仅无裨于事，而且自毁名声。另一种则是远离政治，在学术中“独善其身”，以保持自身的清白。但这毕竟又距时代较远，与社会有隔。何去何从？确乎两难。

二

学术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胡适的“暴得大名”，主要地因为他在五四这一“新旧交替”时刻，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治学理论与方法。

尽管胡适曾断言发现一个古字的意义与发现一颗新星同等重要，曾主张当存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实际上，他始终在探索一种最基本、最广泛、可应用于一切研究领域的科学方法。他确信“实验主义”便是这样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而且进一步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防身的本领”加以宣扬。这样，他所建立的以实验主义为标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不仅具有知识论的意义，而且有着人生论的意义。简言之，他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替代传统儒学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这便是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背景。

当胡适由美归来一举成名、咄咄逼人之时，梁启超正值盛年

而返归学术，力图在学术上独树一帜，欲由言论界骄子转为学术界祭酒。于是，“胡梁的声势相映，一时形成北方学术界的双雄，谁也不愿意对方的声光掩盖了自己。”^①张朋园详细剖析了胡、梁间学术往来的“五个回合”，双方互有赞扬、但更有互相批评。特别是梁启超，热心学习新知识之时又颇知倚老卖老，常常措辞严厉。胡适虽有不满，但多在日记中发泄，公开场合总是客客气气，从无一句重语。在互相批评中互相影响，互补短长，确为一段饶有趣味的学林佳话。

与胡适相差不到一岁的陈寅恪，其学术、文化观念却与胡适迥异。就中学的素养与对西学的研究来说，陈氏都在胡适之上。但陈氏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观点，却与胡适大相径庭，远较胡适保守。陈寅恪坚决反对“西化”，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对中国文化的洞见，使他坚信：“窃疑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国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②如汪荣祖先生所说，这是胡、陈二人文化观的不同所致。胡适始终坚持“文化单元论”，认为不同文化的差异只是时间性的；而陈寅恪始终坚持“文化多元论”，认为不同的文化可以共存而不能取代，文化的差异是空间性的。

有趣的是，胡、陈二位都对乾、嘉朴学推崇备至。但胡适是想从中为“科学”在中国“寻根”，证明“科学”的普适性从而

① 《胡适与梁启超——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第37页。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消解“传统”，而陈寅恪的出发点却是籍此融汇汉宋之学，复兴传统文化。虽同为推崇汉学，其目的及背景却大异其趣。无疑，这代表了中国近代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态度，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

说来使人难以相信，胡适这位全面反传统的健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一篇又一篇文章、剧本、小说中大声促喝“新青年”打破旧式婚姻枷锁，勇敢追求恋爱自由时，自己却尊奉母命，与一位几不识字的小脚妇女江冬秀结婚，毫无爱情地白头偕老，厮守终生。

易竹贤先生在《终生不渝的友情——陈衡哲与胡适之》一文中，为了解以往研究、注意不够的胡适颇为丰富的感情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

1904年1月，年方14的胡适便与邻村江冬秀订婚。但直到1917年夏胡适留美归国后，两人才见第一面，不久完婚。这十余年间，先在上海读书后又负笈美国的胡适正值青春年少，接触到各种新思想后更是观念全变，对理想的爱情艳羡之致。在美期间，他曾与学习艺术的美国女大学生艾迪斯·韦莲司双双堕入情网。但迫于母命，他不得不痛斩情丝。仍是在美期间，素有“才女”之称的女留学生陈衡哲，自然引起了胡适的注意。其时，胡适正在考虑“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文写作，但却遭到众人的反对而颇感孤立。陈衡哲却对此报赞同态度，并尝试用白话文创作诗歌小说，还曾在胡适所编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小说《一日》，给胡适以实际的支持。多年后，胡适还感激地写道：“她是我一个最早的同志。”^①

不久，陈衡哲与胡适的朋友、同为留美学生的任鸿隽结婚。但胡适一直对陈衡哲私心倾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一种很深的

^{①②} 转引自易竹贤：《终生不渝的友情——陈衡哲与胡适之》，《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第232、第245页。

和纯洁的敬爱”^①，并把自己的小女取名“素菲”，即陈衡哲的英文名字“Sophia”（莎菲）之谓也。而陈衡哲也对胡适十分关心照顾，撰写各种文章支持胡适，尤其是几次在胡适十分痛苦的时候去信慰问，给胡适以莫大的精神慰藉。数十年间，胡适与陈、任夫妇一直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1949年后，胡适与陈衡哲分居海峡两岸，却一直遥相思念，友谊确是“地久天长”。

为何鼓动别人勇敢追求爱情的胡适自己却迁就旧式婚姻，不敢追求理想的爱情呢？新近发现胡适婚后不久给近亲胡近仁的一封信，颇能透露真情：“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要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吾母欢喜耳。……此事已成往迹，足下阅此书后，乞扯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②怀想五四时期的一代风流，如鲁迅、陈独秀、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等，都以各自的方式大胆追求自己的所爱，追求婚姻的自由，相形之下，胡适的确太软弱、太怯懦了。谁能说，这种性格特点，对他反对激烈革命、主张点滴改良的政治思想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影响呢？

易文的特点，在于一反以往对历史人物研究抽象化、概念化的缺失，把胡适内心的矛盾、痛苦、软弱、私恋、多虑、自律等等都生动具体地表现了出来。看来，“历史人物”的感情世界，确是一片大有文章可作的新天地。

胡适不但爱交游，也喜发议论因而论敌也多。据闻，李又宁教授又在编《胡适与他的论敌》，相信定能与本书互相补充，使这一“历史人物”更具立体感。因此，急盼该书能尽快面世。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雷颐，1954年生，近代史所编辑）

①② 转引自《终生不渝的友情——陈衡哲与胡适之》，《胡适与他的朋友》，第一集，第245页。

让苏联人民全面地认识中国

——苏联中国学家对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活动之一瞥

薛 衡 天

1991年上半年，笔者在苏联作学术访问，这期间，正是苏联学术界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

中国十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社会科学的繁荣，引起了苏联中国学家的浓厚兴趣。中国何以取得这些成就？中国社会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中苏关系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其中有哪些历史经验应当总结，如何从学术的角度巩固和发展苏中睦邻友好关系的成果？这些都是苏联中国学家，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和苏中关系史专家们十分注意研究的问题。笔者所接触到的苏联中国学家在谈到他们的研究工作时，习惯地用一句概括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研究动机：

“苏联汉学家所做的一切，就是让苏联人民全面地认识中国。”

苏联中国学家所说的“认识中国”，主要是着眼于中苏两大民族在文化内涵的深层次上和 在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广泛的领域内加强认识。苏联著名的中国学家加里诺维奇教授说：“我们苏中两大民族的接触不是从1917年开始的，而是早已开始了。是一个整个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很长很长，政府间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但我们两个民族还未互相认识，两个民族的认识刚刚开始。”这番话初看起来似乎有些偏颇，但仔细思索也颇有道理。它主要强调的是两个民族应通过广度和深度的交往，而达到在文化内涵方面的深入了解。中苏两大

邻国，应象亲近的邻里一样，通过互相往来，各自把对方的脾气秉性摸透，就能友好相处，即便偶而发生口角，由于相互了解，也好解决。毫无疑问，苏联的中国学家在沟通中苏两大民族相互了解方面起着思想先导的作用。

要使苏联人民认识中国，首先要让苏联人民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生平和活动。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开始进行一项巨大的科学工作，组织苏联一些著名中国学家撰写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和刘少奇传。齐赫文斯基是研究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久负盛名的中国学家。他开始主编毛泽东等人的传记，必将带动一批中国学家加强对中国现代史和当代中国的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内，引人注目的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梅利霍夫教授主编的《近代俄国与中国。1643—1917》。梅利霍夫教授向笔者出示了该专著的写作提纲。从提纲上看，该书实际上是一部中俄关系史。参加编写者除主编外，还有纳罗契尼茨基（已故，将由另外人代替）、古列维奇等苏联著名中国学家。提纲继续坚持70年代苏联发表的中俄关系史论著中的基本观点，增加了大量中俄文化交流和中俄人民友好往来的内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过程。提纲指出：

“俄国首批汉学家的出现，及大批有关中国的译著和著作的问世，俄国社会舆论界开始广泛地了解中国。”在一些章节中还增加了俄国进步舆论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内容。

苏联中国学家还对俄中关系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搜集、编辑和出版工作。继《17世纪俄中关系》和《18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之后，又出版了《18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这套文件集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米亚斯尼科夫教授主持，有一批中国学家参加编辑工作。新出版的《18世纪俄中关系》2卷，集中收入了萨瓦·鲁基奇·符拉迪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使团的有关历史文件。起迄年代为1725——1727，仅这3年的历史文件就达600余个16开

印刷页，足见整个工程之巨大。本卷除收入大批外交文件外，还有许多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报告，因此，它不仅是研究中俄关系史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而且对清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中关系史是苏联中国学家注重研究的重要课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加里诺维奇教授向笔者强调说，中苏两大邻国，不仅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在和将来的角度上看，全面和真实论述苏中关系的历史过程对我们两大民族加深相互了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一般苏联读者对苏中关系史的许多方面所知甚少，这就很难加深了解。他为此撰写了专著《苏中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痛点》，把因某种政治原因未被揭示的历史过程和因某种的历史或主观因素而造成的对苏中两国人民都是痛心的事件予以揭示和分析。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二万苏军赴华抗日，由于当时两国领导人斯大林和蒋介石对人民封锁这一消息，至今两国人民对此事所知甚少。又如，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出，仅苏联一方就徒然花费200余亿卢布，对两国经济建设加重了额外负担。但是在全部中苏关系史还有更多的中苏人民都满意的共同点。不管是“空白点”、“痛点”，还是“共同点”，都告诉我们两大民族一个道理——中苏国家关系不能破裂，有了这个共识，才有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加里诺维奇教授还在他的书中将苏中两国学者对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客观地介绍出来，让读者去评判。

加里诺维奇教授特别强调民族之间的往来和了解在中苏关系史上的作用 and 意义。两国关系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是平等的相互关系。“国际关系”一词，中文强调国家意义，而英文“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俄文“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强调民族意义。民族是永存的，它不随着政权的变化而变化，也不随着政权的消失而消失。国家是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就中苏关系而言，有时是国家

的，有时是政党的，有时是人民的亦即民族的关系，更多的情况是这几种关系并存。因此，研究两国关系史，切不可忽视了民族关系，简单地用阶级观点或意识形态标准分析两国关系，或以单纯的国家关系笼统地替代民族间的往来，都可能导致片面性。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青年中国学家谢·冈察洛夫博士则从世界战略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研究中苏关系史。他的新著《1945—1989年世界战略和国家利益在中苏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一书（英文版，将在美国出版）就是这方面的实践。他认为，中苏论战有主义之争，更重要是有世界战略之争，中苏大战略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者说，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是两国世界战略不同的反映。战略利益比意识形态本身更重要。从苏联来讲，它的世界大战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就大战略本身而言，不仅有共产主义思想，还有两国的历史背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最能满足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战略要求。斯大林只相信通过暴力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他指望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好得多：一、苏联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二、苏联可以主动地选择参战的时机和背景；三，苏联的国际环境得到了改善，西方有东欧，东方有中国。中国在苏联的世界大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斯大林需要中国，需要与美国关系不好的中国。第二个层次是关于苏联本身的安全问题。雅尔塔协定签订之后，斯大林恢复了俄国传统的思想。俄国的边境线最长，没有自然屏障，保障俄国的安全，只有靠不断的对外征服，扩大缓冲地带，以空间来保证时间。斯大林对中国、蒙古、土耳其、巴基斯坦、波兰等苏联的周边国家也看作是缓冲地带。在斯大林看来，这个缓冲地带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大收获。这两个层次就决定苏联既需要中国、又控制中国的总布局。对中国来说也有两个层次。其一，毛泽东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要给中国创造伟大国家地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在

短期内难以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对两强美国和苏联二者必择其一。同苏联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体制，苏联会给中国一定的援助，而苏联的援助不可能比美国多，它不会控制住中国，这是选择苏联的战略因素。其二，从国家利益考虑，毛泽东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比美国大，他对苏联对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意图不放心，但为维护中国全境（包括西藏和台湾在内）统一，不得不做一些让步（在新疆和东北）。

在苏中关系史研究方面，苏联中国学家还开始进行一项大工程，编辑从1917——1989年的苏中外交档案文件集。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列多夫斯基、米罗维茨卡娅、冈察洛夫等中国学家。

目前，在苏联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还有两个较热门课题：一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一是对华侨和俄侨的研究。前者是属于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内涵问题，后者是属于中苏两大民族往来问题。参加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仅有多从事历史研究的中国学家，还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等。

翻译中国典籍是苏俄中国学家传统工作。俄国首批中国学家就是从翻译中国典籍成长起来的。有些中国学家将翻译中文籍典作为毕生事业。如著名中国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就为此事业奋斗了终生。他在临终时还留下遗言，让在他的墓碑刻上孔子的话：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因两国关系方面的原因，从70年代起苏联公开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译著并不多见。近两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中国学家嵇辽拉、刘永安、尼克苏受齐赫文斯基院士和季大连科教授之托，将《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内大部分论文译成俄文，仍以原名付梓。今后也许有更多的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俄文译著问世。

1991年10月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薛衍天，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记檀香山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

张海鹏

1991年8月29—31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日本孙文学会于1987年提议的，经东京亚细亚大学校长卫藤沈吉教授和美国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杜维明教授的筹划，终于得以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会期只有两天。会场设在东西方中心的会议厅里。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正式学者有五十多人，大多被公认为这个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如美国的韦慕廷（C. Martin Wilbur）、詹逊（Marius Jansen）、史扶邻（Harold Schiffrin）、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薛君度、郭颖颐、杜维明，韦慕廷年逾80岁，据告，可能是最后一次出席这样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日本的卫藤沈吉、山田辰雄、小野信尔、小岛淑男、久保田文次、中村义、中村哲夫、狭间直树、藤井昇三，都是学术界很熟悉的日本学者。著名学者山口一郎这次以旁听身份出席，未能获得发言机会；如中国大陆的金冲及、李文海、李侃、张岂之、张磊、姜义华、章开沅，刘大年 and 汪敬虞都提供了论文，却因故未能出席；如中国台湾的蒋永敬、张朋园、李国祁、李恩涵、吕士朋、胡春惠。其他如法国的芭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ere）、德国的费路（Roland Felber）、南朝鲜的闵斗基、澳大利亚的黄宇和、香

港的霍启昌等。会议共收到论文36篇，每篇论文约3000字。

一般说来，这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气氛比较浓厚。尤其是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学者，相互尊重，共同切磋，进一步增进了了解。发起这次会议的最初动机，是要促进海峡两岸的中国近代史学者间的接触。自从1987年以来，两岸形势逐步缓和，两岸学者在中国大陆、在海外，已经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正如会议主席卫藤沈吉在闭幕讲话中说的：“海峡两岸学者热烈地、活跃地交换意见，本着友好的态度进行辩论。……对两岸学者，我放心了，我们外国人不需要为你们担心了。”

从学术上看，这次讨论会确实提供了一次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学术的好机会。我提供给会议的论文题目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原以为我的论文会引起台湾学者的异议。在我报告以后，两位台湾学者的提问是建设性的，态度是友好的。来自台中的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吕士朋教授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说中提到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固然是告诫国民党人不要排斥共产党人，也是告诫共产党人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越出民生主义的圈子。来自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的吕芳上副研究员说：论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要注意同时代人对孙中山的影响，如民国八、九年的《建设》杂志上刊登过戴季陶、周佛海等一些人的文章，戴季陶甚至主张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我在答辩中表示我已注意到了质疑中提出的这些问题，同时表示同意并感谢两位台湾同仁的鼓励和指教。这篇论文的报告、质疑和答辩在各国学者面前表明：在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上，海峡两岸学者并未因意识形态有异而争吵，在学术研究上表现了互相尊重、客观公正和包容不同意见的良好风气。

海峡两岸学者学术观点的接近，还可以从另一事例上看起来。台北政治大学蒋永敬教授的论文是关于海峡两岸中国学者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同解释的比较研究。从报告后的质疑和答辩看，双方观点接近。台湾学者认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不是孙中山本人的概括，也不是国民党“一大”的概括；大陆学者承认“三大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首先由共产党人概括出来的，在当时得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人的广泛采用，这一概括且反映了孙中山本人和国民党“一大”的原则立场，并符合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对此蒋永敬也表示同意。看来，双方对“三大政策”的阐述上都表现了尊重历史事实的意向，减少了以往的敌意。虽然在“容共”或“联共”、“三大政策”还是“三个政策”等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认识，那已不是很重要的了。

在讨论张岂之《辛亥革命时期伦理思想和人生价值观新课题》时，来自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恩涵研究员和美国东西方中心的杜维明教授表示了赞同的意见。杜维明还分析了人生价值观的三个相关方面：关于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关于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巧妙指导，关于民主制度的不同形式，他认为，欧美的民主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情况。

当然分歧仍然存在。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1981年在美国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讨论会上，章开沅和张玉法的公开争论曾轰动一时。这次夏威夷讨论会上，两岸学者均未提供辛亥革命性质的文章，因而未展开正面讨论，但蒋永敬曾一再提到10年前的争论，表明他仍然主张全民革命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我与蒋先生在会下有过讨论，但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很难达成共识。史观上的分歧仍然是深刻的。

这次檀香山会议，各国学者之间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有意思的讨论和争论，限于篇幅，不赘述。会议论文，不久将在日本出版英文文集，那时，了解整个会议的全貌就不难了。

1990年中国近代史书目索引

近代史所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编

一、总论

历史学 董进泉等编著 四川人民
1989年9月 430页
史学概论 赵吉惠著 陕西师范大学
7月 312页
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苏双碧著
上海人民 1月 441页
当代比较史学 范达人著 北京大学
2月 248页
史学研究辑存 陈光崇著 辽宁大学
1989年 6月 382页
中国史学 三卷 仓修良主编 山东
教育 2月 3册
中华民族自强史 王棣棠主编 兰州
大学 1月 345页
中外历史新编 第二卷：中国近代史
吴雁南等主编 贵州人民 1989年
6月 377页
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魏宏运著 广东
人民 1989年10月 426页
中国近现代史之最 黄寿先编著 华
南理工大学 4月 183页
新编中国革命史 姜华宜主编 人民

10月 420页

中国现代史 下册 王桧林主编 高
等教育 1989年3月 530页
中国现代史争鸣录：历史事件篇 中
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
主编 江苏教育 1月 640页
中国现代史论选（上） 葛懋春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 1月 647页
中国革命纪事 郑德荣、王维礼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 6月 791页
中国革命史专题论稿 黄存林主编
军事科学 1989年7月 348页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 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10月
357页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联邦德国）夏
瑞春编 陈爱政等译 江苏人民
1989年11月 283页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17辑 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
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中国社会
科学 10月 3册

二、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美) 张馨保
著、徐梅芬等译 福建人民 1989
年5月 287页
- 鸦片战争风云录 张英明编著 江西
教育 5月 81页
- 林则徐评传 林庆元编著 河南教育
8月 430页
- 林则徐在新疆 谷苞、蔡锦松编 新疆
人民 3月 278页
- 太平天国史学导论 祁龙威著 学苑
1989年12月 353页
- 太平天国诸王传 陈宝辉等著 广东
人民 2月 417页
- 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 郭毅生主编
中国地图 1989年6月 319页
- 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 徐炯著 广
西师范大学 4月 170页
- 天地会研究 (荷兰) 施列格编 河
北人民 5月 281页
-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 冯
增烈等编 三秦 4月 316页
- 曾国藩全集: 奏稿(7) 韩长耕等
整理 岳麓书社 1989年9月 1册
- 曾国藩全集: 书信(一) (清) 曾
国藩著 殷绍基等整理 岳麓书
社 6月 805页
- 左宗棠全集: 奏稿(四) (清) 左
宗棠著 岳麓书社 3月 549页

三、甲午战争、戊戌 变法、义和团

- 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 戚其章著 山
东教育 4月 519页
- 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 孙克复编著
辽宁大学 1989年10月 471页
- 历史与当代 黄济福等编著 甘肃人
民 1989年9月 211页(本书收集
有戊戌变法的评价等问题论文)
- 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 (美) 德雷克
著, 任复兴译 文津 7月 206页
- 康有为全集: 第2集 姜义华、吴根梁编
校 上海古籍 4月 949页
- 康有为在西安 单演义遗著 单元庄
整理 陕西人民 4月 257页
- 王文韶日记 袁英光等整理 中华
1989年 12月 2册
- 杨锐刘光第研究 王文等编 巴蜀书
社 1989年11月 279页
- 奕訢慈禧政争记 宝成关著 吉林文
史 6月 399页
- 珍妃 于善浦著 紫禁城 1989年12
月 90页
- 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 路遥主编 山
东大学 9月 265页

四、辛亥革命

- 辛亥革命前菜海招抗捐运动 刘同钧
主编 社科文献 1989年9月 487页
- 秋瑾评传 郑云山、陈德禾著 河南
教育 8月 254页
- 邹容陈天华评传 冯祖贻著 河南教

育 8月 162页

章太炎评传 何成轩编著 河南教育

8月 362页

五、中华民国史总论、

北洋军阀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六

辑：1930年（民国十九年）、第十

八辑：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

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 1989年

1月、8月 2册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 段云章、邱

捷著 四川人民 1月 596页

北洋军阀 1912~1928 章伯锋、李

宗一主编 武汉 6月 6册

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 天津市

档案馆编辑 古籍 2月 596页

中国近代军阀简史 邹孟贤等编著

华中师大 1989年11月 342页

中国近现代军阀的兴亡 李文著 陕

西人民 1989年9月 177页

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堂 余炎

光、（美）陈福霖主编 广东人民

1989年11月 377页

六、五四运动

革命起义录（1919~1949） 范圣予

等著 求实 2月 530页

历史的选择：五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

主义 国家教育委员会科学发展研

究中心编 山东大学 1月 207页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 张允侯、

张友坤编著 武汉 1989年12月

155页

五四前后的河南社会 中共河南省委

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河南人民

2月 535页

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

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

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

学》杂志社编 社会科学文献

1989年10月 2册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编 北京大学

3月 289页

七、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 黄峥编写 新华

6月 47页

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

纪实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等编 广东人民 2月 281页

粤军史实纪要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 1月

295页

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 王全营等编著

中原农民 1989年6月 253页

八、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若干问题 颜广林

编著 复旦大学 1月 397页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唐敦教等主

编 华夏 1989年9月 437页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全荣阶主编

中共党史资料 1989年9月 832页

大别山风云录：豫东南土地革命战争史稿 侯志英主编 河南人民 1月 706页

渭华起义六十周年纪念册：1927~1938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渭南地区委员会宣传部编 陕西人民美术 1989年3月 1册

长征日记：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 赵镔著 山西人民 6月 545页

红旗漫卷：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政治部编 宁夏人民 1989年8月 331页

九、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 (美) 托马斯·阿瑟·毕森著 张星星、薛鲁夏译 东北工学院 1月 129页
中外人士访延纪实：封锁线内的真相：1944~1945 陈明钦等编 云南人民 3月 355页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 陈本善主编 吉林大学 1989年12月 630页

抗日战争史论文集——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中国现代史学会编 春秋 1989年8月 230页

抗日战争纪事(1937~1945) 陈之中、谭剑峰编 解放军 9月 495页

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1938.11~1943 张宏志著 国防大学 4月 766页
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1944~1945.9 张宏志著 国防大学 5月 388页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 《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 中华 1989年10月 349页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长城抗战资料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华 1989年 11月 194页

百团大战始末 王政柱著 广东人民 1989年10月 289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第一册：文献选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党史资料 1989年11月 二册

论牺盟会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著述选辑) 薄一波著 中共中央党校 4月 501页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 雷云峰主编 三秦 5月 438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 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编 陕西人民 1989年8月 599页

苏中抗日根据地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合编 中共党史资料 4月 635页

保山地区史志文辑 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志 保山地区行政公署史志办公室编 德宏民族 1989年12月 410页

将军忠勇震瀛寰：纪念张自忠殉国五十周年：山东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八辑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 山东人民 4月 280页

山东抗日根据地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
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
资料 1989年7月 526页

缅甸、中日大角逐 陈立人著 解放
军文艺 9月 398页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上海市档案
馆 档案 3月 605页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 禹硕基等主
编 辽宁大学 1989年12月 640页

苏北历次大惨案 中央档案馆编 中
华 1989年9月 714页

日本侵略军在山东的暴行 方正主编
山东人民 1989年7月 332页

济南日特机关罪行录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山东省济南市委委员会文
史资料委员会编 济南 9月 267
页

日伪北京新民会 北京市档案馆编
光明日报社 1989年12月 405页

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 秦钦峙、汤家麟著
云南人民 1989年12月 256页

烽火巾帼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
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 中国妇女
2月 531页

黑龙江妇女的抗日战争 中共黑龙江
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黑龙江人民
3月 21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共党史
1989年6月 514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共中央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
料 1989年11月 470页

十、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

全国解放战争史专题研究 田为本著
陕西人民 1989年11月 189页

解放战争时期辽东三地委 李涛主编
沈阳 1989年5月 320页

解放战争实录：两种命运的决战 解
力夫著 河北人民 8月 1册

淮海战役图册 《淮海战役图册》编
辑委员会编 上海教育、上海人民
美术 9月 139页

广西解放纪实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
馆编著 广西人民 1989年7月
345页

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 王元年等
著 黑龙江教育 1989年10月
449页

一九四八年昆明“反美扶日”运动
中共昆明市委党史办公室、云南省
档案馆编 云南人民 1989年5月
454页

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
地区革命史资料 中共北京市委
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大学 1989年
12月 778页

重庆谈判 李勇编写 新华 6月
39页

十一、中国共产党史

指令与自主：共产国际·苏联·中国革
命 孙武震等编著 上海社会科
学院 3月 284页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周城、

李申文著 云南人民 3月 307页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 中共党史资料 1989年8月 286页

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 朱成甲著 河北人民 1989年7月 537页

李大钊遗文补编 姚维斗、杨芹编注 黑龙江人民 1989年9月 179页

智慧的曙光：毛泽东早期、建党和大革命时期著作研究 陈建中、金邦秋著 陕西人民 1月 200页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范荣祥、张继良主编 黑龙江人民 10月 356页

中共党史学史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 3月 412页

中共党史新论：革命史资料第12期 上海人民 6月 143页

中共党史论集 郭德宏著 经济日报 1989年9月 362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史 林之达主编 四川人民 6月 308页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 姜华宣、王德夫主编 江西人民 1989年9月 726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年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 4月 835页

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 1989年6月 245页

中共党史资料：第33~35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 2~9月 3册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 1989年1月 308页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抗日战争时期(二)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 1989年10月 232页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浙江大学 1989年10月 193页

内蒙古党史资料：第一辑 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内蒙古人民 1989年11月 266页

中国共产党在吉林活动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吉林人民 1989年10月 458页

中共宁夏地方史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宁夏组织史资料编辑组编 宁夏人民 1989年9月 256页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1937、7~1938、12；第二卷1939、1~1939、2 山西省档案馆编 山西人民 1989年12月 2册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 文献部分：1945、8~1949、9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 山东大学 1989年6月 2册

中共江苏党史大事记：1919~1949 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

省档案馆编 中共党史资料 6月
402页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二、四十三卷
胡华主编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 1989年12月、1990年
1月 二册

白区斗争纪实 陈绍畴等编著 北京
师范学院 8月 330页

十二、政治

孙中山研究：第2辑 广东省孙中山
研究会主编 广东人民 1989年10
月 412页

孙中山思想新探 刘德军、陆建洪等
编著 档案 1989年3月 236页

孙中山集外集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
上海人民 7月 904页

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 (美)陈
福霖著 中山大学 6月 324页

周恩来选集(下) 周恩来著 外文
1989年 613页

周恩来研究文集 重庆党史工委编
重庆 1989年7月 268页

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研究选萃 吕星
斗、白云涛主编 中共党史 9月
737页

张闻天研究文集：第1集 张培森主
编 中共党史资料 6月 436页

张闻天文集：第1卷 张闻天选集编辑
组编 中共党史资料 8月 572页

伟大的实践 光辉的思想——邓小平革
命活动大事记 李辛芝 王月宗
编著 华龄 3月 317页

邓小平文选：1938~1965 人民

1989年9月 357页

于右任集 刘永平编 陕西人民
1989年11月 439页

邓恩铭遗作选 柏文熙、黄长河编
贵州人民 6月 106页

清末社会思潮 吴雁南等主编；王劲
等著 福建人民 8月 547页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朱日耀主编
宝成关等著 吉林大学 5月 397
页

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 吴剑杰编著
武汉大学 1989年12月 229页

中国政治制度史 韦庆远主编 中国
人民大学 1989年5月 622页

中国政治制度史 李天庆等编著 学
苑 1989年12月 292页

中国政治制度史 王惠岩、张创新著
吉林大学 1989年11月 2册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 高军等主编
华夏 3月 892页

中国近代人事制度 林代召主编 劳
动人事 1989年9月 563页

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 路哲著 福建
人民 5月 335页

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 赵效
民主编 人民 5月 446页

步向民主——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民主
思想 林启彦著 香港中华书局
1989年6月 272页

中国法制史稿 薛梅卿、叶峰著 高
等教育 5月 517页

中国近现代暗杀内幕——现代部分 郑
淑芬等编著 吉林大学 1月 279页

中统兴亡录 柴夫编著 中国文史

1989年5月 188页
民国第一案 王作贤等主编 山东人
 民 7月 296页
中国政协简史 朱令名编著 新疆大
 学 1989年7月 206页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 孟广涵主
 编 重庆 1989年10月 759页
**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中文论文** 郭梁玉编 中
 国华侨出版公司 8月 262页
**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中英文论文** 郭梁玉编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8月 487页
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 刘联珂编著
 5月 216页
中国秘密社会史 (日)平山周编著
 河北人民 5月 180页
中国秘密社会 蔡少卿著 浙江人民
 1989年9月 385页
现代华北秘密宗教 李世瑜著 上海
 文艺 7月 175页
三教九流江湖秘密规矩 金老佛编著
 河北人民 5月 146页
青红帮之黑幕 生可编 河北人民
 5月 150页
洪门史 戴魏光编著 河北人民 5
 月 176页
洪门志 朱琳编著 河北人民 5月
 237页
清门考源 陈国屏编著 河北人民
 5月 314页
国共关系研究 张广信等主编 陕西
 人民教育 3月 512页
国共两党关系史 苏仲波、杨振亚主

编 江苏人民 7月 402页
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 李良志、王顺
 生著 福建人民 8月 406页
中国现代多党合作简史 李世平主 编
 四川大学 1989年12月 305页
中国国民党党史：1894~1988 苗建
 寅主编 西安交大 5月 707页
中国国民党史 宋春编著 吉林文史
 4月 669页
中国民主党派创始人传略 宋玛利、
 郑延泽编著 河南大学 1989年10
 月 295页
中国民主党派史纲：民主革命时期 刘
 秉扬编著 西北大学 1989年12月
 225页
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 张
 军民著 华夏 1989年8月 735页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1930~
 1990**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 6
 月 174页
中国农工民主党六十年 中国农工民
 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物
 7月 1册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 徐素华编著
 中国卓越 4月 223页
中国工人运动史纲 李景华等著 吉
 林文史 8月 328页
福建工人运动史：1840~1949 福建
 省总工会编 中国工人 5月 245
 页
中国妇女生活史 陈东原著 上海文
 艺 6月 440页
妇女运动简史 林苏、李春梓编著

广东高等教育 8月 237页
 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 上海
 市妇女联合会编 上海人民 7月
 298页
 中国婚姻发展史 郎太岩、张一兵编
 著 黑龙江教育 5月 342页
 南洋华侨史 陈碧笙主编 江西人民
 1989年7月 506页
 东南亚华侨史 朱杰勤著 高等教育
 5月 279页
 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 (日)游仲勋
 著 郭梁、刘晓民译 厦门大学
 1987年7月 166页
 美国华侨史 杨国标等著 广东高等
 教育 1989年6月 545页
 美洲华侨华人史 李春辉、杨生茂主
 编 东方 6月 753页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
 东卷 林金枝、庄为玘编著 福
 建人民 1989年10月 756页
 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 (英)
 凯特著 王云翔等译 厦门大学
 1988年12月 298页
 日本华侨研究 陈昌福著 上海社会
 科学院 1989年9月 180页

十三、军事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 吴信
 忠、张云主编 军事科学 9月
 669页
 黄埔军校史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供稿 档案 1987年7月 12册
 黄埔军校同学录 湖南省档案馆校编
 湖南人民 1989年7月 1634页

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
 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
 9月 238页
 中国近代海军史 胡立人、王振华主
 编 大连出版社 2月 543页
 陈绍宽与中国近代海军 陈书麟编著
 海洋 1989年10月 100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
 会编 解放军 1989年10月 500页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 《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
 委员会 解放军 2月 284页
 红军第二师第四师史 刘林松、江铁
 军著 广东人民 1989年9月 215
 页
 新四军研究资料索引 魏蒲、陈广相
 编 江苏人民 8月 271页
 刘邓大军征战记：第四卷 陈斐琴等
 编 云南人民 2月 478页
 刘邓大军西行记 雁翼等编选 湖南
 文艺 1989年8月 450页
 广西将军传 黄立秋、韦秀康主编
 广西人民 1989年11月 335页
 徐向前元帅 解放军画报社编辑 长
 城 1989年10月 164页
 聂荣臻元帅 解放军画报社编辑 长
 城 1989年10月 164页
 彭绍辉日记 彭绍辉著 解放军
 1989年9月 285页
 红军名将李明瑞 覃尚文编著 广西
 教育 1989年12月 343页

十四、经济

- 王亚南文集：第5卷：文化与教育
《王亚南文集》编委会编 福建教育 1989年8月 352页
- 陈岱孙文集 陈岱孙著 北京大学 1989年11月 2册
- 柳随年选集 柳随年著 山西人民 1989年9月 673页
- 徐雪寒文集 徐雪寒著 中国财政经济 1989年9月 440页
-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 严中平主编 人民 1989年10月 2册
- 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 颜鹏飞等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 1989年9月 481页
-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 李占才主编 安徽教育 3月 443页
-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 蒋建平等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 7月 496页
-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 魏宏远主编 档案 5月 395页
-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 谭克绳等主编 华中师大 1989年12月 254页
- 中国近代工业史 祝慈寿著 重庆 1989年7月 972页
- 辽宁近代经济史：1840~1949 张福全著 中国财政经济 1989年12月 801页
- 安徽近代经济史 程必定主编 黄山书社 1989年6月 416页
- 西北近代工业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北近代工业》编

写组编 甘肃人民 1989年12月
590页

- 江西近代工矿史资料选编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江西人民 1989年11月 581页
- 四川近代工业史 张学君 张莉红著 四川人民 1月 506页
- 中国近代造纸工业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编 上海社科 1989年12月 310页
- 贵州省志：煤炭工业志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 1989年5月 448页
- 山东公路史：第一册：古代道路、近代公路 陈汉章等编 人民交通 1989年9月 193页
- 四川公路交通史：上册 王立显主编 四川人民 1989年7月 392页
- 青海公路交通史：第1册：古代道路交通、近代公路交通 青海公路交通史编委会编 人民交通 1989年7月 356页
- 湖北公路史：第1册：古代道路、近代公路 湖北公路史志编审委员会编 人民交通 5月 200页
- 镇江交通史 张立主编 人民交通 1989年2月 510页
- 广西公路运输史：第1册：近代部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运输管理局编 广西人民 6月 236页
- 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 蒋祖缘主编 人民交通 1989年9月 374页
- 厦门交通志 《厦门交通志》编纂委

员会编 人民交通 1989年6月
359页

近代山西农业经济 山西省农业区划
委员会编 农业 5月 341页

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
编：1874~1907；第1卷：1874
~1877 陈霞飞主编，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合编 中华书局 6月
740页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9：上、
下册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联
合会编 天津人民 1989年9月 2
册

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
人民 1月 472页

近代上海金融市场 洪霞管、张继凤
著 上海人民 1989年9月 284页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1）：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人民币 马飞海等主
编 上海人民 1989年11月 647
页

民国时期四川货币金融纪事：1911~
1949 田茂德、吴瑞雨编 西南
财经大学 1989年11月 447页

云南历史货币 汤国彦主编 云南人
民 1989年11月 335页

十五、文化

传统与反传统 王元化编著 上海文
艺 4月 239页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 王举忠、王治主

编 辽宁大学 1989年7月 277页

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 李侃著 文化
艺术 9月 353页

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文化：中日近代启
蒙思想比较 崔世广著 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 1989年8月 167页

近代经学与政治 汤志钧著 中华
1989年8月 393页

智者的迷惘——晚清士大夫中西文化观
演变的缩影 刘福祥著 吉林文
史 6月 229页

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第4卷
季甄馥等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
1989年9月 807页

中国近代现代哲学史论集 中国哲学
史学会、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师
大哲学研究所编 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10月 366页

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 忻剑飞、方松
华编 复旦大学 1989年1月 679
页

中国近代道德启蒙 吴熙钊著 吉林
文史 6月 284页

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 郭朋等著
巴蜀书社 1989年10月 392页

清诗纪事：十四、十五：道光朝卷；十
六：咸丰朝卷；十七：同治朝卷；
十八~二十一：光绪宣统朝卷；二
十二：列女释道·鬼诗梦诗·民歌
谣谚选 钱仲联主编 江苏古籍
1989年5月~7月 9册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
兴起（美）柯文著 林同奇译
中华 1989年7月 228页

毛泽东思想概论 毛世信编著 陕西
人民教育 2月 338页

毛泽东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兴盛 胡为
雄著 湖北教育 1989年11月
237页

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 毕剑横著
四川人民 5月 224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第1卷 庄福龄
主编 江西人民 5月 349页

毛泽东著作哲学思想提要 张瑞生主
编 陕西人民 6月 243页

毛泽东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王功安、官
本滔主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6月 312页

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肖功达著 东
南大学 1989年12月 229页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潘
宝卿著 广西师范大学 5月 359
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
毛泽东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
编辑组编 湖南出版社 7月 739
页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
平 陈云哲学思想概要 龙平
平、张宁生主编 高等教育 7月
241页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史华
兹著 叶凤美译 江苏人民 1989
年7月 237页

严复研究资料 牛仰山、孙鸿霓编
海峡文艺 1月 175页

胡适与中西文化 王鉴平、杨国荣著

四川人民 4月 291页

论王国维 陈元晖著 东北师范大学
1989年11月 326页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 郭
齐勇整理 三联书店 2月 413页

中国教育史 胡云汉编著 兰州大学
2月 375页

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 董宝良
著 人民教育 8月 456页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
期教育 璩鑫圭编 上海教育
6月 527页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 朱有
璩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 6月 827
页

中国农业教育纪事：1840~1983 费
旭主编 江苏教育 1989年8月
500页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
宋恩荣、张成主编 江苏教育
7月 774页

鲁迅研究概要 刘泰隆等著 广西教
育 1989年12月 157页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
1983索引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 中国文
联 7月 258页

郭沫若史学研究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
会、巴蜀文化研究基金会编 成都
9月 460页

闻一多教育文集 刘烜选编 江苏教
育 8月 259页

徐特立教育学 吉多智等编 广东人
民 5月 363页

- 陶行知佚文集 上海市陶行知研究会
等编 四川教育 1989年6月 228
页
- 周扬文集:第三卷 周扬著 人民文
学 9月 396页
- 杨贤江传记·金立人、贺世友编著
江苏教育 3月 313页
-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 孙培青、郑登
云编 华东师范大学 1989年10
月 348页
- 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 蒋行知主
编 上海人民 4月 226页
- 吴汝纶尺牍 吴汝纶著 徐寿凯、施
培毅点校 黄山书社 2月 416页
-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四川省政协巴中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四川大学
8月 317页
- 晏阳初文集 晏阳初著 詹一之编
四川教育 3月 452页
- 梁实秋文学回忆录 梁实秋著 陈子
善编 岳麓书社 1989年1月 459
页
- 梁漱溟全集:第2卷 中国文化书院
学术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 3月
699页
- 陈垣来往书信集 陈智超编注 上海
古籍 6月 833页
- 蒋南翔纪念文集 清华大学《蒋南翔
纪念文集》编辑小组编著 清华大
学 4月 457页
- 雷沛鸿文集:上册 韦善美主编 广
西教育 1989年10月 453页
- 范寿康教育文集 宋恩荣编 浙江教
育 1989年11月 346页
- 姜立夫教授纪念册:1890~1978 吴
大任编 南开大学 1989年9月
111页
- 何炳松纪念文集 刘寅生等编 华东
师大 6月 601页
- 何炳松论文集 刘寅生等编校 商务
2月 585页
-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
1949、9. 皇甫束玉等编 教
育科学 1989年8月 416页
- 苏区教育史 赖志奎编著 福建教育
1989年10月 291页
-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
王文俊等选编 南开大学 1989年
10月 888页
- 中华民国文化史 史全生主编 吉林
文史 4月 3册
-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张岱年、程宜
山著 中国人民大学 7月 406
页
- 中国文化发展的转机 夏禹龙主编
知识 1989年9月 365页
- 中国近代文化问题 《中华近代文化
史丛书》编委会编 中华 1989年
2月 424页
-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1卷 郭廷
礼著 山东教育 3月 714页
- 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 韩斌生著
江苏人民 1989年4月 231页
- 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
吉明学、孙露茜编 上海文艺 3月
665页
-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下卷
贾植芳主编 江苏教育 1989年5

月 2册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

1916 严家炎等主编 北京大学

1989年12月 301页

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 丁景唐

主编 展望 2月 521页

新华日报史：1938~1947 韩辛茹著

重庆 3月 496页

中国京剧史：上卷 苏移等主编 中

国戏剧 1月 677页

京剧二百年概观 苏移著 燕山 8月

403页

中国四大名旦 许姬传等著，宋清江

编 河北人民 7月 420页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话剧运动 孙晓

芬编著 四川大学 1989年6月

403页

十六、地方史志、民族史

方志学 李泰芬编著 河北人民 5

月 319页

当代方志学探论 张仲炎著 巴蜀书

社 1月 249页

新志书编纂求索 张其卓主编 辽宁

人民 6月 312页

古今北京 周沙尘著 东方 1989年

12月 517页

北京革命史大事记：1919~1949 中

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

史资料 1989年10月 380页

北京三百六十行 齐如山著 宝文堂

书店 1989年12月 168页

上海最早的种种 吴申元著 华东师大

1989年10月 170页

上海的过去 王银生等编写 上海社

会科学院 1989年6月 91页

上海解放 上海市档案馆编 档案

1989年5月 386页

旧上海三百六十行 夏林根 华东师

大 1989年10月 195页

旧上海茶馆酒楼 吴承联著 华东师

大 1989年10月 147页

黄埔港史：古、近代部分 吴家诗主

编 人民交通 1989年6月 322页

吉林省编年纪事：1653~1985 王季

平主编 吉林人民 1989年12月

二册

安徽近代史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翁飞等著 安徽人民 1月

519页

齐鲁百年风云录 戚其章主编 山

人民 5月 374页

桑植起义 中共桑植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中国地质大学 1月 396页

湖北民族史 吴永章著 华中理工大

学 3月 195页

江苏史话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编 江苏教育 1989年7月

434页

镇江港史 赵增麟等编 人民交通

1989年6月 280页

南通港史 陈永明主编 人民交通

1989年5月 246页

温州港史 周厚才著 人民交通 2月

325页

宁波港史 郑绍昌主编 人民交通

1989年2月 692页

西安解放档案史料选辑 西安市档案

- 局, 西安市档案馆编 陕西人民
1989年7月 600页
- 甘肃近现代史 丁焕章主编; 兰州大学 1989年10月 582页
- 甘肃省志 第一卷: 概述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甘肃人民 1989年12月 181页
- 甘肃省志 第二卷: 大事记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甘肃人民 1989年12月 591页
- 甘肃省志 第二十五卷: 机械工业志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甘肃省机械工业志编辑室编 甘肃人民 1989年12月 377页
- 我与新疆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当代新疆》丛书编委会编 新疆人民 1989年8月 305页
- 福建海防史 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编 厦门大学 4月 480页
- 福建革命纪事 林骥主编 唐闻观荣编 福建教育 6月 276页
- 厦门的租界: 厦门文史资料 第16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鹭江 5月 290页
- 粤海近代史谭 沙东迅著 华南理工大学 1989年10月 287页
- 海峡两岸首次台湾史研究学术交流论文集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历史研究室编 厦门大学 7月 294页
- 台湾通史辨误 邓孔昭编著 江西人民 4月 350页
- 香港旧事见闻录 陈谦著 广东人民 1989年8月 389页
- 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 1989年12月 478页
- 四川近代史稿 陶澍涛主编 四川人民 4月 828页
-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 1989年5月 三册
- 贵州革命史 何长风主编; 丁芝珍等编写 贵州人民 1989年12月 373页
- 历史造就的统一体: 西藏地方和历代中央政权关系简介 西藏社会科学院《历史造就的统一体》编写组编 西藏人民 6月 48页
- 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 1919~1949 《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编写组编 四川民族 2月 250页
- 藏族传统文化概述 佟锦华著 中国藏学 2月 150页
- 维吾尔族简史 《维吾尔族简史》编写组编 新疆人民 1989年8月 409页
- 岭外壮族汇考 谢启昆等编 广西民族 1989年12月 916页
- 彝族史料集 魏治臻编 四川民族 1989年10月 312页
- 彝族文化史 马学良等著 上海人民 1989年12月 696页
- 中国朝鲜民族迁入史论文集 韩俊光主编 黑龙江朝鲜民族 1989年12月

月 455页

瑶族 黄钰, 黄方平著 民族 3月

100页

黎族 邢关英著 民族 4月 99页

仡佬族简史 《仡佬族简史》编写组

编著 贵州民族 1989年9月 172

页

白族 詹承诸 张旭著 民族 3月

173页

土族 郭琰著 民族 2月

84页

乌孜别克族 罗建生著 民族 4月

71页

萨满教与东北民族 刘小萌, 定宜庄

著 吉林教育 3月 197页

锡伯族 嵇南, 吴克尧著 民族 2

月 82页

十七、中外关系

清朝柔远记 (清)王之春撰 赵春

晨点校 中华书局 1989年6月

524页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

年) 吴东之主编 河南人民 2

月 795页

民国外交简史 曹学恩, 徐广文主编

陕西人民 1989年5月 523页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 周一良著 江西

人民 6月 264页

日本人与中国人: “同文同种”观的危

险 (日)陈舜臣著; 李道荣,

林文铸译 福建人民 1989年7月

146页

中国人和日本人 (日)松本一男著

王枝忠译 宁夏人民 1989年11月

198页

中美关系演化 张其昌, 王国钧主编

东北化工学院 1月 285页

简明中美关系史 蒋相泽, 吴机鹏主

编 中山大学 1989年12月 354页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1946~1949 (美)肯尼斯·雷

约翰·布鲁尔编 尤存, 牛军译

江苏人民 7月 316页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中美关系的历史剖

析 (美)孔华润著 张静尔译

复旦大学 1989年8月 277页

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

(美)许烺光著 彭凯平等译

华夏 5月 376页

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 中英关系:

1840——1986 朱宗玉等著 福建

人民 8月 281页

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

利的反应 (美)爱德温W·马丁

著 姜中万等译 中共党史资料

1990年 268页

使华记: 1893~1897 (法)A·施阿

兰著 袁传璋、郑永慧译 商务印

书馆 1989年 6月 222页

历史文献补编: 17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

译 郝建恒等译 商务 1989年

12月 400页

沙俄侵华史 第四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编 人民 4月 531

页

中苏关系(1689~1989) 林军著 黑

龙江教育 1989年4月 233页

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 林军著

黑龙江人民 7月 251页

十八、人物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人物 尹恺德主编

重庆大学 8月 607页

中国科学家回忆 第二辑 九三学社中

央研究室编 学苑 1月 247页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第十一辑

陈翔华写编 书目文献 7月 340
页

中国现代医学家传 第二卷 吴阶平主

编 湖南科学技术 1989年9月

380页

中国现代农学家传(二) 金善宝主

编 湖南科学技术 1989年8月

520页

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 高

振农、刘新美著 华东师范大学

5月 320页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三) 《经

济日报》主编 辽宁人民 1989年

12月 448页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五)

《经济日报》主编 辽宁人民 4

月 638页

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家名录 中国科

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

院地学情报网编 甘肃科学技术

3月 653页

革命烈士传(四) 《革命烈士传》

编委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 1月

458页

向警予传 何鹤志著 上海人民 4

月 210页

邓恩铭 李肇年、刘昕编著 贵州人

民 6月 96页

邵飘萍传略 旭文编 北京师范学院

8月 187页

评梅女士年谱长编：阳泉文史资料专辑

李庆祥著 文津 6月 242页

刘亚雄纪念集 吉林人民 1989年12月

364页

左权传 王孝柏、刘元生著 人民

5月 366页

韦拔群传 黎国轴、严永通著 广西师

大 1989年11月 175页

人民教育家车向忱 车树实、威雪芬

著 辽宁人民 1989年12月 362页

王右木研究 中共江油市委党史工委

编 四川大学 1989年11月 262页

左宗棠评传 王天奖编著 河南教育

8月 389页

黄遵宪 徐永端著 上海古籍 1989

年11月 142页

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 詹同济编译

1989年12月 172页

张之洞传 孙华峰、王佩元著 河北

人民 1989年7月 439页

王韬评传 忻平著 华东师范大学

4月 251页

李大钊史事综录：1889年~1927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

会编 北京大学 1989年10月 894

页

李大钊 《李大钊》画册编辑委员会

编 解放军文艺 1989年11月

207页

李大钊与天津 刘民山著 天津社会
科学院 1939年12月 288页

李大钊在河北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
料征集编审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
1989年7月 218页

诸夏怀霜 罗宁著 天津 1月
101页(纪念瞿秋白学术著作)

领袖·元帅·战友 薄一波著 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11月
242页

1915~1976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 贾
思楠编 江苏文艺 1989年6月
400页

青年毛泽东 高菊村著 中共党史资
料 3月 317页

走近毛泽东:一个外国人与新中国元首
的交往 蒋建农,曹志为著 团
结 1月 120页

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 武原主编 华
岳文艺 1989年10月 451页

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周恩来研究国际学
术讨论会文集 刘焱主编 南开
大学 6月 618页

刘少奇在皖东 《刘少奇在皖东》编
审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9月 192页

张闻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
共党史资料 7月 1册

张闻天在合江 魏燕茹主编 中共党
史资料 6月 436页

张闻天在无锡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工
作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 7月
165页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纪念

馆编 中共党史资料 8月 191
页

蔡畅传 苏平著 中国妇女 2月
282页

邓颖超革命活动七十年大事记:1919.
5.4~1989.5.4 中华妇女联合会
编 中国妇女 2月 163页

胡耀邦传 田国良,孙大勋主编 中
共党史资料 6月 30页

宋庆龄传 尚明轩、唐宝林著 北京
8月 612页

宋庆龄与何香凝 唐瑛等著 中国
和平 6月 119页

往事追寻忆贺龙 中共桑植县委党史
办,政协桑植文史委员会主编 中
国地质大学 1989年6月 83页

笔祭陶铸 《陶铸文集》编辑组编
人民 3月 628页

张平化回忆录 张平化著 湖南人民
1989年12月 142页

林枫传略 穆欣著 黑龙江人民 5
月 353页

纪念季方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
3月 142页

乌兰夫传:1906~1947 郝玉峰著
内蒙古人民 2月 486页

乌兰夫纪念文集 第1辑 乌兰夫革命
史料编研室编 内蒙古人民 10月
388页

杨杰将军思想研究 杨德慧著 云南
人民 1989年9月 320页

敌营二十年:廖运周将军的非凡经历
张圣芬,牛耕著 中国青年 6月

321页
 杨成武回忆录 (下册) 杨成武著
 解放军 8月 711页
 刘震回忆录 刘震著 解放军 10月
 416页
 谷云亭 安岗主编 天津人民 5月
 165页
 从闽西到京西 刘忠著 厦门大学
 1989年6月 226页
 朱执信评传 张瑛著 河南教育
 8月 323页
 邵元冲日记(1924~1936) 邵元冲著
 王仰清等标注 上海人民 10月
 1446页
 胡汉民评传 须立求著 河南教育
 8月 369页
 熊克武传 周富道、马宣伟著 重庆
 1989年10月 287页
 民国奇才于右任 陈四长、潘志新著
 中国青年 1989年6月 330页
 回忆冯玉祥将军 丘权政编 北岳文
 艺 8月 616页
 忧满黄河：邓宝珊传 黄英著 甘肃
 少年儿童 1989年9月 350页
 黄炎培 尚丁著 人民 5月 221页
 刘文辉史话：1895~1976 彭迪先主
 编，舒国藩，王维明编纂 四川
 大学 5月 220页
 回忆吴宓先生 黄世坦编 陕西人民
 7月 209页
 郑桐荪先生纪念册 政协吴江县委
 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吴江柳亚子纪
 念馆编 江苏教育 1989年10月
 161页

火柴大王刘鸿生 张圻福、韦恒著
 河南人民 10月 244页
 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 许家骏，韩
 淑芳整理 中国文史 1989年8月
 161页
 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40辑 浙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 浙江人民 3月 170页
 竺可桢传 《竺可桢传》编辑组著
 科学 2月 369页
 刘半农年谱 徐瑞岳编著 中国矿业
 大学 1989年11月 203页
 新闻巨子——羊枣传记 吴德才著
 中共党史资料 3月 238页
 冰心传 卓如著 上海文艺 3月
 546页
 王统照 冯光廉、刘增人编 人民文
 学 9月 305页
 萧乾评传 王嘉良、周健男著 国际
 文化 6月 392页
 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田
 永烈著 人民文学 1月 361页
 我的回忆 胡愈之著 江苏人民
 7月 379页
 蒋介石和宋美龄 简洁，孟忻编著
 吉林文史 1989年6月 192页
 蒋介石与黄埔三杰 尹家民著 中共
 中党校 8月 284页
 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 谢本书、
 牛鸿宾著 河南人民 10月
 360页
 蒋经国全传 王金海，佐恩著 吉林
 人民 1989年8月 565页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贾英华著 群

众、解放军 1989年6月 543页
 爱新觉罗·溥仪画传 李淑贤、王庆
 祥编 上海人民 8月 26页
 阿德哥与上海滩 王泰栋著 中国文
 史 1989年12月 173页
 山西王阎锡山 蒋顺英、李良玉主编
 河南人民 10月 294页
 伪满人物——伪总理大臣秘书官的回忆
 高丕琨著 《长春史志》编辑部编
 辑出版 1988年3月 280页
 陈纳德 (美) 杰克·萨姆森著
 石继成等译 东方 5月 387页
 史迪威与蒋介石 苑鲁、王敏著
 庆 1月 377页

十九、资料及工具书

近代史资料：总75、76号 章伯锋主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
 学 1989年11~12月2册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
 1937；第五册(下)：1937~
 1945 彭明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1月、5月 2册
 中国大事辑要：1919~1949 力平著
 湖北人民 1989年6月 326页
 中国革命史上的今天 朱佳木主编
 知识 1989年10月 463页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李文海等著
 南教育 3月 896页
 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浙
 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 浙
 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
 人民 2月 485页

中华文化辞典 丁守和主编 广东人
 民 1989年5月 1225页
 华夏文化词典 张龙虎等主编 华夏
 1988年12月 1009页
 社会科学大词典 彭克宏主编 中国
 国际广播 1989年10月 1180页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 陈荣
 富、洪永珊主编 浙江大学 3月
 882页
 中国藏书家辞典 李玉安、陈传艺编
 著 湖北教育 1989年9月 373页
 中国政治制度辞典 刘国新主编 中
 国社会 3月 968页
 中国经济史辞典 赵德馨主编 湖北
 辞书 8月 948页
 中国青年运动词典 张静如等主编 河
 北人民 1989年7月 412页
 中国出版人名词典 中国出版科学研
 究所、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编 中国
 书籍 1989年12月 948页
 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 高文德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中
 国社会科学 5月 805页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 中国史学
 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人民 7月 630页
 中国工运史辞典 《中国工运史辞
 典》编写组编 劳动人事 3月
 50,878页
 中国人物年鉴(1990) 李方诗等编
 华艺 11月 466页
 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 廖盖
 隆等主编 上海辞书 2月 675页
 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1

1992

《近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任 丁守和

委员 丁守和 从翰香 龙盛运 刘存宽

陈铁健 张振鵬 金冲及 夏良才

耿云志 梁尚贤 龚书铎 曾业英

蒋大椿（按姓氏笔划排列）

近 代 史 研 究

1992年第1期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内总发行	《近代史研究》发行组
编辑者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夏 良 才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副主编	梁 尚 贤		北 京 399 信 箱
编辑部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 政 编 码 100006)	国外代号	BM-298
出 版 者	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刊号	ISSN1001—6728
印 刷 者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CN11-1215/K

国内定价 3.00元